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5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文物中国史

5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物中国史·三国两晋南北朝 /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40-2647-7

I.文…II.中… III.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普及读物②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代—普及读物③文物—中国—三国时代—图录④文物—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图录 IV.①K209②K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4450号

《文物中国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与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山西教育出版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文物中国史·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

编者: 中国国家博物馆
出版发行: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总 责 编: 王宇鸿 张金柱

责任编辑: 李梦燕

助理编辑: 郭志强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张金柱

装帧设计: 孟 孟(香港)

排版制作: 陈先英(香港) 李秋云(香港)

责任印制: 林佳年(香港)

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万福工业区)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全套定价: 800.00元

《文物中国史》编辑委员会

主 任：朱凤瀚

副主任：李 季 董 琦

委 员：王冠英 信立祥 孙国璋 高世瑜 王冠倬 刘如仲

编 者：

史前时代：李 季 安家瑗 孙其刚（绘图：郑 婕）

夏商周时代：李维明

春秋战国时代：王冠英 韩 钟

秦汉时代：陈成军 王永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孙国璋 邵小萌

隋唐时代：高世瑜 胡晓建 梁 丰

宋元时代：黄燕生 陈 煜

明清时代：苏生文 王 芳 李雪梅

编 务：王永红 董 青

前言

这部《文物中国史》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中国历史与考古的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的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正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年轻人或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在读者阅读本书之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先向读者说明。

一、顾名思义，所谓“文物中国史”，是以文物为线索来讲述中国历史，这当然与一般主要依据文献史料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同。文物是历史文化遗存，每一件文物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历史的实物见证，或称物化的历史。透过文物，我们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历史。所以阅读这部《文物中国史》，要比读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更生动，对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体会也会更深刻、更切近真实，因而也更适合青年人阅读。这是我们编撰本书的原因。

二、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工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三、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

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四、作为一部带有一定通史性质的著作,尽管是以文物为主述线索,仍需要有自己的科学的体系,使读者能够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较系统、较完整的过程。这是我们在确定这部著作体例时十分注意的。要保证体系的科学性,一个首要问题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本书没有采取以往较常用的以原始、奴隶、封建社会等经济社会形态名称划分中国古代史发展阶段的做法。这首先是因为这种较传统的划分方式,固然有其理论依据和合理成分,但近年来中国史学界众多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的发展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并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明发展历程进行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新认识。而且,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应是由各段社会形态特点的差异来决定的,仅以经济形态的一些变化来划分并以这些名称来概括也是不完全的。社会形态的划分,应综合考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时间处于独特的地理、自然、人文环境中,其发展在总体上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共同规律,但同时又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鉴于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尤其是其从未间断过的悠久历史、广阔的地理分布,与在世界文明史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无疑应该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所以,关于中国古代史科学的分阶段、分期问题应该从这一高度做更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分卷的形式,每卷包括中国历史上一个时段。虽然并非是对中国古代史做上述意义的分期,而只是从本书编撰方便出发设计的,分卷亦即分时段仍尽可能吸收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以若干王朝相聚合为一历史时段,与纯粹的王朝体系是不同的。被归为同一时段亦即同一卷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发展方面均大致有其可以区别于其他时段的特点。

五、本书虽带有一定的通史性质，但是是以典型文物为线索展开叙述的，文字也要求简练。这样就不可能在每一卷中都像通史著作那样，对政治、经济、文化及事件、人物等都叙述得那么系统、详备；而是要突出时代特色，在叙述清楚各时段历史背景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注意选择本阶段中那些最能体现社会进展，对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对整个世界文明史有较大影响的内容展开叙述，并不要求面面俱到。希望通过这样的编撰方法，使读者能够在熟悉文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基本内容有一个较清晰的印象。

六、作为以文物为线索来展述历史的著作，最理想的是所要叙述的每个重要史实，皆有典型文物来体现。本书虽致力于此，但显然难以完全做到。所以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凡史实能与文物结合、有典型文物表现的，即多着笔墨，以合乎本书之主旨；而无文物可表现之重要史实，则出于上述通史体例要求而必有所交代，但行文则略为简练。

说明了以上几点，相信会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内容。专家、学者们一般都有体会，写稍普及的著作其实更难，既要专业用较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述出来，同时又要准确、深刻，所谓深入浅出，实非易事。本书各卷作者致力于此，为使读者满意，已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但不尽理想之处与疏误仍在所难免，我谨代表本书编委会与作者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朱凤瀚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第一章 三国的建立与发展 2

- 第一节 三国的建立 2
- 第二节 北方的魏国 18
- 第三节 西南的蜀汉 27
- 第四节 江南的吴国 33



第二章 西晋的短期统一 42

- 第一节 西晋的政治和经济 42
- 第二节 八王之乱 50
- 第三节 西晋灭亡 53



第三章 东晋与南朝各代的更迭 58

- 第一节 偏安江南的东晋 58
- 第二节 东晋末年的政治与风气 65
- 第三节 南朝政权的更替 69
- 第四节 南方经济的发展 82



第四章 十六国政权与北魏统一北方 84

- 第一节 十六国兴亡 84
- 第二节 北魏在北方的统治 99



第五章 北魏之后的东西分立 114

- 第一节 从北魏到东西魏 114
- 第二节 从东魏到北齐 117
- 第三节 从西魏到北周 125



第六章 中外交流 130

- 第一节 使节往来 130
- 第二节 货通中外 133
- 第三节 弘法与取经 135

第七章 科学技术 138

- 第一节 圆周率研究的进步 138
- 第二节 天文与历法 138
- 第三节 医药学 140
- 第四节 机械与冶金 140
- 第五节 瓷器制造 143
- 第六节 造纸与纺织 148
- 第七节 地理学 149
- 第八节 农学 151

第八章 文化艺术 152

- 第一节 玄学兴盛 152
- 第二节 佛教的广泛传播 154
- 第三节 道教的发展演进 166
- 第四节 文学的勃兴 170
- 第五节 史学著述的繁盛 174
- 第六节 书法的成就 175
- 第七节 绘画的代表作 178
- 第八节 雕塑艺术的旧趣新风 184
- 第九节 音乐舞蹈 192

参考书目 196

图片索引 197

Arch 40.0



文物中国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一章

三国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 三国的建立

东汉时期，士族门第是步入仕途的阶梯，世家大族是豪门望族的基石。东汉后期，朝廷黑暗，政治腐败，外戚宦官相互争斗，交替专权，迫使农民流离失所，起义不断。董卓专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各地豪强地主纷纷修筑坞堡，加强武装实力以自保。州郡官吏、士族集团也以勤王讨董卓为名，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经过数年的兼并战争，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割据势力。

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今河北、山西及山东的东部和北部），称雄北方；曹操占据兖、豫二州（今山东西南部与河南），控制中原腹地；孙策占据江东（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刘表占据荆州（今湖北、湖南）；此外还有割据凉州（今甘肃）的韩遂、马腾，占

有辽东的公孙度。刘备由于实力不足，被逼辗转投靠袁绍、刘表，没有固定的地盘。

袁绍，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人，出身于“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世家大族。他凭借显赫的家世，得到官僚士大夫的支持，在众多地方割据势力中实力最为雄厚。

曹操，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曾任中常侍，桓帝时封费亭侯。当时宦官与士族水火不容，曹操是一个有远见的人物，他不受家庭因素影响，反而注重与名士交往。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曹操依靠一批豪强地主的支持，很快就占据了兖州的广大地区。192年，在击败青州黄巾军后，曹操得降卒三十万人，选拔其精锐，号称“青州兵”，其实力大为增强，从此不再依附袁绍。196年，曹操又进军豫州，击败汝南（今河南汝南）和颍



川（今河南禹县）两郡的黄巾军，占据许县（今河南许昌），加强了军事力量，巩固了对兖州和豫州的统治。他的谋士荀彧提出，现在皇帝东流西徙，人们担心帝室的命运，如能迎奉献帝，正符合人们的愿望，利于笼络人心和镇服各据一方的雄杰。这一策略正合曹操心意。他遂以洛阳残破为由，亲自率兵迎汉献帝到许县，“奉天子以令不臣”，在政治上取得了有利地位。与此同时，他又在许县推行“修耕植以畜军资”的方针，实行屯田，解决了军粮问题。

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曹操陆续消灭了大大小小的一些地方势力，如袁术、陶谦、张邈、吕布等。

197年，袁术在淮南称帝，与吕布相攻。吕布是一个武人，娴于弓马，气力过人，号称“飞将”。他曾任董卓的中郎将，后与董卓产生矛盾，杀董卓之后投奔袁绍、张邈，被张邈、陈宫推举为兖州牧，成为一方势力，对抗曹操。曹操与吕布在濮阳（今属河南）作战，一度不利。两年后，曹操攻克兖州各个城池，在钜野（今属山东）打败吕布。吕布转而投奔在东面的刘备，称刘备为弟。他乘刘备进攻

袁术之机，夺取刘备所占下邳（今江苏邳县东），自称徐州刺史。袁术的大将纪灵率三万人进攻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纪灵听说吕布赶到，不敢进攻。吕布请来纪灵，说：布不喜合斗，但喜解斗。命令手下在营门举一支戟，说道：诸君观布射戟的小支，一发射中，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继续战斗。吕布射中小支，纪灵等人吃惊，说：将军天威也！不再与刘备交战。

袁术、吕布意欲结成同盟，袁术为儿子

《塙壁图》（砖画）

三国 魏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高17厘米，宽36厘米

曹操像





吕布射戟台
位于江苏沛县

求婚吕布之女，吕布同意。沛相陈珪担心袁、吕结盟后势力壮大，会成为国家的祸患，于是前去见吕布，劝说他与曹操协同，认为与袁术通婚有不义之名，必有危险。吕布追回已在出嫁路上的女儿，与曹操通好。曹操借皇帝之名封吕布为左将军。吕布派陈珪之子陈登见曹操，请求徐州牧一职。陈登对曹操说，吕布勇而无谋，轻易改变立场，应早除之。曹操也认为吕布狼子野心，难于久养，于是，与陈登约好作为内应。

结盟不成，袁术派军进攻吕布，被吕布打败。但不久，吕布又与袁术和好，派大将高顺进攻并打败刘备。曹操派夏侯惇救援刘备，也被高顺打败。曹操遂亲自征讨吕布。吕布战败，袁术也无法救援。曹操军挖壕沟围

城三月，吕布内部离心，只好投降，被曹操杀死。之后，曹操又打败了袁术。当时，在北方能与强大的袁绍势力对抗的惟有曹操。

199年，袁绍消灭公孙瓒，占据冀、青、幽、并四州，拥有几十万军队。200年，袁绍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南下，打算消灭曹操。双方发生了著名的官渡之战。这是袁绍与曹操的一次大决战。

袁绍从邺（今河北临漳）南下，屯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企图长驱直捣许县。曹操的兵力远远不如袁军，但其属下荀彧、郭嘉精辟地分析了袁曹的优劣后，认为胜算在曹军一方。他们说：袁绍礼仪繁多，公为人自然。袁处逆势，公奉天子。东汉晚期，政治宽缓，袁仍用宽政，不能统治；公为政严猛，能制御上下。袁绍外表宽厚，内心忌讳，用人而疑，信任的都是亲戚子弟；公看似简易，实际机敏明了，用人无疑，不问远近。袁绍多谋而少决断；公有了主意就立刻实行，应变无穷。袁绍盛谈谦让，士大夫喜欢言谈粉饰者多归附；公至心待人，不求虚名，士大夫忠正、有远见、有实才者都愿为之用。袁绍见人饥寒，就表现出关心的神色，而对见不到的事情就不去考虑；公对于眼前的小事时有忽略，而一遇大事所给的恩泽都超过人们的期望；袁绍属下争权，谗言四起；公以道术制御属下，没有人事纷争。袁绍对是非不明朗；公对正确的人和事给予优利，对错的用法规匡正。袁绍不懂军事；公能以少胜多。

荀彧、郭嘉所分析的曹袁的十胜十败，部分符合实际。史书记载，袁绍为人宽厚优雅，能考虑全盘，善安排，又沉得住气。他最大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是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如袁绍的谋士田丰曾劝他进攻许都，把汉献帝迁走，借以号令天下，袁绍

没有接受。另一个谋士沮授认为，连年征战，百姓疲惫，物资不足，不可出征，袁绍也不接受。在官渡之战中，田丰、许攸、沮授等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好计策，也都未被袁绍采纳。

曹操先打败了与袁绍联合的豫州刺史刘备，俘虏刘备大将关羽，驻兵黄河以南。曹操深知袁军兵力充实，黄河渡口随处可过，若沿河设防，分散兵力，势必造成被动。因此他选定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作为主要

阵地，准备在袁军主力渡河完毕时，集中兵力进行决战。战争开始，袁绍派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滑县北），曹操采纳荀攸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佯攻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然后率军直奔白马，斩颜良，袁军惨败。白马围解后，曹操南撤，袁绍又派文丑率兵渡河追击，曹军伏兵杀文丑。颜良、文丑是袁绍军中的名将，甫一交战即被曹军斩杀，使得袁军上下震惊。曹军获胜，退回官渡，寻求有利时机再战。不久，曹操得知袁军粮草



官渡之战示意图

屯放在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果断地率精兵五千夜袭乌巢,杀守将,烧军粮,袁军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投降。袁绍与其子袁谭弃军而逃,败回冀州。

官渡之战,曹操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不久,袁绍病死。袁绍的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因争夺统治权而彼此内战,曹操乘机攻取了袁氏的政治中心邺城(今河南临漳西),打败三袁及其势力,占据了中原东部地区。

袁绍与曹操在少年时即有交往,青年时同在洛阳做官,以后又一起起兵讨伐董卓。他们曾谈论自己的志向。袁绍说:我要南面凭据黄河,北面防守燕、代,争取少数民族军队,向南争天下。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雄才大略果然胜出袁绍一筹。

206年,曹操出兵进攻辽西乌桓蹋顿部。乌桓是汉代以来北方东部草原崛起的一个强悍的少数民族,东汉末年曾掠走十多万户汉族人。蹋顿部是乌桓最强大的一支。乌桓与袁绍关系很好,袁尚等人被曹操打败后投奔那里,欲借蹋顿部的帮助打回中原。

当时曹操属下有人认为,袁尚是败逃之人,与乌桓不可能互相利用,而在南边的刘备会乘机说动荆州牧刘表进攻许县。郭嘉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袁绍对汉族及少数民族有恩惠,乌桓及冀州等地的人会配合袁尚恢复政权。而刘表是尚空谈少实干的人,同时他对刘备也未必放心,可以不加顾虑。乌桓因距离中原遥远,必不防备曹军。郭嘉建议轻装迅速向北行进,出其不意地攻击乌桓。

时值夏季,雨水多,海滨地区淹水不能通行。田畴建议从荒废的卢龙道进军柳城(今辽宁兴城西南),此路较近且乌桓不加防备。这条路长五百多里,田畴率领自己的部众为曹军作向导,开山填谷一路行进。离柳城还有二百里时,被乌桓人发觉,袁尚、袁熙、蹋顿及乌桓单于楼班、能臣抵之率几万骑兵迎战。两军在白狼山相遇,曹军身穿铠甲的人数少,产生了恐惧。曹操登上高处,看见乌桓人阵容不齐,就以张辽为前锋冲击,乌桓军崩溃,首领蹋顿及乌桓众多高官被斩,乌桓人及在乌桓部落的汉族人二十多万

邺城城墙遗址





邺城三台遗址

三台是邺城的三个高台，以邺城西城墙的北段为基址。铜爵台建于210年，金虎台建于213年，冰井台建于214年。现存铜爵和金虎二台的一部分。现存金虎台南北120米，东西71米，高12米。铜爵台在金虎台的北面，现仅存台基的东南部，南北50米，东西43米，高6米。据文献记载，三台上原各有房屋100多间，冰井台上有冰室，室内有几口井，井深十五丈，用于储存冰和煤炭。三台以栈道相连。邺城三台是曹操与诸子及僚佐观景赋诗之地。

口投降。辽东太守公孙康迫斩袁尚、袁熙。

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曹操最终歼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基本上控制了北方地区。

平定袁绍以后，曹操把政治中心迁到邺城，汉献帝仍然留在许都。

考古工作者对今河北磁县的邺城遗址进行了勘察。曹魏时期的邺城遗址平面基本为长方形，东西长2400米至2620米，南北宽1700米。据《水经注》记载，曹魏邺城有七个城门。城内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宽13米，把邺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南半部是一些官署和居民区，北半部主要是宫城、一些官署和铜爵园。宫城的正殿是文昌殿，是曹操朝会客人、与群臣饮宴、举行大典之处。文昌殿东面有听政殿，曹操在这里处理日常政务。铜爵园在邺城西北部，东面与文昌殿相邻，西面与三台相邻，园内有宫殿、水池、山石、亭榭等。漳河被引入城中，筑长明沟供给用水。后来，北朝时期在曹魏邺城以南另建邺城，称邺南城，曹魏邺城就称邺北城。邺北城在西晋末年遭到严重破坏，后赵石虎时期又大规模复建。

基本平定北方地区以后，曹操想乘胜消灭侨居荆州（今湖北襄阳）的刘备，进而吞并江东的孙权，统一全国。

208年，曹操率军南下取荆州。荆州牧刘表喜欢供养士大夫，关西、兖州、豫州有学之士前往投奔的有上千人，刘表建立学校，宣讲儒学。宣威将军贾翊曾评价刘表，认为

云纹瓦当

三国 魏
邺城建筑构件

他是和平时期的三公之才，但多疑而无决断，不能处理变化，天下纷争时难以有所作为。曹操南下的主要对手实际是刘备和孙权。

刘备，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后人。刘备早年丧父，家贫，与母贩履、织席为生。十五岁时求学于大儒卢植门下。但刘备不大喜欢读书，而对玩狗、骑马、音乐、服装很感兴趣。他说话不多，敛藏锋芒，对人对事的好恶不现于脸上。一些人认为刘备不是一般人，愿意结交他，给他钱财，刘备自己也喜好结交民间豪侠。

东汉末年，刘备以汉朝宗室后裔的名义组织武装，笼络人心，逐渐扩大了势力。他带领结交的一些年轻人跟随官军镇压黄巾军有功，先后被任命为一些县里小官，实力较弱，不能独立自存，先后投奔中郎将公孙瓒、青州刺史田楷、徐州牧陶谦，被陶谦任命为豫州刺史，并在陶谦死后主管徐州。其后，与吕布交战失败，投靠曹操。刘备又打算与人合谋杀死曹操，被发觉，逃到徐州。200年，曹操打败刘备，俘虏了刘备大将关羽及全部

人马。刘备投奔袁绍，不久，借口去南面联合刘表，201年，南行到荆州，投靠刘表。刘表给了刘备一些兵员，让他驻扎新野（今属河南）抵御曹操，荆州的一些豪杰闻讯投奔刘备。在荆州八年，刘备取得了当地地主集团的支持，并请出流寓荆州的诸葛亮为他出谋划策。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人。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丞。由于父母早逝，诸葛亮随叔父迁往荆州。叔父死后，他就在南阳隆中（今湖北襄樊西）种地为生。诸葛亮才智超群，卓尔不凡，常自比管仲、乐毅，但无人相信，只有徐庶、崔州平对他钦佩不已，徐庶称其为“卧龙”。刘备屯驻新野时，经徐庶推荐，三顾茅庐，见到了诸葛亮。

诸葛亮向刘备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他认为，曹操的势力强大，已拥兵百万，且挟天子以令诸侯，难与为敌；孙权据江东已有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所用，也只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刘备应当占领荆州和益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待时机成熟，兵分两路，“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就可以成就霸业。诸葛亮这一策略，为刘备和日后的蜀国奠定了总的战略方针。刘备从四处奔走、寄人篱下，发展到割据一方，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基本上就是按照诸葛亮的“隆中对”进行的。

刘备极为赞同诸葛亮提出的谋略，恳请他出来辅佐自己。诸葛亮一到刘备军中，便立刻帮助他扩大军队。他建议刘备清查无籍游户，登记户籍，在短期内，把军队由数千人扩大到数万人，成为以后转战各地的基本力量。诸葛亮和刘备一样，也很注意争取益州地方豪强和士大夫的支持，注意提拔有才

刘备像



能的人。

孙权，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父孙坚，官至长沙太守。孙坚死时，正值中原战乱，孙权之兄孙策转向江东发展。孙策本是袁术集团的人，当时的江东即今江苏、安徽东南部的长江以南地区及浙江北部地区，由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控制。

孙策说动袁术让他去取得江东地区。刘繇及当地的官员都闻讯逃走，孙策任命官员，然后与袁术断绝关系。孙策占据了丹阳、吴郡、会稽以及江东以西的豫章、庐陵、庐江等郡，平定了泾西六县，俘虏并收用了刘繇的勇将太史慈。太史慈奉命带领原属刘繇的一万多兵马，在西面防御荆州的刘表势力，又打败了庐江太守刘勋势力。在西面大破黄祖军，获战船六千艘，黄祖士兵死亡几万。孙策又打败了吴郡的地方势力许昭、邹佗、钱铜、王盛、严白虎等。这样，孙策就占据了长江中下游沿江的一些地区及江南的吴郡、会稽。200年，孙策遇袭身亡，孙权继承父兄遗业，致力经营江南。

日后吴国的重要人物如张昭、周瑜、吕范、程普、韩当、黄盖等，都是在孙策经营江东时网罗到的。孙策的打算就是依靠这些地方的人力物力，在长江南北一带建立势力范围。孙策被袭身死后，孙权继承兄志，继续招揽人才，得到了周瑜和鲁肃这两个重要人物。

周瑜是庐江（今安徽潜山）人，出身士族。十四岁时，周瑜结识了孙策，二十岁时孙策邀他共赴江东发展，周瑜率领部曲几千人及大批船只粮草前往，二人在江东发展了力量。后来，周瑜奉袁术调命前往寿春（今安徽寿县）。周瑜见袁术目光短浅，于是到居巢为官，在那里结识了鲁肃。鲁肃是临淮人（今属安徽），颇有家产，早年见天下将乱，他

诸葛亮像



把土地出卖，用于资助宗族亲友并结交豪杰，也发展了自己的部曲。周、鲁二人一同脱离袁术前往江东。

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孙权十分欣赏鲁肃，二人同榻饮酒，谈论天下大事。鲁肃说，曹操已挟天子令诸侯，势力强大，汉朝统治已不可能恢复，所以孙权要效仿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天下是不现实的。可行的是割据江东，乘曹操一时无法南下的时机，攻占荆州，取代刘表，再建立政权，然后等待时机徐图天下。鲁肃受到孙权重用，以后孙吴政权大

太史慈墓

位于江苏镇江



孙权像



体上是按照鲁肃这一思路发展的。

208年，曹操扬言将率八十万大军与孙权决战。此时刘表已病死，其子刘琮不战而降曹。刘备得知刘琮投降，率部众由樊城（今湖北襄阳）向南退却，同时，派关羽带水军乘船由汉水南下，准备在江陵会合。曹军到达襄阳，刘备已经撤离，曹操惟恐刘备抢占江陵贮存的粮食和武器，亲率五千精锐骑兵，日夜兼程三百余里，在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追上刘备。刘备的部将张飞带领二十名骑兵断后，见有曹军追来，张飞在

鲁肃墓

位于江苏镇江



河边瞪着眼睛，把长矛横端，大喊：“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曹军无人敢接近，这样才使刘备得以逃脱。刘备丢掉了人马辎重，仅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至汉津（今湖北汉阳），会合了关羽的水军一齐撤往夏口（今湖北汉口）。这就与已在长江流域经营多年的孙权发生了联系。

曹军还没有到达荆州时，正值刘表病死，鲁肃向孙权建议让他以赴吊的名义前往荆州，联络在荆州的刘备共同抗曹，孙权观望未决。不久，曹军先头部队快速进军，迫使刘琮投降，刘备仓皇出逃。这时鲁肃才见到刘备。鲁肃建议孙刘联合抗曹，诸葛亮也持此议，刘备同意，派诸葛亮随同鲁肃去见孙权，经过一番劝说，孙权有了抗曹的意向。

曹操这时向孙权发出了战书，声称：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把这封信给属下看，多数惊恐失色，产生了强烈的投降倾向。长史张昭等人认为，曹操动辄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现在抗拒，属于不顺。将军可以凭借抗拒曹操的是长江，而曹操吞并刘表后，拥有大批水军，仅战舰就有上千艘，若水陆俱下，江东无险可守，不如迎接曹操。鲁肃坚决反对投降，他对孙权说，自己如果投降，还可获得一定的官位，要是孙权投降则曹操无法安置，希望他不要听从众人的意见。孙权犹豫不决，把周瑜从外地召回商议。周瑜说：北方现在尚未平定，马超、韩遂在西，是曹操的后患，且舍鞍马与吴越争锋，非其所长。正值隆冬，马无饲草，北方士兵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些是用兵之患。周瑜认为可与曹军一战。孙权终于下定决心抗曹。

周瑜又向孙权分析，曹操从北方南下的军队不过十五六万，且久已疲惫。荆州投降的军队最多七八万人，还在犹疑之中。故曹

军人数虽多,却不足惧怕,他的五万精兵,足以制之。孙权于是任命周瑜与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出动水军与曹操对抗。

曹操亲自率领战舰从江陵顺江而下。孙权派周瑜率军与刘备会师,由樊口(在今湖北武昌境)逆江而上,双方相遇于赤壁(今湖北武昌西南)。从数量对比上说,曹军不下二十万,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多,曹军远远超过孙刘联军。但从战斗力方面来看,吴军是老练的水师,战斗力很强,曹军长途跋涉,士兵疲惫,加上时疫流行,战斗力较差。因此,初次交锋曹军就打了败仗,被迫撤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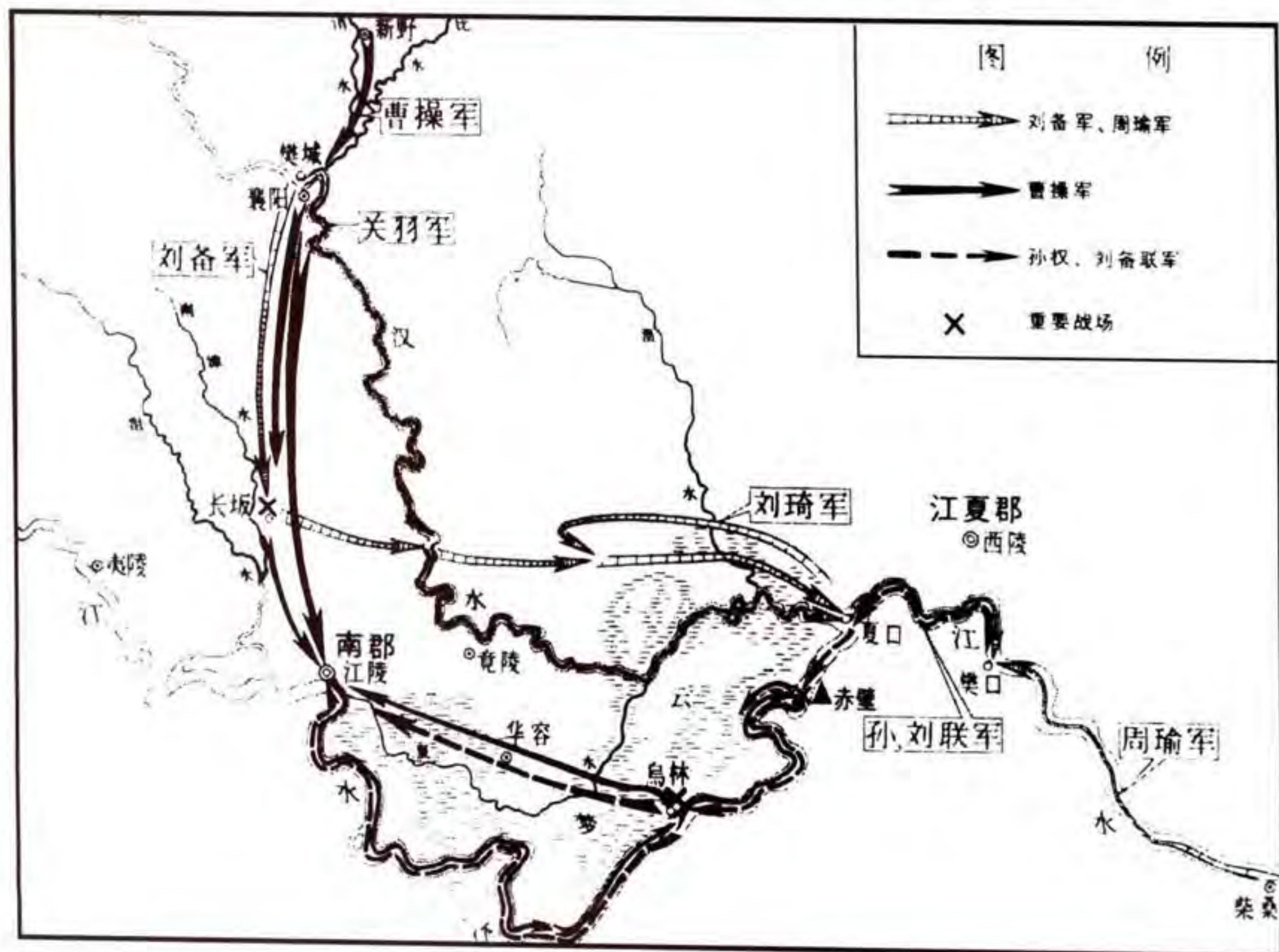
曹军士兵主要是北方人,不习水战。当时江面风大,战船波动不稳,为使战船不过分颠簸,曹军用铁链将船只首尾相连。这样船只就不易分散和调动。吴将黄盖利用曹操轻敌的情绪,向曹军诈降,以轻舟载薪草膏油,直抵曹军,燃火烧草,火随风势蔓延,烧毁曹军战船,延及岸上营垒。周瑜、刘备率军水陆并进,曹军人马伤亡惨重,曹操不敢

再战,率残部逃归北方。

赤壁之战,是决定三国分立形势的关键性战役。此战的结局表明,曹操还未能战胜南方的政治力量而统一全国。战后,曹操守住襄樊、合肥等战略要地,集中力量整顿内部,并积极经营西北;孙权进一步巩固了江东根据地,并向荆州发展势力;刘备取得了荆州的江南四郡,有了稳定的地盘。210年,刘备又向孙权借得荆州的南郡和江夏郡,孙权也向岭南扩展势力。211年至214年,曹操又占据了关中和凉州,刘备也占有了益州。随后,孙权和刘备为争夺荆州,矛盾日益激化。219年,孙权取得荆州。至此,三国鼎立之势形成。

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后,丧失了已取得的荆州大部地区,转而在211年进取关中。

曹操声称要平定汉中的张鲁,占据关中的马超、韩遂怀疑曹操将顺路袭击他们,举兵反叛,曹操趁机向关中开战。因关中军善战,曹操先把主力陈于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吸引关中军,然后派兵渡黄河,随后其



赤壁之战示意图

主力也绕开潼关，渡河从侧面进攻关中军，马超、韩遂只好放弃潼关，在渭河南岸设防。曹操多设疑兵，然后在夜间渡过渭河扎营，马超夜袭曹营，中计兵败。马超多次向曹操请和，曹操趁机离间马超与韩遂的关系，使二人不能协力，被曹操打败逃往凉州，曹操取得关中。这样，曹操基本平定了中原。

215年，曹操亲征汉中的张鲁，张鲁弟张卫在阳平关（今陕西沔县西北）固守，地势艰险，曹军死伤不少，已准备退兵，不料张卫营中晚间发生惊乱，士兵散逃，曹军意外地取得阳平关。张鲁逃往西部少数民族那里，曹军取得汉中的中心城市南郑（今属陕西）。

曹操的主簿司马懿向他建议：刘备取得蜀地，人心未附，又与孙权争夺江陵。汉中

失守，益州受到震动，此时进军，势必瓦解。曹操说：人若无足，既得陇，又望蜀耶！主簿刘晔也说，如果稍微拖延，蜀地安定后守住险要之地，就不可能成功了。曹操不听。七天后，有蜀地投降来的人说，蜀中一天惊扰几十次，守将即使杀人也控制不住。曹操问刘晔：现在可击不？刘答：今已小定，未可击也。法正日后分析，曹操不进军蜀地是力量不足，有内忧的原因。

古代史家评价，曹操是一个军事奇才，其用兵类似孙子、吴起，曾自撰兵书十多万字。他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对敌方制造假象以取胜，变化如神。对出征的将领，遇到军情，他常写出命令指挥，遵守的就能获胜，违反的就会失败。

曹操是一个好学的人，戎马倥偬之际仍

三国鼎立示意图



手不释卷，白天研讨战事，晚上思索儒家经典及历史。他是中国著名的诗人之一，还精于建造房屋及器械，可以拿出营造法则。

曹操极为重视节俭，其后宫女性不穿锦绣的衣服，侍从人员的鞋不用两种颜色，他日常所用的帏帐屏风坏了就修补，坐垫卧褥也不加装饰。在他的影响下，官员也都注意节俭，甚至有人为了刻意表现自己，穿着旧衣，乘着破车，手提午饭去上朝。

曹操很善于吸纳别人的建议，不固执己见。如官渡之战时，荀攸提出从袁绍背后袭击延津、白马的策略，被曹操采纳，果然奏效。

曹操的另一大特点是善于招揽使用人才。只要有才，不管出身高低，甚至不论德行如何，一律任用。

为了加强国家的权力，曹操决心抑制豪强，改革吏治。从210年开始，他先后下达三次《求贤令》，强调“惟才是举”，令各级官吏推举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不问其道德名誉如何都可以任用，借此排除世家豪族的势力，这是对东汉末年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为标准选拔官吏的一次冲击。

人才是当时各个政权都努力争取的，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之一。曹操阵营的人才最为雄厚，既主动搜求，又使用许多来自敌方阵营的人。战乱期间逃到荆州的许多北方人才，往往得不到刘表重用，曹操南下后则大量征召。取得袁绍统治的地域以后，曹操采用郭嘉的建议，征辟青、冀、幽、并名士上千作为掾属，以收服人心，这既有效治理控制新取得的地区，也增强了曹氏集团的实力。

在政权初步稳定后，曹操开始调整用人标准。他派崔琰、毛玠主持选拔官员，任命的都是清廉正直的人，很有名气而行为不

端、表面浮华、拉帮结伙的人都不用。于是天下的士大夫都注意自己的品行，高级官员穿衣乘车不敢张扬，地方官回到中央都乘着无篷的小车，军官进入自己的公署都穿着公务服装，徒步而入。一时，官吏廉洁，流风波及民间。曹操见到这种局面，不由感叹：这样用人，使天下人自正，我还用做什么呢！

稍后，和洽劝曹操，人的才能和德行不一样，不能凭单一品德选拔官员，节俭可以用于自己，用来处理其他事务就可能有问题。像有些人故意把衣服弄脏，不使用制度规定的车辆和官服，朝廷官员提着饭菜上朝，这样就会产生伪行。于是曹操又对选拔官员的标准进行调整，下令：取士若非廉洁之人不用，齐桓公何以称霸？现今天下一定还有一些被褐怀玉等待明主的人，大家要帮助我明扬仄陋，惟才是举。说到底，乱世需要一些乱世之才，这是争夺人才的需要，但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荀彧是曹操政权早期的重要人才之一。



正始二年造铜弩机

三国 魏

长11.9厘米

弩机是中国自先秦以来广泛使用的轻型兵器。正始二年(241)，魏、蜀、吴三国仍在进行战争，这是魏国当时使用的一件弩机。

他最初依附袁绍，得不到重用，于是投奔曹操，被曹操称为“张良”，帮他处理日常政务。荀彧推荐了荀攸、郭嘉，二人为曹操出谋划策，极受重用。荀攸考虑问题有深度又周密，郭嘉通达明智，深谋远虑，曹操许多的重大决策有赖于他们。

曹操任命的地方官也有不少能干之人，如钟繇、卫觋为稳定关中、河东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刘馥被任命为扬州刺史，自己到合肥建立州府，招抚地方势力，几年间，上万的流民回归。他发展生产，建立学校，颇有建树。并州刺史梁习对瓦解当地豪强势力、威服少数民族首领发挥了很大作用。

曹操还赏罚分明，战争中的缴获物都用来赏赐有功人员，对该赏赐的不吝千金，对不该赏赐的分文不给。

曹操治政，可用“严”、“苛”二字概括。屯田民的收成，官、民各得五成，如使用官

牛则官六民四，比例很高。屯田民每年还有两个月从事修建仓库桥梁、运输租赋、整治道路房屋的工作，劳役时间高于汉代。

军队实行士家制度，士兵家庭成员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没有解脱的可能。官兵的家属，都要集中在邺城，实际上是人质。士兵出征时逃亡，要对他们的妻子儿女进行连带处罚。大臣王朗说曹操的小吏和士兵都有“暴徭”，即很重的劳役。曹操军中击鼓吹角的士兵宋金，母亲和两个弟弟都在服官府的劳役，士兵地位之低下、负担之重由此可知。

在征讨乌桓时，天气寒冷，曹军征发百姓凿除进军路上的积冰，一些人因不堪劳役之苦而逃亡，南阳的百姓及小吏不堪艰苦的劳役以至起而反抗。

曹操对那些恃才傲世、不肯亲附自己的人不能容忍。名士孔融因鄙视曹操，“多侮慢之辞”，被他以“招合徒众，欲规不轨”的罪名处死。崔琰是当时士大夫众望所归的名士，由于被人诬告“腹诽心谤”，被曹操施以髡刑，贬为徒隶，最后被迫自杀。毛玠因不满曹操杀崔琰而被罢官。祢衡目空一切，曾当众辱骂曹操，曹操就借刀杀人，把祢衡送到刘表处，后来祢衡果然被刘表的部将黄祖杀死。

曹操崇尚先秦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用权术驾驭臣下。他不仅自己监视，还设专门机构监视内部。从占领青州、冀州的时候起，他就制定了条目严峻的新科，即法律以外的政令，经人劝告才未马上实行。以后曹魏制定的一些法令，从禁止流传讠纬之学及兵法书籍、禁止官员擅自辞职、禁酒、持质科等都可以看出，是较为严酷的，如持质科就是在有人劫持人质时，官兵可以不管人质安全而给劫持者以打击。为了稳定人口，

玉杯
三国 魏
河南洛阳出土



曹魏有的地方官制定了“移居之法”，百姓每五户为一单元，有逃亡、流失人口的情况，比邻要受连带处罚。

在战争中，曹操有一条法令，对方军队如果在被包围以后再投降，就不能赦免，要处死。

212年，曹操打算恢复肉刑，即先秦、秦朝时对犯人使用的几种伤害肉体的刑罚：剃去头发（髡）、在脸上刺字（黥）、割去鼻子（劓）、砍去一脚（刖）、割去生殖器（宫）。西汉初年，肉刑被废除，这时想到恢复，可能是犯法的人多，为免处死过多，要减轻一等处罚。陈群说：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污入室翻墙之奸。虽不能马上都恢复，但有几种时之所患可先实行。除法律必须叛死刑的严重罪行无法原谅外，其余够上死罪的可以用肉刑替代。由此足见当时百姓生存条件之艰难及法条之严峻。因当时大多数人不同意，恢复肉刑之事才被搁置。

刘备方面，210年，因刘表的不少官吏投奔了刘备，只有四个郡不足以安置这些人为官，刘备向孙权要求把荆州江北部分地区也归自己统领。周瑜认为，刘备是个枭雄，关羽、张飞乃熊虎之将，不会久屈人下，应将刘备安置在江东，把关、张分别安置，号令他们对曹作战。如果给予荆州，则难于控制。鲁肃则认为，曹操是江东的主要威胁，借给刘备荆州可以使自己多一个盟友，使曹操多一个敌人。孙权听从鲁肃的意见，把荆州借给了刘备。

211年，曹操占据关中并声言进攻汉中。益州刺史刘璋在蜀地的统治引起了当地百姓和一些官员的不满，法正等人想借刘备之手除掉刘璋。于是建议邀刘备入蜀讨张鲁，巩固益州北面，刘璋同意。刘备让诸葛亮、关羽留在荆州，自己与军师庞统率兵数万进入

益州。刘璋发给刘备大量物资并划拨军队，又把在白水（今四川昭化西北）的军队交给刘备指挥，要他进攻张鲁。

刘备北进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以后，不去讨伐张鲁，而是收抚当地人心。212年，庞统主张选择精锐部队暗中突袭成都，尽快除掉刘璋。他说刘璋不懂军事，平日疏于准备，突袭必能成功。如果不愿这样做，可以假装要回荆州，待白水军主将杨怀、高沛来送行，就拘捕他们，并收编白水军，再进攻成都。要是还不愿意这样做，就只能退到蜀地东面的白帝城（在今重庆奉节东），慢慢寻机取得蜀地。刘备打算采用第二策，对白水军发难。

时值曹操进攻孙权，孙权向刘备请援。刘备向刘璋表示要回荆州救助，请刘璋给予一万兵员和物资，刘璋只给了四千兵和一半物资。稍后，刘璋知道了刘备入蜀的真实意图，命令各地守将不放刘备通过。刘备于是把杨怀、高沛招来杀死，收编白水军，南下进军成都，先占领了涪城。

刘璋的从事郑度建议：刘备兵不满万，士兵人心不稳，没有物资，只以野外的谷物为食，应把巴西、梓潼的百姓内迁，把仓库田地里的谷物全部焚毁，增高城墙，加深壕沟，不出战，不过百日，刘备物资用尽，必然退兵，然后可乘机攻击。刘璋说：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扰民以避敌也。不予采纳。

刘璋的军队与刘备交战都失败而归，绵竹守军投降，刘备包围雒城。诸葛亮也率领张飞、赵云从荆州入蜀，攻克沿途的巴东、江州、巴西、德阳等地。刘备在包围雒城近一年后将其攻克，但军师庞统被飞箭射中而亡。刘备进军包围成都，诸葛亮军也赶到与刘备会合。

刘备派人劝降，当时成都还有兵三万，

粮食够用一年，军民都愿死战。刘璋说：我父子在益州为官二十余年，无恩德给予百姓。战争三年，沃土生草，民有饥饿，都是为了我的原因，心何能安？于是开城投降，属下无不流泪。时为213年。

刘备进入成都后，自己任益州牧，对属下封官。刘备集团除早期的旧人外，到荆州有了糜竺、简雍、孙乾、黄忠、魏延等人，在益州又有了许靖、董和、黄权、法正、李严、吴懿、费观、刘巴等人，还有西北地区来投奔的马超等人。刘巴在荆州时不愿投奔刘备，后成为刘璋的属官，两次向刘璋提醒刘备的危险性。刘备灭刘璋后，对刘巴仍加以重用，于是当地有才之士无不愿意为刘备集团服务，蜀汉粗具统治规模，益州颇见人和。

进攻成都前，刘备向将士许愿，进城后可随意获取仓库中的宝物。这导致了军用给养的不足。刘备采纳刘巴的建议，发行大面额货币“直百五铢”铜钱，一枚相当于百枚以往流通的汉代五铢铜钱，而实际重量只有汉代五铢钱标准重量的两倍多。而且由政府确定市场的商品价格，并派官吏参与交易，几个月后就做到了库府充足。但这是畸形的经济办法，具有经济上的掠夺性，沿用稍久势必引起不满。

“直百五铢”铜钱

三国 蜀

直径2.6厘米至2.8厘米，重3克至9.5克

为213年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之初发行的货币。



217年，刘备采纳法正的建议，与曹操争夺汉中，魏骑都尉曹休击败刘备将吴兰。219年，刘备的讨虏将军黄忠在定军山大破曹军，斩曹操汉中军主帅夏侯渊。曹操亲征汉中，刘备坚守不出。刘备的大将赵云与魏军仓促相遇，魏军追赶到赵云营前，赵云把营门大开，偃旗息鼓，魏军怀疑有伏兵，要退回，赵云擂鼓震天，用弓弩射击魏军，魏军慌乱溃退，落入汉水的人很多。曹军无法与刘备交战，而且士兵伤亡不少，于是退兵，刘备得到了汉中，从而拥有荆州、益州、汉中三地，有了立国之本。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立儿子刘禅为王太子，准备建立政权。

同年，刘备派孟达、刘封攻占曹操的房陵（今属湖北）、上庸（今湖北竹山东南）两郡，这是从蜀地东北方向通往中原的一条路，以后蜀汉与曹魏在这一带也反复争夺。

同年，关羽向北进攻樊城。当时天降大雨，大水几乎淹没樊城。曹操的左将军于禁等七支军队被上涨的汉水所淹，于禁及几万曹军投降。关羽军布下了几重包围，不少地方的百姓起兵响应关羽。樊城距许县并不远，一时威震华夏，以至曹操要讨论迁都。取得樊城以后，刘备在三个方向与曹操接近，对曹形成了直逼的形势，这是刘备势力最强盛的时期。

在江东方面，211年，孙权派步骥为交州刺史，地方势力士燮斩杀了刘表任命的刺史吴巨，归附孙权，孙权取得了岭南地区。

刘备占据益州后，实力大增，这对孙权也很不利。215年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被刘备拒绝。孙权遂派吕蒙夺取了今湖南境内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刘备仍占据部分荆州郡县。

鲁肃屯驻西面时，一直劝孙权与关羽搞好关系，共同抗曹。以后吕蒙取代鲁肃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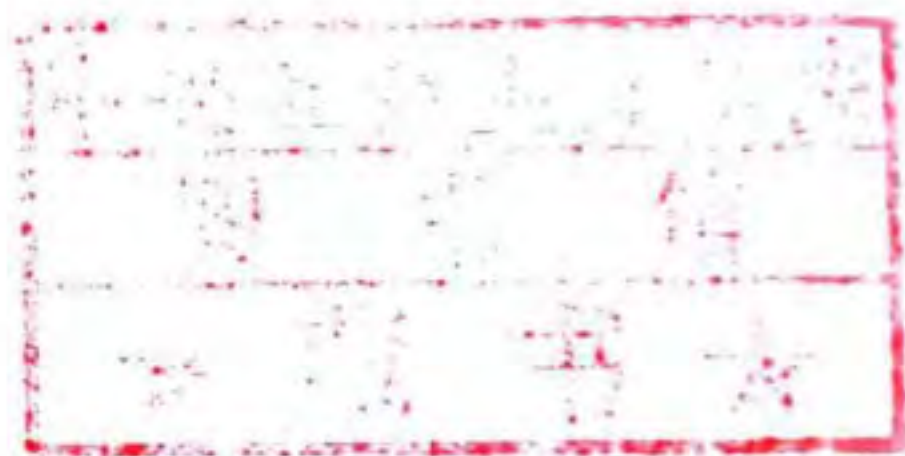
西面主帅。吕蒙认为关羽一向骁勇，有兼并吴地之嫌，又处在上流，不利于己，就对孙权说，可以不依赖他人而抗曹，且刘、关等人并不可靠，可乘曹操一时无力南下夺取荆州。孙权曾为儿子向关羽求婚，不料派去的人被关羽辱骂，遂对关羽极为怨恨，同意了吕蒙的建议。

219年，曹操的属下司马懿、蒋济对曹操说：于禁在樊城是被水淹败而非战败，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孙权不愿关羽得志，可派人劝孙权出兵关羽后方，承诺事成后把江南封给孙权。曹操派人向孙权提出共同征讨关羽，并把江南之地许给孙权。孙权马上同意。

吕蒙准备进攻关羽，他先假称有病返回建业（今南京），使关羽放松对吴军的警惕，随后推荐年轻却有军事才干的陆逊任主帅。陆逊到任后，写了一封信恭维关羽，使关羽更加松懈，把防守吴军的部分军队调离。吕蒙立即开始偷袭关羽，他让士兵穿上商人的

白衣，将战船冒充成商船，先把关羽沿江所设的观察据点的士兵都捕获。在关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吕蒙军的船只一直驶到荆州城下。据守南郡、江陵的关羽军守将糜芳、傅士仁一向对关羽轻视自己不满，又因对关羽的物资供应不及时，关羽表示要治二人的罪，二人害怕，就向吕蒙投降。吕蒙约束士兵，不得侵犯关羽军的家属。关羽从襄阳回军救荆州，其将士得知吕蒙厚待在荆州的家属的消息，无心战斗，甚至有一些人逃跑。关羽无法同吕蒙再战，于是退守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以后再向西撤，被吕蒙军俘获斩杀。占据荆州后，陆逊又向西取得秭归，三峡以东尽归孙权。

关羽与张飞从早年就跟随刘备，三人常常睡觉都在一张床上，亲如兄弟。关、张是当时的猛将，而关羽更胜张飞，曹操的谋臣程昱等人都说关、张是万人之敌。张飞兴兵为关羽报仇，为部将所杀。关羽对士兵很好，



南京玄武湖

孙权水军曾在此演练。



对士大夫傲慢；而张飞却敬重士大夫，不体恤低级的官兵。二人都是因自己的缺点而败亡。

曹魏在东南方向与孙权也形成对峙形势。228年，孙权与鄱阳太守周鲂设计了诈降之计，打算给曹魏扬州牧曹休构筑陷阱。孙权派官员到鄱阳，不断质问各种事务，周鲂到郡的公署解散头发假装谢过，又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见曹休，说被孙权谴责，要投降曹休。曹休中计，率领十万军队接应周鲂。孙权以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率三万军攻击曹军。曹休情知中计，但凭借兵多，与吴军战，被陆逊打败，损失一万多人，幸有曹魏豫州刺史贾逵接应，才避免了更大的失败。

第二节 北方的魏国

曹操控制汉献帝后，东汉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但曹操不愿亲手改朝换代，而是想创造条件让儿子取代汉朝。他曾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

在继承人的问题上，曹氏内部产生了一些纷争。

曹丕是曹操长子，按理是合法的继承人，但曹操喜爱曹丕的同母弟曹植。曹植才华出众，每次曹操向他提出一些问题，都能应声而对。曹操认为曹植是诸子中最可定大事的人，几次都想把他立为太子。

曹植性任自然，行为不作修饰，又好饮酒。曹丕则矫饰自己的行为，宫人及曹操左右的人都为他说好话，更有几个大臣以立长的理由劝说曹操。217年，曹植饮酒而醉，乘车在邳城的驰道中行走，违禁开司马门而出，曹操大怒，改变了对曹植的看法，立曹丕为太子。

219年，关羽包围樊城，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去救援，临行有事要向曹植嘱咐，不料曹植醉了酒，不能前往，曹操只好撤销了任命。关于此事，又有一种说法，是曹丕把曹植灌醉，以便使曹操更厌恶曹植。以后曹植彻底失意，先是被封为陈王，又被改封为东阿王，在曹丕及其子曹叡的压制下，抑郁而死。

220年，曹操去世。在曹氏集团的策划下，百官请求汉献帝退位，并向曹丕呈递劝进表，于是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这年，曹丕称帝，是为文帝，定国号为魏，迁都洛阳。

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中正制是对汉代察举制度的发展。九品中正制是在中央政府中选择所谓“贤有识鉴”的官员，按照他们各自的籍贯兼任本州本郡的“中正”。中正负责察访散在各地，而籍属本州本郡的士人，采择舆论，根据家世和行状，定为九品。这些人任官时，政府按照他们的品第，分别除授。已经入仕的人，也要三年清定一次。

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评定人物的权力完全控制在大族名士的中正手中，实际上等

陶耳杯

三国 魏
山东东阿曹植墓出土
长约11厘米



于承认了世家大族操纵铨选的合法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评定士人的品第很自然地逐渐不凭才能,而单纯以家世高低为准。它对于维护士族门阀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实现统一,曹丕于222年、224年、225年三次大规模出兵征伐孙权,都因长江之隔没有取得成果。226年,曹丕死,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

魏文帝、明帝时又有恢复肉刑的议论,用意也是把一些要处死刑的人用肉刑替代,多活下一些人,因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文帝时处各种刑罚的人很多,一度每年达十万人,当时的曹魏人口粗略估计应在一千万左右,犯法的人口比例很高,统治者已感到承受不起。究其原因,应是社会环境恶劣,导致大批人触犯法网。

魏明帝时曾大规模兴建许都及洛阳。在洛阳修建的宫殿有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总章观高十几丈。又在洛阳的芳林园中修建水池及人工湖,在宫殿之北立八坊,作为女才人、女尚书游乐办公的地方。还引谷水到九龙殿前,修筑玉井、扶栏,有蟾蜍状的设施接水,再由神龙状的设施把水喷吐出来。在芳林园西北部堆出土山,上面种植松竹杂树,到山上捕获一些禽鸟野兽放到土山上。

魏明帝还派马均造指南车以及以水为动力的杂技机械。他把长安的铜人、铜骆驼、承露盘迁到洛阳,征集大量铜铸造两个铜人,称为翁仲,立于司马门外,又铸高四丈的铜黄龙和高三丈多的铜凤凰,放置在内殿前,导致百姓负担很重,无法按时耕种。一些大臣劝阻明帝但不被理睬。

魏明帝不仅大肆兴建宫室,留意玩饰,又多次掠夺民间美女,淫侈无度。以前无需负担一般徭役的屯田客这时也常被征发去修建宫室。官吏的俸禄大大减少,轮休的将士

也得不到廪赐,不仅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也产生了不满情绪。在曹操死后逐渐掌握大权的司马懿,乘机广树恩信,培植自己的势力。

尽管曹魏长期用兵,对民力及物资消耗很大,但毕竟结束了汉代末年北方地区的内乱,使统治秩序得以重建,躲避战乱的农民陆续回到家乡开展生产,手工业也得到发展,经济有了一些恢复,人民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

魏国统治的黄河中下游,以及淮水、泗水流域,过去一直是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文化较进步的地区。经过东汉末年的连年争战,不少地主豪强逃往异乡,随后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兼并混战,迫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四处流亡。北方的广大地区出现了“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的局面。昔日名都洛阳,被董卓烧毁,只剩下瓦砾一片。繁华的中原地区,到处是百里无人烟的荒凉景象。土地荒芜,手工业衰落,商业停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保证军粮供应,并使流民稳定,农民回归土地,谁就能成就伟业。曹操为改变这种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从196年开始,曹操在许下(今河南许

汉魏洛阳金墉城城墙遗址

三国 魏



昌地区)募民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成效显著。于是他在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和军事上有重大意义的地区,广泛推广屯田。

曹魏的屯田区不隶属地方郡县,直属中央大司农,土地为国家所有。屯田客是国家的佃户,每年按实际收获向官府按比例缴纳地租,用官牛的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官民对分。实行募民屯田制度,使许多脱离土地的农民重归于田,土地和劳动力都控制在政府手中。除民屯外,还有军屯。军屯区的屯田兵,既担负作战任务,又从事农业生产,国家运粮养兵的负担因而大为减轻。

以后曹魏又陆续把屯田区扩大到颍川、魏郡、邺城、汲郡、河内、沛郡、洛阳、长安、汉中、皖城、河东、睢阳、芍陂、淮南、淮北、襄城等地。几年之后,各屯田地点的仓库中装满了粮食,提供了大量军队用粮,也减少了百姓的运输负担。241年,经由邓

艾建议,淮南、淮北的五万魏军在当地屯田,一边守备,一边耕种,开辟河渠,灌溉漕运,每年可生产五百万斛谷物,六七年就可以积蓄十万人五年的军粮,为进攻吴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魏又制定法令,向非屯田区的广大自耕农征收租调。按规定,田租每亩交谷四升,户调每户绢二匹、绵二斤。这样,一般农民的负担比过去有所减轻,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条件得到一定改善,生产积极性就随之提高。

曹魏实行盐铁官营。盐铁官营本是汉代的恶政,当时就引发争议,并一度被取消,这时重新实行,有集中资源以便国家使用之意。

曹魏时,冶铁工具有所改进,鼓风采用水排,比“马排”提高效率三倍。当时的冶铸业大量使用煤。曹操在邺城修筑了规模巨

《耕种图》(砖画)

三国 魏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牛耕图》(砖画)

三国 魏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耙地图》(砖画)

三国 魏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扬场图》(砖画)

三国 魏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打连枷图》(砖画)

三国 魏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采桑图》(砖画)

三国 魏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大的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三处别墅。其中冰井台有房屋一百四十间，台下有冰室，冰室内有井，井深十五丈，内储煤数十万斤。煤和水排的使用，提高了铁的产量和质量；铁制工具的大量使用，又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恢复的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起色，魏明帝太和年间恢复使用五铢钱。

在地方上，一些地方官为了恢复经济做了很多努力。汉末战乱使中原人口死亡流失很多，招徕人口成为地方官员的一大要务。郑浑任冯翊太守，有四千多户人前往归附。金城太守苏则对于安抚百姓孜孜不倦，十天一月之间有流民几千家回归。凉茂在泰山太守任上，时间不长就有百姓一千多家到这里来定居。洛阳在董卓之乱后几乎成了一座空城，钟繇当这里的地方官时，把关中一些百姓迁来，又招徕了一些逃跑的人口，几年间，洛阳人气渐旺，使日后曹丕得以在洛阳建都。

还有一些官员努力组织生产。扬州刺史刘馥实行施恩于民的政策，广开屯田，整修芍陂、茄陂、七门塘、吴塘塘灌溉稻田，引得数以万计的流民从南面渡江或走出山区到合肥一带居住。杜畿任河东太守，实行宽厚惠民的统治，百姓努力生产，家家生活物资充实。杜畿在河东郡任职十六年，政绩考核是地方官中最好的。

关中人民在战乱时流亡到荆州的有十多万家，中原安定后，想要回到家乡，但没有耕牛和犁，卫觊主张实行盐铁专卖，把国家获得的收入用于购买耕牛农具，贷给农民，使他们能够开展生产。曹操采纳这一建议，流民得以还乡进行生产，使关中生活资料大为充实。

不少曹魏官员都注重水利建设。夏侯惇

在陈留修了太寿陂。郑浑兴建了郑陂。豫州刺史贾逵挡住鄢水、汝水，建造新陂，又阻挡长溪水，造出弋阳陂，还开通了运输用的渠道二百多里，人称贾侯渠。幽州刺史刘靖修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灌溉土地一万多顷。司马懿在淮北开通淮阳渠、百尺渠，在关中经营成国渠和临晋陂。司马孚经营沁水渠。沛郡在萧、相二县交界处兴陂遏，开稻田，改变了当地长期水涝的局面。关中的临晋陂引泝水和洛水灌溉盐碱地三千余顷，北京附近的戾陵堰水流四五百里，灌田万余顷。凉州则广开水田，募民佃种，常年丰收。有的地方官还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敦煌在推广耨犁和水利灌溉方面节省劳力过半，产量增加五成。修建水利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交通运输的改进，起了重要作用。

经过多年经营，曹魏经济有了起色，许多地区河渠成网，屯田连片。自洛阳至寿春，“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洛阳地区垦田很多，关中地区到魏明帝时已有余粮，淮河流域到少帝曹芳时被描述为“仓庾相望”。

魏国还建立了官营的纺织手工作坊，专门制造“练”这种丝织品。

238年，司马懿率兵四万讨伐辽东公孙渊。公孙氏是辽东的一个军政集团，从汉朝末年以来已历数代。公孙渊与吴国联合反魏，237年称燕王。为了抵抗魏军，公孙渊出动几万人屯据辽隧，挖了二十多里的堑壕。司马懿认为这是要使进攻的魏军久攻不下，成为疲军，就决定直指公孙渊的权力中心襄平。他派人树立了很多旗帜，作出要先进攻南面的状态，引得辽隧守军全部精锐部队向南，魏军则悄悄从北面进军襄平，路上遇到回救的辽隧军，败之，乘胜到达襄平。

时值夏季，大雨一月不止，辽河水暴涨，平地积水几尺，运输物资的船可直达襄平城下，而襄平城中兵多粮少。公孙军士兵乘着一大水到城外采集粮食柴草，司马懿既不移动部队也不进攻外出的公孙军，向对方显示魏军“无能”，以使公孙军不至于逃走，从而将之全部消灭。

雨停后，魏军包围襄平，起土山地道，用楼车、大盾昼夜攻城，城内粮尽，人相食，公孙渊大将杨祚投降。不久，襄平被攻破，公孙渊父子被杀。司马懿进城，杀公孙渊官吏军民七千多人。辽东归魏。

曹魏后期，发生了司马氏篡代引发的内争。

司马氏是有名的世家大族，世代做东汉的将军、太守。司马懿是曹操的大将，他富有谋略，在指挥对蜀国和吴国的战争中，树立了自己的声望。司马懿早年被曹操征召为官，但他拒绝应征，曹操表示要惩罚他，这才任职。有人向曹操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一次司马懿与曹操谈话完毕向外走，曹操突然在后面叫他，司马懿身体还朝向前方，但头部整个扭转向后，类似狼回头的样子，据说这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相貌。但几十年来司马懿一直为曹魏政权出力，并表现出了相当的才能，曹魏几代皇帝对他也并无疑忌。魏明帝临终时，诏宗室曹爽和司马懿辅佐八岁的齐王曹芳继位。曹爽怕司马懿权重难制，把他由太尉调为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之上，是最尊贵的官职，但没有实权。曹爽任命自己的兄弟曹羲统领禁军，又提拔何晏、邓飏等一批名士分居要职。247年起，司马懿开始准备夺取朝中大权。

为了降低曹爽的戒心，司马懿伪装年老体衰。曹爽集团的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借临行向司马懿告辞之由刺探他的动向。司马懿

令两个女仆搀扶着他出来，取衣服时衣服掉到地下，又指着嘴表示口渴，让女仆喂他喝粥，粥从嘴边流下到胸前，说话也是声气不接。他又装作听力有碍，对李胜说：君屈就并州，并州接近胡地，好为之备，恐不能再见面了。李胜纠正他：是出任荆州，而非并州。司马懿继续发挥说：君刚到并州？李胜把司马懿的情况告诉了曹爽，于是曹爽等人不再注意司马懿。

249年，乘曹爽等人陪同曹芳出城祭陵之机，司马氏在洛阳城中突然发动政变。当时，曹爽集团的全部政要都已陪同出行，司马懿假借太后诏命，罢黜曹爽，关闭洛阳城门，占据武器库及洛水浮桥，派遣对曹爽集团不满的司徒高柔占据曹爽的军营，太仆王观占据曹爽之弟曹羲的军营。曹爽等人在外只好征发几千屯田兵作为护卫。

司马懿派人劝说曹爽早归认罪。大司农桓范从洛阳奔出，见到曹爽，劝他带皇帝到许都，征调各地军队，自己用大司农的权力可调集军粮，与司马懿一战。曹爽犹豫不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同意桓范的意见。经通宵考虑，曹爽放弃了抵抗，他向皇帝要求免除

司马懿像



自己的官职，回到洛阳。

司马懿命令士兵把曹爽兄弟的住宅围困。有关部门奏报黄门郎张当与曹爽有奸谋，逮捕审问的结果是曹爽与何晏等人阴谋在三月发动反逆。于是把曹爽兄弟及何晏、李胜、桓范等人逮捕，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全部诛杀并灭三族。从此，司马懿与儿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握了曹魏军政大权。

251年，太尉、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在淮南起兵反抗司马懿。王凌出自太原祁县王氏，这个家族素以嫉恶如仇闻名，东汉末年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就是此家族人。王凌认为皇帝曹芳暗弱，受制于司马懿，打算将其废黜，另立较年长、有智谋勇气的楚王曹彪为帝。一同起兵的还有他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

但事情被人告发，司马懿悄悄发兵，等到王凌察觉，司马懿的军队已离扬州府所在地寿春（今安徽寿县）很近了，王凌来不及部署，只好派人向司马懿谢罪并交出印绶、节钺，然后出降，之后在监送回洛阳途经项

县时，于贾逵祠堂中自杀。

事后，司马懿赐死楚王曹彪，将与事件相关的人都夷三族，并开挖王凌、令狐愚的坟墓，砍棺，暴尸于集市三日。不久，司马懿病死，其子司马师任大将军，继续控制朝权。

254年，司马师废黜少帝曹芳，立明帝之弟东海王曹霖之子、年仅十四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255年，都督扬州诸军事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于寿春起兵，矫太后诏书，列举罪状讨伐司马师。毌丘俭是魏明帝早年的文学掾，明帝待他甚为亲密，毌丘俭也屡有政绩军功。文钦则是曹爽乡里之人。二人合兵五六万人。司马师调集各路军队集中于淮南附近，但又坚壁不出战，淮南军无法决战，将士的家属多在北方，人心涣散，不少人出降。司马师令兖州刺史邓艾率部故意示弱，引诱淮南军。文钦夜袭邓艾，不料司马师已率大军到来，两军激战。文钦兵败逃到吴国，毌丘俭军队溃散，自己逃出寿春后被杀。

寿县城墙

位于安徽寿县





《驿传图》(砖画)

三国 魏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不久，司马师病故，其弟司马昭成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氏继续控制朝政。

257年，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反对司马昭。诸葛诞与从兄弟诸葛亮、诸葛瑾分别效力于魏、蜀、吴三国，人称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这是说三人都很有才干，只是略有差别。诸葛诞早年与夏侯玄、邓飏等十五人为友，他们互相估量各人的才能，定出“四聪八达”的品题，意为有智慧、通达。这被当时的朝廷老臣视为“浮华”之行，告到明帝那里，明帝免了这些人的官。等到曹爽、何晏、夏侯玄等浮华之友掌政后，诸葛诞又在中央机构任职，以后任扬州刺史。诸葛诞曾奉命率军讨伐王凌。毌丘俭起兵，派使节劝说诸葛诞共讨司马氏。诸葛诞斩杀使节，并布告天下，公布毌丘俭、文钦的罪恶，并奉司马昭之命率军讨伐淮南，后被任命为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寿春。

诸葛诞也逐渐看出司马氏剪除异己的目的，非常担心，于是发散大量库藏物资，争取人心，厚待亲信以及侠客几千人，犯了死罪的人也设法让他活下来。此时正值吴国准

备北进，诸葛诞兵力虽足以应付，仍向朝廷请求调拨十万军队。司马昭知道诸葛诞已有异心，于是下诏调诸葛诞到洛阳任司空。诸葛诞恐惧，起兵反叛。他共有十几万军队，又向吴国求援。吴国派大将全怱、全端、唐咨、王祚、文钦领兵三万往援。

司马昭调集各路大军共二十六万进攻寿春，四面合围两重，挖深壕，筑高垒。司马昭部下不少人主张急攻，司马昭认为寿春城池坚固而守兵又多，马上进攻会过多消耗力量，而且若有什么人从外面接应，会很危险，于是按兵不动。以往每年雨季淮河都要涨水，淹灌寿春的城镇，诸葛诞笑道：他们不攻城是自取其败。不料这年却遇大旱，朝廷军队围城如故。

文钦几次出城攻击，均被击退。吴将朱异又率大军来接应诸葛诞，都被兖州刺史州泰击退。寿春城中粮食越来越少，将军蒋班等人翻越城墙投降司马昭，司马昭让他们劝说全怱，全怱也率几千人开门出城。到第二年正月，寿春军连续五六昼夜攻击南围，企图有所突破，围城工事上的朝廷军在高处用发石车、火箭烧毁寿春军的进攻器具，弩箭

石块如同下雨，寿春军死伤极重，仍未能突围。

因城中粮食渐空，几万人出城投降，文钦打算放出城内的北方人，以吴兵坚守，以节省粮食。诸葛诞反对这样做，二人发生矛盾，诸葛诞杀死文钦，文钦子文鸯、文虎出城投降司马昭。司马昭封文鸯、文虎为将军，让二人绕城呼喊：“文钦之子都没有被杀，其他的人有什么可害怕的！”司马昭又发兵攻城，城内人不再抵抗。诸葛诞打算突围，被胡奋部兵斩杀，夷灭三族。

“淮南三叛”之后，司马昭把他不放心的雍州刺史郭淮调入洛阳，基本控制了各地方。这期间，随着司马氏势力的坐大，一些

原中间派的官员开始倒向司马氏一边，如钟会、贾充之流，而多数年轻官员与曹氏没有瓜葛，自然成为司马氏的人。

260年，皇帝曹髦无法再忍受司马氏专权，准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除掉司马昭。他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王经劝曹髦谨慎从事，曹髦不听。王沈、王业连忙向司马昭告发了曹髦的意图。

司马氏对曹髦早有戒备。254年，曹髦登位时，只有十四岁，钟会在朝见曹髦后，司马师问他皇帝是个怎么样的君主。钟会答道：才同陈思（曹植），武类太祖（曹操）。这

神兽纹铜镜

三国 魏

1987年河南洛阳出土

直径15厘米

该镜主纹饰是浮雕的神人及龙、虎等兽类。此类铜镜，出现于东汉中期，一直流行到三国前后。



等于提醒司马氏对曹髦要加以注意。

曹髦率殿中卫士、宫中奴隶几百人，鼓噪而出，遇到了司马昭早已布置好的兵马。率兵的是中护军贾充，贾充父亲贾逵是曹魏老臣，贾充这时已是司马氏集团的骨干。众人见到皇帝，不敢动手，想要逃跑。成济问贾充：“事情紧急，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氏畜养你们，正为今日。今天的事，不需要多问。”成济于是上前猛刺，长枪洞穿了曹髦的前胸后背，使之当场毙命。朝中舆论大哗，司马昭只好把成济处死。

曹髦死后，司马昭又立十四岁的常道乡公曹奂为帝，完全掌控了政权。在建立了平定蜀国的大功后，司马昭称晋王。265年，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继任晋王。曹奂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被迫“禅让”帝位，司马炎于是称晋朝皇帝，魏国灭亡。

曹魏的灭亡，如吴国人张悌所说：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曹丕、曹叡刑法劳役繁重，东西出征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有大功，又废除了以往的烦碎政务及苛刻法令，减少了百姓的疾苦，民心归之。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而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

司马氏以残酷欺诈的手段消除异己，夺取政权，恶名也流传后世。东晋明帝司马绍听人讲述了司马氏篡代的始末，羞愧得用被子蒙住头说：这样得到的天下，安能长久？

第三节 西南的蜀汉

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沿用汉朝国号，史称蜀汉。刘备立刘禅为太子，封诸葛亮为丞相。

同年，刘备为夺回荆州，且报孙权杀关

羽之仇，发兵五六万亲征东吴。翊军将军赵云劝告他不要征伐，刘备不听。在率军出发时，他派人调驻守阆中（今四川阆中）的车骑将军张飞，领兵万人到江州（今重庆）会合。张飞作战勇猛，但性急暴躁，经常鞭打帐下。此次张飞领兵出发时，被帐下部将张达、范强杀害，并带着他的首级投奔孙权。

张飞被杀，刘备极为震怒。孙权向刘备求和，刘备不同意。孙权又向魏国称臣，把俘虏的魏将于禁送还。魏侍中刘晔建议趁机进攻孙权，文帝曹丕不听，接受孙权的卑曲，并封孙权为吴王。孙权解除了对魏国的担忧，得以全力对付蜀军。

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朱然、潘璋、韩当、孙桓等大将及战士五万人西上拒敌。

222年，蜀军进军至三峡东面的猇亭，吴军也集中于此。吴军数量少，刘备产生了轻敌的心态。他把军队分散驻扎在夷陵，建立了几十处营屯，在军营间树立起围栅，连绵七百里。吴军主帅陆逊坚守半年多而不出战，蜀军无法获得战机，军心开始涣散。刘备把水军移至陆上，由于天热，又让军队在山林中安营。陆逊认为决战时机已到，命令士兵每人带一把干草，在蜀营外放火，乘火进攻。在试攻成功后，他又令吴军全面进攻，用同样的方法，攻破蜀军四十余营，杀死蜀军大督冯习、前部督张南。蜀军船只、器械、物资全部丧失，士兵尸体布满江中。另一支蜀军将领黄权投降，只有少数人马随刘备逃回。吴军将领认为可追击，以俘虏刘备，陆逊认为魏国在北虎视眈眈，应退兵。

经过这次打击，刘备病倒，于223年在白帝城去世。临终前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能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主理蜀国军政。夷陵战败，使蜀国实力大为削弱，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始试图摆脱蜀国的控制。223年，雍闿叛乱，越西的高定、牂柯的朱褒都起兵响应。为了腾出精力巩固后方，诸葛亮马上派尚书邓芝为使节，与吴国恢复了同盟关系。孙权也派张温到蜀国回访，蜀国与吴国之间又信使往来不断。

225年，诸葛亮率军平定西南少数民族的叛乱。参军马谡向诸葛亮建议说，少数民族很久以来就不服朝廷了，今天打败他们，以后还会反叛。要是把他们都杀死，那是不仁。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应以征服人心为主。诸葛亮同意他的看法。

诸葛亮分三路出兵南征，为引诱高定把军队集中，以便一举消灭，他令蜀军停止前进，等高定将分散的军队聚集后，突然发起进攻，将其击破，杀高定。另一路蜀军也打败了朱褒。雍闿这时已被高定的部下杀死，孟获代其为统领。蜀军迅速攻占了越西（今四川西昌一带）和牂柯（今贵州关岭附近）各县，但在泸水（金沙江）以南地区却遭到了永昌郡大姓孟获部众的反抗。

孟获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有较高的威信，诸葛亮决定从心理上征服他。他命令蜀军不得伤害孟获，只能活捉。蜀军在交战中六次生擒孟获，每次孟获都对战场失利不服，直到第七次被捉，孟获才真心投降，并表示不再反叛。

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后，诸葛亮加强了对这里的行政管理。他任用少数民族小头领担任县级以下官吏，把一些上层首领请到成都，给以官爵，同时把一些强硬的大姓豪强迁到内地，把一些少数民族男人征入蜀军，连同家属一起迁走。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得这一地区逐渐稳定。当地出产的金、银、

漆、朱砂和牛、马等成为蜀国的重要资源，南中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之间也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之后，诸葛亮准备北伐，同魏国争夺关陇地区。从227年起，诸葛亮先后五次发兵北伐曹魏。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声称从斜谷出军，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到箕谷充当疑兵，诸葛亮自己率领大军进攻祁山（今甘肃西和境）。魏明帝曹叡亲到长安督战。

诸葛亮的参军马谡才能过人，喜欢谈论军事，诸葛亮对他非常器重，每次与他谈论都通宵达旦。这次出征，诸葛亮不用魏延、吴懿等旧将为先锋，而派马谡率军在前，与魏右将军张郃在街亭相遇。马谡违反诸葛亮的策略，不据守山下的城，反把军营安排在山上，离开水源。裨将军王平规劝，马谡不听。张郃断绝了蜀军取水之路，然后发动进攻，大败蜀军。赵云、邓芝也兵败，赵云在后面掩护，军力及物资损失较少。诸葛亮只好退兵，杀马谡，请求自贬三等。此役，蜀军数量多于魏军，诸葛亮认为失败原因在于缺乏良将。

228年，曹休被孙权打败，魏军东救，关中空虚，诸葛亮打算再次北进。群臣对此多抱怀疑态度，诸葛亮向刘禅上书陈述出兵理由，这就是有名的《出师表》。他在上书中回顾了自己“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经历，特别是刘备临终托孤的情景，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帝知道不讨伐曹魏，王业亦亡，坐而待亡，不如伐之。兵法是要借助形势，现在正是时候。曹操智计不同常人，还曾多次失败，何况我才能低下，何能必胜？我到汉中一年间，已失去赵云等将及统兵官七十多人，士兵死亡一千多人，再过几年，可能会损失三分之二。虽然现在百

姓和士兵都很疲劳，但战事不能停止，那么驻扎与出兵的辛劳与费用是一样的。因此，不如乘时而动。各种事情的发展很难事先料想，我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率兵出散关，包围陈仓。蜀军几万人，用云梯、冲车攻城。魏守军千余人用火箭射中引燃云梯，又用绳索系石磨压坏冲车。蜀军制造了高百尺的井字木阑向城内射箭，还用土填平城壕，想直接登城，魏军又构筑出一道城墙。蜀军再挖地道通向城中，魏军在中途横截。如此昼夜攻城二十多天，蜀军粮尽，只好退兵。

229年，诸葛亮派陈戒进攻武都、阴平，自己从建威出兵，取得两个郡后退兵。

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他率军包围祁山，与魏军在上邽相遇。魏军凭险固守，蜀军不得与魏军交战，只好后撤，魏军追击，被蜀将魏延等打败，魏军损失三千余人。其后，诸葛亮因粮尽退兵，魏将军张郃追击，蜀军在高处设下埋伏，张郃右膝中箭而死。

诸葛亮筹备再次北进，发展农业，练习军事，制造了木牛、流马，运输粮食到斜谷，在此建立粮仓，使百姓士兵都获得了休息。三年后，他再次出动全部军队十万人从斜谷伐魏，并与吴国约定在东面进攻。

蜀军到了郿县（今属陕西），在渭水之南驻扎，魏军统帅司马懿率军渡过渭水，背水为营与蜀军相拒。他认为，诸葛亮要是从武功向东进，值得担忧；要是西上五丈原就没有关系。蜀军果真向五丈原移动。

魏雍州刺史郭淮认为诸葛亮必定会争夺北原，断绝通向陇地的道路，控制那里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司马懿于是派郭淮进军北原，击退了前往的蜀军。

吴国这时也出动大量军队，从三个方向进攻曹魏：孙权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陆



逊、诸葛瑾率一万多人向襄阳进军，将军孙韶、张承向广陵、淮阴进军。魏明帝率军亲征，吴军进攻合肥没有收获，士兵又多生病，于是退兵。

魏明帝命令司马懿坚守，不得与蜀军交战。诸葛亮派人送给司马懿女人用的服装头饰，司马懿发怒，上书明帝要求出战，明帝不准，派卫尉辛毗带着节杖到军中控制。诸葛亮的护军姜维知道魏军不会出战了。这时诸葛亮得了重病，不久去世。

长史杨仪不发丧，率蜀军撤退。司马懿

持簸箕陶俑

三国 蜀

1981年四川忠县出土
高54厘米

追赶，姜维令蜀军多张旗帜，并击鼓呐喊，作出要迎战的姿态，司马懿退兵。进入山谷以后蜀军才发丧，百姓慨叹：死诸葛吓走生仲达。

川蜀地区没有像中原那样受到汉末大动乱的破坏，但由于对魏国及吴国的战争，对物资的需求很大，有一个保持经济与战争体制相适应的问题。诸葛亮主持蜀国政务时间较长，由于他的励精图治，蜀国经济尚能跟上战争步伐。

鉴于以前刘焉父子统治时期官吏贪贿苛刻、征收过度的情况，诸葛亮提出了发展农业、减少税赋的方针。

诸葛亮还主持修建了成都附近九里长的长堤，以防止洪水淹没低洼地带的农作物。对至关重要的都江堰，设立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并派一千二百名士兵驻扎堰区，守卫

和维修都江堰。

对于盐铁这样的大宗经济资源，诸葛亮也实行国家专卖制度，设立了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等官职管理，禁止私人涉足，使盐铁成为蜀国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巴蜀地区物产丰富，三国时期手工业发展显著。首先是煮盐业，据文献记载，这里“家有盐泉之井”，“火井沈荧于幽泉”，可见天然气煮盐已成为正常生产。蜀地生产大量的铜镜、漆器。铜镜上神兽花纹生动精巧。漆器不仅种类多，制作也十分精细。器械制造上也改进了东汉的连弩，使一弩十矢俱发，威力很大。

蜀锦也是益州地区的传统产业。诸葛亮鼓励种桑养蚕，蜀锦制造有了很大成就，远销到吴国、魏国，也成为蜀国重要的财政来源。诸葛亮甚至说：对敌战争之资，惟靠锦耳。经过努力，川蜀地区田地开辟，仓廩充实，器械坚利，蓄积丰饶。

诸葛亮治理蜀国，强化了已有的严法政策，人们多有怨言，法正曾劝他宽缓为政。但诸葛亮认为：刘焉、刘璋父子治理蜀地以恩德为重，却导致了蜀人专权放纵，君臣之道不立，所以衰落。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制封官，有官就知荣，恩威并济，上下有节，这是为政之要。

诸葛亮能做到任用贤能，选拔官员不看虚名而求实才，不使用浮华之人。他赏罚公正，犯法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要处罚，有功的人即使是与自己有矛盾仇隙的也要奖赏；有人犯了过错、有恶行，不论多轻，只要是抵赖掩饰的都要严罚，有人为善，不论多小也要褒奖。他对人处罚严而不酷，因此人们虽然被处罚也无人怨恨，蜀国上下都能遵法，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由于诸葛亮的勤政与公正，即使采取的是较为

吹箫陶俑

三国 蜀

1981年四川忠县出土

高38.5厘米



严厉的治国策略，这一时期蜀国政治也是三国中最好的。

诸葛亮本人极具人格典范。他治理蜀国，极为严谨认真，终日操劳。他不仅在朝中兢兢业业辅助后主刘禅，还兼益州牧主管地方事务，政务不分大小，都由他决定，以至于要亲自核对账册。丞相本应是决定国家大政的，诸葛亮之所以事无巨细必躬行，纯粹是不得已，因为蜀国人才较少。

诸葛亮一生以严于律己著称，他死后只留下桑树八百棵，薄田一千五百亩。这对一般百姓是不少的资产，但考虑到高级官员一些必要的车辆、服装、佣人等项支出都由自己开支，就不算多了。诸葛亮曾说，这些资产供子弟的衣食有富余，不再另外经营产业，身死之日，不使自家内有多余的丝织品，外有其他的资产。临死他嘱咐葬在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墓穴容下棺木即可，随葬应季的衣服，不安放器物。这属于薄葬。

诸葛亮临终推荐蒋琬和费祎辅政。蒋琬先是诸葛亮的掾属，极受重视。蒋琬曾任县令，一次刘备休闲时突然到了那里，见他并不把政务放在心上，又正好喝醉酒，于是大怒，要杀他。诸葛亮为他辩解说：“蒋琬是社稷之器，非一县之才，他为政以使百姓安定为本，不追求浮华的政绩。”刘备听后饶恕了蒋琬，只是免了他的官。

诸葛亮北伐时，蒋琬在成都处理丞相府事务，筹集物资供给前线。诸葛亮死后，蒋琬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为尚书令，处理军政要务。

蒋琬与费祎等人鉴于诸葛亮几次北伐不能成功，改为经营凉州的策略。他们认为曹魏地域太广，不易攻克，凉州对于关中可进可退，当地的羌、胡等少数民族同蜀汉关系也较为亲近。于是任命姜维为凉州太守，蒋



琬自己驻扎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北）以为接援。蒋琬的政策是很实际，也很替蜀国百姓考虑的。

费祎最早担任刘禅的太子属官，后来成为诸葛亮的参军，诸葛亮早年就对费祎很看重。刘禅时，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继蒋琬之后，主持处理国家军政要务。费祎才力过人，有段时间军政事务繁忙，面对公文，费祎看一眼就知大概，并且不忘。据说他每天清早就开始处理公务，其间一时接待客人，一时吃饭娱乐，偶尔还下下围棋，但却能有条不紊，公务及个人事务兼顾。253年，费祎被曹魏降人刺死。

费祎死后，姜维成为蜀国的重要人物。姜维忠心事主，思虑精密，对军事机敏，被诸葛亮看重。247年，姜维与费祎同录尚书

抚琴女陶俑

三国 蜀

1981年四川忠县出土
高32.8厘米



费祎墓
位于四川绵阳

事，参与大政。姜维好立功名，主持凉州事务时，打算招羌、胡人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以获取陇西。他几度欲大举兴兵，均遭到费祎反对。费祎认为诸葛亮对曹魏尚且不能有作为，他们的才能相去更远，不如保国治民，等待能者。

费祎死后，姜维马上开始实行攻魏行动，从费祎去世之年到汉亡的前一年，短短十年间，他数次西征。253年，他率数万军队包围南安，后因粮尽而退。254年，他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再次出陇西，进攻曹魏在凉州的城镇，攻取河关、狄道、临洮，移其民而回。255年，他与车骑将军夏侯霸一起

出兵，在洮西大破曹魏雍州刺史王经的军队，魏军死亡一万多人。256年，姜维为大将军，进攻曹魏上邽城，被曹魏邓艾军打败，死伤甚多。257年，趁曹魏诸葛诞之乱，姜维率几万兵攻魏，曹魏司马望、邓艾坚守不与蜀军交战，其后，曹魏内乱平定，姜维退兵。262年，姜维再次出兵攻魏，被邓艾打败。姜维的多次用兵，大大消耗了蜀国的民力，蜀人极为愁苦。

蜀军多次北伐，均无重大进展，反而使蜀国军力、民力、财力耗费极大。而北伐不能成功，一是由于蜀、魏经济、军事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加上蜀失去荆州后实力更为削弱，因此几次征魏都是军粮用尽退兵；二是魏军主帅曹真、司马懿、邓艾也是极具军事才干的人，魏军没有大的失误。

姜维多次用兵不果，宦官黄皓鼓动后主刘禅用右大将军阎宇代替姜维，姜维疑惧，驻于远离成都的沓中。鉴于曹魏钟会屯兵关中，姜维向后主建议由张翼、廖化驻守阳安关和阴平。黄皓信巫术，认为曹魏不会进攻，竟让后主不要理会姜维的建议。

刘禅后期，宠信宦官黄皓，政治腐败，蜀国国力日衰。

263年，曹魏兵分三路伐蜀。一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三万多人进军沓中，牵制姜维；一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多人断绝姜维归路；另一路则由钟会率主力十多万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进攻汉中。

蜀国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兵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驻守阳安关周围，要求各地都坚守不出战，退至汉城、乐城固守。钟会分兵进攻汉、乐二城，自己率兵取阳安关。

张翼、董厥行军到了阴平，听说魏诸葛绪军指向建威，于是在阴平驻留一个多月而

并未向阳安关进军。阳安关蜀军守将蒋舒曾因在其他地方为政平庸而被撤换，心怀不满，此时出城投降魏军，城中另一蜀将傅佥战死，魏军攻克阳安关。

姜维听说钟会攻克阳安关向汉中进军，就后撤至形势险要的剑阁，与廖化、张翼、董厥等人固守。钟会大军无法攻下，粮食匮乏，已有退兵之意。但邓艾认为蜀军已有败绩，应乘胜势。如果从阴平经汉德阳亭向涪城进发，即从剑阁以西百里的地方穿过，出其不意，剑阁蜀军必退向涪城，则钟会军可以向前推进，如果剑阁蜀军不退，那么涪城蜀军必成弱势。

邓艾于是率军从阴平穿过无人之地七百余里，这条路山高谷深，极为艰险，要凿山修桥才能通过，粮食又缺乏。邓艾用毡子裹住身体下山，将士都扶着树木，攀着崖岩，在崎岖的山路行进。魏军直抵江油，蜀军江油守将不及防备，只好投降。蜀诸葛瞻军到了涪城，迟疑不进，前锋被邓艾军打垮，只好退守绵竹。邓艾之子邓忠及魏将师纂与诸葛瞻力战，大破之，斩诸葛瞻。魏军进入平坦地带，向成都进军。

蜀军没有料到魏军来得这么快，来不及部署成都防务。百姓也发生恐慌，许多人逃向山林地区。后主刘禅召集大臣开会，有人主张逃到东吴，有人主张逃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凭借地势固守，最后还是觉得投降较为可靠。于是刘禅捆绑自己、抬着棺材向魏军投降。在外的蜀军将领接到命令，也向钟会投降。蜀国灭亡。

第四节 江南的吴国

221年，孙权把政权中心迁到鄂城（今湖

北鄂州），改名为武昌。

229年，孙权称帝，以建业（今南京）为都城。建业在先秦是金陵邑，秦始皇认为此地有王气，怕不利于己，就凿破山岗，改金陵为秣陵县。吴国建立前，张纮认为秣陵山河之势为胜地，劝孙权将之作为政治中心，刘备也这样劝孙权。212年，孙权建石头城，把政权中心迁到秣陵，改名建业。

吴都建业遗址在今南京市，孙权时把武昌宫的材料拆下，在建业建设了太初宫。以后的东晋及南朝在吴都的基础上续建，布局仿照魏晋洛阳城，城内宫室、官署各代设置有所不同，但是城市范围及城门名称没有大的变动。外城墙周长二十里，宫城周长八里，最初是以土和竹篱为外城墙和宫城墙，以后逐步用砖砌筑。建业城在隋朝初年被夷平，以后各代的修建更使六朝都城面貌难以寻觅。

孙吴的主要威胁来自日益强大的曹魏。吴与魏的主要战场在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合肥是魏国东方的前沿重镇，长江天堑则是吴的天然屏障。为了防御魏国，吴国在这一地区长期布署着二十万左右的军队。由于兵员枯竭，又缺少战马，吴军无力久驻江北与魏骑兵交锋；魏国兵力虽强，但水军不足，也难以渡江与吴军作战。双方在这样的军事形势下，只能南北相峙而立。

孙吴政权是依靠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才建立起来的，因此，世家大族的势力在孙吴统治时期有很大的发展。

孙吴所在的江南地广人稀，经济比较落后。为了获得人口、赋税以维持政权，孙吴连续几十年对境内的吴郡、会稽、临海、丹阳、豫章、庐陵、临川、建安、新都（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境内）等广大山区的山越大规模用兵。



石头城遗址

位于江苏南京

石头城是建业城西部的一个独立小城，是在清凉山的山岩上填土筑成。城周长七里一百步，三国时是土筑，东晋义熙初年用砖加砌。石头城中有仓城，又名石头仓，是储存兵器、粮食的。石头城西南有烽火楼，是吴人点燃烽火报警之处。当时吴国在长江沿江各处设有烽火台，一有军情，烽火很快会传达到位。石头城下是秦淮河，不仅可凭河守卫，还有吴国水军驻地，可停泊战船千艘。石头城成为六朝时都城的一处重要军事屏障。

山越是越族人与逃亡居住在当地山区的汉族人的后裔，前后有几十万山越人被孙吴政权征服出山。如东安太守全琮几年间就获得一万多山越人。诸葛恪持续征伐山越，先把能够控制的百姓与山越人隔绝，然后收割山越人的庄稼，使得山越人无法生存，被迫出山，诸葛恪征服的山越人多达十余万。山越人出山后成为政府的编民，不少精壮者被征入军队。陆逊、贺齐在鄱阳、丹阳征剿山越获精兵八千。吴国士兵有十几万来自山越人，约占吴国军队的半数。还有一些山越人成为屯田民。

吴国也实行士兵世袭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士兵家庭有专门的称呼，称为“兵户”。与曹魏一样，吴国士兵不归地方政府管辖，而归属于将领，统领这些士兵的将领也是世代相传。士兵平时要从事生产活动，所得的一部分粮食归将领所有。出兵打仗时，

将领要把自己的家属交给国家做人质。

除世袭领兵之外，许多世家大族拥有大量田客。这些田客一部分是私自招募的，一部分是政府赐给的。在孙权的大力扶持下，不少世家大族“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他们有成千艘船只贩运货物，拥有粮食万仓，陈陈相因，以致发霉变质。人民辛勤开发江南的成果，成了世家大族致富的财源。

东汉末年，中原连年战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北方的世家大族为避难，纷纷流寓江南，许多农民也不断逃亡到吴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山越人出山定居，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促使长江下游沿岸和太湖流域的许多荒地得到开垦，江南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吴国经济的发展，以太湖等地区最为显著。太湖地区在汉代就已建造了海塘、圩田，

堰塘、运河等多种水利设施，吴国在此基础上继续兴造。

太湖东南岸的堤塘是防止太湖水泛滥淹没农田的重要设施，吴国在这一带屡有修建。吴景帝孙休时期，从吴兴城北到长兴修筑太湖长堤几十里，名为青塘。吕蒙在皖城凿石通水，灌溉稻田一百多顷。富水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吴国引富水灌溉农田。巴水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同样被引用灌溉当地的屯田。涔水是澧水支流，吴将周泰引涔水灌溉土地。

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保证军粮供给，孙吴像曹魏一样，实行军屯和民屯，成立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机构进行管理。军屯的佃兵且耕且战，民屯下的屯田客只须耕种，不服兵役。较大的兵屯在庐江（今安徽潜山），较大的民屯在毗陵（今江苏武进），各有男女数万人口。

吴国士兵都要兼农，吴军驻扎之地就有军屯。古丹阳湖地区在今江苏南部及安徽东南部境内，吴国在这里设立了于湖督农校尉，在湖滩大规模地开垦土地，其中金宝圩是由于中原南下人口无田可种，而在这里建造圩田。此外，还有永丰、咸保、毗陵、湖熟、溧阳、江乘等屯田区。今浙江境内的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也是吴国时期开辟的。

吴国在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设立了十多处屯田区。先是曹魏在皖水下游设立了屯田区，孙权见这里土地肥沃，于214年夺取了这一地区，俘虏了曹魏屯田民几万人，继续在此大规模屯田，这里遂成为吴国最大的军屯区。这一带的屯田点还有新都、皖城、赭圻等，是孙吴重要的水稻产区。

武昌地区是吴国又一重要的屯田区，主要有阳新、巴水、涔水、夷陵、江陵、金城、

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浔阳、柴桑等地。

吴国还开凿了几条运河：240年开通从建业西南到秦淮河宫苑内仓城的运渎，用以运输粮食；241年又开凿东渠，连通北埭，南接秦淮河，名为青溪；同时又开凿潮沟，与运渎、青溪连成建业地区的一条航路。

245年，管理屯田事务的陈勋主持疏凿破岗渎，使用屯田兵民及劳役兵三万人。这条水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可以与运渎及吴郡、会稽连通。吴国还对江南运河的北段进行了治理，此段河道因地势高，经常出现水浅难以航行的情况，治理工程自丹徒至云阳，劈山开岗，十分艰辛。这几条水道的治理也可使农田得到灌溉。

吴国的手工业较以前有一定发展，今天能直接见到的遗物主要是瓷器和铜镜。东汉中晚期，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一带铜镜制造业很发达，生产的铜镜有较高水平，成为当时的一个制镜中心，三国时这里的铜镜制造业继续发展。会稽镜的主要种类是神兽镜，这是一种背面花纹较深较高，纹饰也比较复杂的铜镜。纹饰的内容由传说人物和吉祥野兽加上装饰花纹及铭文组成。铭文一般

陶碓

三国 吴

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

长13厘米，宽3.9厘米



永安五年神兽镜

三国 吴

直径12厘米

“永安”是吴景帝孙休的年号。三国时吴国会稽成为铜镜制造的一个中心，产品主要有神兽纹镜和画像镜，制作精美。



是年份和吉祥语，有时还有制镜师的名字。如有一面铜镜的铭文是：“永安四年太岁己巳五月十五日庚午，造作明镜，幽涑三商，上应列宿，下辟不祥，服者高官，位至三公，女宜夫人，子孙满堂，亦宜遮道，六畜蕃伤，乐未（央）。”会稽镜制作精良，产品销售到其他一些地区。

湖北鄂州曾是吴国都城，也是当时的一个制镜中心，出土了不少当地出产的铜镜。鄂州产铜镜有一些是由来自会稽的制镜师制造的，如一面黄武六年造的铜镜上有铭文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家在武昌思其少”，表明这是一个来自会稽山阴名叫鲍唐的制镜师移居武昌（鄂州）后制造的。

绩麻是当时民间重要的副业生产。南方传统的麻布以会稽产的最为有名。孙吴时这

里的丝织业也逐渐兴起，会稽郡诸暨县和吴郡永安县盛产丝，专门供应宫廷需要。

三国时，吴的铜铁冶炼也比以前发达，造船业得到大力发展。为了适应水战和海上贸易，吴国专设典船都尉监督造船。当时海上的商船大的长达二十余丈，江中的战船有的可载士兵三千人，有的船只上下五层，雕镂彩画，非常华丽。吴国的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北达辽东，南通广东、交趾及南亚诸国。

吴国于236年、238年分别发行了“大泉五百”、“大泉当千”两种大面额铜钱。“大泉五百”一枚相当于通行的五铢钱五百枚，“大泉当千”一枚相当于五铢钱一千枚，但其实际重量仅为7克和14克，相当于五铢钱标准重量的2倍至4倍，这反映了吴国经济的掠夺性。

三国时吴与夷洲（今台湾）已经有了较多往来。据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记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还说：“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那里“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人们以农业和渔业为生。“亦出铜铁”，“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手工业有一定发展。230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人的庞大舰队到达夷洲，他们在夷洲逗留近一年，回来时还把几千夷洲人迁到大陆。孙吴的这次远行，密切了夷洲与大陆的关系，也增加了大陆对夷洲的了解。242年，孙权又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领一支三万人的水军远航珠崖、儋耳（今海南），恢复了那里同大陆的关系。

吴国自孙权称帝，几代皇帝大多对官员不信任。陈寿评价孙权性多猜忌。孙吴设有校事吕台等，监视内部，纠举大臣，排陷无辜，诛杀臣下，许多人都畏罪不敢议论政事。孙权晚年猜忌愈甚。与曹魏一样，孙吴带兵在外的将领都以妻子儿女为人质，如有叛逃就杀死人质，甚至夷三族。

孙权称帝后刚愎自用，宠信小人，吴国发生了夺嫡之争，国势大受打击。孙权称帝后，先立长子孙登为太子。孙登早死，又立孙和。但孙权宠爱孙霸，让其在礼制上享受与孙和同等的规格。这使孙霸产生了夺嫡之意，他建立了自己的势力，想取代孙和。由于孙权的纵容，朝臣也分为两派：一派以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为代表，拥护太子；一派以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为代表，支持孙霸。

孙霸党羽多次向孙权诬告孙和，而丞相陆逊、太常顾谭、太子太傅吾粲则认为太子是正统，替他说话。孙权听信诬告，对孙和



产生了不满，他把顾谭和其弟顾承流放，将吾粲逮捕杀死，并几次派宦官指责陆逊，使陆逊忧愤而死。

孙霸得势后，孙权又逐渐悟出一些曲直，为了铲除派系，他采取了双双打击的手法。他先把孙和幽禁，将劝诫的臣僚杀死，流放了十几人，支持孙和的无难督陈正、五营

“位至三公”铜镜

三国 吴
湖北武昌出土
直径10厘米
该镜钮图饰变形四叶纹，内四角刻“位至三公”字样。

“大泉当千”铜钱

三国 吴



督陈象被族诛，孙和被废为庶人；接着，他又把孙霸赐死，杀死其党羽全寄等人。

夺嫡之争，牵涉广泛，东吴政局因之大乱。

孙权之所以对争权双方同时进行打击，其主要原因是为了打击和抑制江东地方大族、豪族的势力。世家豪族在东吴势力强大，一些家族多人在朝担任要职，甚至握有重兵，他们的行动足以动摇东吴政权的根基。对他们，东吴政权一方面极为重视，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换取这些人的支持；另一方面，东吴当政者又对大族、豪族很不放心，因为在不利的环境下这些人可能轻易放弃对现主的支持。

252年，孙权死，葬于建业蒋山。继位的孙亮，年仅九岁，由诸葛恪辅政。

诸葛恪之父诸葛瑾，是诸葛亮之兄，汉末避乱江东，后成为吴国官员。诸葛恪执政之初，施行了一些善政，取消关税及百姓所欠债务，广施恩惠，受到了百姓的爱戴。以致每次出行，百姓都伸长脖子瞻仰他的风采。

252年，曹魏三路大军征伐吴国。征南将军王昶进攻南郡，镇南将军毌丘俭进攻武昌，扬州刺史诸葛诞率七万人进攻东兴（今安徽含山）。魏军攻东兴城，一时难克。吴冠军将军丁奉率三千人突袭魏军前方营垒，魏军惊扰四散，浮桥断，魏军落入水中，踩踏而死的有几万人。孙吴获得的魏军物资器械堆积如山。诸葛诞败绩，其他两路魏军闻讯而退。

吴军大胜，诸葛恪加封荆州、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他产生了轻敌之心，试图进攻曹魏，认为曹操时的将领当时都已死亡，新一代没有成长起来，司马师年轻，正是北伐的好机会。众人极力劝阻，认为刚打完

大战，军队疲劳，诸葛恪不听。253年，诸葛恪出动几乎是全国兵力的二十万军队北伐。

吴军包围了合肥新城，城中魏军仅三千人，吴军却攻打几个月都不能攻克。时值大暑，吴军因疲劳、饮水不洁发生疾疫，一半人患病，死伤甚多，只得撤军，一路伤病、死之者到处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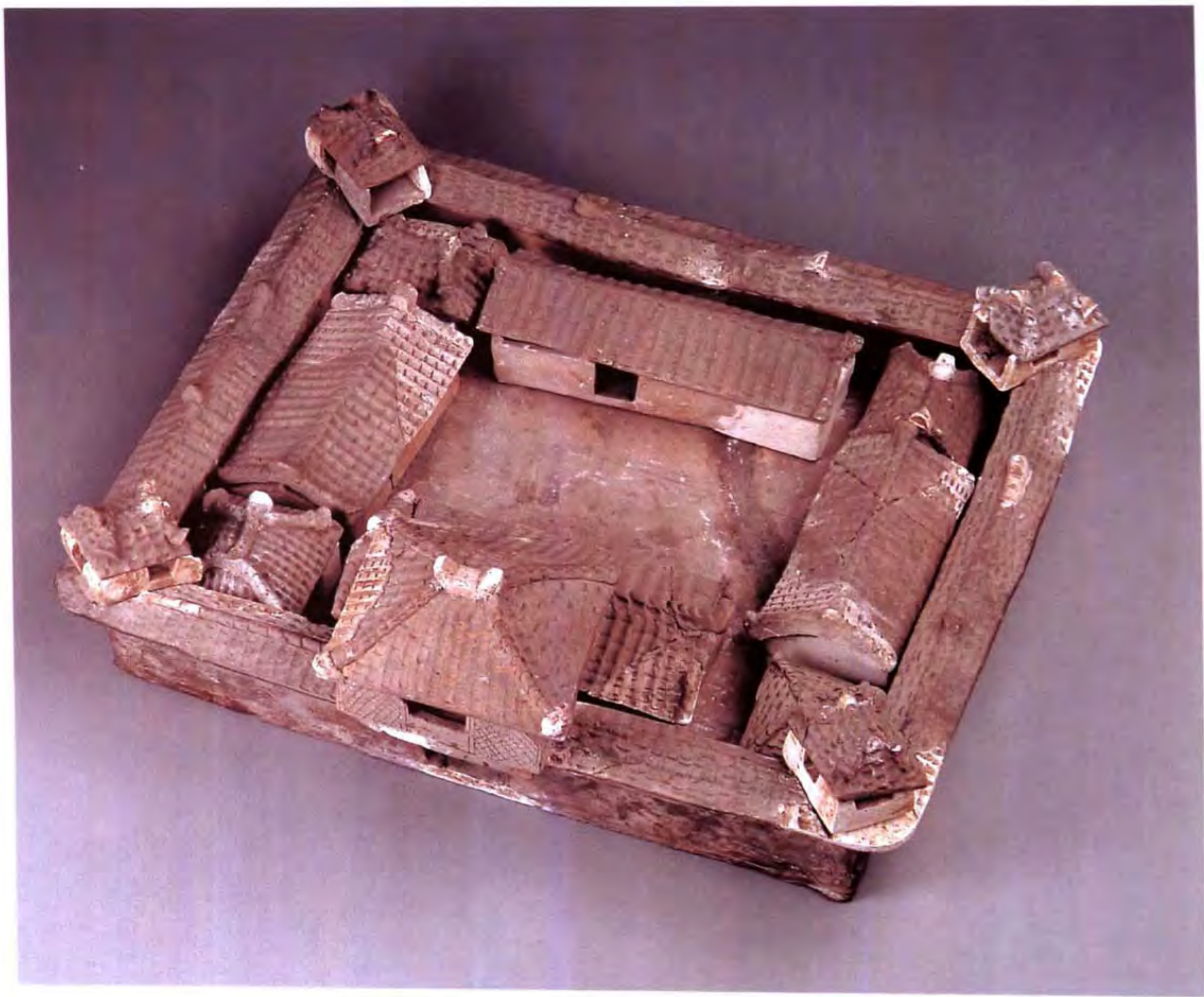
诸葛恪回到建业后，更为骄矜、狂妄。他把人事部门打算任命的地方官全都废止，为了树立威严，经常责难臣僚，并把禁军换成自己的亲信。吴人对诸葛恪极为不满，孙峻向皇帝孙亮说，诸葛恪要生变。征得孙亮同意后，孙峻在宫中宴会上把诸葛恪杀死。

诸葛恪年轻时有盛名，孙权对他极为器重，然而他的父亲诸葛瑾很发愁，认为诸葛恪不是保家之主。陆逊曾对诸葛恪说：我对于在我前者必定奉之同升，对于在我下者则扶接之。现在我看你气势凌驾在上者，轻蔑加于在下者，这不是安德之基。果然，骄矜、狂妄最后给诸葛恪带来了灭顶之灾。

孙峻杀诸葛恪后，成为丞相。他独自辅政，骄矜淫暴，人们对他很反感。后来孙峻病死，其堂弟孙琳掌政。孙琳对人无礼，诛杀异己，吴国人对他也普遍反感。皇帝孙亮在政务上对他有所责难，于是孙琳不再入朝，又派几个弟弟驻守建业军营，以图自保。孙亮心中嫌恶，欲诛杀孙琳，不料事情泄漏，孙琳抢先废黜孙亮，立琅邪王孙休为帝，是为吴景帝。

后来，孙琳又与景帝产生矛盾，率兵出镇武昌。有人告诉皇帝，孙琳企图谋反，孙休准备除掉孙琳。在腊月的朝会上，孙休将其逮捕杀死。

孙休任命濮阳兴为丞相，与左将军张布同受重用。二人都是孙休以前的故吏，行事奸佞不仁。曾有人建议兴建浦里塘，诸大臣



都认为太难，且劳民伤财，只有濮阳兴认为可以成功，于是动工，耗费人力费用不可胜数，施工的士兵百姓有许多死亡。吴国人很失望。

264年，孙休病死，丞相濮阳兴等认为内外形势严峻，应立一个成年的皇帝，于是立乌程侯孙皓为帝。

孙皓是被废黜的太子孙和之子。孙皓即位之初，安抚百姓及士兵，开仓赈贫，把一些宫女放出，与民间没有妻室的人婚配，又将皇家园林的禽兽放生以减少开支，当时人称其为明主。然而不久他就露出了本性，残暴，好酒色，有许多忌讳。因为拥他为帝的

濮阳兴、张布表露后悔之意，孙皓就将二人杀死，并灭三族。他还杀死景帝皇后与景帝的两个成年儿子。臣下对他稍有冒犯，就被处死。

吴国在孙皓以前，战争、赋税及劳役就一直很繁重，吴国百姓多次起义反抗。顾雍、陆逊曾劝孙权减轻百姓负担。孙权却认为，如果只是坐守江东，军队数量够用，赋税劳役也不该那么多，但东吴国家地域狭小，又北有曹魏时刻觊觎，为了使兵力够上战争之用，百姓负担重，是没办法的事。吴国后期，人民负担变得更重，小吏的家庭，五人就有三人服役，还要自己准备口粮。

陶院落

三国 吴

1967年湖北鄂城出土

长54厘米，宽44厘米

这组陶院落，平面呈长方形，由围墙、四角礮楼、前堂、正房、左右厢房组成。楼顶内刻“孙将军之门楼也”七字，可能是仿照吴国武昌督孙述的庭院而作。

简牍

三国 吴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
长47厘米至54厘米

孙皓在位时，视迁都为儿戏。他听人说荆州有王气，于是把都城迁到武昌，然后由下游的扬州从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提供供给，百姓十分劳苦。他还几次发兵进攻西晋，同时在建业修建昭明宫，费用上亿。在他统治下，赋税劳役变得更加繁多，甚至向百姓征收算缗即人头税，一家往往有两人自备口粮同时服役，赋税也要照旧缴纳。兵家原来不服劳役，这时也被调去从事其他劳役。为了保证搜刮，供他享乐，他施行苛刻的法令，百姓愈加贫困，民众不堪忍受，以致反抗起义。

孙皓一贯亲近小人，虐待大臣。每次与群臣宴饮，他都要让这些入喝醉，又安排黄门郎十人，等宴会结束后，专门汇报大臣饮酒时的过失，诸如看起来不恭敬的直视及

错误的言语等等，严重的就杀死，轻的也要议罪。他的后宫已有几千女子，却仍到处搜寻充实。宫中的人偶有不合他意就要被杀死或流放。他甚至还设置了剥去人面部的皮及凿瞎人眼等酷刑。中书令贺邵中风不能说话，孙皓怀疑他是装的，将其逮捕拷打，贺邵还是不说话，最后被火烧、锯断头颈。湘东太守张咏不向百姓征收算缗，孙皓派人杀了张咏，并把他的首级向各郡的地方官展示。会稽太守车浚公正清廉，要求赈济灾民，孙皓认为这是私树恩惠，也把他杀死。左丞相陆凯、镇军大将军陆抗等人多次劝告孙皓，他都置之不理。

在孙皓的暴政下，吴国政局紊乱，上下离心，国势日衰。晋武帝司马炎产生了灭吴的想法。他以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以卫瓘为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以司马佃为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又命益州刺史王濬造战船，船长一百二十步，可容纳士兵两千多人，船上有木城、木楼，城上可以骑马。

羊祜对江汉一带的吴人采用了恩惠政策。每次战斗，都要到一定时间才交锋，不使用突袭战法；出兵时，若用了吴人田地中的粮食，都会估价偿还。吴国民众对羊祜都有好感。吴国统帅陆抗认为，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因此，命令吴军守好自己的地域，不得与晋军作小的军事计较。羊祜又开屯田八百顷，到他临终前积累了军队十年的用粮。279年，羊祜去世，荆州的百姓停止市场买卖，街巷一片哭声，吴国守军也为之流泪。

吴国荆州都督陆抗向孙皓上疏请求注意晋军动向。他自己也严加防范，不给晋军以可乘之机。不久，陆抗病死，吴国内部又因孙皓的恶政，矛盾重重，官员自危，百姓不

满。羊祜上疏认为，吴国地势之险远不如蜀国，而内部矛盾却重于蜀国，晋军的军队及物资都优于灭蜀之时，应抓住机会攻打吴国。由于朝中不少人反对，此议被搁置。羊祜死后，由镇南大将军杜预接替荆州都督。279年，杜预几次上疏请求伐吴，益州刺史王濬也上疏劝伐，认为一旦孙皓去世，吴国更换贤君，将会成为强敌。晋武帝终于同意了征吴计划。

晋军二十多万兵分六路开始南伐：镇军将军司马伷进攻滁中（今安徽滁河流域）；建威将军王戎进攻武昌（今湖北鄂州）；平西将军胡奋进攻夏口（今武昌）；安东将军王浑进攻牛渚（今安徽含山）；镇南大将军杜预进攻江陵（今属湖北）；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唐彬从巴蜀浮江而下。

杜预军先渡江攻取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俘虏吴都督孙歆，再攻克江陵。沅江、湘江以南直到交州、广州的吴国地方官纷纷投降。之后，杜预率军向建业方面进军。

西面，吴军在三峡口设置了拦江铁链，

并在江水中安放了一些一丈多长的铁锥，以阻截晋军战船。晋军造了几十个大筏，在上面设置了穿铠甲、持兵器的稻草人，在舰队前面航行，铁锥刺到大筏就被带走。晋军又造巨型火炬，长十几丈，粗十几围，灌上麻油，置放船前，只需片刻就能烧断铁链。晋军取得了吴军在三峡口的要塞西陵（今湖北宜昌），杀吴西陵督留宪，然后顺流而下。

王戎与王濬合攻武昌，吴军投降。吴国丞相张悌督吴国全部精兵三万人渡江迎击牛渚所部晋军，吴军溃败。王濬率巴蜀晋军顺流而至建业，吴水军一万人迎战，但见到晋军旗帜就投降了。王濬战船满江，旗帜照天，兵势极盛，吴国人恐惧不已。这时，司马伷也逼近了建业。吴将军陶濬到建业，孙皓问他水军如何，陶濬骗他说从巴蜀来的晋军船小，自己已得二万兵，明日乘大船出战。当晚，吴军全部溃逃，建业的一些吴国官员也开始投降。不久，王濬统军八万，战船绵延百里，击鼓呐喊进入石头城。孙皓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吴国灭亡，时为280年。

第二章

西晋的短期统一



265年，司马氏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夺得曹魏政权，建立晋朝，都城仍旧建在魏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司马炎灭吴，结束了三国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世家大族的荒淫残暴，决定了西晋政权的腐败与黑暗，使得全国一统的局面仅仅维持了三十多年。316年，腐朽的西晋灭亡。西晋灭亡后，南北分裂，北方先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建立了各自的割据政权，历史上称为“十六国”。317年，江南的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王，第二年改称帝，史称东晋。

第一节 西晋的政治和经济

西晋初年，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社会

秩序比较安定。西晋王朝采取免役和分发口粮的办法招募流散农民开垦荒地，并制定促进人口发展的法令，凡年满十七岁的女子，如父母不让出嫁，就由官府代择配偶。这些措施，有利于编户人口的增加和促进生产发展。

西晋王朝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租税，颁布了占田、课田和户调制。自魏国后期，屯田制被逐渐破坏，屯田客、屯田兵不断逃亡，加上世家大族霸占屯田的土地，屯田制已经无法维持下去。魏晋之际，曾两次下令废除屯田官，取消屯田区，于是除大地主的佃客外，其余农民一律成了州郡领民。这就需要对农民可以垦占的土地和征收租税的制度作出相应的规定。占田就是政府规定农民垦占土地的最高限额，课田是政府向农民征收地租的标准。占田、课田和户调则是按户向农民征税的办法。占田、课田和户调

的具体规定大致如下：

1、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女为正丁，十三岁至十五岁及六十一岁至六十五岁的男女都为次丁。

2、男子一人可占田七十亩，女子一人可占田三十亩。不论是否垦占了足额的土地，都要按规定的课田亩数缴纳地租。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课田二十亩；次丁男课田二十五亩，次丁女和六十五岁以上、十三岁以下的老人孩子都无课田。地租的数量是五十亩交粟四斛。

3、丁男做户主的每户每年缴绢三匹、绵三斤，妇女或次丁男做户主的折半缴纳。

4、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按户缴米、布或钱。

课田是带有强制性的。农民已经占了田，就耕种所占的田；没有田的，可以去开荒。实行占田、课田法以后，政府掌握的劳动力显著增加了。西晋农民赋税负担比曹魏农民还要略高，但考虑到赋税都用实物缴纳，数量是固定的，在收获较多的年份，农民可以有较多的余粮，这就为农民改善生活创造了条件。

西晋政府在颁布占田、课田和户调法令的同时，还制定了按官品占田和荫亲属、荫佃客的制度。制度规定：贵戚、官僚和世家大族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递减五顷，第九品可占田十顷。同时，可以按官品和门第的高低庇荫数量不等的亲属，享受免役特权，并可庇荫一定数量的衣食客和



青瓷神兽尊

西晋

1976年江苏宜兴出土

高27.9厘米，腹径23.2厘米
该器堆塑兽首为装饰，又以器腹为兽腹，以器耳为兽耳，兽与器浑然一体，别具风格，是一件高水平的青瓷手工艺作品。

佃客。一品、二品可以荫佃客十五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六品以上可以荫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二人，九品一人。被庇荫的佃客和衣食客可以免除政府的徭役。许多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徭役，都投身于贵戚、官僚和世家大族之门，成为他们的依附农民。

西晋实行的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农业的政策，使社会财富有较大的增长。为了发展农业，政府重视开河渠、通漕运，建筑新塘，灌溉农田。从考古发掘的晋墓壁画上，我们可以见到已经使用耕、耙、耨这套北方保墒防旱的先进技术。一些有关放牧的画面上，马牛羊成群，反映当时畜牧业也很兴旺。南方的晋墓中常出土陶瓷猪圈、羊舍、狗窝、鸡笼等，说明了这一时期农村家禽的饲养情况。在农业发展的同时，金属冶铸业的金、

银、铜、铁的冶炼技术有显著提高。西晋的制瓷业成就突出。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资逐渐丰富，广大人民的劳动果实也不断地被统治者攫夺挥霍。为了维护贵戚、官僚和世家大族的利益，西晋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把持着中正官位，经中正评定的士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重要官职都被世家大族垄断，世家大族成了有世袭特权的门阀。

门阀士族世代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官僚何曾每天饮食需用一万钱，还说无处下箸。他的儿孙在奢侈方面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贵戚、官僚竞相比富的事例中，最为突出的官僚是石崇与贵戚王恺。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奢盖过对方，王恺家用糖浆洗锅，石崇家用蜡烛当柴；王恺出门做四十里的紫丝

鎏金画纹带神兽镜

三国 吴

1977年湖北鄂州出土

直径14.6厘米，边厚0.45厘米

镜为圆形，扁圆钮，钮面有错金兽纹，连珠圈座。镜背主纹为五神一侍及四兽。其外有鸟兽相间的方枚一周，每枚一字，读为：“吴造明镜，神圣设容，服者卿公。”边纹外为蟠螭状云纹，内为羽人操舟、奔龙、飞凤、走兽等组成的画纹带，缘外侧有错金双线锯齿纹。通背鎏金，装饰华丽辉煌。三国两晋时期，东吴地区铸镜水平很高，可以说是我国古代铜镜铸造史上的一个新的高峰时期。



碧绫布障，石崇就做五十里长的锦缎布障；石崇用香椒涂墙，王恺就以赤石膏泥壁。

晋武帝司马炎鉴于曹魏政治苛刻及大量花费，早期厉行节俭。有人报告司马炎，御用的牛车的青丝绳断了，他就下诏书用便宜的青麻绳代替。太医令向司马炎进献用野鸡头上的毛做成的大衣，司马炎下令将之在宫殿前焚烧，并下令有敢进献奇器异服的，一律问罪。但在平吴以后，司马炎认为天下已无事，开始沉湎享乐。司马炎原已有嫔妃数千，这时又把吴主宫中的五千嫔妃纳入自己后宫。他还公然卖官鬻爵，不择手段地搜刮钱财。

司马炎对官员态度宽缓，有过错一般不责罚。大臣何曾的奢侈是出了名的，司隶校尉刘毅多次弹劾，司马炎也不问罪。

尚书胡威曾提醒司马炎对大臣过于宽厚，司马炎说：“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吾无所有过。”胡威说：“臣之所陈，岂在尚书省的丞、郎、令史等中下级官吏，而是指如臣这样的等级，才可产生影响，显示法规的作用。”

三国的曹魏、孙吴统治者对官员监察过严，人人不满。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官员为达到或提高政绩而不择手段，暴虐百姓。魏晋以来，一些官员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官场舆论倾向宽政。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晋朝官员对政务的荒废，应该处理的事务不去过问，豪强势力膨胀，这同样是对百姓的祸害。

西晋政权冗官冗员现象严重，司徒左长史傅咸曾向司马炎上书说：国家和百姓资财缺乏，是由于设官太多，户口只有汉代的十分之一，而设置的郡县多于汉代。设立的军府有上百个，还有公、侯、伯、子、男这五等诸侯也设置自己的官吏，官禄及经费都出



稟事陶俑

西晋
1955年湖南长沙出土

自百姓，这是百姓贫困的原因，应该省并官府，减少百姓劳役。官员们讨论后，形成了减少一半州、郡、县各级政府官吏的意向。中书监荀勖却认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萧何、曹参做汉相，清静无为，民众安宁，这就是清心。抑制浮华



写字陶俑

西晋
1955年湖南长沙出土



《屯垦图》(砖画)

西晋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的舆论，减少行政文件往来，除去琐碎细微的政务，原谅人们的小过失，对喜欢生出事务以获取功名的人进行处罚，这就是省心。把全部九个中央行政部门合并到尚书省，把中央各系统的监察部门并到太尉、司徒、司空三府，这就是省官。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政务多少不一，要是只按比例将各个政府机构都裁减一半，是行不通的，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280年，司马炎下诏说，汉末以来，州刺

史既管民政，又掌军队。现天下合一，应止息干戈，州、郡两级政府都撤销军队，只设武装吏员，大郡一百人，小郡五十人。这一措施的实行，使西晋的军队数量大为减少。曹魏及西晋平吴前，州、郡都有军队，由地方官统领，与敌方及某些少数民族接近的地区设置的军队更多。

西晋的裁军及减少官吏数量特别是减少无意义的政务的做法，客观地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是对汉代、三国长期存在的官员

《牧马图》(砖画)

西晋

1972年甘肃嘉峪关出土





青瓷猪圈

西晋

直径10厘米

为晋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常见的模型明器，是汉代以来庄园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

青瓷羊圈

西晋

直径9.8厘米

为了追求政绩而为政苛刻的一个反省。军队及为追求政绩而产生的政务的减少，会大大减少国家开支，减轻农民负担。

280年平吴以后至290年西北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前，十年里西晋既无内战又无外战，皇帝及官员崇尚简易的政治风格，政治事务少，对经济发展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也没有兴造大的土木工程，国家开支及农民劳役比以前大为减少，农民有时间从事生产，转嫁给农民的额外负担也相对较少，农民生活出现了安定富足的情况，是三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古代史家描述为：人们都安心并满足于自己的生产，牛马遍野，余粮剩在田里；外出住宿时，大门可以不关；人们相见都有亲切感；谁有了匮乏，在外面就可得到。当时谚语也说：天下无穷人。史家称之为“太康之治”。







陶骑马俑

西晋

1955年湖南长沙出土

高22厘米至24厘米

此组陶俑为墓葬中仪仗俑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古代所谓好的时代对一般农民来说，充其量只能是解决温饱，还远远谈不上富庶，更不是解决了封建经济的弊病而取得的发展。如余粮剩在田里的记载，就反映了当时经济不正常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撤销地方军队，一些人如尚书仆射山涛等表示反对。晋武帝死后，在西北地区发生了流民潮，因地方没有军队镇压，最终发展成大规模的流民武装。应该看到，流民因少数民族事变及饥荒而发生，这是历代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及民族政策所导致的，设置地方军队虽可镇压一时，但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蕴藏着更大的统治危机。

第二节 八王之乱

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势必对皇权构成威胁。晋武帝担心自己的子孙落得和曹魏末主曹奂同样的下场，因此大封宗室子弟为王，扩大他们的权力。他允许藩王自选王国内的长吏，后来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让他们掌握一定数量的军队，企图依靠他们的力量来防止异姓大族夺取政权。结果适得其反，诸王都竞相网罗党羽，扩充军队，各自拉拢一批士族、官僚、地主，互相倾轧，伺机夺取帝位，最后酿成“八王之乱”。

290年，晋武帝病死。司马炎气度宽宏温厚，明白事理，喜好谋划事物，能容纳大臣的直言，很少对人动以声色，对官员的政务没有苛刻的要求。但正因为他对人对事从宽从简，平吴以后又沉湎享乐，少问政事，一些人如皇后之父杨骏开始弄权，排斥旧臣；外部的局面也逐渐向不好的方向转化。

司马炎的第一位皇后是杨艳，杨艳死

后，其从妹杨芷又成为皇后，得到宠爱，杨氏一门权倾朝野。杨芷之父杨骏及杨芷之弟杨珧、杨济都居高位。杨艳所生的儿子司马衷智能有障，晋武帝立他为太子后，预定杨氏外戚日后辅佐他，并选择重臣、开国元老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以为司马衷增加一重辅佐。

司马炎临死前，杨骏希望能由杨氏外戚单独掌权，暗中排斥其他大臣。司马炎知道贾南风性情酷虐，又怕杨家权势太盛，在遗诏中安排王佑掌握中央禁军，命秦王司马柬都督关中，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分别掌握重镇，作为皇室外援，又使汝南王司马亮在中央与杨骏一起辅政。杨骏却伪造遗诏，单独辅政。

290年，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为了专权，杨骏排斥了司马亮。杨骏弟杨济、外甥李斌劝杨骏留下司马亮一起辅政，这样可以使自己没有麻烦，杨骏不听。杨骏掌政，严苛细碎，朝中大臣多对他不满。皇后贾南风为人险恶强悍，又工于权谋，阴谋从杨家手中夺取大权。借杨骏专权、朝野不满之机，贾后与司马亮、司马玮密谋进兵洛阳讨伐杨骏。司马亮不同意。司马玮与贾后以惠帝名义下诏废黜杨骏。尔后，司马玮带兵在杨骏家里将其杀死，贾南风又矫诏废黜杨太后，将她饿死在宫中，并将杨家亲党一律灭三族，死者几千人。

杨氏族灭后，司马亮被任命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共同把持朝政，同时楚王司马玮、东安王司马繇、贾后之侄贾谧也参与国政。司马亮、卫瓘认为司马玮性情刚愎，为政喜欢使用威严刑杀手段，准备让他及诸王返回封国，司马玮因而产生愤恨。而贾后对卫瓘一向有怨恨，也不愿司马亮、司马玮掌权，不能遂她自己之意，于是决心把他们一个个除

掉。

贾后诬陷司马亮、卫瓘要废黜惠帝，矫诏令司马玮讨伐。司马玮正好复仇，派兵包围司马亮、卫瓘的府邸。长史刘准劝告司马亮，认为这一定是个奸谋，府中兵将如林，可以一战。司马亮却自认为没有异心，不听劝告，束手就擒，于是与卫瓘都被捕被杀。司马玮的属官岐盛劝司马玮乘兵势诛杀贾后，以正王室、安天下。司马玮犹豫不决。太子少傅张华派人向贾后说：“楚王已经杀了两个辅政，将天下威权收归于己，这样人主何以自安？宜以擅杀的罪名将他除去。”贾后马上宣布司马玮伪造诏书，图谋不轨，将其处死。

贾后执掌朝政后，委任亲党。她任命族兄侍中贾模，中书监张华，侍中裴頠辅政。张华儒雅，能筹划，有策略，有人望，贾、裴也是用心政事的人，所以几年之间朝野尚算安定。

贾后无子，惠帝谢妃所生的儿子司马遹被立为太子。司马遹早年人很聪慧，深得武帝喜爱，在朝廷也很有人望，但长大后却不好学，只与左右人游戏。贾后让人引诱司马遹奢侈逞威，令他的名誉渐渐衰减，并与贾谧发生矛盾。贾谧向贾后说，太子一旦继位就会杀了自己并废黜贾后，不如早些除去，另立太子，贾后同意了。

贾后假称惠帝病重，召司马遹入宫，派人以惠帝名义赐司马遹酒。司马遹饮后大醉，被诱惑而写下了几句话：“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又宜速自了，不了，吾当手了之。”贾后将这些字给惠帝看，并要惠帝下诏赐死司马遹。此举遭到大臣反对，贾后只好废黜司马遹并将他幽禁。

司马遹属官中有人打算废黜贾后，助太子复位，与赵王司马伦亲信孙秀联系，司马



持鞭陶俑

西晋

1955年湖南长沙出土

伦同意。及待动手，孙秀对司马伦说，明公一向与贾后关系亲近，路人皆知。太子性情刚猛，一旦再起必不受制于人，若有矛盾，势不免死，不如拖延，贾后必害太子，再以为太子报仇为名废黜贾后，这样不仅可免祸，还可得志。司马伦采取了她的建议。

于是，孙秀派人传播谣言，说宫中人要废贾后，立太子。贾后派出的宫女查访到这些说法，令贾后十分恐惧。司马伦、孙秀又向贾谧劝说，早日除去司马遹，可使大臣不再有二心。贾后因派太医令去毒杀司马遹，司马遹不肯饮药，来者用药杵将其打死。

300年，司马伦与梁王司马彤、齐王司马冏率兵进宫抓捕并废黜贾后，不久将她赐死，又将贾谧及贾氏党羽数十人处死。司马伦想当皇帝，与孙秀商量借机把有威望的大臣也除掉，司马伦此时大逞私志，杀张华、裴頠、解系、解结，都灭三族。司徒王戎等许多官

员被认为是张、裴的亲党被免官。

司马伦以相国身份辅政，任命孙秀为中书令。中护军、淮南王司马允暗中谋划讨伐司马伦，孙秀伪造诏书，升司马允为太尉，以夺取他的兵权，司马允拒绝了，并率兵进攻司马伦。眼看司马伦支持不住，侍中、汝阴王司马虔与督护伏胤阴谋趁乱取利，假称有诏书，司马允下车接受诏书，被伏胤杀死。司马伦、孙秀杀死与此事有关联者几千人。

孙秀曾为小吏，为黄门郎潘岳服务，潘岳多次鞭打他。卫尉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与司马伦不和，而石崇有一名爱妾叫绿珠，孙秀得志后曾向石崇索要，石崇不给。此时，三

人被孙秀诬为司马允同党而遭杀害。

301年，司马伦逼惠帝“禅让”，自己当了皇帝，孙秀为中书监，他们的党羽都被封为中央部门主管的卿或高级将领，一些奴隶及小卒也封了爵。每次朝会，头戴金蝉及貂尾装饰的官员满座都是，时谚说：“貂不足，狗尾续。”

孙秀因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握有重兵，于是派自己的党羽当他们的属官，同时给三王加官。司马冏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颖、司马颙响应，一时声势很大，达到了二十多万军队。双方军队在洛阳周边大战。战争延续六十多天，士兵死亡

持刀陶俑

西晋

1955年湖南长沙出土

左俑高20厘米，右俑高17厘米

此组陶俑为西晋士兵形象。



近十万人。洛阳的官兵都想除掉司马伦，左卫将军王舆率人杀死孙秀，逼司马伦迎惠帝复位，司马冏入洛主持朝政，杀司马伦及其党羽。

司马冏掌握大权后，沉迷于享乐，不入朝与官员见面，用官不公正，以亲信掌政，又因河间王司马颙曾想倒向司马伦一方，常怀恨在心。司马颙的长史李含与司马冏的属官皇甫商有矛盾，担心自己有祸，这时诈称接受秘密诏书，要司马颙诛杀司马冏，司马颙因于302年举兵，司马颖响应。长沙王司马义率兵进攻司马冏府，双方在洛阳城内厮杀三天，司马冏大败，被杀，其党羽被处死并夷三族，两千多人同死。

接着，司马义主管朝政，但大小事都要咨询司马颖。司马颖骄傲奢侈，政务废弛比司马冏还厉害。司马颖又嫌司马义妨碍自己，想要除掉他。河间王司马颙原本打算在打垮司马冏后废黜惠帝，由司马颖为帝，自己总揽大权，事情却不如所料，于是在303年派将军张方带兵七万、司马颖以陆机为后将军督二十多万军队进攻洛阳。张方打败司马义军，进入洛阳，士兵大肆抢劫，死亡一万多人。但司马义军又打败陆机军，陆机的军队奔逃，七里涧中死者堆积如山，涧水为之不流。陆机也被人诬告心向司马义，被司马颖杀死。双方前后交战三个多月，死伤八九万人，最后东海王司马越拘禁司马义，向城外军求和，张方烧死司马义，战事才平息。

之后，司马颖废太子，司马颙表请立司马颖为皇太弟。司马颖奢侈僭越，所亲信的小人用事，大失人心。304年，司马越与左卫将军陈眕讨伐司马颖。一些地方官员加入讨伐，合兵十余万。司马颖打败司马越军，扣留了惠帝，旋又被安北将军王浚、东嬴公司马腾打败。王浚军进入邺城，士兵大肆抢掠，

死亡者甚多。军中的鲜卑士兵抢劫了许多妇女，王浚下令敢有挟藏者斩，因此事被投入易水淹死者共八千多人。司马颙派张方援助司马颖，张方把惠帝西迁至长安。司马颙废黜司马颖，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自己总揽大权。

305年，范阳王司马虓、幽州刺史王浚推司马越为盟主，起兵讨伐司马颙，张方率十万兵与之对抗。张方因事被司马颙派人杀死。司马越联军攻入长安，打败司马颙军，士兵在长安大肆抢劫，死亡二万多人。306年，司马越奉惠帝回到洛阳，杀司马颖及司马颙。其后，惠帝食物中毒而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怀帝，司马越总揽大权。

“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六年，大量士兵死亡，交战区遭到严重破坏，西晋政权实力大大受损，成为其灭亡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西晋灭亡

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数十万人丧生，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一空。在战争过程中，洛阳十三岁以上的男子全被胁迫服役。洛阳米价贵到一石万钱，不少人被饿死。长安也未幸免，军队烧杀抢掠，死者数万。人民时刻处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下，无法进行生产，纷纷逃亡。东汉以来，居住在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与汉族长期交往，逐渐走向定居和农业生活，并陆续向内地迁移。魏晋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力的不足，也常招募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到西晋时，北方民族分布有了较大的变化，幽、并、雍、梁、秦、凉等州已是各族错居杂处，汉族以

外，主要有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

魏晋时期的民族迁徙，促进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融合，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北方久经战乱，人口稀少，内迁各族人民对北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也推动了内迁各族人民经济和文化的不断进步。“八王之乱”给西晋的社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疾病的流行和饥荒。各族人民被迫背井离乡，外出流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西晋政府不顾流民的死活，勒令他们各还本乡，这激起流民的反抗，终于形成了西晋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自290年起，秦、雍二州连年遭到旱灾，到296年形成了严重的饥荒，并有瘟疫流行，一斛米卖到一万钱。

294年，匈奴人郝散首先在上党（治今山西长治）起兵。两年后，他的弟弟郝度元联合冯翊、北地等郡的马兰羌和卢水胡，连败西晋官军。关中的氐人和羌人起来响应。

296年，西北地区氐、羌族人民起义，以氐族人齐万年为首领，人数有七万多，西晋政府派兵镇压。梁王司马彤为征讨主帅，他与将领周处有矛盾，于是只给五千兵，逼令周处与齐万年七万人交战。

周处出身江南大族，义兴阳羡人。据《世说新语》记载，周处早年是不良少年，气力过人，好骑马驰骋、打猎，乡里人都害怕。周

青瓷香熏

西晋

1953年江苏宜兴出土

高19.5厘米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贵族喜欢使用香料去除污浊气味。使用时，将香料置于香熏中点燃，让香气从香熏孔隙中释放。



处知道以后下决心改正。他对父老说：“今年风调雨顺，收成很好，为什么不乐？”父老叹道：“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周处问：“此话怎讲？”回答：“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的蛟龙，还有你周处就是三害。”周处说：“我能除之。”周处到山里射杀猛兽，又入水中与蛟龙搏斗，蛟龙或沉或浮，周处与龙一起翻腾，在水里行几十里。乡里人认为周处与龙都死去了，彼此庆贺。周处杀龙回来，听说乡里庆贺，才知道人们把自己看作多么大的祸害。于是他到吴郡去找二陆，见到陆云说，自己想要改邪归正但年已蹉跎，恐怕来不及。陆云说：古人看重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就怕不能立志，哪用担心名节不立。于是周处励志好学，养成了仁义和刚烈之气，言语忠信克己。

周氏家族自周宾开始，到周宾之子周鲂，周鲂之子周处和周处之子周玘、周札，四代人人有名，家族中有五人封侯。

以后，周处曾在吴国做官，又到洛阳担任西晋官员，颇多善政，升迁至御史中丞，主管纠弹大臣的违法乱纪，不避权贵。一次，梁王司马彤违法，周处加以严处。正值齐万年反，朝臣嫌恶周处的强硬刚直，都说“周处是名将之子，忠烈果敢刚毅”，推荐他出征齐万年。伏波将军孙秀知道周处此去必死无疑，对周处说：卿有老母，可以去辞别。周处说：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然辞亲事君，父母怎能又得到儿子？今天就是我的死日。齐万年听后说：周府君以前当新平太守，我了解他，才兼文武。如果他有独立指挥权，我无法抵挡；要是受制于人，我就能战胜他。周处知道司马彤被任命为西征主帅后定会陷害他，但是自以为作为人臣要尽节，不应害怕躲避，于是慷慨上路，志不生还。

将军夏侯骏逼周处进攻，周处说：没有

后援，肯定失败，自己身亡，也是国家的耻辱。司马彤再次命令周处进攻，于是进军。周处军要进入战斗，但士兵还没有吃饭，司马彤催促快速进兵，又断绝他的后援。

周处知道必死，于是赋诗：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终。赋诗完毕投入战斗，从日出到日落，斩首万计，弓弦拉断，箭支用完。战斗前，周处曾与振威将军卢播、雍州刺史解系相约共同进攻，这时二人的兵马也不见来救。左右劝周处退兵，周处按剑说：这是我效节授命之日，有什么好退的！且古代良将受命，凿凶门而出，盖有进无退。今各军说话不算数，势必不振，我以身殉国，不亦可乎！于是周处拼死战斗而阵亡。

直到299年，齐万年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此后的297年至永嘉年间（307—312），百姓生活无着，大规模离家出走求生，而幽、并、司、冀、秦、雍六个州又发生大蝗灾，草

铁戟

西晋

1953年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
左戟残长16.8厘米，右戟残
长23厘米

297年，周处率军镇压西北
氏族起义时阵亡，归葬宜
兴。此为其墓中随葬品。





陶耳杯

西晋

1953年江苏宜兴周处墓出土

木和牛马的毛都被蝗虫食尽，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和饥荒。当时河流中满是人的尸体，到处是白骨，离家到外地求生的人民有一百万以上。这是个很大的数字，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统治危机。饥民起义此起彼伏，如巴蜀的李特起义，荆州地区的张昌、石冰起义，王如、杜弢起义，以及在黄河中下游的刘泊根、王弥、汲桑、石勒起义等，规模都不小。

301年，賈族（巴氏）人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领导氐、汉流民起义。起义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取得胜利。李特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把主力军分散到当地地主的坞堡就食。益州刺史罗尚勾结各坞堡的豪强地主，袭击起义军，李特牺牲。其弟李流、子李雄继续战斗。302年，起义军攻下成都。306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从此，这个流民起义的首领蜕变为割据政权的封建统治者。

张昌是蛮族人，曾为县小吏。都督荆州的新野王司马歆为政严苛，当地的少数民族都有怨愤。西晋又征调荆州人去镇压川蜀的李流起义，荆州人民不愿应征，地方官亲自出马强行征调，人民逃跑聚集。303年，张昌

在安陆（今湖北应山南）发动起义，几次打败政府军，又杀死南阳王司马歆，控制了荆、豫、江、扬、徐五个州。张昌奉刘尼为皇帝，自己为相国，任命地方官，但这些地方官素质恶劣，时常打劫抢夺财物。西晋派荆州都督刘弘主管征剿，张昌与西晋南蛮长史陶侃作战失败。张昌部将石冰活动在扬州地区，被周玘、王矩、顾秘、刘准、陈敏等西晋地方势力及官员打败。

310年，荆州、湘中一带又发生了王如、杜弢起义。王如也是因战乱饥荒逃到南方的流民，西晋政府强行要把流民遣返回乡，王如于是起义，打败了荆、湘、交、广四州都督山简、荆州刺史王澄的军队。后王如军与匈奴汉国的石勒交战兵败，加上饥荒和内部矛盾，王如投降西晋。

在荆湘的巴蜀流民有十多万，西晋荆州刺史荀眺听说巴蜀流民都准备反叛，预备杀尽流民。巴蜀流民于是以杜弢为首领起义，打败了湘州、荆州、广州的晋军。西晋琅邪王司马睿派将军王敦、武昌太守陶侃、历阳内史甘卓率十万军征剿，政府军几次被打败。在水战中，流民军用桔槔击沉晋军船只，果烈善战的西晋武卫将军陶璜阵亡。到315年，流民军在与西晋寻阳太守周访、陶侃的作战中兵败，杜弢逃跑后被杀。

309年，匈奴人刘渊派兵进攻洛阳，几次都被打败。310年，司马越率二十多万军队离开洛阳，洛阳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宫殿内死人交横。311年，怀帝不满司马越专权，下诏指责司马越，并派征东大将军荀晞等讨伐。两军发生冲突，司马越死，太尉王衍被推为主帅。刘渊部将石勒进攻晋军，匈奴骑兵围住晋军射箭，晋军互相践踏，死者堆积如山，十多万无一逃生，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六将被俘。匈奴军攻陷洛阳，俘虏怀帝，

官吏百姓被杀三万多人。

西北地区已有贾疋率领的汉族及氐、羌少数民族五万多人与雍州刺史麹特、扶风太守梁综的十多万兵控制了关中地区，准备复兴晋室。豫州刺史阎鼎与司空荀藩奉秦王司马邺到了关中，313年，司马邺被立为皇帝，是为愍帝。

此时，关中仍有三十万属于西晋的武装。西晋此时的另一支力量是幽州刺史王浚和并州刺史刘琨，二州掌握的武装部队也有三十万人。在南方有琅邪王司马睿的力量。愍帝要求南北两方共同出兵收复中原。但司马睿威权未立，南方军实际上各自为政，无力北伐。而王浚打算乘着混乱自己称帝。他为政苛暴，向百姓滥征赋税劳役，不得人心。石勒假装向王浚投附，乘其不备，将王浚捕获杀死。西晋司空刘琨这时在并州联合拓跋鲜卑共同抗击刘汉匈奴，但兵力不多，难有大作为。

315年，匈奴军进攻西北地区，南阳王司马保不肯出兵救援，只派出将军胡崧前往长安。胡崧担心打败匈奴军后，司马保的部将



持盾陶俑

西晋

1955年湖南长沙出土

麴允、索琳势力壮大，就按兵不动。而麴允想奉愍帝与司马保会合，索琳则担心司马保控制愍帝后生出异心，于是仍留在长安。匈奴军包围长安，城中严重缺粮，许多人饿死，大批士兵逃跑。316年，愍帝袒露上身，乘羊车，嘴里衔着玉璧，带着人抬着棺材出长安城投降刘曜，西晋灭亡。

第三章

东晋与南朝各代的更迭



西晋末年，北方战乱，很多士族纷纷南迁，他们和江南当地士族共同支持司马氏在南方建立汉族政权。强大的士族一方面是东晋皇权的依靠，同时又是对皇权最大的威胁。终东晋一朝，皇权和强宗之间的争斗、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未曾平息，人民企盼的北伐中原、重新统一中国的愿望落空。

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残酷的剥削，使农民被迫起来反抗。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北府兵的中下级将领逐渐掌握了东晋朝政，这些出身“布衣素族”的军阀上升到统治集团以后，并未改变政治上的腐朽，不论是高门士族还是寒门新贵，都竞相敛财，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一幕幕逼宫、禅位、夺权的活剧不断上演，宋、齐、梁、陈四朝轮番更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之一。

第一节 偏安江南的东晋

307年，琅邪王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进驻建业，为司马氏退守南方做准备。

司马睿初驻建业时，江南士族地主对他很冷淡，因为他在西晋宗室中并没有多少名望。跟随司马睿到南方的王导是北方名士，他知道要在江南建立政权，没有当地士族地主的支持是不行的；而要取得江南士族的支持，首先就要抬高司马睿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王导和王敦经过一番谋划，为司马睿专门安排了一次出游。司马睿乘肩舆，而王导与王敦以及南来的北方士族都恭敬地骑马随行。顾荣等南方名士，见王导和王敦都如此敬重司马睿，也就对司马睿另眼相待了。接

着王导又以司马睿的名义邀顾荣、贺循出来做官，并通过他们拉拢了一批江南士族。这样，司马睿在建业得到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支持。317年，晋愍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建业，司马睿先称晋王，次年正式称帝，是为晋元帝，改建业为建康。这个偏安江南的政权历史上称为东晋。

西晋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大批民众渡江南下避难，一些士族地主也纷纷率领宗族部曲南渡。江南的世家大族并没有因为孙吴政权的灭亡而受到什么影响，他们仍旧拥有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西晋末年各族人民起义时，南方的地主武装与西晋的官军一起对起义军进行残酷镇压。但江南士族地主和西晋政权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他们受到北方士族的排斥，很少有到中央政府为官的机会。陆逊的孙子陆机上疏推荐江南名士贺循当尚书郎，认为“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本心”。陆机的话，反映了江南士族地主的不满。

依靠南北士族支持而建立起来的东晋，从一开始就因内部矛盾而危机四伏。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在东晋朝廷中掌握大权，地位显赫，而南方士族的待遇地位远不及北方士族，即使像顾荣、贺循这样的名士，也只是担任一些无权的清官闲职。因此，南北士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在南方士族地主看来，过江的北方士族只是一些“亡官失守之士”，让这些人来驾驭自己是无法忍受的。义兴大族周玘曾镇压江夏农民起义，又平定了陈敏的叛乱。他认为自己“三定江南”有功，为司马睿进驻江南创造了有利条件，自己又是江南名士，理应得到东晋政权的重用，但结果只得到一个郡太守的职位，为此愤恨在心，密谋起兵。事情没有

成功，周玘忧愤而死。

东晋延续西晋的门阀制度，出任高官的大多为南北高级士族，由于他们势力强大，东晋政权不能有效控制其行为。东晋政权因统治基础薄弱，故以稳定为第一要务。初期主政的丞相王导就不主张对南方豪族侵占人口、土地的行为严加究处，继任王导的庾亮、谢安也不敢有所作为，目的就是不想激起豪强势力作乱。王导为政，奉行“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宗旨。他任扬州刺史时，主管部门的官吏到州内例行巡查，扬州的掾属顾和回来汇报说：您执政的宗旨是宁可使能吞舟的大鱼漏网，那么何必明查地方上的事情。王导竟然对此加以称赞。东晋中期执政的谢安，也不准搜查豪族隐匿的逃亡人口。



陶女俑

东晋

1955年江苏南京出土

高33.7厘米

这件女俑应是一仆人，但表情诙谐，十分生动可爱。

在东晋政权建立之初，许多人希望朝廷能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向南方逼近，并迅速北伐，解除北方人民所受的痛苦。但东晋统治集团所关心的是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当中许多人怕进军中原冒险，只想苟安江南。一部分过江的北方士族，虽然希望有朝一日能还乡，却只是在江边饮酒，遥望北方，哀叹长江与黄河有异，风景不同，不打算有什么作为。只有少数人进行着恢复中原的活动，但都因朝廷内部争权夺利，处处受到牵制，始终没有多大成果。

祖逖是北伐最积极的人。永嘉年间，中原战乱，他带领几百宗族部曲从洛阳南渡，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他对北方人民要求摆脱少数民族统治的愿望十分了解，知道进军中原会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也能够得到一些汉族地主的合作，因此向元帝司马睿提出北伐的建议。司马睿给了他一些粮食和布匹，让他自己招募军队，置办装备。祖

逖驻在淮阴，率军一面屯田，一面作战，并得到拥有武装的北方坞堡地主的支持，打了不少胜仗，经过几年，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全部土地。正当祖逖准备向黄河以北进军时，晋元帝怕他势力过大，难于控制，派毫无才能的戴渊总领六州军事来牵制他。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明争暗斗非常激烈，王敦之乱已经在酝酿中。这些情形使满腔热忱的祖逖忧愤成疾，不久病死。

晋元帝能够在江南建立政权，得力于王导和王敦的支持。因此，在北方士族中以王氏权势最盛。王导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侍中、录尚书事、领中书监等职；王敦为大将军、荆州刺史，握有重兵，驻守荆州。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晋元帝不满王氏兄弟的专权，因以谯王司马承镇湘州，以戴渊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军事，以刘隗都督青、徐、幽、并四州军事，意图制约王敦。321年，元帝又采纳刁协、刘隗的建议，征调沦为僮客的北方流民当兵，名义上是为讨伐石勒，实际上是企图建立一支防备王敦的军事力量。

王敦是王导的从兄，为人强豪、残忍。在洛阳时，一次王恺设宴，让美人向宾客敬酒，要是有人不喝尽，王恺就会杀死美人。敬到王敦、王导处，王敦故意不饮，美人悲惧失色，王敦傲然不视，最后还是不能饮酒的王导勉强干杯，才使美人躲过一死。

受到元帝抑制，王敦内心不平，每次酒后，都要一边用如意敲打唾壶为节，一边吟咏曹操的“老骥伏枥”诗，击得唾壶边沿尽是缺口。

322年，王敦发动了“清君侧”的军事行动，从武昌进兵，攻进建康。王导因对皇室不满，态度暧昧。当时在建康的士族首领人物是尚书仆射周顗。周顗一向与皇室保持距

青瓷印纹唾壶
东晋南朝



离，但对王氏也早有不满意。朝廷军兵败后，周顗奉诏去见王敦，指责王敦为“犯顺”，王敦哑口无言。不久，周顗与戴渊同被收捕，路过太庙，周顗大呼：“贼臣王敦倾覆社稷。”士兵用戟刺伤周顗的嘴，血流至脚而周顗神色不变，被杀。周顗的反王有旗帜性作用，朝中及地方官员大多不与王敦合作，王敦无法在建康有效发号施令，只好退回武昌。

当年，元帝忧郁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王敦这时得了重病，再次派党羽钱凤率兵三万、沈充率兵一万，以讨伐“奸臣”温峤为名进攻建康。明帝亲自率兵，连连打败钱凤，不久王敦病死，钱凤、沈充都被斩杀，王敦之乱平定。

祖逖死后，南北之间暂时保持着均衡局面，东晋统治集团忙于内战，北伐的呼声沉寂了一个时期。晋成帝即位，外戚庾亮当政。333年，石勒死，镇守荆州的庾亮请求乘机北伐，由于蔡谟、郗鉴等人阻拦，没有实现。

继庾亮之后，积极主张北伐的是桓温。

桓温镇守荆州的时候，蜀地的成汉政权政治上腐败，经济上横征暴敛，不断激起人民的反抗。346年，桓温出兵攻蜀，汉军节节败退，晋军攻入成都，李势投降。攻下成汉后，桓温名望大增，多次请求北伐。为了抑制他，东晋朝廷任用清谈家扬州刺史殷浩参与朝政，桓温北伐受阻。

352年，前秦、前燕政权相继建立，东晋才派殷浩进驻寿阳。次年，殷浩领军七万向洛阳进发。殷浩任用羌族降晋的姚襄为前锋，但姚襄中途倒戈，晋军在山桑（今安徽蒙县）遭到伏击，殷浩丢弃军械储备，狼狈退却。

殷浩兵败被罢黜，东晋军政大权落入桓温之手。354年，桓温率军由江陵出发北伐，得到北方人民的支援，进军迅速，很快到达

长安附近的灊上。桓温想等到麦熟，就地取粮，迟迟未渡灊水进攻长安，丧失了良机。前秦坚壁清野，晋军粮食不继，只好退回。

两年后，桓温再次北伐，打败姚襄，收复洛阳。他在收复洛阳后，向晋哀帝上疏，要求迁都洛阳，继续北上。但东晋统治集团已安于江南的享受，无意迁回北方。

369年，桓温乘前燕内乱，率五万军队第三次北伐。一开始，进军顺利，从扬州一直攻到前燕郾都以南的枋头（今河南浚县境），打败前燕八万大军。后前燕军得到前秦的帮助，截断晋军粮道。晋军兵败，死三万人，桓温烧掉船只，抛弃辎重铠甲，逃回南方，原来收复的土地重新丧失。

桓温的北伐活动，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每次北伐，桓温都得到北方汉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由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牵制，加上他的欲望是“先立功于河朔，还受九锡”，把北伐作为个人集中权力的手段，他的北伐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东晋雄强的大族除王敦外，桓温、桓玄都进行过篡代活动，但这是其他高级士族不愿见到的，对他们进行了强烈的抵制。

桓温是谯郡人，为人豪爽，姿貌壮伟，被人看作孙权、司马懿一流的人物。桓温被外戚庾翼推荐给明帝，因此他对将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后赵石虎死，桓温上疏请求北伐，久无答复，又知朝廷借重中军将军殷浩压制自己，极为愤怒，就把八个州上调国家的物资截归荆州使用。

桓温北伐取得成就后，升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有了非分之心。他对掾属说：这样寂寞，将为文景所笑。言下之意是欲追踪晋文王司马师、晋景王司马昭，行篡代之事。他曾经路过王敦墓，赞王敦为“可人”。

北伐失败使桓温名望降低，打乱了他先



江苏镇江长江滩涂

即当年北方南下人口的一部分到达的京口。

建功接受封赏再篡代的打算，于是他直接废黜司马奕，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桓温升任丞相，控制了皇帝及朝政，退到离建康不远的姑孰（今安徽当涂）。简文帝在忧愤中只两年便去世，遗诏桓温主管国政，如当年诸葛亮、王导故事。司马曜继位，是为孝武帝。桓温原以为简文帝死前会禅位给自己，或者至少使他像周公一样拥有极大的权力，为此深感失望而愤怒。

不久，桓温从姑孰出发前往祭拜简文帝的陵墓，朝中百官在新亭出迎，桓温暗中设置许多士兵，打算行篡代事，居高位、有名望的人都害怕失色，因为他们很可能是桓温要诛杀的对象。桓温召见侍中谢安、王坦之，王坦之极为害怕，谢安神色不变，说：“晋室存亡，在此一行。”见到桓温，王坦之流汗沾衣，手版也拿倒了。谢安从容入座，对桓温说：“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耶？”桓温笑道：“不能不如此。”谢、王是当时士族中的首望人物，如果他们都恐

惧而向桓温屈服，桓温就可以顺利控制士族阶层，篡代也就会顺利进行。由于没能获得士族的支持，桓温篡代失败，退回姑孰，不久病死。

东晋的赋税制度先是沿用西晋，到成帝时一亩地收租三升，不久改为一人收三斛。淝水之战后增加田租，丁男每人每年缴纳五石米，禄米二石，每年要缴纳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丁女减半，实行九品混通征收，缴纳的粮食较一般为重而绢布的数量较少。

东晋男性十六岁开始服半额劳役，而西晋是十三岁就开始服劳役，东晋十八岁至六十岁服全劳役，每年服役不过二十日，比以前一般朝代明显减少，这与东晋统治者崇尚简易少事的政治思想有关。

373年桓温死后，军权由其弟桓冲掌握。当时前秦已经统一北方，占领益州，威胁东晋。

大敌当前，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相对

缓和，宰相谢安坚决主张抗秦。桓冲也把扬州让给谢安，自己专镇上游，作防秦准备。谢安侄谢玄在京口招募一批流落在南方的北方农民，严格地训练，使之成为东晋政府掌握的一支非常精悍、能攻善战的军队，当时称京口为北府，故称“北府兵”。383年，秦王苻坚率九十万大军南下，想一举吞并东晋。东晋以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都督，任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八万北府兵前往迎战。另派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增援。谢安任主帅坐镇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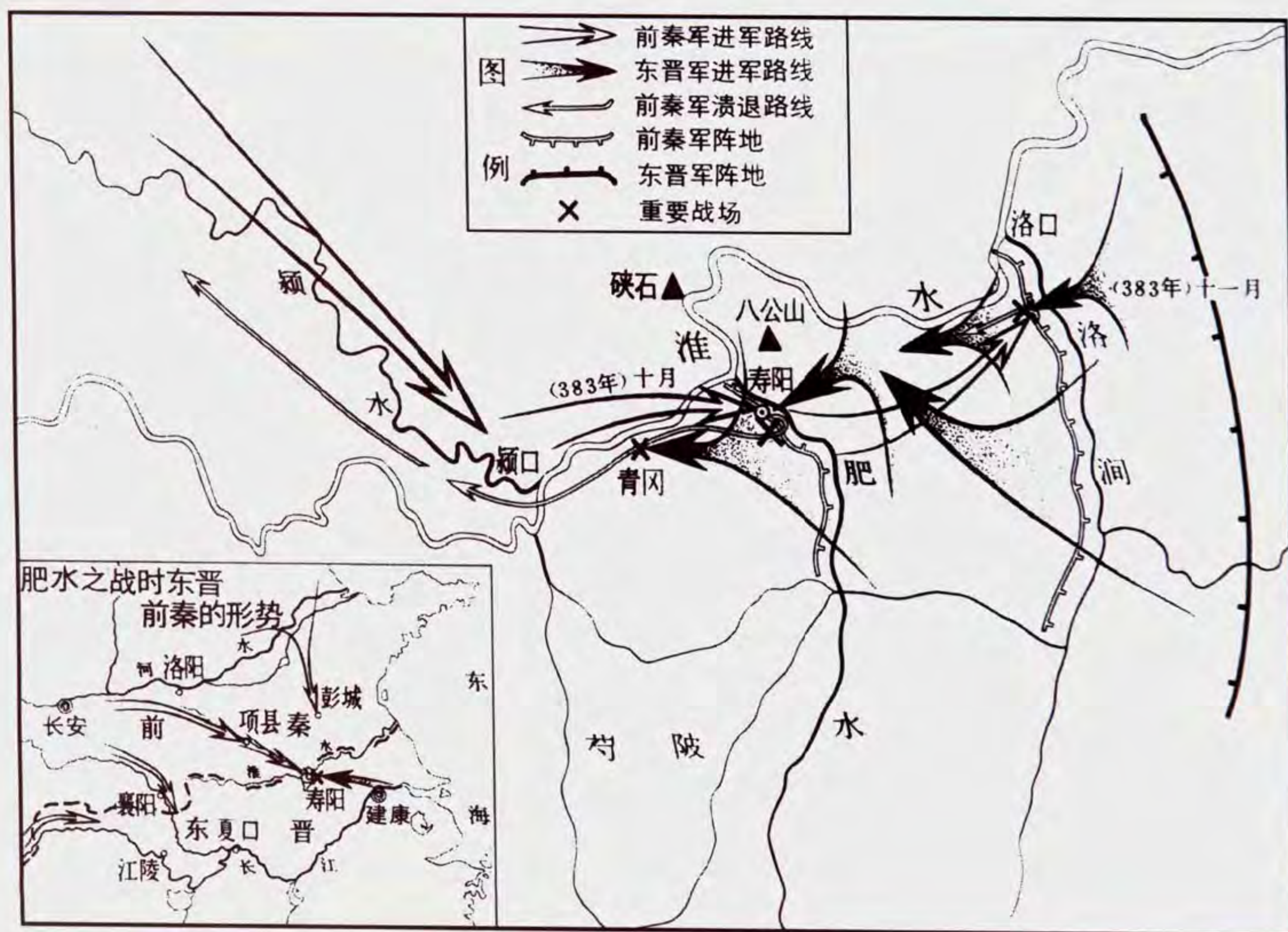
前秦军组成步兵六十多万、骑兵二十七万的庞大军团，另有贵族子弟组成的禁卫军三万多骑，由苻坚亲自统率。其弟苻融和鲜卑族大将慕容垂统军二十五万为前锋，攻占了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寿县），控制了洛

涧。谢石、谢玄所率东晋军被迫在距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扎。胡彬率领的水军得知寿阳失守，便退保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胡彬困守硖石，粮食将尽，遣使至谢石处告知。信使为苻融截获，苻坚亲自到寿阳，部署作战计划，并派被俘的晋将朱序到晋营劝降。朱序告诉谢石，秦军百万尚未全部集中，建议趁其众军未齐，速战速决，认为只要打败秦军的前锋部队，就可取得大胜。谢石等人采纳了朱序的意见，派兵迂回到秦军侧后，切断他们的退路，同时令猛将刘牢之率精兵五千直趋洛涧，出其不意，夜袭秦营。五万秦兵被冲得溃不成军，在抢渡淮河时竟有一万五千多人被淹死。

洛涧战役的胜利，鼓舞了晋军的士气。

晋军乘胜沿淮河水陆并进。苻坚与苻融登上

淝水之战示意图



寿阳城，看到晋军布阵严整，又遥望寿阳城北的八公山，以为山上晃动的草木都是晋军，便命令部队沿淝水西岸布阵，阻止晋军反攻。谢玄遣使与苻坚相约，请秦军向后略退，让晋军渡河，两军在西岸决战。苻坚想趁晋军渡河时予以袭击，便令部队后退。可是秦军内部不稳，一退便不可收拾，队伍大乱。晋军渡淝水猛攻，杀死苻融，秦兵溃败，自相践踏。失魂落魄的秦军在奔跑中听到风声，都以为是东晋的追兵，昼夜不敢停息，加以沿途饥冻，损失惨重，最终只有十多人回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淝水之战中东晋的胜利，使南方人民避免了氏族统治者的摧残，使南方经济文化免遭破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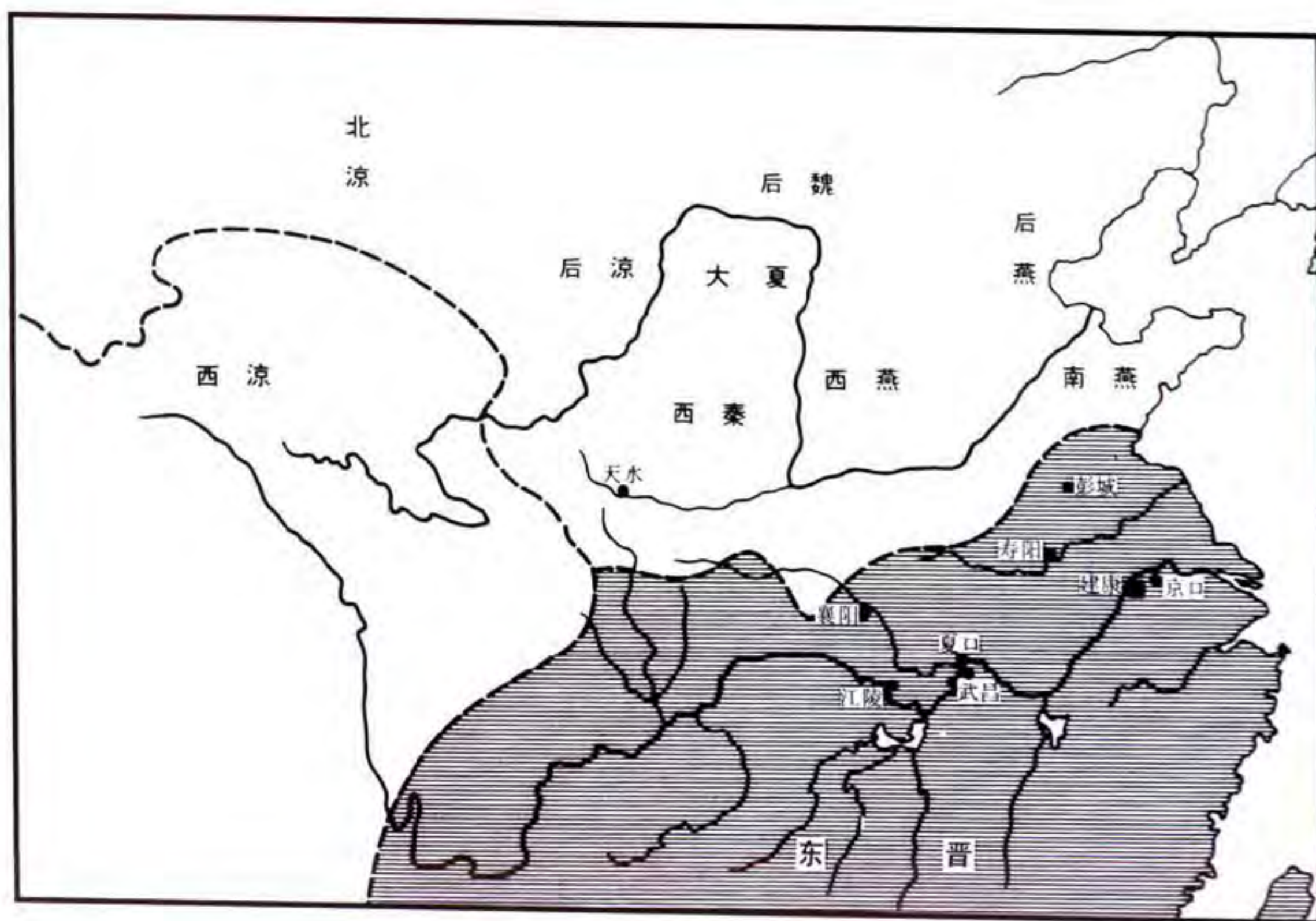
淝水之战以后，谢安曾试图继续维持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利用有利时机北伐中原，他指挥的晋军一度进抵邺城，荆州的晋军也收复了洛阳。但东晋统治集团是一群腐朽的门阀士族，他们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

争，在强敌威胁解除之后很快重新激化，北伐也就成了泡影。

孝武帝时期，主政的大臣是谢安。谢安因自己及儿子都有大功，担心被朝廷猜疑，于是请求北伐，出镇广陵，退出了中央事务，又把荆州、江州、豫州三个重要州的都督权从自己的职务中分割出去。由于谢安的退让，孝武帝得以提高皇室权威，由其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主管中央事务。谢安病死后，司马道子又兼领扬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后来，孝武帝沉溺于酒色，不理政务，司马道子擅权，所用之人多为自己亲信，许多人因而投靠他。孝武帝不满司马道子的专权，为了平衡，任命皇后之兄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军事，兼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又以殷仲堪为荆州刺史。396年，孝武帝被宠爱的张贵人害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安帝弱智，司马道子摄政。

397年，王恭以诛司马道子的亲信王国宝、王绪为名在京口起兵，殷仲堪在荆州起兵呼应。司马道子只好赐王国宝自杀，斩王

淝水之战战后形势图



绪，王恭退兵。

之后，司马道子开始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为将军，以亲信王愉为江州刺史。

398年，王恭再次起兵，殷仲堪及广州刺史桓玄、豫州刺史庾楷起兵响应。司马元显从王恭的前锋将领刘牢之入手。刘牢之是北府将领，但王恭将他只视作一般武将，礼节甚薄，刘牢之深感耻辱、愤恨。司马元显派人策动刘牢之倒戈，许诺事成后任以王恭所任的兖、青二州刺史。交战时，刘牢之进攻王恭，王恭兵败被杀，庾楷也相继失败。桓玄、殷仲堪要求为王恭正名，建康方面只好委曲求全，以桓玄为江州刺史。

桓玄是桓温之子，受到朝廷抑制，因桓温在荆州故旧甚多，桓玄打算夺取荆州。荆州发大水，殷仲堪救济灾民，把仓库的粮食用光，桓玄趁机进攻，打败并杀死殷仲堪，向朝廷要求荆州之地。由于孙恩之变及扬州一带饥荒，朝廷只好任命他为都督荆、江等八州军事，兼荆州、江州刺史。桓玄取得了长江中游一带的统治权，禁止商人向建康运送粮食。

402年，东晋朝廷以司马元显为主帅，讨伐桓玄。桓玄打败司马尚之，另一部的主将刘牢之被桓玄劝降。桓玄攻入建康，杀司马元显及朝中一些官员，朝廷不得已，封桓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扬州牧，总管一切事务。

桓玄执政之初，罢黜不称职及奸滑之人，提拔贤才，实施了一些善政；后来则凌辱朝廷，幽禁排斥其他高级官员，豪奢纵欲，令朝野失望。桓玄知道自己不得人心，于是加速篡代，令其心腹卞范之矫诏劝进。403年，晋安帝“禅让”皇位，桓玄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楚。

第二节 东晋末年的 政治与风气

经过淝水之战，东晋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解除，但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又起。396年，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政，引起镇守州郡的王恭、殷仲堪、桓玄的不满。397年至398年，长江中游地区被拥有荆州军的桓玄割据；下游的京口和长江以北地区，为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控制；东晋朝廷能控制的地区，实际上只有江南一隅，于是赋税徭役、兵役的沉重负担全部落到江南八郡的农民身上。

在土地占有制恶性发展的东晋，广占土地，奴役众多佃客、部曲和奴婢的大地主，大量隐匿户口，把重税转移到自耕农身上。除田税外，还有户调和各种杂税。徭役也名目繁多。农民纷纷破产逃亡，越来越多的土地和劳力转入豪族私门。这些豪门在地方上霸占山林湖泊，百姓打柴捕鱼，都得向他们纳税。

司马元显考虑到荆州军的威胁和北府兵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由他自己掌握的新军，便下令征调江南诸郡从奴隶身份放免的佃客，移置京师建康当兵，连一般农民也不能幸免。因此，征调令一下，就引起佃客的反抗。

399年，以反征役为导火索的农民起义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吴兴）、义兴（今江苏宜兴）、临海（今浙江临海东南）、永嘉（今浙江温州）、东阳（今浙江金华）、新安（今浙江淳安西北）等地爆发。起义军的前期领导人是五斗米道教主孙泰的侄子孙恩。道教的教义本身并不含有反抗残暴统治的内容，但却是联络农民

发动起义的好工具，孙泰就是利用宗教联系农民。孙泰的这种做法引起东晋政府疑虑，把他流放到广州，后又召回，任新安太守。在讨伐王恭的过程中，孙泰被司马道子父子斩杀，孙恩逃入海岛，以五斗米道招收流亡农民。东南八郡人民纷纷起来反对兵役之时，孙恩带领百余人从海岛登陆，袭击会稽郡城。他们杀死官吏，队伍很快扩展到几十万人，随后转战到东南各地。不久起义军遭北府兵镇压，退入海岛。400年至402年，孙恩又带领起义军多次登陆，曾占领广陵（今江苏扬州）、扈渚（今上海），聚众十余万，楼船千余艘，震动建康城。在最后一次进攻临海的战役中，孙恩兵败，投海自杀。

其后，孙恩的妹夫卢循继续领导起义军战斗，转战于东阳、永嘉、晋安（今福建福州）等地，随后泛海南走，于404年占领番禺（今广东广州）。卢循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刺史事，并派徐道覆攻下始兴（今广东韶关西南）。他们吸取孙恩失败的教训，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从事农民军的整编工作。

这时，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南燕和羌族建立的后秦，又形成对东晋的威胁，因而东晋对卢循采取了妥协态度，卢循接受了东晋授予的官职。410年，卢循采纳徐道覆的意见，乘着北府名将刘裕率军进攻南燕的机会，兴师北伐。卢循自始兴（今广东韶关南）攻克长沙、巴陵（今湖南岳阳），而后顺江东下，徐道覆则由南康（今江西赣州）、豫章（今江西南昌）直取建康。两军于浔阳（今江西九江）会师后，有战士十余万，战船千计，连旗而下，舟车百里不绝，很快就挺进到淮口（在今江苏南京）。东晋朝廷大为震惊，乱成一团。刘裕刚灭了南燕，匆忙南下，仓促应战。卢循不听徐道覆的建议，丧失了与北府兵决战的有

利时机，在进攻小受挫折时，就下令急退。后来与晋军决战，又接连几次失败。411年，卢循被迫退回番禺。刘裕遣将先从海道袭取了番禺。徐道覆在始兴兵败被杀，卢循也因战败投水自尽。

东晋末年的农民起义先后持续了十二年。起义开始发动于东南八郡，后来扩大到粤江、湘水、赣水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士族的势力，不少地方佃客、士兵的处境经过农民战争多少有些改善。因而社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

东晋后期，统治格局发生变化，原来高级士族与皇室分享政权，这时高级士族势力衰落，北府将领则发展了势力，最突出者是刘裕。

刘裕祖先是徐州彭城人，西晋末年北方大乱，流寓到长江南岸的竟陵丹徒。早年贫穷，以卖鞋为生。在北府军时参与镇压孙恩、卢循起义，既勇敢又有谋略，多次立功，步步高升，成为彭城内史。

桓玄在篡代过程中，杀了几个北府兵的将领，刘裕假意赞成篡代而获免，同时与北府将领刘毅、何无忌等人秘密反桓。404年，刘裕等人起兵，占据京口、广陵，杀死南徐、南兖二州刺史桓修和青州刺史桓弘，进兵建康，又打败桓谦军，桓玄逃往江陵。北府兵又西上，打败桓玄水军，桓玄被杀，桓楚政权只一年即告垮台。刘裕拥戴晋安帝复位，自己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职，掌握了大权。

刘裕于409年开始北伐。首当其冲的是南燕慕容政权。在今山东掖县，刘裕击败南燕军队主力，进而围攻其首都广固（今山东益都）。410年，南燕开城投降，南燕皇帝慕容超被俘，刘裕将其押至建康斩首。412年，刘裕部将朱龄石进军蜀中，消灭地方势力谯纵，收复益州。416年，刘裕开始进攻后秦。

将领王镇恶、檀道济一路攻战，占领洛阳。417年，刘裕亲率军队北上，王镇恶的水军从渭水直抵长安，大破后秦军，后秦皇帝姚泓投降，被押至建康斩首。刘裕建立大功后，认为取代东晋的时机已成熟，马上率大军返回江南，只留一万多军队镇守关中，在夏政权军队的攻击下，其留守军队很快被消灭。418年，刘裕杀安帝，立司马德文为帝，即恭帝。420年，他废黜晋恭帝，自己称帝，东晋灭亡。

三国两晋南北朝流行隐士文化，许多士大夫包括官员崇尚隐逸，其原因在于厌倦了有风险的官场生活和繁琐的公务。但真要隐逸又会失去优裕的生活，因此当时真正心甘情愿隐逸的人很少，多数人又隐又不隐，于是有了“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的说法，说只要能得到精神上的通悟，虽庙堂无异于山林。

在东晋，隐逸是高雅的风尚。郗超每次听到有人要隐逸，都要赠送百万钱，并为这人建造住房。阮裕在会稽东山，萧然无事，常感到非常满足。有人问王羲之对阮裕的看

法，王羲之说：“此君宠辱不惊，古代的隐士何过于此！”东晋高级士族孔愉、刘麟之、何准、戴逵、许询、刘剡、王羲之、王徽之及其他一些士族都有隐逸的经历，最著名的当属谢安。

谢安早年被征召为司徒府的官员及佐著作郎，都被他以有病为由推辞。他住在会稽东山，和王羲之、许询、支遁等人往来，游山玩水，写诗撰文，就是不想入仕。扬州刺史庾冰因谢安名气极大，一定要他来做官，屡次让郡县政府催逼谢安应征，谢安不得已出任官职，一个多月就辞官。吏部尚书范汪要谢安出任吏部郎，谢安写信拒绝。有关部门以谢安被征辟而多年不上任为由，下令终身禁止他做官。谢安于是就在会稽山中居住，常坐在山洞边，面对山谷，悠然感叹：“此离伯夷何远！”

谢安之所以不出仕，应是考虑到桓温握有重权重兵，有篡位的可能，这时出仕，尤其是任高官是极具风险的事。当时的丞相司马昱代表皇权，他认为：谢安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征聘必至。谢安弟谢万是

东山

位于浙江上虞
为谢安隐居处。



西中郎将，因过失被罢官，谢安这才有出仕的意思，被桓温聘为司马。御史中丞高崧同谢安开玩笑说：“卿几次违反朝廷的征召，高卧东山，大家总说谢安不肯出仕，将如苍生何，现在苍生亦将如卿何！”谢安甚有愧色。谢安这样的人不出仕是国家的一大损失，现在出仕了，却跟桓温这样的人在一起，高崧故有此言。

戴逵博学，善写文章，又会弹琴，且精于书法绘画。朝廷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的官职几次征召，他都以父亲有病为由拒绝。地方政府奉朝廷命令不断催逼，于是戴逵逃到吴地，悄悄跑到吴国内史王珣的别馆，与王珣游处，经会稽内史谢玄为其开脱，才得到朝廷的谅解。以后王珣当了尚书仆射，又以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的官职征召他，他仍不任职。

王羲之曾对政务很热心，中军将军殷浩与荆州刺史桓温有矛盾，王羲之认为国家的安定在于内外和谐，写信劝诫殷浩。殷浩打算北伐，王羲之认为必败，因而力劝。殷浩北伐失败后，打算再次北伐，王羲之致信殷浩，详细陈述北伐将给百姓带来无法承受的

沉重的经济及劳役负担。

尽管王羲之是东晋少有的具有社会责任的官员，但也受到官场之累。王述早年有名气，与王羲之齐名，但王羲之很看不起王述，两人关系不好。王述先为会稽内史，因母丧辞职，但仍住在会稽。王羲之代替王述为会稽内史，只去王述家吊过一次丧，就再也不曾拜访王述。王述每次听到号角的声音，总以为是王羲之来看望自己，就洒水打扫，准备迎接，却总是一场空。这样过了一年，王羲之也没有来过，王述对王羲之深深痛恨。

王羲之曾对人说过：王述可以当尚书，到老了能当上尚书仆射，要当会稽内史就很渺茫。然而王述不仅当上会稽内史，而且被升为扬州刺史，王羲之对作为他的下属感到羞耻，于是要求朝廷把会稽郡从扬州分出去成立越州。为此而派去游说的人说得不够含蓄，为当时人所笑。王羲之内怀愧叹，却对儿子们说：“我不比王述差，而职位悬殊，是因为你们比不上王述之子王坦之的原因。”王述以后到会稽郡检查政务，考察司法方面的工作，问得十分详细，主管官吏疲于应对。

浙江绍兴鹅池

王羲之喜爱鹅，后人作池立碑纪念。





江苏镇江招隐寺
南朝戴颙曾隐居于此。

王羲之深感耻辱，于是以有病为由辞去官职，在父母墓前发誓：“止足之分，定于今日。敢渝此心，贪冒苟进，就是子而不子，将为天地所不容。”此后王羲之只管悠游山水，以划船钓鱼为乐，还与许迈一起服食药物，到千里以外采药。他游历了东部各郡，去了各个名山，又泛舟大海，叹道：“我终当快乐而死。”朝廷因王羲之发了誓，也不再征召他为官。

就连很喜欢当官的谢灵运也是著名的隐者。谢灵运是东晋刘宋之际的人，出身于高级士族陈郡谢氏，由于官场失意，两次隐逸。他在会稽山居，写出了许多吟咏山水的诗文，但终因官宦情结不能熄灭，与农民起义有牵连而被处死。

第三节 南朝政权的更替

淝水之战中，东晋朝廷依靠的军事力量是有名的北府兵。随着士族门阀的日益腐朽

和无能，北府兵中出身寒门的中下级将领逐渐上升到东晋上层统治集团的行列。刘裕就是追随刘牢之，镇压孙恩起义而成为北府兵的一名重要将领的。404年，刘裕率领北府兵战败桓玄，掌握了东晋的朝政，接着他不断用兵消灭割据势力，继续镇压农民起义。420年，刘裕迫使东晋恭帝让位，自立为帝，国号宋。

刘宋前期政局比较稳定。武帝刘裕是一个比较开明和节俭的皇帝，他限制大族私自占有劳力，禁止大族封固山泽向百姓收税。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也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开垦荒田，使当时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有明显的发展，人口也有增加。

刘宋的户调税收较此前有所加重。461年规定，每户平均缴纳调布四匹。又实行计资征税，民家桑长一丈，田增一亩，乃至屋上加瓦都要收税。繁苛的捐税，兼之士族地主的兼并和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的处境极其困苦。

刘宋统治集团内部也爆发过争权夺利的



青瓷托盖

南朝

福建福州出土

托直径16厘米，盖直径约12厘米

斗争。422年，刘裕当上皇帝不久就死去，长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少帝。辅政大臣徐羨之、傅亮、谢晦因刘义符信任小人，专事游乐，不理朝政，于424年先将其废黜，又将其杀死。谢晦曾对刘裕说过，其第二子刘义真德轻于才，不可为帝，这时担心刘义真继位于己不利，于是又将其废为庶人并杀死。徐羨之等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

426年，文帝以杀害刘义符、刘义真为由将徐羨之等三人问罪，徐羨之自杀，傅亮被捕被杀，时为荆州刺史的谢晦起兵反叛，兵败被杀。文帝此举意在消除高级士族自行废立的情况，从此以后高级士族与皇室分掌政权的局面结束，皇权得以加强，但也使皇帝与辅政大臣互相纠偏的政治机制遭到破坏，南朝成为一个内乱频繁的时代。

宋文帝执政三十年，国内尚无大的政争，社会安定，生产得到发展，百姓的劳役较少，国家事务也少，没有消耗过多的民力。文献记载，当时余粮在田里来不及收上来，民户晚上不用关门，史称“元嘉之治”。

文帝太子刘劭本得文帝信任，但在文帝晚年却做起巫蛊咒其早死，文帝于是废黜

刘劭，刘劭杀文帝。武陵王刘骏起兵杀刘劭，即帝位，是为孝武帝。刘骏其人，对事机警，有勇气，有决断，且学问广博，所写文章华敏，阅读公文能七行俱下，又善于骑马射箭。

江州刺史臧质与刘骏的叔父、荆州刺史刘义宣都自以为诛杀刘劭有功而骄傲任意。荆州兵强，朝廷制度与自己有所不同就不遵守；臧质也把孝武帝看作少主，江州的政务不向朝廷报告。建康与江、荆二州产生了矛盾。后臧质、刘义宣起兵，奉刘义宣为天子。双方在梁山大战，荆江军大败，臧质被杀，刘义宣逃回江陵，无心再战，逃出后被俘杀。

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无事生非，作檄文自称楚王，又改年号，设置百官，作为娱乐，被人告发，刘浑先被废黜，又被逼自杀。

孝武帝刘骏打算削弱皇室成员的权力，订立裁减王侯的车辆、服装、器用、乐舞等级的措施共二十四条。刘宋有些皇子出任州刺史，多数年幼，皇帝命亲信作为典签协助，以后年长的王当刺史以至非皇室的官员当刺史也由皇帝派亲信任典签，执掌政务，削弱刺史的权力。

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刘诞对人宽厚有礼，又是诛杀刘劭的功臣，丞相刘义宣也有大功，而孝武帝在亲族内有淫乱事，所以人心向往两王。刘诞聚集勇敢之士及兵器，孝武帝畏惧猜忌。刘诞也暗中防备，修筑城墙，聚集粮草，世人都说刘诞要反。有吴郡百姓刘成、豫章百姓陈谈之向皇帝上书报告刘诞的不轨事。于是孝武帝派人到广陵捕捉刘诞，但被刘诞杀死。

孝武帝因派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讨伐刘诞。刘诞焚烧附近村镇，把居民驱赶进城守卫。沈庆之攻破广陵城，杀刘诞。孝武帝下诏将广陵城内军民全部杀死，经沈庆之劝留，改为杀成年男子三千多人。为了震慑臣

子，孝武帝还下令把这些人的首级堆在石头城南岸作为景观。

464年，刘骏病死，子刘子业继位，是为前废帝。刘子业幼年时就狭隘粗暴，曾杀死孝武帝的几个亲信，他即位后大臣都不自安。江夏王刘义恭在孝武帝时怕被猜忌，时常要求贬低自己的实权，对孝武帝的亲信也极恭顺。孝武帝死，刘义恭与人相庆：今日始免横死矣。又与大臣柳元景、颜师伯日以继夜饮酒作乐。刘子业知道后深为不满，他亲自率兵杀死刘义恭及其四子，把刘义恭肢解，掏出内脏，挑出眼睛，用蜜浸泡，称为“鬼目粽”。

刘子业又杀死柳元景及他的八个儿子、六个弟弟和一些侄子，杀颜师伯及其六子，以及湘州刺史刘伯禽。新安王刘鸾原受孝武帝宠爱，这时也被赐死。刘子业又杀刘鸾弟南海王刘子师。

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素被孝武帝嫌恶，民间一直传言刘昶要反。刘子业说：“我即大位以来，未曾出兵，使人郁闷！”于是

亲自率军征讨。刘昶被逼谋反，但所统各郡不听命，文武官员各怀异心，刘昶只得携家逃往北魏。

刘子业又把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佑关押在宫殿内，用竹笼装起来。三人皆胖，刘彧为最，被呼为“猪王”，刘子业使人用木槽盛饭，拌上杂食，又在地上挖坑，灌上泥水，脱去刘彧衣服，让他在坑中用嘴吃木槽中的饭，以供取乐。有十几次，刘子业都想杀死三个王，每次都是刘休仁谈笑取悦刘子业而得免。一次，刘子业又脱去刘彧衣服，把他的手脚捆在一起，让人用木杠穿上，犹如抬猪一样送到厨房，说：今日屠猪！刘休仁笑道：猪未应死，待生皇子，杀猪取其肝肺。刘彧才得免死。后又杀了南平王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安南侯刘敬渊。刘子业打骂大臣更是寻常事，又把一些不放心的大臣杀掉，致使人人畏惧。

吏部尚书蔡兴宗于是筹划废黜暴君。他先联络劝说有威望的沈庆之，沈表示要效忠君主；又有沈文秀劝沈庆之起事反刘子业，

江苏扬州

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广陵。



沈还是不同意。刘子业听到风声后，派沈庆之的从兄之子沈攸之赐沈庆之死，沈庆之不肯饮药，被沈攸之用被子闷死。蔡兴宗又秘密联络刘子业信任的右卫将军刘道隆。此时，刘子业又派人赐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死，刘子勋准备起兵。而宫中的一些宿卫军官也谋划杀死刘子业。一天晚上，刘子业未带卫兵去行巫术事，被宫中主衣官寿寂之等人杀死。湘东王刘彧即帝位，是为明帝。

晋安王刘子勋不承认明帝，于江州起兵。长史邓琬、雍州刺史袁顗劝刘子勋即皇帝位，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琐，会稽内史、寻阳王刘子房，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益州刺史萧惠开及多数地方官员起兵响应。明确支持明帝的只有丹阳、淮南几个郡。

青瓷双柄鸡首壶

南朝

1965年江苏镇江出土

这是一件造型、装饰简练的酒器，两晋南北朝时名士嗜酒成风，随葬品中常出现酒器。



明帝派太尉刘休仁任主帅、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副帅征讨，先打败江州一方的晋陵内史庾业、义兴太守刘延熙，又攻克吴兴、吴郡，转而进攻其他方面，与江州军刘胡、袁顗相持，江州军连续失败，刘胡弃营逃跑，十万军被俘，袁顗被杀。邓琬被江州官吏杀死，江州投降。朝廷军在江州杀刘子勋，又陆续平定其他各州郡变乱，参与起事的安陆王刘子绥、临海王刘子琐、邵陵王刘子元都被赐死。

刘休仁认为孝武帝儿子们的存在是一个隐患，于是明帝赐松滋侯刘子房、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子真等十人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皆死。明帝晚年变得猜忌残忍，因太子年幼而担心诸弟日后不利太子，又开杀戮。他与晋平王刘休祐一起猎山鸡，命左右人乘天色已暗逼赶刘休祐从马上摔下，将其打死；又赐死建安王刘休仁、巴陵王刘休若，其兄弟中只有桂阳王刘休范才能低劣，保全了性命。

473年，明帝死，子刘昱继位，年仅十岁。刘宋皇室、大臣因自相残杀所剩无几，于是萧道成势力开始膨胀。萧道成的祖先是东海兰陵人，其祖父萧整于西晋末年南迁到南兰陵郡（在今江苏武进），曾任淮阴令，其父萧承之官至刘宋的右军将军。

477年，萧道成杀刘昱，立刘准，是为顺帝。479年，宋顺帝“禅让”，萧道成即皇帝位，建立齐朝。

由于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员，刘宋多次进攻南方的蛮族，沈庆之共俘获蛮族人二十多万，把他们迁徙他处，使之成为专门的营户。而后的齐、梁、陈也都大量使用少数民族为兵。

萧齐王朝是南朝最短命的一个王朝。其政治局势与刘宋后期一样混乱，统治集团十

分腐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本来法令规定租调缴纳谷物和布帛，实际上却常要人民折纳其他实物，或者折成钱。通过折变，往往给人民加重几倍负担。徭役也非常繁重，除修城、筑路、兴建宫室之外，连官府厨役都从州郡征发。

东晋、刘宋以来，江南的人口迅速增长，但国家户籍册上的编户却不见增多。除了大批农民成为士族地主的隐户，或流浪于山泽之间以逃避赋役外，还有许多人假冒免役的士族或僧侣。萧齐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萧齐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沿袭刘宋旧制，在各地设立典签，监察出任方镇的宗室和各州刺史。典签虽然官位低微，但由于为皇帝所信任，权力都很大，使得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

时局动荡之中，统治阶层弥漫着一股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气氛。无论是士族高门或寒门新贵，都竞相聚敛，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从齐武帝开始，萧齐宗室内部分不断地相互倾轧和残杀。

482年，萧道成死，武帝继位。武帝时还算安定，他死后其孙萧昭业继位。萧道成之侄萧鸾杀萧昭业，以萧昭业之弟萧昭文为帝，自己执掌大权。而后，萧鸾又杀郢阳王萧铨、晋安王萧子懋等十二个宗室王，接着，废黜萧昭文，自己称帝，是为齐明帝。

明帝有病，想到自己的近亲又少又弱，而萧道成及武帝的子孙还有十个王，打算把他们全部除去。他与始安王萧遥光频繁密谋此事，萧遥光认为应按顺序施行。每次商量过后，明帝都要焚香，呜咽流涕，众人就知道当晚必有诛杀。每次都是杀死诸王以后，再要大臣奏上这些人的罪状，还要附上请求诛杀，明帝诏令不许，大臣再奏，然后批准。这些王被杀时，都很年幼，巴陵王萧子伦十

六岁，邵陵王萧子贞十五岁，南康王萧子琳、衡阳王萧子峻、西阳王萧子文、临贺王萧子岳都是十四岁，湘东王萧子建十三岁，南郡王萧子夏仅七岁。

大司马、会稽内史王敬则是萧道成的旧将，心不自安。明帝对他也是表面礼数周到，内心怀疑防备。明帝派张环任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担当防备的任务。社会上传言，会有异常处分。王敬则听到后说：“东面现在还有谁，不过是欲平我罢了。但东面亦何易平！我决不会受金甃！”金甃是装有毒的鸩酒的，用来赐死。于是王敬则起兵反，奉南康侯萧子恪为帝，萧子恪害怕，逃跑。王敬则与朝廷军在曲阿交战，兵败被杀。

499年，萧鸾死，太子萧宝卷继位。萧宝卷在东宫时，不好学习，只喜欢嬉戏；也不

青瓷博山炉

南朝

1980年福建福州出土

通高16.8厘米，口径9.3厘米

底径11.9厘米

博山炉为熏炉中的一种，起于汉代，汉晋时期极盛行。





青瓷莲花尊

南朝

河南上蔡出土

高49.5厘米

莲花在佛教中象征洁净。南北朝时期佛教广泛传播，许多日用器物都用莲花图案加以装饰。

与朝中大臣接触，而是亲近宦官及左右的卫士、传令的小吏。当时，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六人分日值班处理政务。萧宝卷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事，这六人中就有人不同意，萧宝卷十分愤怒。萧遥光等人打算废黜萧宝卷，被发觉。萧遥光在建康起兵，与皇城军交战，兵败被杀。萧宝卷是一个残忍的人，当初明帝曾告诫他：“做事不可在人后。”萧宝卷奉行此言，多次突然诛杀不放心的大臣，以致朝中人人自危。

太尉陈显达是萧道成及齐武帝旧将，以武功显赫致高位，在明帝时内心怀有恐惧，常常降低姿态，以求自保。他每次出门都乘坐破旧的车辆，仪仗也降低规格，只用十几人，且都是身材弱小之人。萧宝卷即位，陈显达越发不愿留在建康。被任命为江州刺史，他极为高兴。萧宝卷在朝中诛杀大臣，传说还要发兵袭击江州，陈显达于是在寻阳起兵反，声称要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朝廷派大将崔慧景为主帅率军讨伐。陈显达败后将军胡松于采石，建康震恐。后陈显达率兵夜袭建康宫城，在西州府前交战阵亡。

萧宝卷原是不肖之辈，杀陈显达后日益骄恣。豫州刺史裴叔业是萧齐名将，萧宝卷诛杀大臣，裴叔业怕祸事及身，建康也盛传裴叔业将反，裴叔业于是向北魏称降，北魏派彭城王元勰、车骑将军王肃率十万兵接应。不久，裴叔业病死。

先是，萧宝卷派大将崔慧景率兵讨伐裴叔业，崔慧景出了建康，也发动起义，欲废黜昏君，安定社稷，兵锋直向建康，多次打败朝廷军，攻入建康城，称太后令废萧宝卷为吴王。但崔慧景的部将崔觉与崔恭祖有矛盾，崔恭祖又多次向崔慧景提出建议而不得采纳，心中愤怒，于是投降朝廷军，引得人心涣散。崔慧景悄悄向江北逃跑，被朝廷军

打败，崔慧景被杀。

将军萧懿是打败崔慧景的主将，战前，其弟雍州刺史萧衍劝说他：“平定崔乱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在明贤君主时，这种事也许都不难处理，况且乱朝，何以自免？若诛崔之后，就带兵进宫，行伊尹、霍去病故事，此万世一时之机；若不愿如此，就应回到豫州，那时威振内外，谁敢不从？要是放弃兵权，接受官爵，必生后悔。”萧懿不听劝告。战事结束，萧懿被任命为尚书令，其弟萧畅任主管宫廷守卫的卫尉一职。萧宝卷的嬖臣茹法珍等人害怕萧懿的威权，对萧宝卷说萧懿要行废立之事，萧宝卷信以为真。有人秘密告诉萧懿，劝他去襄阳，萧懿说：“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的尚书令！”萧宝卷用毒药赐死萧懿。

萧懿死后，萧衍以一万多人起兵，不久得到荆州军的支援，东下包围郢州。郢州城内有军人及百姓近十万，闭城门二百多天，



武士俑

南朝

江苏南京出土

发生瘟疫，死亡十之七八，尸体叠着尸体，许多房屋成了停尸场，守将投降。萧衍又劝降了江州刺史陈伯之。

萧宝卷在建康附近的朱雀航布置精兵十万，被萧衍大将王茂、曹景宗、吕僧珍打败。朝廷军士兵奔逃，被挤入秦淮河而死者无数，尸体累积与渡口等高，后来的士兵踩着尸体逃跑。建康城内当时尚有七万精兵，但已无斗志，夜晚有人进入宫中杀死萧宝卷。萧衍先立萧宝融为帝，不久又废齐称帝，建立梁朝，是为梁武帝，时为502年。

梁武帝萧衍是南兰陵人，是西晋末年以来渡江的北来人。其祖先在魏晋时是县令、州郡僚佐一类的官吏。祖父萧道赐是刘宋的治书侍御史，为中央部门的属官。父亲萧顺之是南齐的领军将军。萧衍博学好文，曾是齐竟陵王萧子良“八友”之一，又喜策划事务，有文武之才。

梁武帝萧衍即位之初，颇有善政。他废除了典签制度，把后宫、乐府、西榭及服刑的暴室中的妇女都遣散，准许中央官府的小吏、士兵通过买赎成为平民。萧衍每次任命地方官，都选清廉公平之人，并亲自授以为

政之道。当时官员都自我勉励。尚书令沈约是梁武帝多年旧臣，又以文学闻名，但他追求名利，当官十几年，对于政治得失很少发表看法。沈约自己认为应该升任三公级的高位，舆论也如此认为，梁武帝不准；沈约请求到地方任官，又不准；主管部门请求为沈约加三公的仪礼，仍不准，只是任命他为荣誉性的左光禄大夫。萧衍喜好儒家学说，设立五经博士各一人，又在地方的州、郡广泛设立学馆。

萧衍接受宋齐由于宗室操戈而速亡的教训，对宗室采取温厚宽容的态度，诸王犯法大多不追究，严重的罪过也只加以教训，这就造成了宗室的跋扈违禁。

萧衍的六弟萧宏与北魏作战大败，又大规模经营钱财，还被升任司徒。临贺王萧正德父子意图谋反，被发觉后，萧衍也是流着眼泪加以宽恕。王侯日益骄横，以致白天在街上杀人；夜间抢劫，罪犯逃到王侯家，官府不敢搜捕。庐陵王萧绩一向贪婪，临死前他让参军谢宣融把他的一千多件金银器上献，梁武帝问道：“王一金尽此乎？”谢答：“这已很多，安可加也！大王的过错如日月

萧顺之建陵石刻

位于江苏丹阳
萧衍称帝后，追尊萧顺之为文帝。



之食，死前欲令陛下知道。”

萧衍还对高级士族给以优待，给予高级士族的后人官职，又给寒门出身的人以官职，为此，他在中央及地方增设了许多官职安置这些人，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还因官生事，因事生奸。梁的地方行政官府日渐增多，共有一百零七州，州府官吏也多，只好把州分成五品，根据等级确定州府官吏的多少。

贺琛对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减少，是因为地方机构设置繁多，上级机构到下面检查公务，增加了事务及开支，有人还乘机谋取私利，狡猾的地方官也乘应对上级事务之机，搜刮聚敛，郡不堪州的控制、要求，县不堪郡的盘剥，尽管多次减免百姓赋税，尽管没有战争，百姓还是难以忍受，所以离开原籍依附大姓，或聚集生活，天下地方官都贪婪苛刻，少有廉洁美才者。梁武帝听后大怒。

梁朝对百姓很苛刻。梁武帝喜好文雅，对刑律定得疏阔简略，朝中大臣也对司法不注意，于是奸滑官吏趁机弄权行奸，谋取钱财，冤狱甚多。当时每年被处二年刑期的

有五千人，还有连坐之法，一人逃亡，全家罚为官府做工。有人对梁武帝说，陛下的法令对百姓严急，对权贵宽缓。梁武帝这才取消了老幼一同受罚的做法。

梁武帝为人孝顺、慈爱、恭敬、节俭，博学有文才，对阴阳、卜筮、声律、草隶书法、围棋无不精通。冬天，他四更就开始工作，在寒冷的室温中执笔书写，手都皴裂。信佛以后，他不食鱼肉，只吃蔬菜和粗米饭，身穿布服，使用木棉的帏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件长衣穿两年，后宫贵妃以下衣服的长度不及地。梁武帝不饮酒，非重大仪式不奏乐，是少见的克勤克俭的帝王。但他在细节处虽处处垂范，但对于朝廷的大政方针却掌控不当，以致梁后期“人人厌苦，家家思乱”。

547年，东魏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侯景投梁，被封为大将军、河南王，安置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抵御东魏，埋下了内乱的隐患。侯景与东魏慕容绍宗军作战，大败。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与东魏作战被俘，东魏声称与梁和好，要送还萧渊明，也一并遣送侯景在邳城的家属。侯景担心梁与东魏和好后自己被弃用，反复上书不要与东魏和好，梁

南京鸡鸣寺

即梁朝时同泰寺。梁武帝氏为好佛，几次舍身同泰寺为奴。



朝还是打算和好。侯景假造了一封东魏书信，试探梁朝的意图，信上说要用萧渊明交换侯景，梁武帝不察，同意此议。

于是侯景在寿阳起兵反叛，兵员只有一千多人，打算快速进攻建康。中领军朱异认为侯景不会渡江，梁军也就不在沿江多加防备。梁武帝以临贺王萧正德为防守建康一带的主帅。萧正德早对萧衍不满，派大船几十艘秘密接引侯景的军队渡江。梁朝这才开始在建康部署军事，以太子萧纲负责防务。在萧正德部众的接应下，侯军进入建康城内，进攻宫城台城，还在城内纵火焚烧。侯景招募大批奴隶为兵，攻陷台城，自封为丞相。梁武帝被幽禁，饮食被减少，忧愤成疾而死，时年八十六岁，在位四十七年。

549年，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是为简文帝。侯景被封为相国、汉王，又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550年，侯景军进攻巴陵不克，受到重创。在赤亭，侯景大将任约又被武猛将军胡僧祐打败。萧绎所封征东将军王僧辩率水军东下，连克侯景部众镇守的城池。551年，侯景废黜并杀死简文帝，立豫章王萧栋为帝，不久又废萧栋，自己称帝。

王僧辩在姑孰又击败侯景军，进至建康，与东扬州刺史陈霸先一起大破侯景，侯景逃跑被杀。

侯景极为残酷，每次出兵都对将领说：“我攻破城镇后，要把人都杀光，以使人知道我的威名。”他的军队专以焚烧抢掠为事，视人命如草芥。侯景之乱的兵祸主要涉及建康及三吴、广陵地区。侯景士兵在建康大肆烧杀抢掠，许多士大夫死于兵乱。建康原本是靠外地运粮，本身并不储备，战乱一起，交通断绝，粮食严重短缺，以至于人相食，建康居民饿死一半。建康在梁代是一座有二十八万户居民的都市，经过战乱，居民只剩十之一二。从东晋起，历经二百余年创造的文化全部被毁。在吴郡，侯景军大肆抢劫财物妇女，劫掠人口贩卖。三吴即吴郡、吴兴、会稽，是东晋以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兵乱时被严重破坏。在广陵，侯景军把男女老少都埋在地里，让士兵骑马射箭把他们杀死，广陵几成空城。

平定侯景前后，梁皇室之间就开始了内部斗争。萧绎的荆州军攻克长沙，斩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郢州刺史、邵陵王萧纶被荆州军的强势所逼，逃到北齐。551年简文帝被废，552年武陵王、益州刺史萧纪在蜀称帝；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萧纪东下，被萧绎军打败，萧纪被杀。岳阳王依附西魏，西魏兵于554年攻破江陵，萧绎投降，投降前把珍藏的古今图书十几万卷（一说四十万卷，其中包含从建康运来的八万卷）焚毁，这是中国古代典籍的又一次大损失。不久，萧绎被西魏杀死，梁朝宗室、官员、百姓几万人沦为西魏将士的奴婢，被驱赶到长安，江陵城中幼小及体弱者都被杀，幸免于难的只有三百多家。

555年，岳阳王称帝，成为西魏附属政

梁武帝修陵石天禄

位于江苏丹阳

身長3.1米，高2.8米



权。这时期，建康方面与北齐是附属国的关系。北齐准备把逃到北方的贞阳侯萧渊明送还建康，立为梁朝皇帝。太尉王僧辩先不同意，北齐军攻克梁的东关城，王僧辩恐惧，只好接受萧渊明为帝。侍中陈霸先欲借此事除掉王僧辩，领兵突然袭击，逮捕王僧辩，将其杀死，罪名是王欲与北齐军联合进攻自己。萧渊明退位，陈霸先立萧绎之子晋安王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陈霸先被封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又进封丞相、相国、陈公，掌握了军政大权。557年，陈霸先废黜敬帝，自己称帝，建立陈朝。

陈霸先是吴兴长城人，祖先也是西晋末年南迁的，在南方政权中任中级官职。陈霸先读过一些兵书，有武艺，明智果断，通达事务。

陈朝建立之初地域狭小，较侯景之乱前少了一半的州郡。西面的荆州以北地区被西魏攻取并建立了附庸政权，长江上游的川蜀地区也被西魏获得。长江中游江南的湘州是效忠梁朝的王琳所有，军势强大，并打败了陈霸先的大将侯安都、周文育。长江下游江北地区大多被北齐控制。

559年，陈霸先死，其侄陈蒨继位，为文帝。陈霸先善于决断，为政崇尚宽厚简易，不是军事上必需的不轻易征调百姓，又极为节俭，每顿饭不过几个菜。其后宫女性不戴金玉装饰，也不设女乐。

文帝时，王琳东下进攻陈国，水军在芜湖用火攻陈军，但风向不对，反而烧了自己的战船，王琳军全军覆没，与王琳呼应的北齐一万多人也大部分阵亡，王琳逃亡北齐。陈朝又先后打败或招抚了地方势力熊昙朗、周迪、留异、陈宝应等，境内获得平定。这一时期陈朝政治尚好，经济有所恢复。566年，文帝死，子陈伯宗继位，安成王陈顼辅

政。

陈顼把与自己一同辅政的尚书仆射到仲举、中书舍人刘师知赐死，文帝亲任的湘州刺史华皎准备起兵反叛，陈顼任命吴明彻为湘州刺史，与征南大将军淳于量、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车骑将军徐度等几路兵马讨伐华皎。华皎水军从西向东进，朝廷军先用中小船只出战，赏赐这些船上的士兵大量金银，让他们迎受华皎军大船击拍，等华皎军的击拍用尽了，朝廷军的大船再出战，发出击拍，华皎军的战船被拍碎沉没。华皎军又用载着柴草的战船进攻，乘着风势发起火攻，但不久风向改变，大火烧毁了华皎军的船只，华皎大败。

568年，陈顼废黜陈伯宗，自己当了皇帝，是为宣帝。

573年，以司空吴明彻为主帅，十万陈军进攻北齐，一路攻城受降，取得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许多北齐的地域。在寿阳，陈军与北齐几十万大军相遇，北齐军不向前进，陈将都感到害怕。吴明彻说：齐军结营不进，自己削弱锐气，吾知其不敢战。吴明彻派兵从四面进攻，一战破齐，俘虏逃到北齐的原梁将王琳及扬州刺史王贵显等人，攻克寿阳。

577年，北周灭北齐，形成了陈朝与北周对峙的局面。宣帝认为黄河以南地区可以容易地取得。陈军此时正围攻北周彭城，北周援兵赶到，把几百个车轮用铁链穿起来，沉入淮河支流清水河入淮口，断绝了陈军退路。北周军援兵不断增加，吴明彻决定突围，破坏了清水河的围堰，想乘着水势进入淮河，但战船被车轮挡住，水逐渐变浅，周军攻击，陈军崩溃，吴明彻及三万陈军被俘。北周封吴明彻为大将军，吴忧愤而死。陈朝改在长江一带防守。

582年，宣帝病死，陈叔宝继位，是为后

主。陈后主沉湎逸乐，在光昭殿前建临春、结绮、望仙三座楼阁，皆高几十丈，有几十间房。其门窗、墙中的横木、横楣、栏、槛都用能发出香气的沉檀木做成，并装饰金玉、珠翠，门帘是珠子做成的。阁中还设宝床、宝帐，其他服饰玩好的华丽程度也是近世不曾有的，微风吹过，香闻数里。阁的下面有假山、水池、奇花异卉，极为讲究。陈后主自住临春阁，让宠爱的张贵妃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住望仙阁，又有王美人、李美人、张淑媛、薛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被宠爱的后宫佳丽频繁游览其上。

尚书仆射江总是个喜好文学之人，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瑳等文人数十，常陪同陈后主在后庭游览饮宴，彼此很随便，称为“狎客”。诸狎客及后主宠爱的嫔妃及女学士袁大舍每每赋诗，彼此酬答，其中文词艳丽的被配上时尚的曲调，选宫女千余人练习歌唱，曲目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内容都以嫔妃的美色为主题，至有“不见正

横陈”这样的诗句。他们经常是通宵达旦地饮酒唱歌。

陈后主少问政务，往往是倚靠在称为“隐囊”的倚枕上，让张贵妃坐在他的腿上，两人共同批阅公文。江总等人也是不问公事。于是宦官近侍得以弄权，他们勾结在外的亲戚横行不法，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许多大臣都讨好他们。陈后主不喜欢听不好的消息，孔范每每把坏消息加以文字修饰后再上呈，谁要是想劝告后主，孔范都找个罪名把他排斥出去。

宣帝时，陈朝两度发大军北伐，加上造宫殿的靡费，百姓赋税劳役负担很重。过去对军人及士大夫不收关税及市场税，这时重征，超过以往几十倍。百姓还要充任繁重的劳役，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而孔范认为自己具备文武双才，常人不及，对陈后主说武将都有勇无谋，从此武将稍有过失都被夺去兵权，用文官领兵，陈朝武力削减。

588年，隋军五十一万南下灭陈。晋王杨

江苏徐州

即古代彭城，为兵家必争之地。



广为主帅，从六合（今属江苏）出发，秦王杨俊从襄阳（今属湖北）出发，清河公杨素从信州（今属四川）出发，荆州刺史刘仁恩从江陵（今属湖北）出发，蕲州刺史王世积从蕲春（今属湖北）出发，庐江总管韩擒虎从庐江出发，吴州总管贺若弼从吴州（今江苏苏州）出发，青州总管燕荣从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出发。

杨素的巴蜀军出三峡，遇陈军在狼尾滩据险而守。杨素率领舰队悄悄出动，派大将王长袭领步兵攻击陈军别营，刘仁恩率骑兵从江北岸攻击白沙，陈军大败。杨素率军东下，气势极盛，而陈朝主管机要的施文庆、沈客卿压住各地战报不奏。当初，梁宗室萧严、萧贲带军队归附陈朝，陈后主内心顾忌，于是招二人回朝，令长江各要塞舰船都随二人开回建康，以致这时不再有战船与杨素水军作战。

大军压境，陈后主仍一味享乐，醉生梦死。他认为，王气在建康，北齐三次南征、北周两次南征，都失败而回，隋人也不会有何作为。孔范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限隔南北，今日敌军岂能飞渡耶！”一帮昏君佞臣依旧成日酗酒、赋诗、观看歌舞，不作重大军事部署。

589年，贺若弼从广陵渡江。为麻痹陈军，贺若弼把老马弱军展示在外，把所买的陈朝人的船藏起来，又买了五六十艘旧船停泊在小河中。陈朝的侦查人员见到，以为隋军没有战船。贺若弼又让沿江守防的军人在换防时，都集中到广陵，多竖立旗帜，满布营帐，陈军以为隋朝大军到来，就进入军备状态，几次防范落空后，就不再注意。到了贺若弼军真的渡江时，陈军竟不知道。韩擒虎也率五百人渡江到了采石（今安徽当涂），采石陈军报告，陈后主这才作部署，连僧人、



尼姑、道士都要从军。贺若弼攻克京口（今江苏镇江），军纪严明，把俘虏的六千陈军都予以释放，于是一路攻战，进展顺利。韩擒虎攻克姑孰，江南人素知韩擒虎的威信，到韩营拜见的人络绎不绝。贺军进到了金陵的钟山，杨广及王世积的部将也向建康进发，陈军极为恐惧，许多人投降。

这时建康还有十多万军队，但陈后主一向怯懦，敌军入城，他只知日夜哭泣，把机要事务交给亲信施文庆办理。施文庆一向以讨好后主而获升迁，知道将军们讨厌自己，恐怕他们有功对自己不利，对后主说这些人心气不高，总是应付差事，不可信任。于是陈后主对将军们的军事请求都不同意。骠骑将军萧摩诃两次要求在京口及钟山与隋军交战，不获许可。吴兴太守任忠向陈后主建议说，客军贵在速战，主军贵在持重。国家现足兵足食，宜固守建康宫城，在秦淮河设立军营，不与北军交战。另在沿江断绝南北通信，自己再率一万水军突袭江北的六合，隋朝大军必认为渡江的隋军已被消灭，信心受打击，而后声称要在徐州截断北军退路，北军必然退兵。此议也不被采纳。

青瓷褐釉十足砚

南朝

1960年江苏镇江出土

直径13.4厘米，高4.7厘米
砚最初皆为石质，西晋时开始出现瓷研。

孔范表示自己要与隋军决战，后主于是令萧摩诃出战。陈军大作部署，南北各将的军队延绵二十里。贺若弼以八千人与陈军交战，陈军小胜即骄。贺若弼再次进攻孔范军，陈军混乱而败。任忠见大势已去，投降韩擒虎。隋军进入建康，陈军逃散。后主与后宫十多人藏在一口井中，被隋军士兵发现，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被捉。陈朝兵将官员纷纷投降，陈朝灭亡。

第四节 南方经济的发展

西晋末年以来，中原战乱，北方人民不断南下至长江流域，使原来地广人稀的南方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北人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提高。南方的土地得到了开发，一些地区的湖区、山地都成为耕地，还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如曲阿新丰塘是321年东晋竟陵内史张闿兴造的，灌田八百多顷，使原来这里很差的土地状况大为改观，

每年都能丰收；丹阳郡的练湖为西晋末年陈敏兴造，汇集七十二条溪水入湖，湖周长一百二十里，灌田几百顷；山阴的鉴湖是东汉时兴造的，以后又续修，六朝时已有宽五里、东西长一百二十里的规模，开水门六十九所，灌田两千顷；梁天监年间在今浙江丽水筑通济堰，灌田数十万亩。

这时期，南方地区的水田采用烤田法。即第二次耘田后，将田里的水放干，土地经日晒，稻根就可以发达不倒伏，谷穗大而粒多。还在田中种植红花作为绿肥，大粪肥田的做法也有所扩大。北方的农作物如麦、菽在南方开始种植，这些都促使南方农业有所发展。会稽郡有良田几十万顷，上好的土地一亩就值一金，是关中不能比的。刘宋时有人说丹阳、会稽一年丰收，几个郡粮食都有保障。而吴兴郡若是丰收，京城也能受益；若是遭受水灾，则几个郡都会产生粮食危机。其他如湘州、郢州的序溪，以及寿春、襄阳、淮南、姑苏都是农业发达地区。刘宋后期，江南的粮食交易达到了以千斛为量的规模。

手工业也得到发展。一些矿山得到开发，丹阳的铁矿运到扬州用来制造铁器。建康有东西两处冶铁场所，梁朝修浮山堰就用了东西二冶的铁器几千万斤沉在围堰处。会稽、武昌、益州、广州冶铸业也较发达。

北方人民南迁后，丝织业在南方也兴盛起来。南朝时永嘉郡及豫章郡蚕桑业发达，豫章郡养蚕一年四五熟。东晋末年，建康设有官办的织锦署，成都织锦名重天下。刘宋时有荆、扬二州“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说法，足见产量之大。

制瓷业在南方地区有所扩大。除较早烧造瓷器的会稽郡外，南方其他地区，如今浙江温州、金华，江苏宜兴，湖北武昌，湖南，江西，广州，福建都有瓷器烧造，并具备地

青瓷狗窝
晋



方特点。考古发现的东晋南朝瓷窑瓷器数量都比较多，以会稽郡的越窑青瓷、德清窑出产的黑瓷品质较佳。

造船业在南方较发达，南朝水军有时是几千艘船的阵容。船只的尺寸也很大，湘州的大船可容万斛。陈朝曾造大舰二百艘。隋朝平定陈朝以后，下令没收各州民间三丈以上的大船。侯景水军的千艘战船两边都有八十只桨，行驶起来“捷过风电”，说明船既大又快。祖冲之发明的千里船据说能日行百里。

南方这一时期的商业发展很快。建康在三国时城中已有商业集市，分为大市、小市、北市，南朝时更是“贡使商旅，方舟万计”，秦淮河边有大市十多处，小市百余处。荆州也是当时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而会稽城内有很多店铺摊贩。一些地区设立了与境内少数民族交易的市场。

商业贸易利润丰厚，当时一些官员也从事此事。东晋江州刺史刘胤不事政务，专事商贾。刘宋吴喜自荆州返回建康，大船小船都装满了钱米布绢，吴喜的部下也人人满载货物而归。刘宋孔道存、孔徽用船载货物回家乡贩卖，绵绢纸席等货物装了上千船，可见商业规模之大。

宋齐时与南海一些地区的商业往来有所发展，因进出货物大多从广州转运，在广州做官的人往往发财致富。东晋南朝与北方的



边境贸易也有所发展，东晋曾与后赵互市，北魏与南朝互市，有些时期南北走私贸易也很盛行。

青瓷鸡笼
晋

商业活动促进了货物流通，繁荣了经济，如萧齐时吴兴郡几年粮食歉收，商人就从丰收的会稽郡贩运粮食到吴兴郡卖。侯景之乱时，会稽郡发生饥荒，地方豪强陈宝应从海路运粮到会稽交易。刘宋时发行了四铢钱，但发生了盗铸，伪钱轻薄。梁朝发行了五铢钱，还有五铢铁钱，说明货币需求量很大，商业兴旺。

南方地区在内战较少、社会较为安定、政治不很恶劣，或对外用兵较少时，百姓赋税劳役负担没有额外增加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得到一些发展。



第四章

十六国政权与北魏统一北方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点燃了战乱的烽烟，其后西晋覆亡，晋室南迁，偏安一隅，广大的中原地区落入内迁的各少数民族的抢夺之中。

在东晋与南朝四政权迭相更替的一百多年间，北方地区，深重的民族斗争与分裂割据、兼并征战片刻未息，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先后建立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及后燕、后秦、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南燕、北燕等十六个政权。这些政权相互厮杀、兼并、更迭，整个北方地区陷没在血雨腥风里。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大斗争之一，但民族大斗争的同时，也产生了民族大融和，百余年间的兼并厮杀也为后来的北魏再度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创造了条件。

第一节 十六国兴亡

前汉政权是匈奴人建立的。在今山西一带，东汉以来已有匈奴族聚居，这些匈奴人的首领后又接受曹魏、西晋的封号。“八王之乱”中，首领刘渊被本族人推举为大单于，准备恢复匈奴事业。304年，刘渊称汉王，设置百官，打败西晋的讨伐军，拓展了并州一带的土地。308年，刘渊称帝，国号为汉，都城设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刘渊两次命军队进攻洛阳均告失败。延津一战，匈奴汉国的灭晋大将军刘景把三万平民投入黄河淹死，刘景被刘渊罢官。刘渊死后，子刘和继位，与辅政的刘聪发生冲突被杀，刘聪称帝。

匈奴汉国的镇军将军石勒在苦县消灭了晋军主力。刘聪派前军大将军呼延晏、龙骧将军刘曜、石勒进军洛阳，连续十二次战斗

均获胜，晋军战死三万多人。匈奴军攻入洛阳，焚烧宫殿、官府，士兵大肆抢掠。316年，攻陷长安，灭西晋。

并州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刘聪采取了胡汉分治的方法。他置左右司隶，各管汉户二十多万，每一万户设置一个内史管理。又设置单于左右辅，管理少数民族二十五万户。

匈奴贵族为了争夺财富和权力，互相倾轧，汉国统治很不稳定。刘聪立其弟刘义为皇位继承人，称太弟，而以其子刘粲为相国、晋王，主管政务。刘义的属官卢志等人对刘义说，主上以殿下为太弟，是为了安抚众人，其实意在晋王。相国本是赠官，现在大小事无不由之，殿下无法继位是很明显的，而且还会有不测之危，可夺取各营，派人刺杀相国。刘义不听。此事被人告发，卢志等人被杀。一些与刘义不和的人趁机向刘粲游说，称刘义终将危害刘粲，应当设法除掉。

317年，刘粲派人对刘义说，他得到诏书，京师将有非常之事，应当设兵以备。刘义于是命令宫臣穿上铠甲防备。刘粲即派外戚、中护军靳准、中常侍王沈向刘聪报告说刘义将要作乱，已命人穿上铠甲。刘聪派靳准、王沈率兵包围东宫，逮捕氏、羌酋长十余人，严刑拷问，这些人都自诬与刘义准备谋反，于是杀刘义及官属几十人，坑杀有关

军队士兵一万五千人。之后，刘粲被立为太子。

318年，刘聪死，刘粲即位。靳准又准备除掉刘粲，夺取汉国。他对刘粲说：听说一些大臣要行伊尹、霍去病之事，欲先杀太保呼延晏，再杀臣，以大司马刘骥主政，陛下宜先行动手。刘粲不听。靳准两个女儿是皇后，靳准让她们再去说。于是刘粲杀太宰、上洛王刘景，太师、昌国公刘颢，大司马、济南王刘骥，吴王刘逞等五王。刘粲以靳准主持军国事务。不久靳准带士兵进宫，杀死刘粲，夷灭刘氏，自称汉大王。

刘渊的养子、相国刘曜自关中发兵至平阳，杀死靳准，迁都长安，称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与关陇氏族、羌族及石勒连年发生战争，中山王刘岳与石勒军的石虎在洛阳一带战斗，刘岳兵败被俘，前赵一万六千俘虏被坑杀。328年，洛西一战，刘曜临战饮酒，被石勒军打败，被杀。329年，石勒进军关中，灭前赵，建立后赵。

石勒是羯族人。羯族人有西域人的特点，高鼻深目，属于匈奴人的别部。石勒原居住在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其祖父、父亲都是部落小帅。石勒被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的军人掠卖为奴，以后与牧人师汲桑起兵投奔公师藩，在“八王之乱”中对晋将苟



“亲晋胡王”铜印

西晋

边长约2.5厘米

这是西晋政府颁发给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章。

曦作战兵败。

石勒释放囚犯、招纳逃亡者，以扩大兵员，又投身刘渊军中，成为重要将领。他参加了刘渊对西晋的战争，攻克武德城，坑杀投降士兵一万多人，令黄河以北的坞壁都感到害怕，有五十多处向他投降并送人质。石勒封给这些坞主官职，从这些坞主的部曲中挑选五万人为兵，于是有了一支精兵。以后他又攻下冀州坞壁百余所，有了十多万人的军队。

石勒健壮，有胆有力，喜好骑马射箭，也喜欢文化，即使在出征打仗的间隙，仍常令人读史书。他很有见识，常评价帝王的优劣，得到官员儒生的认同。一次，他读到酈食其劝刘邦封立战国六国贵族的后人时大惊，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再读到经张良劝阻未果，才说：“赖有此耳！”

石勒注意招引人才，设立了君子营，一些汉族及少数民族的人才投到石勒门下，其中张宾成为石勒的重要助手。张宾博览群书，很有头脑，曾对弟弟说：吾自言智谋认知不比张良差，但未遇刘邦。他认为石勒是可以成大事的人，于是提剑到石勒军营，请求接见。他筹划的事情从没有落空的，石勒对他十分倚重。

以后石勒占据河北，319年，称赵王，设立百官。321年，石勒打败并俘虏晋泰山太守徐龛，将他送至襄国斩首。东晋兖州刺史郗鉴向南退却，后赵取得徐州、兖州地区。接着又打败了鲜卑段部。322年，石勒打败东晋青州牧曹嶷，占据青州。328年，石虎进攻前赵的蒲坂（今山西永济东南），刘曜率兵增援，破石虎军，又包围后赵洛阳城。石勒率兵八万多人来救，与刘曜大战于洛阳。刘曜

“石安韩丑”砖

十六国 后赵

1954年陕西西安出土

长15.5厘米

“石安”即今陕西咸阳，后赵石勒曾改咸阳为石安县。

“韩丑”是造砖人的名字。



因醉酒在战斗中落马，被石勒俘虏杀死，后赵大败。329年，石虎进入关中，俘虏前赵太子刘熙，取得了前赵原有的关陇地区，这样他就占有了北方大部分地区，且一度进攻到东晋的长江以北地区。

330年，石勒称赵天王，不久称帝，都城在襄国（今河北邢台）。他建立的赵政权，史称后赵。

石勒注意协调羯族人与汉族人的关系。专门设立了门生主书的官员，掌管羯族人进入宫中的事务；又设立严格的法禁，不让羯族人侮辱汉族士族。

他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曾到襄国的学校考察学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情况。还设立秀才、孝廉试经的制度。郡国也设立学官，每郡设两名博士祭酒，有弟子一百五十人。

这个时期，后赵百姓每年缴布帛二匹、粮二斛，负担比西晋稍轻。

333年，石勒死，太子石弘继位。334年，石虎废黜并杀死石弘，自己称帝，把都城迁至邺城。石虎是石勒从子，性情残暴。他开始大规模地在邺城、洛阳、长安修建宫殿，一共征发了四十多万民工，还向各地强征妇女充实后宫，其后宫妇女竟多达十万人。

由于战争，石虎统治时期农民的劳役及军役很重。石虎准备进攻前燕，下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州原本享有免役权利的家庭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与邺城的原有军队一起，合共五十万人，可见征发数量很大，又在青、冀、幽州民户三丁发二、五丁发三为卒。他频繁地发动战争，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石虎要进攻南方，规定士兵每五人出一辆车、二头牛、十五斛米、十四绢，不能完成的就要处死，百姓卖儿鬻女，仍然不能完成，道路上死者相望。石虎的暴政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反抗。

规模最大的是梁犊起义。梁犊原是邺城的卫士，后在雍城发动起义，向东方进军，到长安已发展到十多万人。他打败长安守将石苞，再向东进。石虎借用羌人姚弋仲、氐族人苻洪的骑兵才打败了梁犊。

349年，石虎死，幼子石世继位，被其兄石遵杀死，石遵称帝。不久石遵即被其弟石鉴杀死，石鉴又被石虎养孙冉闵杀死。350年，冉闵称帝，改国号为魏，后赵亡。

冉闵原本是汉族人，他下令邺城之内，与政府同心的留下，不同心的听任出城，于是周边百里内的汉族人都进入城内，而城内的羯族等少数民族纷纷出城。冉闵知道这些少数民族不会为自己服务，于是率领汉族人对这些人大开杀戒，死者二十多万，尸体置于城外，都被野狗豺狼吃掉。这是这一时期民族残杀的一大恶性事件。

后赵的石祗听说石鉴已死，在襄国称帝，原后赵在各地领兵的少数民族将领纷纷响应。石祗派石琨率十万兵进攻邺城的冉闵，被冉闵打败。冉闵又打败苻健等部，率十万兵进攻襄国城，被石祗及羌族姚弋仲、鲜卑慕容部的援军打败，冉闵部下及士兵死者十多万。

因政局不稳，这一带强盗土匪横行，司州、冀州地区又发生大饥荒，人相食。由于冉闵与羌人、胡人频繁战争和饥荒，以前被二赵政权迁来的羌、氐、胡、蛮族人民及青、雍、幽、荆等州的汉族人民这时纷纷返回自己的故乡，人数合计有几百万。流民在路上不时相遇，互相攻杀抢劫，加上饥饿和疾病，大量人口死亡，能回到家乡的只有十分之二三。中原地区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没有人能安心农业生产。这是西晋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又一场大灾难。统治者对各族人民不适当的安置迁徙是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源，

如石虎曾把关中地区的百姓及氏族、羌族十万户迁徙到关东。

冉闵回到邺城，打败了石祗部刘显的七万军队。刘显害怕，向冉闵请降，并杀死石祗以示诚意。鲜卑慕容部包围邺城，城内饥饿，人相食，有人开城门投降，冉闵被俘被杀。

成汉政权由流民首领李氏所建立。西晋后期的296年，西北地区以氏族人齐万年为首，发生了大规模的氏、羌族反抗西晋统治的起义，299年被西晋政府剿灭。由于战争，关西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天水、略阳、扶风、阴平、始平、武都六郡的汉族及氏、羌、氐等少数民族大批流亡，人数有十多万，向巴蜀地区迁移。其中李特、李庠、李流家族率领的氏族人七千多人进入绵阳。

当时西晋的益州刺史赵廋见中原混乱，产生了割据巴蜀之心。他招募一万流民，切断了北面的入蜀之道。当时的流民首领是李特、李庠，李庠得人心，引起赵廋猜忌，于是赵廋杀李庠及其子侄十余人。李特带兵攻进成都，赵廋战败逃跑，被部下所杀。

西晋任命的下一任益州刺史罗尚进入川蜀，下令流民返回故乡，但当时粮食尚未收获，这些人没有返回故乡的钱粮，而政府又是限期返回，人们都发愁，不知如何是好。罗

尚与广汉太守辛冉都很贪暴，大肆勒索流民的财物，辛冉还把平定赵廋之功据为己有，并想杀死流民首领。李特一再请求将返回的时间后推到秋收时，辛冉却张榜重赏购募李特等人。李特把榜文揭下，加写“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意在激起流民对罗尚等人的仇恨，于是六郡流民聚集在李特周围。辛冉、罗尚派兵袭击李特营地，却中了埋伏被消灭。

李特看到中原大乱，准备占据巴蜀。他攻下广汉，继而进攻成都。罗尚一面向李特求和，一面要求西晋援兵。西晋援兵到达，罗尚发动突袭，李特兵败被杀。李特的四弟李流继任统率军队，打败了西晋荆州援军，重新围困成都。不久李流病死，李特之子李雄成为统帅，切断向成都运粮的通道。李雄指挥人马攻城，罗尚弃城逃跑，城内人开门迎接流民军。304年，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306年又称帝，国号大成。

成政权建立之初，较少有封建国家的特点。它废除了西晋的法律，只是约法七章，刑政宽简，监狱中没有多少来不及审判而积压的犯人。官吏没有俸禄，用度取之于民。赋税也比西晋轻得多，丁男每年缴谷三斛，丁女减半，有疾病再减半，户调则是每年几丈布帛，绵只有几两，劳役也少。百姓富裕殷实，里巷夜不闭门，中原人及一些少数民族也来降附。

334年，李雄病死，其侄李班即位，李雄之子李期杀李班，自己称帝。338年，李特弟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成汉进入乱政期。李寿大兴宫室，百姓劳役繁重，思乱者十家有九。李寿死后，其子李势继位，大肆杀伐，上下离心。347年，东晋将领桓温攻蜀，李势兵败投降。

“汉兴”铜钱

十六国 成汉
直径16.7厘米，重0.7克至1.1克

西晋末，氏族李氏率流民起义，建立成国，又称成汉，铸造“汉兴”钱。



前燕是鲜卑慕容部所建政权。曹魏时，鲜卑慕容部首领莫护跋帮助司马懿讨伐公孙渊，被曹魏封为率义王。至首领涉归时迁居辽东北部。西晋永嘉年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东晋初年接受晋元帝的单于封号。由于慕容廆统治较为清明，许多中原人逃到辽东避难，一些人还担任了官职，如为之出谋划策的长史裴嶷。

333年，慕容廆死，其子慕容皝掌握大权，于337年称燕王，341年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同年，前燕进攻高句丽，打败了五万高句丽军队，攻入丸都城。

高句丽的创立者是朱蒙，出自夫余族，最初以纥升骨（今辽宁桓仁）为都城，公元前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242年，高句丽王位宫进攻辽东，被曹魏幽州刺史毌丘

俭打败，魏军追击，进入国内城的守备城丸都城。246年，毌丘俭再次进攻高句丽，位宫逃走，魏军追击千余里，在丸都山刻石纪功。前燕军毁坏丸都城，焚烧宫殿，抢走大量珍宝，高句丽王钊逃跑，被百济杀死。前燕几次迁徙高句丽人十几万。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

在今辽宁、吉林两省发现了不少高句丽的城址和墓葬。据考古调查勘测，国内城平面呈方形，周长2686米。保存较好的城墙残高3米至4米，厚7米至10米，用石料砌筑，每面城墙均有马面，城墙的四角原来建有角楼。四面城墙共有六座城门，东面西面各有二座，南面北面各有一座。城门之间有道路连通，在城内形成了东西向二条横向道路、南北向一条纵向道路。



鎏金鞍桥和马镫

高句丽

1976年吉林集安出土

大鞍桥宽50.5厘米，高29.8厘米；小鞍桥宽38厘米，高25.4厘米；马镫高约26.8厘米，宽约17.2厘米

四五世纪时，高句丽鎏金技术达到很高水平，鎏金器物精美华丽。



莲花纹瓦当

高句丽

1976年吉林集安出土

直径21.5厘米

集安是公元3年至427年高句丽都城所在地，当时出土瓦当极丰富。

丸都城遗址在国内城西北2公里外的山坡上，东西北三面高，南面低，因山势用石材筑城，石料长20厘米至50厘米，宽29厘米至40厘米，厚10厘米至27厘米。城墙整体呈椭圆形，总长6951米，共有五座城门，东墙北墙各有二座，南墙一座，城墙上女墙。

高句丽墓葬有石墓和土墓两类，有的墓室内有壁画，描绘墓主人生前的饮宴歌舞场面、佛教题材、四神、日月星辰等内容，这些题材及内容明显表现出汉族文化的影响。墓内随葬有生活用具、工具、武器、马具及装饰品等。

前燕又掠夺幽州、冀州境内三万多户，迁徙宇文部五万多户到昌黎（今属河北），以充实自己的人口。前燕境内外来人口居多，慕容皝租给这些人土地，打算把自己无耕牛而由国家提供耕牛的农民收获的八成归政府，自己有耕牛的农民收获的七成归政府，

这是高于曹魏的苛刻的国家租税，经人劝说，改为官六民四或官民各半。

349年，慕容皝死，子慕容儁继位。这时后赵境内大乱，350年，前燕大军进攻后赵，占据幽州、冀州，迁都蓟（今北京），又灭冉闵政权，取得其地。352年，慕容儁称帝，迁都至邺城。

这时前燕已占有潼关以东地区及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打算向关西进兵，于是下令州郡检查人口，每户留一丁，其余成年男性都征发为兵，想使兵员达到一百五十万。经大臣劝阻，改为三五占兵之法，即三丁征发二人，五丁征发三人为兵，这在中国仍是很苛重的兵役法。360年，慕容儁死，子慕容暉继位，由慕容儁之弟太宰慕容恪、太傅慕容评主政。

慕容评率兵攻陷东晋的黄南北地区，抚军将军慕容厉攻克东晋兖州地区，河南大都督慕容垂、前秦将军苟池打败东晋桓温军，晋军死亡四五万人。这时慕容恪已死，慕容垂有大功，与慕容评发生矛盾，慕容垂逃到前秦。前秦王猛率军进攻前燕，慕容评率四十万兵对抗。前秦军兵少，又远道而来，希望速战速决，慕容评则不出战，企图拖垮秦军。慕容评为人贪财，不肯给将士发放钱物，军队缺乏斗志，在潞川之战中秦军烧毁了燕军的辐重，燕军大败，死亡五万多人。前秦苻坚、王猛率大军继续进攻，一路取得邺城、和龙，在高阳俘虏慕容暉，前燕灭亡。

前秦是氐族人所建的政权。西晋末年，苻洪被氐族人推举为盟主，反对晋朝。后赵石虎把关中豪强及氐族、羌族迁徙到关东并给以任用，苻洪领二万户居住在枋头。冉闵时发生屠杀胡人、羯人的风潮，在关东的氐、羌纷纷西返，苻洪聚集十多万人，自称三秦王。苻洪后被人毒死，子苻健率众继续西归，



鎏金镂空箭镞饰

三燕

1988年辽宁朝阳出土

占据关陇。351年苻健建国，自称天王，国号秦，史称前秦，352年苻健称帝。

355年，苻健死，子苻生继位。苻生荒淫残暴，用严法统治，任意杀死大臣，苻健之侄苻坚与一些亲信密谋替代苻生。357年，苻坚得到苻生要先消灭自己的消息，于是令弟弟苻法率几百人悄悄进入宫门，他自率三百人进攻，宫廷卫士不愿替残暴的苻生卖命，临阵倒戈，苻坚进入宫中，杀死苻生。苻坚即位，改皇帝名称为天王。

苻坚在政变前已结识王猛。王猛是北海

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出身贫寒，博学，好读兵书，谨慎持重，严格坚毅，气度雄伟高远。东晋桓温攻入关中时，王猛曾求见，他穿着旧短褐衣，一边捉虱子，一边纵论天下，面无愧色，旁若无人。经人推荐，王猛得见苻坚，二人相见恨晚，苻坚说：“遇到你，如同刘玄德见到诸葛孔明。”苻坚对王猛委以丞相的重任，朝政都听从王猛。

前秦在这段时期有些善政，国势急剧上升。前秦广泛设立学官，由通晓一种以上儒家经典者出任，教授公卿以下官员子孙。苻

坚亲到太学主持考试，每月到太学巡视一次，还经常提出儒家经典中的问题与博士讨论。下令提拔孝悌、力田、廉直、文学、政事等方面的人才为官，宗室外戚无才者也不得为官。苻坚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减收一些地区的田租，这样国家和百姓的负担都要稍轻一些，但他对被征服的拓跋部采取过三五取丁的重役政策。史载，这个时期，人们都鼓励自己上进，号称多士，犯罪行为止息，请托当官的途径被杜绝，农田得到开垦，国家库藏充实，典章制度完备。

365年，前燕夺取了东晋占领的洛阳，又向西进占浍池，达到前秦东面。这时，北面归附了前秦的匈奴人曹毂、刘卫辰开始出兵反前秦，鲜卑人乌延也起而呼应。苻坚亲征，

打败曹毂部，斩杀乌延，大将邓羌击败刘卫辰部，生擒刘卫辰。

369年，王猛率三万军进攻前燕洛阳城，前燕大将慕容臧率十万兵来援，在荥阳（今河南郑州）被前秦军伏击，洛阳孤立无援，守将投降。370年，前秦六万军进攻前燕，以王猛为指挥，先攻下壶关，又增援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悄悄开挖地道通向晋阳城内，然后派几百人进入城中，打开城门，前秦军攻进城内，生擒并州刺史慕容庄。

前燕四十多万军队来救援，与前秦军在潞川对垒。前燕主帅慕容评好财，舍不得给部下资财，士兵用的柴草及水都要自己出钱买，使得军中不满，人无斗志。王猛得知，增加了战胜前燕军的信心。他先派兵焚烧了前燕军的粮草，火势之大连邺城也能看见。前

“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

十六国 前秦
河北易县出土
直径17.5厘米
这件瓦当的铭文称颂前秦兴盛，功如同古之圣人，应当是官府用瓦。



秦军与前燕军开始决战，大将邓羌等人对前燕军发动猛烈攻击，前燕军崩溃，士兵奔逃，死伤被俘十几万人，慕容评逃跑。

前秦军随即包围邺城，苻坚亲率十万大军与王猛会合。前燕人见到前秦大军到来，城中人心混乱，有人在夜间打开城门迎接前秦军，前燕主被俘，前燕其他地区纷纷投降，前燕被灭。

371年，前秦进攻仇池，征服了这一带的氐族人。373年，前秦攻取东晋的益州、梁州。376年，趁前凉内部争权夺利之机，出兵十三万进军前凉姑臧城。前凉主张天锡出动十万军队与之交战，兵败，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前秦又出动三十万大军击垮了鲜卑拓跋部建立的代政权，派官员管理拓跋部事务。至此，前秦取得了中国北方，控制的地方东到大海，西到龟兹，南到襄阳，北越大漠。

375年，王猛病死。王猛临终告诫苻坚不要进攻东晋，理由是东晋是历代相承的王朝，现在内部和睦，攻之不易。但苻坚追求所谓的功业，决定进攻东晋，统一天下。这时的前秦实力已经有所衰弱。由于连年用兵，北面要派兵驻守，南面的巴蜀之地要从很远的地方运粮来供应，士兵在外贫苦，百姓负担过重，饿死不少人。统治阶层内部有许多被征服政权的人员，极不稳定。这些都注定了前秦的失败及速亡。

383年，前秦讨伐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元气大伤。当年投降的不少前燕人在前秦政权任官职，这时想要趁机恢复燕政权。慕容垂向苻坚请求回故地祭祀祖先，苻坚自认一向待慕容垂等人不薄，不致有什么不测，于是同意。

384年，慕容垂与丁零人联合，重建燕政权，用丁零及乌桓二十多万人攻打邺城，关

东地方官员纷纷向燕国投降。苻坚为防止慕容垂有变故，曾派出一些军队镇守关东，但人数太少，此时无能为力。

当年投降前秦的羌族人姚萇在前秦任官职，因与苻觚出兵讨伐慕容泓兵败而畏罪，这时也得到关中羌族人和当地豪强的支持，分离出去，自称万年秦王。苻坚几次派兵讨伐姚萇都未获得成果。姚萇与慕容冲联合，慕容冲进攻到长安附近，长安城内的鲜卑人准备呼应，要在宴会上杀死苻坚。有人告发，苻坚杀死了长安城中的鲜卑人。苻坚被慕容冲军包围，无法在长安据守，与几百人逃入五将山，被姚萇俘虏。姚萇要苻坚禅让，苻坚大骂不止，姚萇于是下令缢死苻坚。不久慕容冲攻占长安。苻坚族孙苻登在陇东称帝，为姚兴战败被杀。394年，前秦灭亡。

后秦是氐族人姚萇建立的。姚萇的父亲姚弋仲，先归附前赵、后赵。姚弋仲死，子姚襄继续统领羌人，与苻坚作战，其死后，弟姚萇降前秦。淝水之战后，姚萇被关西豪族推为盟主。乘慕容冲与苻坚交战，姚萇取得前秦关陇的一些地区，并俘虏苻坚。386年，姚萇进入长安，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萇令各地设立官学，通过考试录用人才。393年，姚萇死，太子姚兴继位。

姚兴广泛招纳贤才，并褒奖勤政廉洁的官员。他喜欢研讨汉族文化，在他的影响下，长安儒风极盛，有几名大儒教授学生，远道而来求学者有一万多人。姚兴还邀请高僧鸠摩罗什演讲佛理，并与鸠摩罗什一起考订以前有较多错误的佛经，官员、百姓不少人也好佛，长安成为北方当时的文化中心。姚兴重视司法，在长安设立律学，学业优异者选派地方任职，主持司法，地方有不能解决的案件，姚兴还亲自审理，当时号称无冤狱、无积案。姚兴崇尚节俭，车马不用金玉装饰，官

“太清丰乐”及“凉造新泉”铜钱

十六国 前凉

直径分别为2.2厘米、2.05厘米

前凉是两晋动乱后出现在西北地区的政权，当地原以布匹做待进行交易，前凉铸造货币取代布匹。



员也都受影响，淡于财物。

416年，姚兴死，子姚泓继位。东晋于同年攻下后秦的洛阳，次年攻取长安，姚泓投降，后秦亡。

前凉是301年张轨任凉州刺史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政权。西晋灭亡后，凉州成了中原人躲避战乱的一个中心。在张轨执政时期，凉州一直奉东晋为主。

张轨死，子张寔接替统治，后被左右人杀死，张寔弟张茂接替。张茂曾投降前赵，被封凉王。张茂死，张寔子张骏接替。张骏大规模修建宫殿，百姓劳苦。又打算对秦陇之地用兵，为筹集物资，把粮食布匹借给百姓，一年后收取一倍的利息，缴不足的就把相当

于所欠数额的土地房屋强行卖出。张骏时开始称凉王，官员及车辆、服装、旗帜的制度都按王的等级设置。

346年，张骏死，子张重华接替。张重华死，子张曜灵接替，不久被部下废黜而立其兄张祚。张祚在家族内淫乱，设立五都尉，专门寻找别人的过失，又禁止四品官以下的人穿丝织品的衣服，一般百姓不得拥有奴婢，不准乘车骑马，百姓怨愤。河州起兵讨伐并杀死张祚，张骏子张玄靓继任。张天锡辅政，杀张玄靓自立。张天锡不理民政，376年前凉被前秦灭亡。

夏政权由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年建立，都城在统万（今陕西横山）。统万意为统一天下君临万邦。赫连勃勃是一个残酷的人，他建筑统万城，用蒸后的土夯筑，再用铁锥刺土，刺进一寸，就杀民工，把尸体拌和泥土一起筑城；制造兵器，以箭射甲，箭入甲则杀制甲匠，不入即斩制弓人。他还经常出兵劫掠杀戮，抢劫牲畜。征伐南凉时，他下令把杀死的万余人的头堆在一起，当作景观。

418年，夏国夺取东晋手中的长安，赫连勃勃改称皇帝。425年，赫连勃勃死。夏国的

“大夏真兴”铜钱

十六国 夏

直径2.3厘米，重2.2克

“真兴”是赫连勃勃称帝后的一个年号。



太子原是赫连璜，以后赫连勃勃又想立幼子赫连伦，赫连璜知道后杀死赫连伦，赫连勃勃第三子赫连昌又杀赫连璜，赫连昌成为太子，到这时即皇帝位。

427年，北魏攻取统万、长安，赫连昌率军与北魏交战，败逃到上邽。428年，魏军进攻上邽，俘虏赫连昌。赫连定逃到平凉，自称皇帝。431年，赫连定灭西秦，在渡过黄河要进攻北凉时，被吐谷浑攻击，赫连定被俘，夏灭。

西秦是乞伏氏所建。乞伏氏是鲜卑族的一支，先臣服于前秦，淝水之战后，其首领乞伏国仁召集各部落十万人，摆脱前秦统治，385年，自称大单于，史称西秦。388年，乞伏国仁死，弟乞伏乾归即位，改称河南王，被后秦征服。407年，称秦王。412年，乞伏乾归被兄子乞伏公府杀死，子乞伏炽磐继位，消灭了南凉政权。428年，乞伏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他的政治、法令严酷，内外崩离，431年西秦被夏政权灭亡。

后凉是氐人吕光所建的政权。吕光原为前秦将领，奉苻坚之命征西域。苻坚死后，吕光于389年称三河王，396年称大凉天王。399年，吕光死，子吕绍继位，吕光子吕纂发动政变，吕绍自杀，吕纂称王。吕纂弟吕弘有功名，怕被吕纂所不容，起兵攻吕纂，兵败被俘被杀。吕光弟之子吕超又杀吕纂，让位给兄吕隆。吕隆靠杀豪强及有威望的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内部很不稳定。

南凉及北凉政权相继攻后凉，战争导致都城姑臧粮价奇贵，一斗五千钱，人相食，不大的姑臧城饿死十多万口，百姓请求出城成为他人奴婢的每天有几百人。吕隆怕城中人心崩溃，把这些人全部坑杀，城内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吕隆于403年投降姚兴，后凉亡。

南凉是鲜卑族的一支秃发部所建。397

年，秃发乌孤自称西平王，后改称武威王，用汉族及少数民族人士作为官员，在乐都建都。秃发乌孤死，弟秃发利鹿孤继位，改称河西王，建立学校，教授官员之子。他死后，其弟继位，改称凉王。南凉经常与北凉及夏政权交战，多数败绩。战争使南凉农业荒废，南凉军出外掠夺乙弗部，西秦趁机攻破南凉都城乐都（今属青海）。414年，南凉向西秦投降而亡。

北凉是卢水胡人建立的政权，建立者是沮渠蒙逊。其祖先是匈奴的左沮渠官，以后部落就以这个官名为姓氏。沮渠蒙逊及部众原归后凉管束，后与从兄沮渠男成率部众一

沮渠封戴墓表

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沮渠封戴是北京高昌太守。



白双且造塔

十六国 北凉

甘肃酒泉出土

残高46厘米，底径21厘米

北凉首领沮渠蒙逊崇佛，使北凉成为佛教艺术由西向内地传播的中介。



万多人拥护建康太守段业为主，推段业为凉州牧。段业儒雅温厚，没有权谋策略，也没有威信，于是沮渠氏成了他的一支重要力量，沮渠蒙逊被任命为张掖太守，攻取了晋昌、敦煌两地。

沮渠蒙逊恐怕段业忌讳自己的雄强武略，就隐匿自己的才能。段业仍对沮渠蒙逊很不放心，把他调到较远的临池任太守。沮渠蒙逊认为段业愚蠢而不明智，不是拨乱之才，打算把段业除去，立沮渠男成为主。沮渠男成认为段业依赖亲重沮渠氏，背叛他不妥，不表同意。

沮渠蒙逊于是施展权谋，先与沮渠男成约定一同到兰门山祭祀，又秘密派人向段业说，沮渠男成要谋叛，打算在某个日子发动，要是他请求到兰门山祭祀，臣的话就是应验

的。到那天果然如此，段业逮捕沮渠男成并令其自杀。沮渠男成向段业说出事情原委，并建议：臣死，沮渠蒙逊必反，如果假称臣死，等到沮渠蒙逊发动时，臣出而讨伐，就能成事。段业不接受，仍令他自杀。沮渠蒙逊对部众说要为沮渠男成报仇，沮渠男成一向对部众有恩信，部众听后极为愤怒，起兵讨伐段业，俘虏并杀死段业。

沮渠蒙逊与后秦通好并接受封号。内部人推沮渠蒙逊为凉州牧，把政治中心迁到姑臧。412年，沮渠蒙逊称河西王，设置各种官署，兴建宫殿、城门、观楼，史称北凉。这时期北凉不断与西秦、南凉、西凉和名叫乌蹄及卑和的少数民族交战。420年，北凉大破西凉军，灭西凉，占有河西走廊地区。

沮渠蒙逊自幼好学，广泛阅读历史书



嘉兴元年神兽铜镜

十六国 西凉



木芯鎏金铜片马镫

北燕

1965年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

籍，通晓天文，喜欢儒家文化。北凉也提倡佛教，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沮渠蒙逊曾下令减少各种徭役，但实际如何不得而知。433年，沮渠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继承政权。439年，拓跋焘亲征北凉，沮渠牧犍投降，北凉灭亡。

西凉是汉族人李氏家族所建。400年，敦煌太守李暠起兵反后凉，后自称凉公。417年，李暠死，子李歆继承其事业。西凉与北凉不断交战，420年，李歆率军进攻北凉大败，三万军队被歼，北凉随即灭亡西凉。

后燕是鲜卑人慕容垂所建。他原是前燕的吴王，因内部争斗逃到前秦，被委以官职。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脱离苻坚，于384年在关东自称燕王，386年称帝，以中山（今河北定州）为都城，史称后燕。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范阳王慕容德率近十万人进攻北魏，被北魏军队在参合陂打败，回来的士兵只有十之一二。慕容垂率兵亲征北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打败北魏军，慕容垂这时病重，燕军撤退，途中慕容垂死，太子慕容宝继位。

慕容宝的法令、政治严厉，上下离心离德，百姓都希望国家发生变乱。396年，北魏四十万大军讨伐后燕，攻下后燕重镇晋阳，

常山、信都，击败后燕十五万军队，围困中山城。后燕皇室的矛盾表面化，有才能又得人心的清河王慕容会固守中山，慕容宝准备除去他。慕容会进攻慕容宝，慕容宝逃往龙城。中山城乏粮，后燕军战败，魏军攻下中山。后燕只剩辽西地区在手。

慕容宝派三万兵想夺回失地，但士兵厌战，扔掉兵器逃跑。398年，慕容宝被部下所杀，长乐王慕容盛称帝，又在内乱中被杀。慕容垂少子慕容熙被立为帝。慕容熙大规模修建龙腾苑、承华殿，又征契丹、高句丽，到处巡游，士兵劳苦死亡甚多。407年，慕容熙被将军冯跋、高云所杀，后燕灭亡。

西燕是慕容泓所建政权。淝水之战后，慕容泓自称济北王，起兵反前秦，打败前秦大将苻叡。慕容泓被部下杀死，众人立慕容冲为主。385年，慕容冲进入前秦都城长安，企图以此为基业，但部众为鲜卑人，愿回关东。一些人杀慕容冲，部众向东移动，途中上层争斗，慕容永掌权。386年，慕容永在长子（今山西长子）称帝，建立政权。393年，后燕慕容垂打败西燕军队。394年，后燕杀慕容永，灭西燕。

北燕的建立者是汉族人冯跋。409年，冯跋被众人推为燕天王。冯跋要让位于其弟冯素弗，冯素弗认为不合传统，于是冯跋即位，也以龙城为都。冯跋见到当时百姓赋税劳役繁重，生活困苦，就力求精简政务，去除前朝的各种苛政，减少百姓的劳役和赋税。冯素弗任大司马，谦虚恭慎，非礼不动，对仆人也以礼相待，住房、车辆、服装都求俭约，以此影响臣下，百姓作歌称颂他。430年，冯跋死，冯跋弟冯弘杀冯跋之子即天王位。436年，北燕被北魏所灭。

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是慕容垂之弟，本来守卫邺城，北魏灭后燕时，慕容德率众南

撤至滑台，称燕王，并取得青州、兖州、徐州之地。399年，慕容德称帝，迁往广固（今山东益都），以为都城。405年，慕容德死，侄慕容超继位，信用奸臣，杀害贤良，百姓赋税繁多，劳役很苦。410年，南燕被东晋大将刘裕灭亡。

第二节 北魏在北方 的统治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初在大兴安岭一带游猎。秦汉以后北方民族南迁，东晋后期中原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纷争的局面。这时，鲜卑族的拓跋部南迁到内蒙古草原。386年，拓跋珪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称

代王。398年，改国号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史称北魏。

一、北魏统一北方

十六国后期，各族统治者先后建立王国，关东有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和北魏，关中、陇西有后秦、大夏和西秦，河西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它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城夺地的战争。

在这些割据政权中，羌族建立的后秦在姚兴统治下，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它翦灭了前秦和后凉，曾控制西起河西，东至徐、兖的广大地区，强盛了二十多年。就在这个时候，在它的东北方，北魏也日益强大。

1980年，在大兴安岭北部的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发现了鲜卑拓跋部旧墟石室，洞中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中书侍郎李敞奉诏来此



鸟纹铜牌

北魏

1961年内蒙古吐默特旗出土
长5.5厘米

匈奴、乌桓、鲜卑诸族一直
使用此类铜牌，用作衣物的
束带或马具。

祭祀的文书石刻，洞内还发掘出石器时代的陶片及工具，说明这里是拓跋部的最早居住地。

到了拓跋部早期的拓跋毛时期，已经“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有了部落联盟。以后，拓跋部在推寅时期向南迁徙到大湖区，到诃汾时期再次南迁，到了北方草原的匈奴故地。248年时，拓跋部已发展成有二十万骑兵的部族。258年，拓跋部迁到盛乐。在录官时期，拓跋部分为三部。西晋末年，猗卢总管三部。猗卢帮助西晋刺史刘琨打击刘渊、石勒，被晋怀帝封为代公，晋愍帝时又封为代王。到什翼犍时期（338—376），拓跋部开始建立年号，设

立百官，官员的名称与西晋有许多相同，还制定了法律。

376年，前秦与铁弗部刘卫辰一起打败了拓跋部。原来附属于拓跋部的高车部趁势进攻拓跋部，什翼犍被俘虏到长安，拓跋部瓦解，人员被分散安置到几个郡，成为前秦的民户，其地由苻坚指派的铁弗刘卫辰部和刘库仁部分掌。

淝水之战后，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复兴拓跋部，受到一些部落的拥护。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开始仿照汉族政权，建立年号“登国”，同年自称魏王，史称北魏。拓跋珪在后燕军队的支持下，打败了拓跋部内部与他争位的拓跋窟咄，接着击败了独孤部的刘显，又连续征服了库莫奚部、解如部、叱突邻部、纥奚部，大破高车部，俘获大量人口及牲畜。391年，刘卫辰部八九万人进攻北魏，拓跋珪身边只有几千人，但以兵车为营，打败刘卫辰军，刘卫辰被部下杀死，其部落瓦解。拓跋珪获马匹三十多万只，牛羊四百多万头。

北魏与后燕原是友好政权，但后燕不断向草原地带扩张力量，与北魏产生了矛盾。391年，后燕打败与北魏关系很深的贺兰部，生擒首领贺讷，得到其部众几万人。拓跋珪出兵援救，后燕归还贺讷部众。后燕又扣留了出使中山城的拓跋珪之弟为人质，要北魏提供战马，被拓跋珪拒绝，两国交恶，自394年起双方进入战争状态。

395年，后燕约十万军征伐北魏。为避其锋芒，拓跋珪把军队撤至黄河以西，后燕军无法与北魏交战。因天气渐寒，又传说慕容垂已死，燕军主帅慕容宝决定退兵。这时，黄河上结了薄冰，燕军焚烧了渡河船只，以为北魏军无法渡河，就未设观察军人。但此时突然天气急剧转寒，几天北风使黄河冻结，拓跋珪率两万军渡河追赶后燕军，在参合陂

圈足铜镬

北魏

内蒙古吐默特旗出土

高19.5厘米

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习用的炊具，自公元前至北魏在欧洲东部至中国北方广泛流布，可说是丝绸之路上表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种典型器物。



(今山西大同东)西赶上燕军。此前,已有北魏拓跋虔的五万骑兵截断了燕军东去的道路,拓跋仪率五万骑兵在朔方阻挡燕军,拓跋尊率七万骑兵在南面阻挡燕军。这时燕军已宿营,并未察觉危险。第二天清晨,魏军骑兵在山上出现,燕军大乱,魏军攻击,燕军死者万人,四五万人被俘,几千人逃跑。拓跋珪将俘虏全部坑杀。

396年,燕军再度兴兵讨伐北魏。燕军突然进军到平城,北魏守将拓跋虔战败。拓跋珪率步骑兵四十万伐燕,攻占了后燕的并州及冀州的大部分地区,后燕守将非逃即降。397年,北魏军攻占后燕重镇信都,后燕军在严寒的天气下冻死甚众。拓跋珪又率军进攻中山城,后燕皇室内部此时争权夺利,皇帝慕容宝逃往龙城。几个月后,中山城内粮食断绝,主帅慕容麟逃跑被杀,城内人开门投降。后燕另一重镇邺城守将慕容德也弃城南逃,北魏进入邺城,取得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398年,拓跋珪从盛乐迁都平城,开始建造宫殿、宗庙、社稷,仿照汉族政权,建立政府机构,定立官制、爵品,设郊庙、社稷、朝觐、飨宴等礼仪。同年称帝,是为道武帝,国号为魏。

399年,北魏军三路进兵,大破高车四十



余部,俘获人口十万,牲畜一百余万。402年,后秦四万军攻北魏,战败,被俘获两万余人。

由于北魏政权内部出现了拓跋仪与穆崇合谋杀拓跋珪未遂事件,以及拓跋顺打算利用一次战争北魏失利之机自立的事件,拓跋珪逐渐对内部人不放心,进而对一些人产生疑心。他杀死了大将和跋,皇室成员拓跋尊,将军庾岳、莫题,又杀死拓跋仪和与其有关

“传祚无穷”瓦当

北魏

山西大同出土

直径15.5厘米

其铭文表达了北魏统治者希望皇位永传的愿望。



“河内太守”铜虎符

北魏

内蒙古出土

系的皇室子弟三十多人。由于服食丹药中毒，拓跋珪最后到了几天几夜不能吃饭睡觉的程度。他自言自语，怀疑所有的大臣，发现有人异常就将其杀死，如觉得某人呼吸有异，某人神色有异，或是走路姿势不对，问答慌张失措，就亲手用刀砍死，把尸体置于宫殿外面示众，北魏官员人心惶惶。

409年，拓跋珪要处死贺妃，贺妃告诉儿子拓跋绍。拓跋绍带人潜入拓跋珪卧室，将其杀死，拓跋绍即位。先前被废黜的太子拓

跋嗣在北魏上层的支持下杀拓跋绍即帝位，是为明元帝。明元帝死，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424—452），北魏的武功达到顶峰。

425年，夏国主赫连勃勃死，夏国内部发生皇位之争，关中混乱，拓跋焘打算趁机进攻夏国。426年，北魏出兵攻夏，大将奚斤率兵五万，攻克弘农、蒲坂、长安。427年，夏国赫连定率二万兵进攻长安，双方在此相持

骑马武士陶俑

北魏

1953年陕西西安出土

高38厘米

北魏最初用骑兵作战，保留着许多鲜卑族的原有风俗。



不下。拓跋焘乘机派十万军，分前后军进攻统万。拓跋焘亲自率三万兵进至统万城下，令士兵采集野菜，向赫连定示弱。夏军三万人出击，魏军先假装后退，然后突然反攻。夏军兵败，魏军进入统万城内，赫连昌逃往上邽。428年，魏军攻取上邽，俘虏赫连定，灭亡了夏国。

居住在北方草原的柔然族于402年征服高车，强大起来，不断南下进攻北魏边塞。424年，柔然六万军南下，占领北魏盛乐宫，拓跋焘与之交战，陷入重围，拼死方得出，柔然成为北魏的劲敌。此后，北魏与柔然常有征战。429年，北魏从东西两路讨伐柔然，东路由拓跋焘亲自率兵，西路由平阳王长孙翰率领。东路军放弃輜重，用骑兵奔袭，柔然可汗大檀听说魏军突然来到，仓促间携家西逃，来不及招呼各部落。大檀之弟匹黎率兵援救，正遇魏西路军，被打败。魏军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范围对柔然展开征讨。

高车原被柔然征服，这时乘机摆脱柔然，投降北魏者三十余万落，带马匹一百余万，牲畜几百万。拓跋焘回军途中，听说东部高车居住在已尼陂，于是令左仆射安原率领骑兵前往，招降东部高车几十万落，把这些高车人迁徙到大漠以南、平城以北地区。由于高车部脱离柔然，柔然的力量骤然削弱，可汗大檀死。443年、449年，拓跋焘又两次亲征柔然，给柔然以重大打击。柔然向北面逃跑，不敢再向南侵，北魏解决了北部的威胁。

430年，北魏对北燕用兵，拓跋焘率军与将军奚斤会师于和龙。石城、营丘、带方、玄菟等北燕地区投降。和龙的北燕军坚守，魏军被迫退兵。436年，魏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率骑兵一万进攻北燕，北燕天王冯弘逃往高丽，魏军进占和龙，灭北燕。439年，

拓跋焘亲征北凉，北凉主沮渠牧犍准备同魏军决战。沮渠董来率兵万人与魏军交战于姑臧城南，但北凉军惧于魏军声势，见到魏军就溃散。魏军包围姑臧，沮渠牧犍率文武官员五千人面缚出降，北凉灭亡。至此，中国北方都归北魏所有。

拓跋焘是北魏武功最盛的皇帝，同时他也与其先辈一样，不断完善封建体制，还大批吸收汉族人进入统治层。当时最著名的汉族官员是崔浩。

击鼓陶俑

北魏

1953年陕西西安出土
高29厘米



崔浩是清河东武城人，出身于北方高级士族，在拓跋珪时期入仕，由于擅长书法，在拓跋珪身边做郎官，到明元帝时为博士祭酒，参与应对，得到信任。到拓跋焘时，在征伐柔然的问题上，崔浩与一般大臣的意见相反，独自主张出兵，说服了拓跋焘，结果出征柔然，大获全胜。此后，拓跋焘对崔浩格外信重，许多军政大事都向崔浩征求意见，而且往往加以采纳，崔浩也一直升到了司徒的位置。

崔浩是汉族政权士族体制的赞同者，对官员按德才器识判别高下，并区别这些人的门第，连汉族官员卢玄也劝告他，认为不合时宜，崔浩不听。崔浩又称赞从南朝来的高级士族太原王慧龙为贵种，鲜卑官员及拓跋

焘对此大为不满，认为他嘲讽鄙视鲜卑文化。他曾经一次就向主持国政的太子拓跋晃推荐士族五十多人，并且不听拓跋晃对这些人要逐步提升的意见，起步官就是郡守，这在历代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对于这些容易引起鲜卑官员反感的事情，崔浩不以为意，汉族官员高允说：崔公恐不能免罪了。

439年，北魏编写本国历史书，名曰《国史》，崔浩担任主编，对执笔者所写内容作了一些增删和评价。《国史》具体内容今已不详，但书中对鲜卑拓跋的历史不加避讳，写成后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大道旁。鲜卑官员读后异常生气，告诉太武帝崔浩有意暴露国家恶行。太武帝也十分愤怒，抓捕崔浩，然后处死。一些秘书郎以下的官员也被杀。清

“冠军将军印”铜印

“高城侯印”铜印

“怀州刺史印”铜印

北魏

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
皆长3.5厘米，宽3厘米
三方印文表现了墓主人封磨
奴生前的军职、爵位和官
职。



河崔氏的族人，不管远近都被灭族，又牵连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被灭族。这是汉族士族与鲜卑贵族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北魏统治势力向汉族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地区日益扩展的过程，也是拓跋部社会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北魏建国初年，拓跋部还处在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奴隶社会初级阶段。拓跋珪命令部落成员分土定居，把被征服的大批后燕人迁到代北，计口授田。农业在北魏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拓跋部社会随之逐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巩固统治，北魏吸收了一批汉族士大夫参加统治机构，并依靠各地地主的坞堡组织作为自己统治的支柱，封建政治制度在北魏初步建立起来。

北魏境内是多民族杂居，由于北魏政权的武力征服政策，加上北魏许多官员行政的苛刻，各种关系十分紧张，各族人民的反抗频繁。大量的高车人被向内迁徙，成为北魏政权的奴役对象，为国家饲养牲畜。内地被征服的汉族人大量被迁徙到平城一带，即所谓的平齐户，从事农业生产。北魏对有功官员大量赏赐奴隶，数量从几十到几百户不等，奴隶的来源就是被征服的各族民众。

北魏各族人都有被强征入伍的情况，或成为营户在军队服劳役。战斗时，汉族及各

族步兵在前，鲜卑骑兵在后驱赶，前面的步兵如行动迟缓，就会被后面的马匹践踏。

北魏官员先是没有俸禄，以后才有俸禄，但不论哪个时期都有严重的贪贿现象，不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官员均如此。如公孙轨治理上党，赴任时单人匹马，离任时物资装满百辆车。

北魏官员为了增加收入及多向国家缴纳税赋提高政绩，收取租赋时采用大斗、长尺、大秤，这样官员得到的粮食布帛等实物俸禄就增多了。汉代一尺的长度约合今23厘米到24厘米，东晋的一尺增加了1厘米，南朝的一尺也是25厘米，而同期的北魏一尺将近31厘米。孝文帝曾禁止大度量衡，但由于各地官员的营私和贪婪，时间不长，又恢复了大的规格，百姓极为不满。

北魏时期，不仅赋税沉重，而且为政苛暴。前代官员为政苛刻已是通病，北魏更苛一层。北魏官员大多素质低下，加上战争频繁，对各种物资需求紧迫，向百姓索取的情况异常严重，由此引起的矛盾是深刻的。北魏时期人民起义不断，仅北魏前期九十年，史书中记载的各族人民起义就有七十多次。

盖吴起义是北魏人民起义较大的一次。当时，关中地区各民族杂居，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屠各等部族。北魏对各少数民族采取压制政策，为便于控制，且增加平



铜尺

北魏

长30.9厘米

北魏尺较汉尺长七八厘米，这是因为北魏时国家对百姓征收实物赋税，为了多征收而采用大度量衡。



武士陶俑

北魏

1965年河南洛阳元邵墓出土
高30.8厘米

此俑为孝文帝改革后的制品，服饰上汉化风格明显。

城人口，许多人被强行迁徙到平城，其中死于路途的有十分之三四。这里的各族人民赋役负担也很沉重，使人无法忍受。

445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发动起义，打败了北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关中各族人民纷纷响应，人数最多时达到十多万，烽烟遍及关陇。在汾水流域的薛永宗也发动起义，呼应盖吴，发展到五万人。同时盖吴与南朝

的宋文帝联系，希望刘宋能出兵攻击北魏。太武帝率八万骑兵亲征，先进军汾水，隔断了薛、盖两军的呼应，又突然袭击打败了薛永宗部，北魏大将乙弗也打败盖吴主力。446年，盖吴被北魏军包围于杏城，盖吴被内部人所杀。为震慑起义民众，北魏军在耿青、孙温、李润堡等地进行了大屠杀。

北魏的逐渐强大，不可避免地要与南朝发生战争。422年，北魏南进，一年多的时间里攻占了刘宋重镇滑台、洛阳、虎牢及司州、豫州、兖州的大部分地区。430年，宋军约十万人北伐。北魏先从滑台、洛阳等地撤军，然后发动反击，打败刘宋姚耸夫、竺灵秀军，宋军物资几乎全部丧失。

450年，拓跋焘率十万军亲自南征，无功而返。451年，刘宋准备北伐，由于兵力和财力不足，在六个州全面征兵，并要官员、百姓捐献物资。宋军一直进至滑台、虎牢一线。拓跋焘率十万军亲征，围攻滑台的宋将王玄谟逃走，其余各路宋军只好退兵。魏军乘势南进，到达建康长江对面的瓜步，由于一时难以南进，第二年退军。魏军所过之处焚烧房屋，杀死百姓，掳掠人口，使村落空虚，赤地无余。当时人说，残杀之惨古今未有，撤退时，壮年人被杀，婴儿被刺在枪上挥舞。盱眙之战，拓跋焘在给宋军守将臧质的信中写道：攻城的不是鲜卑人，东北面的是丁零人、胡人，南面的是氐人、羌人，你杀尽这些人，正好可减少我的麻烦。战斗非常惨烈，魏军尸骸堆得同盱眙城一样高。

497年，北魏孝文帝率大军南伐，取得了南朝萧齐的南阳等郡，打败齐将崔慧景、萧衍军，斩俘齐军二万多人。南齐派陈显达率军四万企图夺回失地，几次打败魏将元英。齐军围困马圈城四十多天，魏军粮食用尽，只能以死人肉及树皮充饥，最后只好放弃马

圈城。孝文帝再次亲征并部署战事，在均口大败陈显达，齐军死亡三万多人。

以后，南北有一个战争相对较少的时期，到梁武帝时又重启战端。506年，萧梁北伐，主帅是临川王萧宏，军队规模盛大，新制造的兵器用具精良，其军队之精锐，北魏人认为是南朝几十年来所不曾有过的。魏军主帅是中山王元英，率兵十几万与梁军对峙，不久又增兵十万。萧宏胆小，军事部署有问题，元英与北魏镇西将军邢峦来攻，萧宏有退意。夜遇暴雨，萧宏以为魏军到了，只与几个人慌忙逃跑，梁军见失去主帅，于是

溃散，兵器、铠甲、器械到处抛弃，死亡近五万人。

北魏军数十万乘胜围攻梁钟离城，城中只有梁将昌义之率领三千人据守。魏军用车运土填平护城的堑壕，步兵背土跟随在后，骑兵紧跟在步兵后面驱赶，有的士兵投土后来不及走回，就被后面的土掩埋。很快壕沟填平，魏军用冲车冲撞城墙，梁军随时用土修补撞坏的城墙，魏军昼夜攻城，死者与城墙等高。

507年，梁右卫将军曹景宗督众军二十万救援钟离，又有豫州刺史韦叡来援。韦叡



陶马

北朝

1948 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

高31.3 厘米

此陶马为仪仗队伍的组成部分。

听从将军冯道根的建议，在淮河的邵阳洲上挖掘长壕，树立鹿角，一夜之间造成一座城堡，与魏军的城堡只距百步，元英极为吃惊。此时淮河遇雨，水势大涨，韦叡派水军出击，在小船上装载干草，浇上膏油，焚毁了魏军在河上修筑的两座桥，又有敢死之士上岸砍坏魏军营栅，梁军奋勇出击，以一当百，魏军崩溃，被挤入淮河淹死的有十几万人，被斩杀的也有十余万，弃甲投降乞求为奴的有五万人。淮河百余里的地方，到处是魏军尸骸。

二、孝文帝改革

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个通过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并得到巩固，是北魏统治集团必须解决的问题。统治集团内部有中央集权和旧部落显贵之间的矛盾，有推进改革和守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处理不慎都会演化成流血斗争，危及北魏的统治。

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为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政治危机，从公元483年起，在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孝文帝拓跋宏于471年继位，由于年幼，由太皇太后冯氏辅政。490年，冯氏死，孝文帝亲政。冯氏与孝文帝执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因为都是孝文帝在位时期，故称孝文帝改革。

冯氏是长乐信都人，祖父冯弘是北燕王。北燕被北魏灭亡，冯弘逃到高丽。冯弘之子也就是冯太后的父亲投降了北魏，在北魏做官，后因罪被杀，女冯氏没入皇宫。冯氏聪慧好学，十四岁时成为文成帝的贵人，十八岁时成为皇后。文成帝死，献文帝继位，冯后被尊为皇太后。这时皇帝年少，车骑大

将军乙浑专权，诛杀异己。冯太后以谋反的罪名杀死乙浑，自己临朝听政。献文帝让位，孝文帝继位，冯氏成为太皇太后，与献文帝矛盾加深。476年，献文帝暴薨，当时传言是冯太皇太后害死的。孝文帝年幼，冯太皇太后再次临朝听政，并主持了北魏的改革。490年冯太后去世，葬于平城北面的方山。原本冯氏规定自己的陵墓不事奢华，坟墓不过三十步，内室方一丈，用普通棺槨，不设随葬品，孝文帝把坟墓和内室均加大一倍。冯氏陵墓称永固陵。

冯太后与孝文帝改革的主要内容有颁行俸禄制度、推行均田制、设立三长制及迁都洛阳、改革鲜卑风俗等。

484年，北魏颁行俸禄制度。北魏前期，中央和地方官员一律不给俸禄，中央官吏可以按等级分享掳获的战利品。地方官吏则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在管区内任意搜刮。这是导致北魏官员贪贿盛行的主要原因，也是北魏在战争中大肆掳掠的原因之一，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尽管北魏对贪贿惩罚严厉，如461年文成帝下令凡贪赃绢十匹以上处以死刑，献文帝时下令凡贪一只羊、一斛酒者处死，但仍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所以到这时要实行俸禄制度。北魏官俸按官品大小发给。

485年，北魏颁布均田令，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措施。西晋末年，北方由于长期战乱，人民流徙死亡，出现大量无主荒地；北魏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大规模强制人民迁徙，户绝地荒现象严重；北魏统一北方后，战争大为减少，流民大批返乡，农民得不到土地，无处谋生，只得转入私门或聚集山泽起义反抗。为保证租调和徭役的来源，缓和社会矛盾，北魏颁行均田令。

均田令规定十五岁以上男女开始接受政

府田地，接受的田地分为露田及桑田。露田男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接受同样数量的田地，耕牛一头接受三十亩，但每户受田的牛不能超过四头。政府授予的露田上不能种桑、榆、枣等树木，不能买卖，丧失劳动能

力或死亡时，交还政府。桑田男二十亩，奴隶授予同样数量。桑田允许种桑、榆、枣等树木，不还给政府，可世代相传。每户桑田达到规定数量，政府就不再发给，不足可由政府补足，桑田有余可卖，不足也可买。



永固陵石券门

北魏

1976年山西大同发掘

门楣长224厘米，宽50厘米，厚19厘米；门框长168厘米，宽22厘米，厚22厘米；门墩高30厘米，宽41厘米，长45厘米

永固陵是北魏文成帝皇后冯氏的陵墓，在今山西大同以北25公里。

北魏政府推行均田令的目的是与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使逃户自立，使隐户脱离宗主。要推行均田令，必须从整理户籍入手。486年，北魏建立三长制。此前，北魏实行的是宗主督护制，一户往往有几十户，户主即宗主。这是不正常的情况，国家的民户大量被大姓隐藏，而被荫户也只是获得了所谓的人身保障，自身权益受到很大侵害，一切惟宗主利益是从，而且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及劳役。同时，人口被隐藏，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

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邻、里、党长归属州郡县政府。这样就把农户置于政府管辖之下，强宗大族庇隐户口和侵吞国家租调的情况有所改善。

在建立三长制的同时，北魏还颁布了新的租调制。此前，北魏实行九品混通，平均

的数额是每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这已高于前代的赋税，而前代赋税的量对一般农民家庭来说已是致贫的重要原因。实行俸禄制后每户又增加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不久又增加二匹帛。兼之户口不清，有隐匿人口，落实到百姓头上的赋税就又重一等。孝文帝的新户调制规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没有娶妻者四人出一夫一妻缴纳的数量；奴婢能耕织的八人缴纳未娶妻的丁男四人的数量；耕牛二十头缴纳奴婢八人的数量。这使百姓负担比过去减少了十多倍。

北魏规定，男性十五岁至七十岁要服劳役，缴纳赋税，十一岁至十五岁男性为半夫，缴纳和承担一半的赋税劳役。劳役时间不详，但有四十天或三十五天一轮的实例。北魏服劳役年龄范围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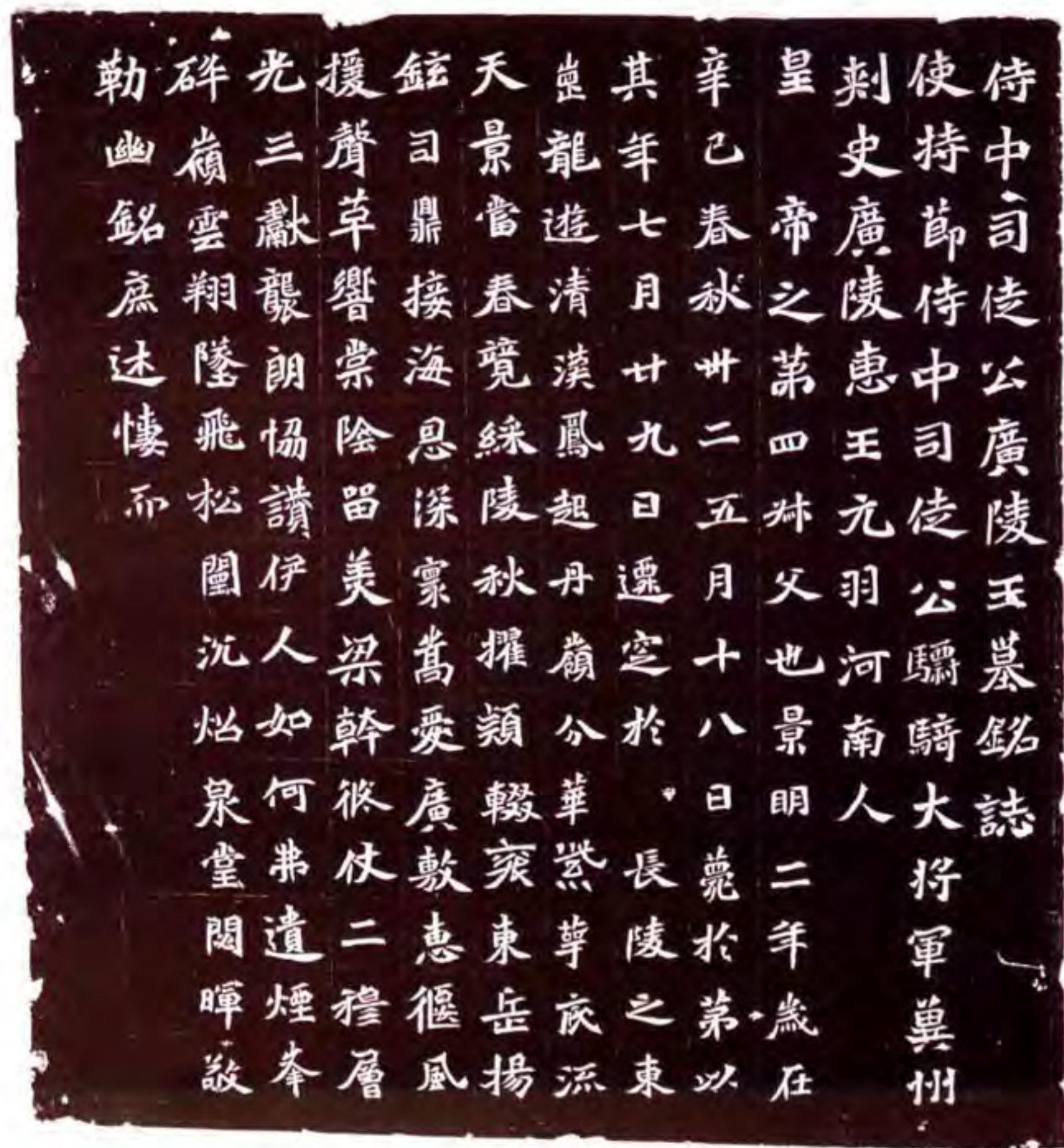
新的租调制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不同于以大户为征收单位的旧租调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畸轻畸重的租调负担，也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

490年，孝文帝为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进一步推行改革和汉化，决定迁都洛阳。当时的魏都平城地处边塞，对控制中原地区和推行改革十分不便。同时，北魏与南朝的战和关系已成为这时的要务。平城还发生过粮荒，而洛阳是汉族文化中心所在，从各方面来看迁都都势在必行。

孝文帝顾虑迁都会遭到多数鲜卑上层反对，于是以南伐为名实施迁都计划。493年，他出动三十万大军到了洛阳，当再要南进时，秋雨连绵，不利行军，随行大臣跪在孝文帝马前劝阻南行，于是孝文帝答应不再南进，但要迁都，大臣只好同意。北魏开始了营建洛阳的工作。

孝文帝在迁都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皇室成

元羽墓志



员的拥护，其中广陵王拓跋羽起了重要作用。拓跋羽是孝文帝之弟，当时为侍中、太子太保、尚书左仆射。孝文帝南行，拓跋羽与太尉拓跋丕在平城留守。许多鲜卑人对迁都不理解，由于有拓跋羽的镇抚，平城一带保持了肃然的秩序，得到了孝文帝的称赞。

495年，孝文帝发布命令，规定禁止穿鲜卑服装，改穿汉式服装；禁止说鲜卑话，改说洛阳话，三十岁以上的人因为积习已久，可逐渐改变语言，三十岁以下的在朝廷之人如仍说鲜卑话则降爵罢官；还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河南，不能回平城安葬，同时迁洛的鲜卑人籍贯也改成洛阳。

496年，孝文帝下令改鲜卑姓为汉姓。皇

室拓跋氏的拓意为土，跋意为后，后是君主之意，土是万物之始，故改姓元。鲜卑贵族中的拔拔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为叔孙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赖氏改为贺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还有许多鲜卑姓氏也改成了汉姓。

孝文帝的改革使北朝官员开始注重文化修养，崇尚清谈、好论文学之风与南朝不相上下。南北朝在战争较少的时期，有一些使节往还，会面多是礼节性的，交谈应对的话题不关涉政治、军事、经济情况，所炫耀和看重的是文化、人物还有机辩。双方都企图通过文化上的较量来体现自己的优越。

在孝文帝时，与南齐断绝多年的使节往



镇墓陶兽

北魏

1965年河南洛阳元邵墓出土
高25.5厘米

自西晋时开始流行在墓内置
镇墓兽。

文吏陶俑（左）

北魏
1965年河南洛阳元邵墓出土
高17.7厘米



文官陶俑（右）

北朝
1948河北景县出土
高27.3厘米



来开始恢复。南朝派来的使节是刘缵，北魏则以李安世为主客令。李举止得体，相貌俊美，刘缵等人赞叹：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当时南北和好，彼此往来，都要夸耀人才，接待对方使者的人选都用心选拔，没有才能门第的人无缘此事。每当有梁朝使节到邺城，高门名流子弟都盛装聚集前来观瞻，并送上优厚的礼物。宴谈时，东魏执政的高欢常派人观察，东魏方面有一句话占了上风，高欢都要鼓掌。东魏的使节到建康，场面也是如此，成为一时盛事。

三、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

北魏末年，社会矛盾尖锐，在北边六镇

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

北魏初年，为了防备北方的柔然南下和镇压被征服的少数民族的反抗，在东起赤城（今河北赤城）西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一带修筑了两千余里的长城，并在沿边要害之处设立军事据点，有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西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北）、武川镇（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怀荒镇（今河北张家口北）等六镇。由于边镇防务非常重要，镇将都是选择亲信的鲜卑贵族担任，镇兵也多是征发鲜卑人或中原“强宗子弟”充当。他们受政府重视，享有特殊地位。

孝文帝迁都后，北魏政治中心南移，文化上实行汉化，六镇官兵地位下降，一些六

镇官员往往由德才低下的人出任，士兵多由俘虏和谪配的罪犯充当。镇将只顾聚敛，威逼属内懂金属手工艺及农艺的人员辛苦劳作，派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到深山伐木或耕作贩运，报酬微薄，不少人饥病而死。

北魏以文化治国后，没有及时考虑提高六镇人的文化及其他入仕途径，而六镇人与一般州郡的人地位不同，不得外出拜师求学，因而影响了仕途，由此在门第婚姻上也大受影响，积累了不满，六镇某些官员的贪污腐败，也成为事件的导火索。

边镇地区还居住着一些被北魏征服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受到北魏政府和镇将的奴役，一直潜伏着反抗的火种。

北魏社会的各种矛盾在边镇地区都有反映。一方是北魏政府和鲜卑贵族，另一方则是边镇的人民、士兵和少数民族。

523年，柔然统治者那环率三十万众进入塞内，掠夺人口牲畜北去，柔玄、怀荒等镇遭受很大损失。怀荒镇兵要求镇将于景发给仓粮，遭到拒绝，愤怒的群众杀死于景，起兵反魏。不久，沃野镇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占领沃野，起义军南下，包围怀朔，完全控制了六镇。524年，高平镇人推敕勒渠帅胡琛为首领，起义斗争达两年之久，震撼了北魏王朝，最后，北魏统治者借柔然的力量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北魏把起义的镇民迁到冀、定、瀛三州。

六镇起义鼓舞了关陇地区的各族人民。524年，秦州（今甘肃天水）人薛珍等杀州刺史，推羌人莫折太提为首领，举行起义。太提病死后，子莫折念生继续领导战斗，屡败魏军。起义军越过长安，占领潼关，直逼京

师洛阳。北魏统治者采用武力镇压和招抚分化双管齐下的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不久，敕勒族的万俟丑奴被推为起义军领袖，领导起义军很快攻下东秦州（今陕西黄陵）和邻州（今甘肃宁县）。528年，建立政权。次年又围攻岐州（今陕西凤翔），在这里与北魏大将尔朱天光激战，后被魏军击败，万俟丑奴牺牲。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给北魏王朝以沉重打击。

525年，原柔玄镇兵杜洛周率六镇降户在上谷（今北京延庆）起义。不久，攻下幽州（今北京）、定州（今河北定州）、瀛州（今河北河间），声势日盛。526年1月，原怀朔镇兵鲜于修礼率六镇降户在左人城起义。他牺牲后，葛荣领导这支起义军继续战斗。529年9月，葛荣杀死北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国号齐。接着，起义部队连克殷州（今河北内丘东北）和冀州（今河北冀县）。起义军发展迅速，杜、葛两起义军近百万人，占领了河北大片土地，毁掉了大量地主坞壁，形势大好。但不幸起义军内部发生矛盾，葛荣杀死杜洛周，起义队伍分裂，削弱了战斗力，统治者乘机镇压，葛荣被俘牺牲。后来，起义军在韩楼领导下，又重新占领幽州，给北魏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北魏末年的三大起义，前后延续八年之久，风暴席卷今内蒙古、河北、陕西、甘肃广大地区，起义队伍中有汉、匈奴、鲜卑、氐、羌、敕勒等各族人民，他们在共同反抗北魏统治者的斗争中加深了融合。他们的英勇斗争使门阀士族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北魏政权再也无力维持下去了。

第五章

北魏之后的东西分立



北魏末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人民起义不断，加速了北魏政权的瓦解。534年，高欢立元善见为皇帝，都邺城，史称东魏。宇文泰立元宝炬为皇帝，都长安，史称西魏。550年，高欢子高洋废元善见，自己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557年，宇文泰子宇文觉废元宝炬而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

东魏、北齐虽然据有人口众多，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但这一地区土地兼并激烈，再加上皇帝的奢侈暴虐，官吏的贪污腐化，穷苦农民不断逃亡，北齐实力日衰。

西魏地处关中，宇文泰勤于朝政，继续实行均田，建立府兵制，使西魏拥有一支较强的军队。在西魏实力渐强的基础上，周武帝宇文邕又兴修水利，开辟农田，释放官私奴婢，禁佛、道二教。这些改革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北周在政治、经济上都日益

强盛。577年，周灭齐。

北周统一北方不久，军政大权落入外戚杨坚手中，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589年，隋军南下灭陈，三国两晋南北朝绵延几百年的分裂局面至此结束。

第一节 从北魏到东西魏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鲜卑贵族和汉族豪门地主在各族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受到猛烈冲击，促使北魏政权迅速瓦解，北魏的军政大权落入契胡贵族尔朱荣手中。

尔朱氏世代为秀容川（今山西朔县西北）契胡酋长。六镇起义时，尔朱荣看到北魏政权的衰落，便凭借自己的巨大财力招兵

买马，积极扩充力量。各地豪强地主，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尔朱荣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逐步在北魏政权内部取得了重要地位。528年，魏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三岁的宗室元钊被立为幼主。尔朱荣借口替孝明帝报仇，率兵进攻洛阳。尔朱荣进入洛阳后，迎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并把胡太后和幼主投入黄河，又杀死北魏的王公卿士两千余人。孝庄帝不甘心做傀儡，利用朝见的机会杀死尔朱荣。尔朱荣从子尔朱兆攻入洛阳，杀孝庄帝，立

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尔朱家族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统治极为残暴。尔朱荣的部将高欢曾向尔朱荣建议，对六镇余众不能只依靠武力镇压，而要分化瓦解，进一步收编。后来，高欢把收编的六镇余众带到山东，在当地汉族地主的支持下，势力很快壮大。531年，高欢起兵消灭了潼关以东的尔朱氏势力，杀元恭，另立元脩为帝，是为孝武帝。于是北魏政权由尔朱氏之手转移到高欢手中。

史书记载，高欢是渤海郡人，六世祖是西晋的太守，以后几代为前燕及北魏政权效



牛头鹿角形金饰件

北朝

1981年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出土

高17.5厘米，重90克

这是鲜卑族上层贵族的冠饰，名“步摇”。



马头鹿角形金饰件

北朝

1981年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出土

高16.2厘米，重90克

步摇多以兽形为饰，有辟邪之意，又象征祥瑞。

力。高欢祖父因犯法被迁徙到怀朔镇，世居于此，到高欢时，生活习惯、语言、意识已与鲜卑人同化，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欢的鲜卑名为贺六浑。高欢性格深沉，器度雄大，许多人知道他不是一般人，都与他结交。

高欢起初在怀朔镇当队主、函使等下级职务，后参加到杜洛周的起义军中，又因对杜洛周不满而逃跑，投入尔朱荣军中。尔朱荣对高欢十分欣赏，经常让高欢参与军事谋划，后来还让高欢当晋州刺史。尔朱荣死，高欢认为尔朱兆率兵攻洛阳是以下犯上，有了消灭尔朱兆的意思。

当时，流入并州、肆州的六镇失败军民有二十多万，被契胡人欺压而不断举兵。尔朱兆感到麻烦，问高欢怎么办，高欢说应派人去统领控制。有人推荐高欢出任这个职务，尔朱兆同意。六镇流民平时讨厌尔朱荣，这时乐于接受高欢的统领。因为饥荒，高欢请求率领这些人去山东求生，尔朱兆同意。高欢由此摆脱了尔朱兆的控制。

531年，高欢开始反对尔朱氏，攻杀了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立元朗为北魏皇帝，自称丞相，打败了尔朱兆军，攻占邺城。532年，尔朱氏二十万大军与高欢三万军在邺城韩陵山会战，尔朱氏大败，一些尔朱氏的大将倒向高欢。高欢进入洛阳，废杀尔朱氏立的皇帝元恭及自己立的元朗，立元脩为帝，自己任大丞相，控制了北魏政权。532年，高欢攻克尔朱氏老巢晋阳，尔朱兆自杀。

元脩不甘心受高欢控制，准备调各地军队进攻高欢。高欢出兵二十万，讨伐元脩在各地的力量，元脩投奔关中的宇文泰。534年，高欢又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从这年开始的高欢所建立的魏朝，史称东魏。535年，宇文泰进入关中，建立了另一个魏政权，史称西魏，北魏政权终结。

第二节 从东魏到北齐

高欢所依靠的对象是边镇的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这些人帮助高欢夺取政权，成为了勋贵集团。为了争取这些人的支持，高欢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满足他们的要求，在他的纵容下，许多鲜卑贵族肆无忌惮地贪污敛财。

高欢不仅培植了一个新贵集团，而且大力推行鲜卑化政策。鲜卑话重新成为通用语言，一些汉族士大夫为了获得高官厚禄，也让子弟学习鲜卑语。

高欢知道，仅仅依靠鲜卑贵族及其军队并不能巩固他的统治，因此在满足鲜卑贵族利益的同时，又尽量拉拢汉族的豪强地主。高欢政权就是建立在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地主相互利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的，并以此来缓和民族矛盾，实现他的统一事业。高欢政权的骨干及军队以六镇鲜卑及其他少数民族为主，这些人有强烈的反汉倾向。但高欢本人认识到了汉族人的重要性，为了统治需要，高欢也吸收了一些汉族人进入政权，甚至与汉族大族联姻。高欢对鲜卑人说：“汉人是你们的奴婢，男为你种地，女为你织布，为什么要欺负他们？”又对汉人说：“鲜卑人是你们的部曲，得了你一斛粟、一匹绢，就为你们抗击敌人，为什么恨他们？”

东魏政治恶劣，官吏贪贿，盘剥百姓，使得许多人投到豪强门下，对此高欢并不多过问。郎中杜弼劝高欢加以治理，高欢说，这种情形出现已经很久，现在部队军官家属多在关中，宇文泰经常以此引诱这些军官，人心不定，而江东的萧衍专门从事文化事业，被汉族士大夫认为是正统。要是我治理太严，武将就会西去，士大夫就会南投，我们

如何立国？

高欢因洛阳西近西魏，南邻梁境，易受攻击，故决定迁都邺城。

东魏和西魏连年交战。537年，关中大饥荒，死者十之七八，东魏军在高欢的督帅下分三路伐西魏。在蒲坂，东魏军造了三座浮桥。宇文泰认为这是做出渡黄河的样子牵制自己，目的是使东魏大都督窦泰所率的军队得以西进；又认为窦泰总是作为前锋打仗，是常胜将军，且所率都是精锐部队，必然产生骄矜心理，可先予攻击。于是宇文泰声言要保陇右，暗中则进军小关，窦泰渡黄河迎战，不料在泥淖地区被西魏军伏击，该路一万多东魏军死伤大半，窦泰负伤自杀。高欢军退兵。

不久，宇文泰率军一万向东魏地区进攻，高欢出兵二十万迎战，宇文泰连忙退入关中。有人向高欢建议说：关中连年饥荒，所以宇文泰来进攻，企图夺取仓库里的粮食。现在司徒高敖曹已率军包围恒农，宇文泰已无法得到粮食，只要不出兵，等一段时间，其军民都会饿死。

高欢不听劝阻，要渡过黄河与西魏军交战。西魏将领认为东魏太盛，要等高欢更向西进后再伺机交战。而宇文泰认为，高欢要是到了长安，关中就会人心混乱，应趁东魏军远道新来之机给予打击。西魏军于是渡过渭河，进军至沙苑。仪同李弼建议，敌众我寡，不可在平原地区设置军阵，可埋伏在渭曲。宇文泰依计令李弼、赵贵分左右埋伏在渭河边的芦苇中。

东魏都督斛律羌举认为，宇文泰率全部兵员而来，要决一死战，犹如疯狗能够吃人，且渭河边芦苇深地上泥泞，无法用力，不如与西魏军相持，派军直取长安，可打败西魏军。高欢说：“纵火焚烧芦苇如何？”南道行

台侯景说：“当生擒宇文泰以示百姓，要是烧死，谁能相信。”有的将军意气高昂，请求战斗，认为我众敌寡，何忧不克。高欢同意。

东魏军见西魏军人数少，争相前进，队伍不成行列。宇文泰击鼓，西魏士兵奋起，仪同于谨等六军合战，李弼所率骑兵冲出，将东魏军断为两截。东魏军大溃，损失八万人。西魏军乘胜东进，取得了黄河以南的一些地区。侯景撤退时纵火焚烧洛阳，洛阳建筑大都被毁。

538年，东魏出兵夺取失地，宇文泰与侯景军在洛阳的黄河一带战斗，宇文泰座马中箭，西魏军先失一阵。侯景不加准备，西魏军随即杀回，东魏军溃散，死伤被俘二万多人，东魏大将高敖曹被杀。东魏大军继续战斗，西魏军阵过于庞大，首尾不能相顾，只好败退。

543年，宇文泰东进，高欢率十万军迎敌，驻扎在洛阳邙山。宇文泰试图偷袭东魏军，高欢已预先得知，西魏军一到就被东魏骑兵冲杀溃散。东魏军连续追击，西魏士兵死亡三万人。第二天，西魏军再与东魏军战，中路的宇文泰、右路的领军将军若干惠大破东魏军，俘虏全部东魏步兵。而左路的中山公赵贵失利，东魏军重新振作，宇文泰兵败而退。

546年，东魏军攻西魏，双方在玉壁交战。玉壁城内西魏守将韦孝宽坚守不出，东魏军不惜一切昼夜猛攻。东魏军在城南筑土山，挖地道十余条。西魏军则与之相对，在城内筑起高于土山的高楼，再挖长壕与东魏军地道相通，在地道中放火。东魏军用冲车攻城，西魏军就用大幅布幔罩住冲车，使其无法施展。东魏军用长杆加松麻油脂点火烧布幔、高楼，西魏军则用长钩刀割去杆上的松麻。东魏军又在城下挖地道二十条，地道

中先用木梁柱支撑，然后放火烧毁梁柱，打算使地道崩塌，城墙也随之塌陷。西魏军立即用木料在塌陷处树立栅栏，东魏军无法进城。东魏军连攻五十多天，没有效果，士兵阵亡病死七万人，高欢也因此得病，只好撤兵。

548年，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都督刘丰生率军十万进攻西魏大将王思政守卫的颍川，几次进攻不能奏效。高澄派军支援高岳等，一年多仍不能攻克。刘丰生建议在河上筑堰用水灌城。大片地区淹水，西魏援兵无法到位。城墙快要被泡塌时，慕容绍宗与刘丰生乘船前往观察，遇到大风，船被吹向城的方向。城上西魏军钩住船，用箭乱射，慕容绍宗跳水而死，刘丰生被射死。

高欢子高澄欲建立功业，亲率十万军队进攻颍川附近的长社，也是在河上筑堰，准备用水灌城，筑了三次不能成功。高澄发怒，把背土的人连同黄土一起推下去塞堰。长社城中缺乏食盐，人得浮肿病，十之八九的人死亡，城墙也毁坏，西魏军移到土山上抵抗。高澄派人劝降，王思政投降。

东魏多年对西魏及南朝战争，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士兵大量死伤，河南的郡县许多百姓饿死，社会财产消耗很大。

东魏政权实际是高家的政权，元氏徒有虚名。鲜卑卫士跟随魏帝到邺城的不满万人，其余六镇鲜卑士兵都迁到晋阳。都城在邺城，而高欢则以几百里外的晋阳为政治中心进行遥控。535年，东魏把洛阳的一些宫殿拆毁，把材料运到邺城建宫殿。

东魏政权面临的诸多政治上的问题，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很难彻底解决，使东魏政权有着致命的弱点。以后，高欢以其子高澄代管吏部尚书事，又领中书监，执掌中央政务，意图改变吏治。高澄改

变了北魏末年以来的按年资任命官员的做法，选拔有能力之人，起用了几个汉族官员。凡是有才有名气的人，即使没有条件任职，也招到门下，一起游宴、谈论，士大夫对此都加以称赞。

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是高欢的亲党，掌管政务，在邺城称为四贵。四贵权力既大，就产生了专权、骄横、贪污等问题，导致高欢打算削弱几人的权力。太保孙腾在会见高澄时礼节有缺，高澄命人将其从坐床上拉下，用刀把击打，又罚站门外。

高欢、高澄为了整肃官员贪污的问题，



武士陶俑

北朝

1948年河北景县出土

此俑上身穿小袖、大开领服装，属典型的鲜卑风格。



镶嵌红宝石金面具

南北朝

1997年新疆昭苏出土

这是突厥贵族死后覆盖面部的用具。

派宋游道任尚书左丞、崔暹为御史中尉，专门主管此事。崔暹弹劾尚书令司马子如，太师、咸阳王元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宋游道也弹劾司马子如、元坦及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羨。高澄逮捕司马子如，司马子如一夜白头。高欢为司马子如求情，高澄把他释放，但把几个人都免官，还有不少人被免官处死。高欢告诫官员：“咸阳王、司马令皆吾布衣时旧人，尊亲不过二人，吾不能救，诸君共慎之。”

高欢于547年病死。高欢整天都是一种俨然的表情，人们看不透他；在关键时刻，变化如神；统领军队法令严肃；对于人和事都能准确判断，没有人能欺骗他；选拔官员重视才能，不问出身，对于徒有虚名的人一概不用，但也维护旧人、功臣，文武官员乐于

为他出力。

高欢死后，高澄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继承了高欢的权力。高澄忌讳其弟高洋，高洋就约束自己的言行，对高澄言听计从，使高澄产生了轻视之心。549年，高澄被膳奴杀死，高洋继承权力。550年，高洋废黜东魏皇帝，自己称帝，建立齐朝。

高洋少有大度，沉稳机敏，明智果敢，有决断。高欢曾让幼年的儿子们解乱丝，借此观察他们的思维，高洋抽刀断丝，说：“乱者必斩！”高洋外表看上去好像不聪明，兄弟及一些人都看不起他，却很受高欢器重。高洋喜欢公务，终日处理难事烦事也不觉疲劳。

高洋执政初期有过一些善政，如改革苛刻的法律，精简政务，减少地方州郡县数量，裁减冗员，制止贪污，严禁徇私枉法，任用贤能等。他对于国家政务或军事作战都能自己决断，每次打仗都要亲临阵中，不畏飞石乱箭、刀枪锋刃，所以在极艰难的战斗中也能够取胜。

553年，高洋率兵亲征契丹，俘获契丹人十多万口、牲畜几百万头。

当时北方草原的另一强大游牧民族是突厥。突厥族先是附属于柔然，东魏末年，其首领伊利可汗大破铁勒，降服五万多家，向柔然主阿那环请求通婚，阿那环不准，并派人大骂之；西魏则与突厥互相派遣使节，有了初步关系。550年，突厥向西魏请求通婚，魏文帝将女儿长乐公主嫁给伊利可汗，这样突厥就与西魏结成了同盟。突厥进攻柔然，在怀荒镇北大破柔然，阿那环自杀，柔然举国投奔北齐。高洋征突厥，突厥请降。伊利可汗之子乙息记可汗继位，在沃野镇北打败柔然。其后的木杆可汗东征西讨，再次率兵打败柔然，又在西面攻破哒部，东面赶走

契丹部，北面吞并契骨部，控制的地域东起辽海，西至西海，南面到沙漠北缘，北面到今贝加尔湖，东西长一万里，南北跨五六千里。突厥又与西魏、北周一起进攻北齐，曾发兵十万骑进攻北齐晋阳城。木杆可汗死，佗钵可汗继位，派尔伏可汗统治东部，步离可汗统治西面。北齐畏惧突厥的强盛，给其大量资财以求平安。北周每年也给突厥高级丝织品十万段。北齐灭亡后，突厥立逃亡的齐范阳王高绍义为齐帝，581年进入幽州，打败北周柱国将军刘雄。进入隋唐以后，突厥仍是北方草原上的强大民族。

553年，高洋讨伐石楼的山胡，大获全胜，山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都被斩首，女子及幼儿都赏赐给军人。石楼地势险要，一直难以进攻，到这时，其他地方的山胡也都被威慑归附。

到了后期，高洋认为有了功业，就纵欲纵酒。他的神经似乎出现了问题，常自己敲鼓起舞，歌唱不止，通宵达旦，以夜续昼；还袒露身体，涂脂抹粉，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要不就拔刀张弓在市场游荡，或早晚驾临有功大臣的家里；又骑骆驼牛驴，不用缰绳，不管炎夏隆冬，脱衣驰骋，随从的人都不好意思；又喜欢杀戮，北魏宗室的成员都被他杀死，一些大臣也被杀害，还要把杀死的人肢解或用火焚烧、投入水中。

高洋到晚年精神越加失常，总说见到了鬼，或说听见了怪声，跟谁有了一点别扭，必定要杀死他，还要自己杀人，作为娱乐；又有许多营建的事，如征发三十万人扩建邺城三台的宫殿，木作就高二十七丈；又在北面筑长城三千里，还有几百里是双重修筑，其中幽州到恒州九百里的一段就征发了一百八十八万人；又与南面的陈霸先征战，人和马匹死去的有几十万，百姓劳役十分繁重。

高洋当政时，一些汉族官员取得了地位，这是此前高洋之兄高澄执政时重视官员才能和文化水平的结果。同时，高洋之妻李氏是汉人，李氏所生子高殷成为太子。高洋死前，担心弟弟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会威胁太子高殷，命汉族官员尚书令杨愔、侍中燕子献、黄门侍郎郑子默与鲜卑人平秦王高归彦共同辅政。这引起了一些鲜卑人的不满，高洋就杀了轻视鲜卑人的杜弼加以安抚，但不能解决问题。不久，汉族官员与鲜



女陶俑

北朝

1948年河北景县出土

高23厘米

此俑作武士形象，头戴风帽，身披风衣，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



彩绘甲骑具装陶俑
北齐
1987年河北磁县出土

卑贵族间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权争。

560年，高洋死，燕子献建议让太皇太后、高欢之妻、鲜卑人匹娄氏居北宫，而国政归于皇太后李氏；辅政的几人又鉴于近年封爵太多太滥，杨愔先解除了自己的王爵，一些投机讨好被封的人也被解除了爵位，于是这些人都投靠高演、高湛。杨愔打算分散两王在中央的权力，向皇太后李氏陈述安危。有人向匹娄太皇太后报告这些事，匹娄太皇太后因与高演、高湛共谋，准备除去杨愔等人。

不久，高湛被外封为并州刺史，高演为

录尚书事。两王以此为由，在尚书省与百官聚会。杨愔等人应邀前往，高湛在家埋伏了家奴几十人，在劝酒时将杨愔等擒获，家奴拳杖俱下，乱加殴打，杨愔等人血流满面。

杨愔被送到匹娄氏宫中，李氏及皇帝高殷在一侧站立。匹娄氏问杨郎何在，有人答：“一眼已被打出。”匹娄氏指责高殷：“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儿，次及我，为何纵容？”高殷说不出话。匹娄氏悲愤，在场的王公都流下眼泪。匹娄氏又说：“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姬斟酌。”李氏谢罪，高演仍向匹娄氏叩头不止，以示求助。匹娄氏对高殷说：“何不安慰尔叔。”高殷只好说：“天子亦不敢舍弃叔叔，岂敢怜惜此汉辈，但愿乞儿性命，儿自下殿去，这些人任叔父处分。”杨愔等人都被斩，高湛因郑子默曾说自己的坏话，把郑的舌头拔去，又砍掉双手。高殷被废黜，高演即位，为孝昭帝。高演死，弟高湛继位，为武成帝，鲜卑贵族势力更加强盛。

高湛担心自己有祸，便让位给儿子高纬，是为后主，自己做了太上皇。高湛、高纬即位以来，北周几次大规模进攻北齐，但齐军尚有较强实力应付。564年，北周柱国将军尉迟迥率十万军进攻洛阳，起土山、挖地道向城内发动攻击，一月无效。北周军以为齐军不敢出城交战，不作多少防备。然而北齐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斛律光、并州刺史段韶率兵来救，北周军没有料到，因而有些害怕，齐军进攻，周军大败。

这时候，北齐负责与北周对峙的主帅是左丞相斛律光和太宰段韶以及兰陵王高长恭。斛律光在齐周边境筑十三座城，使周军不能有进展。段韶有谋略，能够使将士拼命为他打仗，多次打败周军，但不久死去。斛律光官位很高，但生活节俭，不喜欢音乐女色、宾客往来，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不贪

权势。他虽不识字，但在朝廷的言论总是很有道理。其父斛律金也是名将，斛律光模仿父亲的行军设营之法，营舍没有设置好自己也不入营休息，有时整天不得坐，铠甲头盔总不脱下，经常在士兵前面行动，士兵有罪，最多是用棍击背，不随便杀士兵，所以士兵都争着为他效死。斛律光自从加入军队以来，未曾打过败仗，敌国极为害怕。

北周东面的主帅韦孝宽于是设离间计。他命人在邺城散布谣言：“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榑树不扶自举。”容量一百升是一斛，斛律光字明月。高山自然指皇室，榑树则指斛律光，意指斛律光会取代高氏。街头小儿广为传唱。斛律光一向反对的尚书左仆射祖珽是个佞人，这时也编出歌谣续在后面：“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祖珽是盲人，说自己受着威胁；饶舌老母指女侍中陆令萱，是与祖珽互相利用吹捧之人，祖珽说陆“自女娲以来，未之有也”，陆称祖为“国师”、“国宝”。斛律光之弟斛律羡是幽州刺史，也善于治兵；斛律光之子斛律武都是梁州、兖州刺史。斛律光在西线时，将士有功者还没有得到赏赐，朝廷就下令解散。斛律光一方面上表要求赏赐，一方面仍然向邺城行军。高纬听到谣言，极为不快，这时联系起斛律光过去的种种行为，认定斛律光要谋反，于是召斛律光进见而杀之。北周皇帝听说斛律光死，高兴得大赦犯人。

高长恭当年在洛阳邙山大破北周军，极为勇敢，士兵作《兰陵王入阵曲》歌颂他，高纬对他极为忌讳。高长恭意识到这一点，在接替段韶以后就聚敛钱财，故意毁坏自己的名声。当陈朝进攻北齐时，担心自己被任命为将，叹道：“我去年脸肿，今何不发。”从此有病不治，但也未逃脱厄运，被高纬派人

毒死。

后来，汉族与鲜卑官员又进行了一场内斗。冯子综利用高纬弟高俨杀执政弄权的和士开，高纬任用汉族人祖珽、薛道衡、颜之推等人执掌中央政务。祖珽劝高纬杀了解律光，又驱逐少数民族官员的力量，反而被少数民族官员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人排斥，穆提婆等人大杀汉官。经过几番权争及杀大将，北齐统治层实力大为削损。

东魏和北齐都颁布过均田令。564年，北齐规定：京师邺城三十里以内的土地，全部作为公田，按级别授给代迁户执事官一品以

彩绘按盾武将陶俑

北齐

1987年河北磁县出土



下至羽林各级官吏；在这范围之外的公田则授给与代迁户相应级别的汉官。普通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露田四十亩。又每丁给桑田二十亩为永业田，不宜种桑的地方给同等数量的麻田。奴婢依照良人受露田，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受田的农民从十八岁到六十六岁要输租调，二十岁到六十岁要服兵役和力役。均田农民要服兵役，说明北齐的正规军队需要由汉人来补充。东魏和北齐的大土地所有制比北魏有所发展，这表现在赏田的盛行。职分公田本不准买卖，到了东魏和北齐，公田加速私有化，除了有一定规定的公田赐与，还有无定额的随意赏赐。早在迁邺之初，北齐政权就把大量公田无定额赏给各级官僚贵族，听任他们买卖。

北齐赋税劳役原本是一般水平，规定：一夫一妻交绢一匹，绵八两，粮二石半，家有奴婢的每人按自由民的一半交纳，每头牛交绢二尺、粮一斗半。男性十八岁至六十岁服劳役。在550年，立九等户之制，把民户分为九等，富裕的人家以钱交税，贫穷的人家以劳役抵税。但到后期，武成帝及后主大量消耗资财，后主的后宫女性衣食奢侈，一条裙子可值一万匹绢。又大量地建造宫殿花园，不久腻烦了，即毁坏旧宫造新宫，工人没有休息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赋税徭役加重，政府库藏空虚。一些佞人执政，他们的亲信都得以卖官，郡县职能部门的主管官吏往往是富商大贾，这些人在任上贪赃，北齐官民矛盾激化，多有农民起义，北齐国力由

陶牛车

北齐

1955年山西太原出土

车高31.2厘米，牛高23.2厘米

牛车是此时贵族出行的常用车。



强变弱。

573年，陈朝挥军十万北伐，自长江以北到淮河一带，北齐城池多被攻破，更多的是一座接一座地投降，北齐实力进一步削弱。577年，北齐被北周灭亡。

北朝是一个鲜卑族对汉族政治势力和文化既吸收利用又争较高下的时期，但汉族制度及文化毕竟给了鲜卑政权以很大的帮助，也同时对鲜卑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乘坐牛车本是汉族人的习惯，特别是汉族官员普遍乘坐。在西晋，诸王三公有勋德者特加皂轮四牛车；驾牛的油幢车，是王公大臣有勋德者特给；驾牛的云母车，用以赏赐王公；而诸王三公都乘坐驾牛的通幃车。南朝齐梁时期，二千石四品以上官员及列侯都给驾牛的轺车。这种乘牛车的制度影响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北朝从北魏开始，鲜卑官员也把牛车作为出行工具，以至于在很正式的出行仪仗行列中也使用牛车。到北魏明帝时形成制度，庶姓王侯及尚书令、仆以下、列卿以上给驾马轺车，或乘牛车；正、从一品官及仪同三司至七品官都乘牛车。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的这一制度。北魏时，主管匡正官员违法乱纪的御史中丞驾车出行时，路上乘车行走的王公见到，都要远远停车，把驾车的牛卸下，把车轭放在地上，等中丞的车过去后才能驾上车继续行走，要是动作迟缓，为中丞开道的吏卒就会用红色大棒击打那些车辆，东魏时废除此制。

北朝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牛车模型，一般都是一牛驾车，车身有乘人的屋形车厢，顶为拱顶或平顶。牛车行走较慢，但能负重，而且安稳，这本属于汉族的行为风格，一向在马背上疾驰行走的鲜卑人由此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第三节 从西魏到北周

宇文泰原是武川镇人，祖先出自匈奴的一个部族，以后迁到辽西。东汉末年，宇文部族加入鲜卑檀石槐的部落联盟，也成为鲜卑人。以后檀石槐被前燕所灭，宇文部首领宇文陵在前燕任职。前燕被北魏灭亡，宇文部的一些豪杰被北魏迁徙到武川镇，世居于此，崇尚武事。

破六韩拔陵起义，宇文泰之父宇文肱纠合乡里人杀死破六韩拔陵任命的一个王卫可孤，以后到中山避乱，被并入了鲜于修礼军中，后在与北魏军交战中阵亡。宇文泰随父在鲜于军中，葛荣杀鲜于修礼，任命宇文泰为将领。尔朱荣打败葛荣，宇文泰与葛荣军一起又成了尔朱荣部下，驻扎关中。魏孝武帝元脩想借助尔朱荣旧部、时为关中统帅的贺拔岳反对高欢，不料贺拔岳被倒向高欢的侯莫陈悦杀死，贺拔岳的部众推宇文泰为主，宇文泰控制了关中。535年，因孝武帝对其专权不满，宇文泰用毒酒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都城在长安，宇文泰为丞相，执掌了中外大权。

关陇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和汉族融合的程度较深，而宇文泰手下的边镇鲜卑人又不像高欢那样多。因此，宇文泰不得不大力争取汉族封建地主，特别是关陇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

西魏建立之初，力量薄弱，只有从关东带来的少数鲜卑兵，约三万人。542年，宇文泰仿周官六军之制，把原有的十二军改为六军。第二年，宇文泰与高欢在邙山会战失败，兵力损失很大，于是他“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不少汉族地主武装的乡兵，都并入六军之中。550年，宇文泰正式建立府兵制。

府兵制糅合了鲜卑的部落兵制和周官的六军之制，府兵的核心是入关的六镇鲜卑，但府兵制度下的士兵已经补充了众多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农民，高级将领则多为关陇豪强。

府兵制的具体内容是以八个柱国大将军为军队首领，每个柱国大将军统领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统领两个开府将军，每个开府将军下面有两个仪同，还有都督等军官，每个仪同率兵一千人。每支军队的官兵改姓该军的柱国大将军之姓，这样可以加强内部团结，官兵关系如同子弟。士兵不入地方户籍，也就不承担赋税劳役，减少了士兵家庭的负担。府兵制是仿效鲜卑部落制的兵制，但确实提高了西魏军队的战斗力。

宇文泰还改变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的做法，让鲜卑人重新改为鲜卑的复姓。宇文泰仿照鲜卑族早年的三十六个部落、九十九个大姓，把功高将军的姓氏改为三十六姓，功劳次一等的改为九十九姓。一些汉族官员也被赐予鲜卑姓。元氏重姓拓跋，柱国大将军李虎改姓大野，于景恢复为勿忸于，赵贵赐姓乙弗，苏桩赐姓贺兰，杨忠赐姓普六茹，李弼赐姓徒何。

西魏之初，宇文泰考虑到战争频繁，百姓极为疲惫穷乏，颁布二十四条新规，内容是禁止贪污，减少冗员，设立闾正、族正、保长，实行屯田，规定计账法、户籍法；又预先确定第二年对百姓的徭役数量，以使赋役数量较为合理。

以后，苏绰又制定了六条规定：一是清心神，二是敦教化，三是尽地利，四是擢贤良，五是恤狱讼，六是均赋役。宇文泰对此很重视，把它经常放置在座位右面，并下令官员要熟悉这些内容，还为此开设学校，令中下级官员学习这些内容，不知晓者及不知计账法者不能任职。不久又把六条扩展为十

二条。

宇文泰施行了一些善政，如对于法治，官员犯法也一样治罪，但要求治狱官吏慎重处罚，力戒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这在汉族官员那里都是少见的。宇文泰还废除了已在中国沿用了两千多年的宫刑。

宇文泰对官员的要求是以儒家学说对自身进行规范，要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又要能用儒家文化教化百姓。他在行台设立学校，中央各部门的丞、郎、僚佐等中级吏员凡是有德行又较为聪明的人都是白天办公，晚上学习，以提高这些人的道德文化素质，有利于以德治国。

宇文泰选拔官员不限资历门第，只要德才兼备，出身低的人也可以位居卿相，这就打破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的僵化的选官方法。宇文泰任命了一批贤能之士担任各级地方官，按照新规行政。西魏北周官员较少庸滥之辈，吏治较清明，见不到多少东魏北齐官吏贪贿的事例，而较多的是在政务及军事方面精干的官员，内部也较少权力之争。

在经济上，宇文泰也推行均田令。他把百姓服劳役的年龄从北魏的十五岁改成十八岁，丰收年份服役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中等收成年份不超过二十天，歉收年份不超过十天，而且每户服役人口为一人，这是大大少于以往各朝各代的。到北周时，实际服役为一年一个月，但每家仍是不多于一人，还是低于封建社会的一般水平。

宇文泰还对向百姓征收的绢的长度也做了规定，每四十尺为一匹，也大大少于历代政府的数量，同时抑制不法官吏的滥收，对增加百姓收入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到宇文泰死前，西魏仓廩充实。

宇文泰的措施加强了西魏政权的内部团结，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增强了国力及



加彩武官陶俑与文官陶俑

西魏

1977年陕西汉中出土

武官俑高40.2厘米，文官俑

高38.9厘米

二俑服饰具有“褒衣博带”的时代特征。

军队的战斗力。宇文泰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史书评价他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恩信对人，能驾驭英豪，与他有过一次接触的人，都愿为之效劳。沙苑之战俘虏的东魏军人，释放而后使用，在河桥之战中都能为他拼死作战。宇文泰还颇有作战方略，将领按照他授予的方案作战无不获胜。所以，在与东魏的历次战争中西魏能胜多败少，以弱胜强。宇文泰还崇尚俭朴，反对虚饰。

550年开始，西魏向南方的梁朝进攻，大将军杨忠取得了江陵以北地区，梁荆州刺史萧绎向西魏称臣。553年，西魏大将军尉迟

迴进攻梁朝的益州，梁人投降，川蜀归西魏所有。554年，西魏柱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率兵五万进攻江陵，先切断梁人的东逃之路，梁军在荆州城外树立木栅栏，周长六十里，魏军也在江陵城外构筑长围，梁军出城与魏军交战，都失败而归。魏军攻城，梁领军将军胡僧祐战死，梁军胆寒，有人从内部开栅门接应魏军，江陵陷落，梁元帝被处死，江陵官员及百姓十多人被迁徙到关中。

556年，宇文泰死，其侄宇文护辅政。557年，宇文护废黜西魏恭帝拓跋廓，立宇文泰之子宇文觉为天王，西魏灭亡，周朝建立，史称北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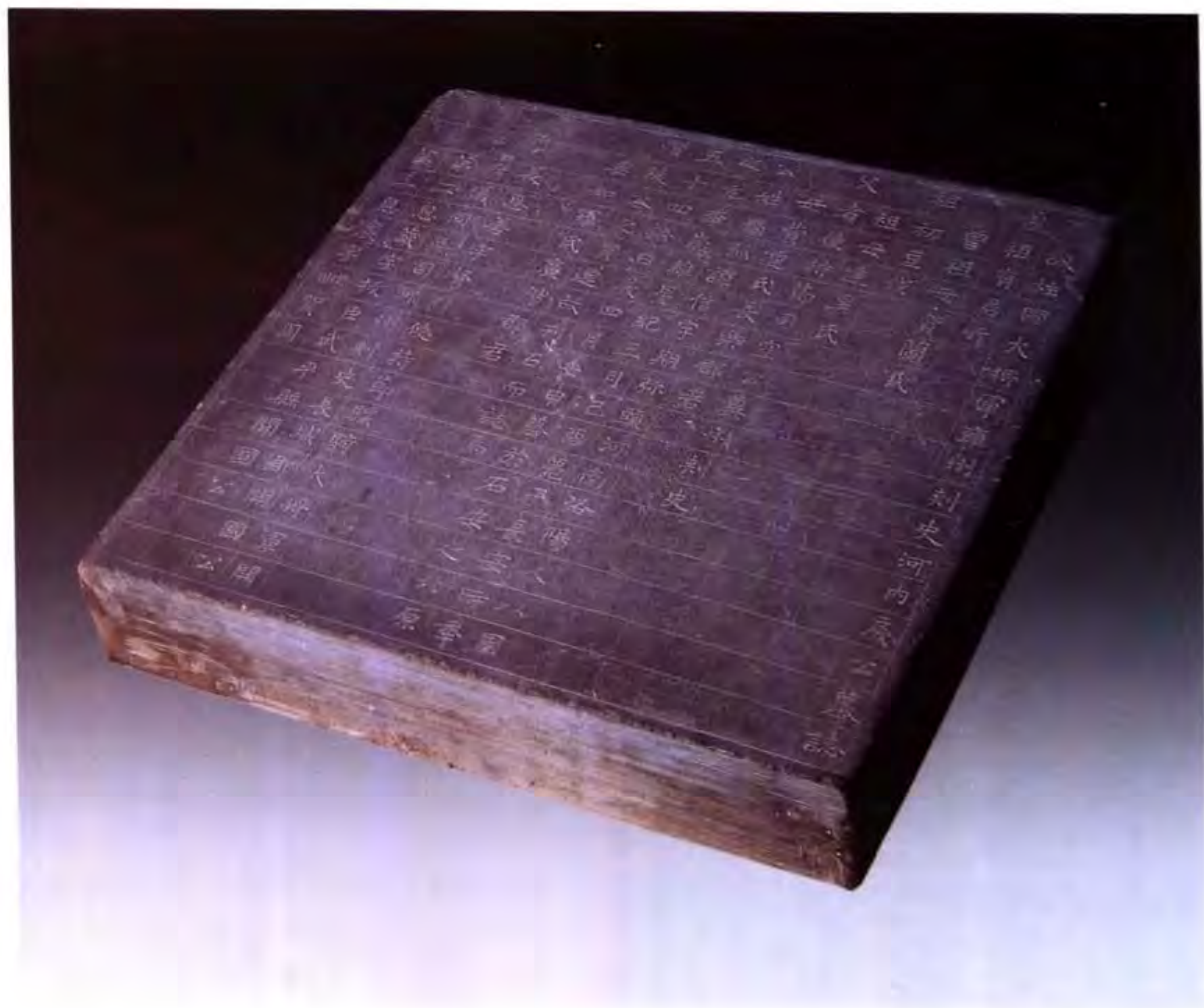
独孤信墓志

北周

1953年陕西咸阳出土

边长41厘米，厚7.4厘米

独孤信，鲜卑族人，是北周声名显赫的大将军。



宇文护为稳固自己的地位，杀宇文泰旧臣赵贵，令独孤信自杀，独揽大权。宇文觉不满宇文护专权，密谋除掉宇文护。宇文护知道后，先杀宇文觉，立宇文泰另一子宇文毓为天王，559年改称皇帝，是为明帝。560年，宇文护毒杀明帝，立宇文泰另一子宇文邕为帝，是为武帝。宇文邕于572年杀宇文护，结束其专权多年的局面。

北周的赋税是每个家庭每年交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而未婚娶的丁男即十八岁至五十九岁的单身男性交纳一半数量。没有土地的农民，有家庭的每个家庭交纳布一匹、麻十斤，无地的未婚丁男交纳一半。这是一般的赋税水平。其补充规定是：在丰年时交纳这个规定的全量，中等年成时交纳一半数量，下等年成则交纳一成，遇到家庭或个人有特别困难则不征收。这是优于历代赋税制度之处，对农民起到了一定的减轻负担

的作用，这也是北周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

周武帝还大量招募汉族农民充当府兵，改变府兵的鲜卑部落的组织形式。

北魏末年以来，寺院庇荫的人口占了国家户口的很大比例。周武帝接受建议，销毁佛像，勒令僧道还俗，并把寺观的财产分赐臣下。这一措施使北周政权获得了成百万的劳动力，不但扩大了征收赋税的对象，而且充实了府兵的来源。

东西力量对比方面原来是东强西弱。北齐高洋时，北周人担心东军来犯，每年冬天都要把黄河的冰凿破。到后来武成帝高湛时，北齐内部混乱，渐成弱势，每年冬天改为北齐人凿黄河之冰以防北周东进。

576年，周武帝看到北齐后主昏庸，百姓生活困苦，政局不稳，决定抓住机会灭齐。武帝率十四万军攻北齐平阳城，北齐晋州刺史投降，北周军队进入平阳。北齐出动十万精

兵包围平阳，北周八万大军在平阳城附近布防，两军沿一条壕沟对垒。北齐后主下令填壕前进，与北周军交战。北齐军一翼稍后退，北齐冯淑妃与城阳王穆提婆认为齐军败阵，建议后主退保高桥，但当后主一向后撤，北齐军队即人心动摇，全军溃乱，主力崩解。北周军继续前进，齐后主逃到晋阳，又觉不可靠，再逃往邺城，北齐官员纷纷投降北周，北周军攻克晋阳。后主知道形势不妙，把帝位让给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准备逃到南朝。577年，北周军攻克邺城，齐后主在青州被俘，北齐灭亡。

578年，周武帝病死，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宣帝忌讳有威望的齐王宇文宪，派人将其缢死。宣帝一味沉湎享乐，命令对大臣严加查访，有小过失就杀死或处罚；又杀死重要的军政大臣上大将军王兴、徐州总管王轨、仪同大将军独孤熊、仪同大将军豆卢绍、上柱国将军宇文孝伯、并州刺史宇文神举。大臣多被罚以杖打，每次都是一百二十下，后又加到二百四十下，连后宫嫔妃也有不少被杖背，人人自危。后来，宣帝又把皇位提前传给太子宇文阐，是为静帝，自己称天元皇帝。



579年，北周军攻取了陈朝的寿阳、广陵等重镇，其他长江以北的一些城邑的百姓自行撤退到江南，江北之地尽归北周所有。北周随公杨坚位高望重，宣帝对他十分忌讳。不久宣帝得了重病，几个大臣推荐杨坚辅政。宣帝病死，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掌握了大权。他改革了宣帝的苛刻政治，立身节俭，被内外大臣接受，在铲除了异己以后，于581年迫使静帝让位于他，隋朝取代了北周政权。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

北周

1996年陕西咸阳北周武帝孝陵出土

第六章

中外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与周边及外部地区有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往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共同发展。

第一节 使节往来

3 世纪时，在今日本出现了耶马台国。233 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到曹魏首

都洛阳，两国互赠礼物。曹魏的赠礼中有高级丝织品、黄金、刀、珍珠、铅丹，还有铜镜百枚。243 年，卑弥呼女王又遣使至洛阳。卑弥呼死后，邪马台国又两次遣使到洛阳；西晋时，再度来中国重申友谊。而在东晋、南朝时，日本有一个大和国多次派遣使节到首都建康访问。南朝的宋、齐、梁朝各有一次派使节访问大和国。西晋时，吴服师也就是南方的裁缝到了日本，《论语》也在这时传到



日本。刘宋时，大和国从中国南方请汉织、吴织及缝衣匠人到日本。一些中国制陶匠、画工和织绢的“绌人”也经百济移居到日本。522年，中国赠送《针经》给日本，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一百六十卷医书到日本传播医学。

南朝梁元帝萧绎曾画过一幅《职贡图》，反映了南朝与一些地区的交往情况，此画现存北宋熙宁年间的摹本，其中就有到南朝来的倭国使节像。

日本4世纪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中国的或中国式的铜镜，是中日交流的珍贵遗物。这些铜镜是神兽类镜，其中一些与三国的吴国镜相同，应是从中国输入的。而大量的铜镜主要是一种边缘突起、断面为三角形的神兽镜，日本学者称其为三角缘神兽镜。三角缘神兽镜中有一部分是日本仿造的，而学者对另一部分则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从吴国输入的；有人认为是从三国的魏国输入的；还有人认为是中国工匠到日本后制造的，因为中国出土的神兽镜没有三角缘，应是中国工匠到日本后把中国的神兽镜和画像镜的特点结合起来而生产的。日本学者对三角缘神兽镜进行了技术测定，其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属于中国铅矿的特点，而不是日本铅矿的特点。又有学者说这些铅原料是中国北方所产。但不论如何，三角缘神兽镜与中国



《职贡图》中的波斯国使像

的三国时期有着密切的关系。

百济的前身是马韩部落，居住在朝鲜半岛。马韩在西晋时曾多次遣使节到洛阳，赠送方物。346年，马韩部落之一的百济部落，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百济国。百济曾十一次遣使节到东晋南朝首都建康访问，四次遣使节到北朝都城洛阳、邺城、长安赠送方物。北朝渔民及出使国外的使节在海上遇难，百济都给以救护。4世纪，百济从东晋引进了佛教。百济文化人爱好中国文献，一些人还善于用汉文写作。梁武帝时，百济使节

《职贡图》

南朝 梁 萧绎绘
北宋摹本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绢本设色

纵25厘米，横198厘米
图卷原画南朝使节共25人，现已残缺，存12个使节：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日本）、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国。每个使节均单人右向侧立，身后有题记文字记述该政权历史、风俗及开来“朝贡”情况。





《职贡图》中的阿跋檀及胡蜜丹国使像

胡人头陶像

北朝

1948年河北景县出土



到建康求书，见到侯景之乱后的残破状况不禁痛哭。南朝何承天的元嘉历在南朝时传入百济并使用。梁武帝时，百济使节到建康请《毛诗》博士、《涅槃经》及工匠、画师等，梁武帝均给以满足；陆诒还曾应聘到百济讲学。

新罗是自4世纪从辰韩及弁韩部落发展而来的国家，在高句丽之南。西晋时，辰韩

使节三次到洛阳赠送方物。南朝时，新罗使节四次到建康。北齐时，新罗使节两次到邺城。新罗的文字及兵器铠甲与中国相同。

今斯里兰卡的师子国，也在东晋及南朝时几次遣使节到建康。

而今越南境内的林邑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与中国南方有频繁的往来。在今柬埔寨境内的扶南国，从三国到陈朝，二十多次遣使节到建康访问。三国吴国的交州刺史吕岱曾派中郎康泰、从事朱应出使扶南等国，回国后康泰撰写了《吴时外国传》，朱应撰写了《扶南异物志》。

在今泰国境内当时有金邻、顿逊、狼牙修等国，其中的狼牙修国在梁朝时三次遣使节到建康访问。

在今马来半岛的罽皇国，在南朝时七次遣使节到建康访问。同一地区的丹丹国在南朝的梁、陈两代六次遣使节到建康访问。爪哇岛上的柯罗丹国王在刘宋时四次遣使节至建康访问。爪哇岛的另一国家阇婆婆达国在刘宋时遣使节到建康访问。在今苏门答腊岛上的干陀利国的使节在南朝的宋、梁、陈朝时五次到建康访问。巴厘岛上的婆利国在宋、梁朝时三次遣使节到建康访问。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与西域各国也有较多来往。

265年，大宛国使节向三国魏国赠送名马。西晋时与大宛互遣使节。大宛使节曾出使后赵、前秦。北魏时，大宛使节五次到平城，赠送方物。者舌国、悉万斤国、忸密国、肃特国在北朝时多次派使节来访，赠送方物。北魏太武帝时，多次派使节出使西域。北魏晚期的延昌、神龟年间（512—520）两次派人出使西域。

贵霜王国于三国魏国时遣使节来洛阳访问，赠送方物。笈多王朝在前秦时遣使节到

长安，赠送火浣布，在刘宋时又到建康访问，送金刚指环、摩勒金环及红、白鹦鹉各一只。以后至南北朝，都陆续有天竺各个国家的使者到中国的建康及洛阳访问。

在伊朗高原的波斯萨珊王朝也多次遣使节到南北朝访问，赠送方物。

大秦帝国即罗马帝国，在三国时有商人到了吴国建业，详细向孙权介绍大秦的风土人情。西晋武帝时，大秦皇帝遣使节到洛阳，赠送方物。

第二节 货通中外

南方的广州当时是一重要港口，是外国商人及使节到中国的主要登陆地点。梁朝时，海船每年有几次或十几次到达广州。

天竺、师子国、波斯、大秦与南朝有贸易往来。在广东南朝墓中出土过波斯银币。波斯的商品中有琥珀、珍珠等装饰宝物，也有朱砂、雌黄、水银、苏合香、毕拔、石密等药物，还有胡椒等香料。中国商品也输出到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法显在师子国就见到了中国的白团扇。据阿拉伯人记载，5世纪前期，波斯湾及幼发拉底河上有中国及印度的船只。

中国当时不能制造玻璃器，而罗马帝国制造玻璃器的历史较早，产品质量好。从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输入到当时中国南方的商品，现存有出土的玻璃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江苏南京发掘的四座东晋墓中，发现了三件玻璃杯和一些玻璃碎片。这些玻璃杯与在希腊、土耳其发现的罗马时期的玻璃杯是一样的。经过对一些碎片做技术检测，它们的化学成分与古罗马、古埃及玻璃的化学成分相近，为钠钙玻璃系统。结合这批玻璃器的

形制及磨琢工艺判断，应是典型的罗马玻璃器。

晋代葛洪的《抱朴子》记载有外国制“水精碗”，即玻璃器，当时交州、广州得其法而制造。《南史》记载，南朝刘宋时大秦国派遣使节携带各种琉璃即玻璃器到达建康。几年后又有一琉璃工人来，“炼石为水晶”，即制造玻璃，向他人传授技术。

从三国时期开始，西域的商品就有输入中国的。青海大通出土的一件银壶，高15.8厘米，是3世纪时今叙利亚一带的罗马帝国时期的产品。

从北魏开始，由于统治了河西走廊，中西交流的道路畅通，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商贸来往。很多西域人，包括很远的东罗马帝国商人来到中国经商，买卖西域及中国商品。北魏与各国的贸易要数与西域各国为盛。北魏洛阳城南设置有四夷馆，名为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其中崦嵫馆是专门用来接待西域使节及商人的。一些西域商人因喜好中国生活而移居洛阳。洛阳御道以西有四个里，名为归正、归德、慕化、慕义，慕义里是侨居和暂住洛阳的西域使节和商人的居住区。侨居洛阳的外国人被北魏称为附化之民，史载有一万多家，其中许多是西域人。

北魏时期，河西走廊一带是与西域通商较多的地区，内地商人经营的商铺很多，有



波斯银币

1964年河北定州北魏石函出土
直径约3.1厘米

网纹玻璃杯

1948年河北景县出土
高6.7厘米，口径10.3厘米，
足径4.7厘米



银壶

公元3世纪
青海大通出土
高15.8厘米，口径7厘米，底
径5.4厘米
该壶出土于一卢水胡首领墓
内。



一段时间还通行西域货币。

从西域输入中国的商品有：农果类，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瓜、胡葱、胡蒜、橄榄、胡桃等；动物类，如汗血马、狮子、白象、孔雀、鸵鸟等，还有香料、皮毛、毛织品、金银珠宝、玻璃器等。输入中国的玻璃器在当时是珍贵之物，出土的几件西域玻璃器都是出自高官之墓。

1948年，河北景县北朝封氏家族墓出土了一件网纹玻璃杯，直径10.3厘米、高6.7厘米。杯为淡绿色，杯腹部贴三条波纹，互相衔接形成网目纹，杯壁很薄，仅两毫米。经技术检测，这件玻璃杯属于钠钙玻璃，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罗马帝国时期黑海北岸地区的产品。

西域输入中国的商品还有铜器及金银器。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遗址出土一件鍍金镶嵌红宝石高足铜杯，其造型及装饰洋溢



鎏金镶嵌红宝石高足铜杯

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遗址出土

高9.8厘米，口径11.2厘米，足径6.8厘米

该器的造型和装饰洋溢着浓厚的西亚风格，当是北魏迁都洛阳前输入的西方艺术品。

着浓厚的西亚风格。

1983年，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一件鎏金银壶，高37.5厘米，壶把上有一个西域人头像，壶腹部有一周西域人物图像，共六人，为三对男女，这是当时输入中国的萨珊帝国的制品。

中国通过商人输往西域的产品的大宗是丝织品，其他还有漆树、桃、李、梨、肉桂、黄连、玫瑰、茶树等。中国的养蚕丝织技术在汉代已经传播到于阗，这时期继续向西广泛传播，552年传到东罗马，以后又经东罗马传到欧洲。

第三节 弘法与取经

佛教本是印度文化的产物，汉代开始传入中国，以后广泛传播，深入中国各个阶层，

成为对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向中国内地传播的重要时期，一些西域僧人到内地传播佛经、佛教。

昙无讖是中天竺人。北凉时，他在北凉都城姑臧学习了三年汉语，然后与中土僧人惠嵩、道朗合作，译出佛经十四部。昙无讖翻译的佛经包括《大般涅槃经》等重要经典，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来到北凉译经的西域僧人还有浮陀跋摩，他译出了《阿毗昙毗婆沙论》，这是大部头佛经，共一百卷，参加翻译的有三百多人。当时的河西走廊地区成为佛教文化在中国发展及传播的重要地区。

408年，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僧人佛驮跋陀罗及弟子四十多人到达长安，之后又到了东晋建康，在道场寺翻译宣讲了《华严经》，又帮助东晋僧人法显把从天竺带

鎏金银壶

北周

1983年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

高37.5厘米，流长9厘米，最大腹径12.8厘米，足高8厘米

长颈，鸭嘴状流，面对壶口方向的把上铸一胡人头像，壶身腹部锤揲一周高浮雕异族人物图像。

回的梵本佛经《大般泥洹经》、《僧祇律戒本》翻译成汉文。法显先后翻译佛经十多部，特别是其中的《华严经》对以后华严宗在中国的创建起过重大作用。

来到南方翻译佛经的还有天竺名僧求那跋多罗。他在刘宋时从海路到广州，而后到建康。在建康、荆州，他译出许多佛经。古印度优禅尼国僧人拘那罗陀，在南朝梁末年

到达建康并开始译经，前后二十二年共译出《摄大乘论》、《唯识论》、《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六十四部经典，共二百七十八卷，大乘瑜伽学由此传入中国。

来到南朝的重要天竺僧人是真谛，他是惟一得到古印度无著、世亲法相唯识学真传的人。真谛于梁朝时到达建康，因侯景之乱而转到广州。他在中国二十多年，共译佛教经论四十部，一百四十一卷，重要的有《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金光明经》、《金刚经》、《弥勒下生经》、《俱舍论》等。在翻译佛经的同时，真谛还讲解佛经义理。《摄大乘论》经过他的翻译与解释及其弟子的传播，促成了摄论宗的形成。

在北魏则有天竺僧人常那邪舍参与译佛经十四部。孝文帝时，最有名的来中国的天竺僧人是名叫佛陀的人，曾为少林寺主，传译了重要的佛经《十地经论》，另译有《摄大乘论》等十部佛经。

北魏宣武帝时，来洛阳的最重要的天竺僧人是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两人。菩提流支译有重要佛经《十地经论》，以及其他西域佛经共三十九部，计一百二十七卷。《十地经论》又称《地论》，北朝地论宗由此得名。他也把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理解及发挥翻译传播到西域，是把中土佛教文献向西传播的第一人。勒那摩提翻译的佛经有《法华论》等。他也翻译了《十地经论》，使北方地论宗分为相州南派及相州北派。

天竺人（或说波斯人）菩提达摩在北魏末年到达洛阳，以后又住在嵩山寺，他创建了中国宗教史和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禅宗。

这一时期，中外交流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东晋僧人法显。399年，因为当时中国国内佛教律经缺乏，法显一行五人从长安出发到西域取经。他们穿过敦煌以西的大沙漠，



途经新疆诸国，越过葱岭，到了古代印度境内，这时已是400年。法显等人继续前行，先到了乌苌国，又南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富楼沙国，再向西北至今阿富汗境内的那竭国，随后到达了罗夷国、达跋那国、毗荼国，在这些国家游历并从事佛教文化交流活动。405年，他们到达笈多王朝的都城巴连弗邑。在这里，法显停留了三年，学习古印度书籍、古印度语以及佛教律经。406年，法显到达释迦牟尼出生地，即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城。以后他们又经过瞻波国到了多摩梨帝国，继续求经。409年，法显乘船到了师子国，在师子国停留两年。411年，法显等人乘船回国。在海上遇到大风，漂泊九十多天，到了今爪哇的耶婆提。412年，法显等人再次乘船向中国航行，最后在今山东崂山登陆，完成了取经大业，前后一共十三年。法显不仅取回佛教经卷，而且将他的旅行过程写成《佛国记》一书，记载了沿途各个国家，特别是古代印度的自然、社会、文化、交通等方面的种种情况。

法显以后陆续有一些中国僧人西行求法，5世纪时中国到西方求法的人见诸文献



的有六十一人。其中较为著名的如，智猛于404年与其他僧人共十六人从长安出发到了古代印度的几个国家，424年才从天竺返回。昙无竭等二十六人西行求法，到了南天竺，最后只有他一人乘海船回到中国。北魏的惠生、宋云奉崇佛的太后之命，于518年从洛阳出发前往天竺取经。他们越过葱岭，到了乌苌国、乾陀罗国、波斯国，拜访佛教名胜，并取回一百七十部佛经，于522年回国。

写经残卷
六朝

第七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圆周率研究的进步

圆周率计算是中国人一直努力探求的方向。三国时吴国人王蕃推算到了 $142/45$ 即 3.1556。魏晋时人刘徽把圆内接正六边形不断分割成 192 边形, 得出圆周率为 $157/50$, 合 3.14, 人称“徽率”。以后他又求出圆内接正 3072 边形的面积, 得出圆周率为 $3927/1250$, 即 3.1416。南朝祖冲之则把圆周率的精密度大大提高, 到了 3.1415926 至 3.1415927 之间。

勾股定理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三国东吴人赵爽用几何图形面积换算对勾股定理加以证明, 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也用几何图形的分合移补成新图形, 证明了勾股定理。



刘徽还纠正了《九章算术》中圆球体与其外圆柱的体积之比为 $\pi:4$ 的错误结论, 而祖冲之父子推算出球与外切于球的“牟合方盖”, 即两个底半径相同的圆柱体垂直相交的公共部分的体积的值, 并由此得出了正确的球体体积计算公式, 解决了球体体积计算问题。

刘徽还改善了《九章算术》解线性方程的方法, 采取相应各行系数相互乘后再消元的方法, 较为简便。据研究, 祖冲之在这方面解决了解一般形式的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的问题。

第二节 天文与历法

天象学是中国历代极为重视的科学门类, 天体也一直被关注。东晋虞喜发现了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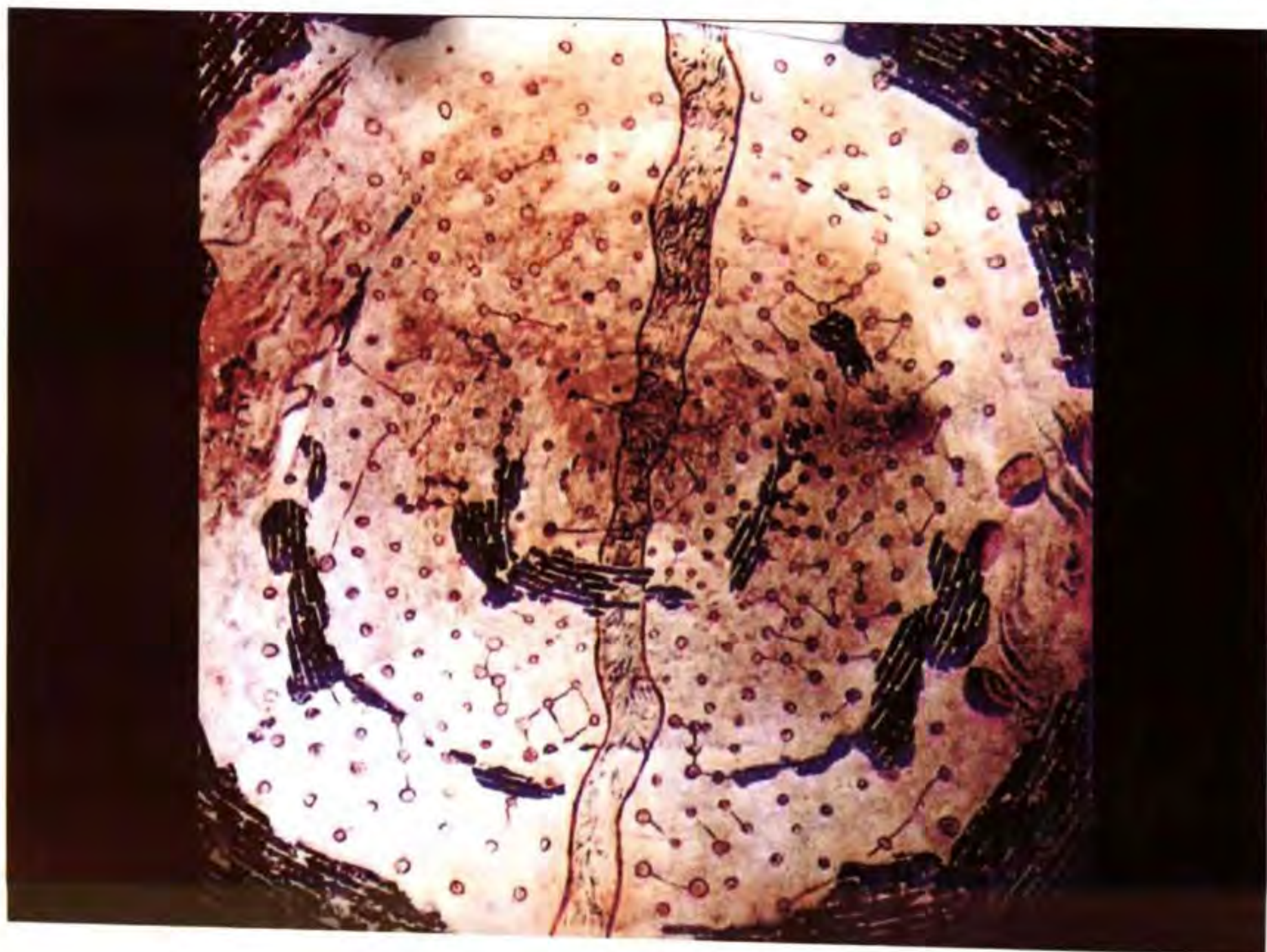
差，他研究历史记录，注意到上古尧的时代冬至日的黄昏时分是昴星在正南方，而他所在的时代则是毕宿在南方，有相当的差距。他由此认识到太阳从第一年的冬至运行到第二年的冬至，并没有完全回到原来的位置，而是每五十年向西移动一度，每年都有差数。借用别人利用日食、月食确定太阳分度的方法，虞喜对星宿加以实测，又研究历史资料，最后提出岁差是每百年差一度。北朝人张胄玄制定的历法中以八十三年差一度，接近现在实测的七十一年八个月的数值。而北朝人张子信发现了太阳及五星运动不均匀的情况，这一成果被以后的历法制定者采用。

历法也是中国古代一直受重视的科学门类。刘宋人何承天制定的历法是中国古代历法中较好的一部。他创立了定朔算法，使朔望与月球的实际位置相符，他还创立了调日的算法。采用这些成果，何承天制定的一年的实际长度为365.2467天，比以往的一年长度都要准确，他的这部历法称为元嘉历。

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員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
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算
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
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
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法以圓徑
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二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
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
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
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羈開差

祖冲之创立了大明历。他发现何承天的元嘉历已与天象有所不合，就依据实测把岁差定为四十五年十一个月差一度，并最早把岁差引入制定历法。他还认为以往的十九年七闰的做法不精密，他提出的新闰法是三百

《隋书·律历志》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记载



《星象图》(壁画局部)

北魏

1974年河南孟津出土

这幅画在墓室顶部的《星象图》，绘出了银河及三百多颗星，亮星之间有连线。

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改变了沿用了千年的闰法。他还推算出交点月的长度为 27.21223 天，与现在的 27.21222 天相差极微。他把一年长度定为 365.2488 天，朔望月的长度定为 29.53059 天，这些数值在当时是准确度最高的。五大行星会合周期也被他推算得很准确。

第三节 医药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医学方面，除对以往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研究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医学著作。

晋人王叔和写有《脉经》。这部医书是他把《内经》、《难经》以及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人的诊脉方法与他个人的行医经验相结合写出的。全书共十卷，系统地阐述了脉学理论及诊脉部位和方法，详细论述了对脉象的阴阳、虚实、寒热、逆顺、生死的判断，人的脏腑的生理及病理脉象与病症的关系，举出了二十四种脉象作为诊断时的依据，又

提出了八种相似的脉象以资鉴别，还叙述了各种病的脉象以及妇女和儿童的脉象特点。《脉经》把中医诊断学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6 世纪时，《脉经》传到了朝鲜和日本，以后又被阿拉伯医学所吸收。

晋人皇甫谧写了《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这是他在《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基础上，结合历代名医的针灸经验编纂而成的，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此书对人体生理、病理、穴位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做了详细论述，并为后代针灸所遵循。此书还流传到了日本及朝鲜，成为教科书。

许多行医者把一些医方编纂成书，约有百种。较有影响的是陈延之的《小品方》十二卷，葛洪的《肘后方》六卷，范东阳的《范汪方》一百七十六卷，姚僧垣的《集验方》十卷，徐叔响的《杂病方》二十二卷，陶弘景的《补阙肘后百一方》九卷。其中，《小品方》以后传入日本，成为医学教材。

在药学方面，最有成就的要属梁代的陶弘景。他到过许多名山寻访仙药，对药物接触很多，也丰富了对医药的认识。他的医药著作有《陶隐居本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太清草木集要》等。其中《本草经集注》是对汉代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的整理和增补，收集记录药物七百三十种，数量较之增多一倍。陶弘景还首创了按药物的自然性质和医疗性质分类的办法，把记载的药物分成六类。

第四节 机械与冶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机械方面的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书影)



发明。

曹魏时的马钧有多种发明。例如，以往的织绌机五十综的五十蹑，六十综的六十蹑，很费工，马钧将之改进成十二蹑，省时五倍。

马钧又利用差动齿轮机械构造原理制造出了传说中的指南车。车的单辕上立一木人，不论车行走时如何改变方向，木人的手始终指向南方。后人根据《宋史·舆服志》燕肃所传的制造方法复制出该车模型，是以齿轮作传动，当车辆转向时前辕也同时转动，这时后辕的绳索提拉或回落改变车内齿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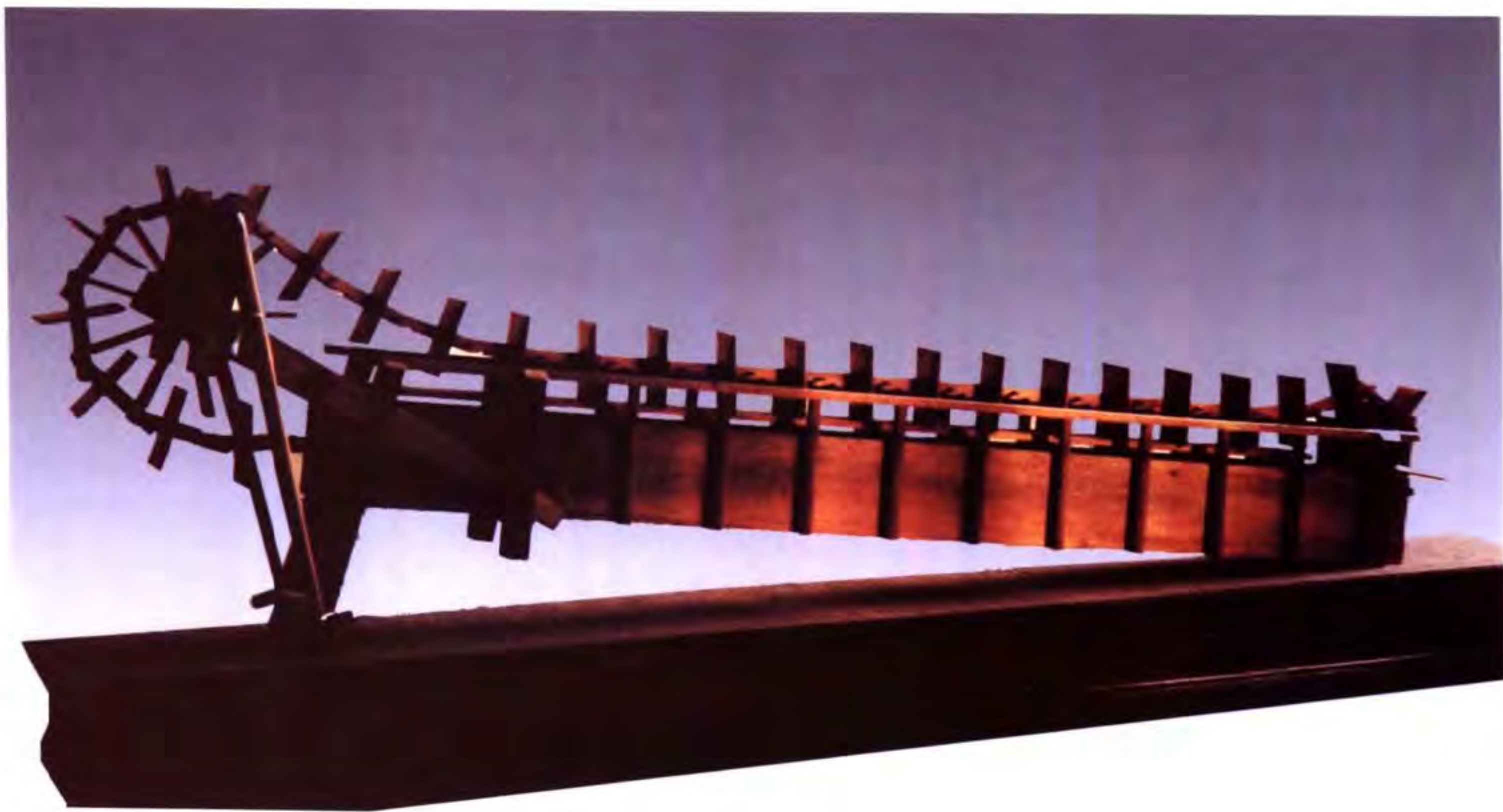
间的组合，使车上的木人总是保持一个方向，即开始设定的正南方向。但这件机械必须是以一个车轮为中心，另一车轮为半径做旋转，才能使木人保持一个方向。

马钧改进的翻车也有很高的效率。洛阳城内的园地没有水灌溉，马钧于是制造了翻车，儿童就可使用，其机巧百倍于一般的用具。

有人向魏明帝进呈百戏偶人模型，但不能动作，明帝问马钧能否使其动起来，马钧的回答是肯定的。明帝又问，能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机巧，马钧也回答可以。

指南车模型





翻车模型

马钧制造了一个庞大的齿轮结构系统，用水推动，带动各种百戏偶人，有女乐跳舞，有木人击鼓吹箫，有木人在山的模型上跳丸掷剑或在绳上倒立，行动自如，又有各种官府的办公场所，以及舂米、磨谷、斗鸡等场面，十分丰富。

蜀国的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都是用来运输军事物资的交通工具。木牛用人推，可载着一年的用粮，日行二十里人也不甚劳累，而且装载多了行走顺利，装少了反而不行。流马是一人推的小车，有前后轴、前后杠、前后四个脚，每辆可装米二斛三斗。诸葛亮还造了连弩，可以同时发射十枝箭。

西晋的杜预发明了连机碓及水转连磨，刘景宣发明了牛转连磨，都是一个动力可推动多个工具的机械，加工粮食可提高几倍效率。

南朝的祖冲之也对机械颇有研究。东晋平定后秦时获得了指南车，但徒具外形，内部机械结构全无，每次行走时，要用人在车内转动。当时马钧的指南车造法已失传，无

人能再复原。到南朝齐代，萧道成派祖冲之研究指南车，祖冲之改用铜制的机械结构，不管如何行走都指向不变。祖冲之还制造了千里船，把机械制动原理用于造船，日行百余里。他还发明了依靠机械，不用人力的陆上交通工具，可惜二者均不得其详。

冶金业在这时期也有所发展。由于战争，制钢技术上的新发展多见于武器制造。百炼工艺取得发展，曹操令工匠作“百辟利器”，曹丕的著作中提到了精炼宝剑“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像龟背一样的花纹，色彩如丹露，理腴如坚冰，在朝日下发出光芒。刘备曾令蒲元一次造刀五千把，刃口刻七十二涑铭文。曹魏人陈琳的《武军赋》也提到铠甲是“百炼精刚”制成。夏政权赫连勃勃曾令人造“百炼刚刃”。

灌钢，即以生铁和熟铁合炼成的钢材及钢制品，在这时期的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载。北齐人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方法是先把生铁熔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生铁中的碳渗入熟铁，然后分别用牲畜尿及牲畜脂肪

淬火，就成为钢，用这种方法制出的刀可以砍三十副铠甲。

第五节 瓷器制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制造业发展极为突出。当时的制瓷业主要在南方地区，南方瓷器以青瓷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黑瓷。南方瓷器以今天长江以南的宁波、绍兴地区最为发达，瓷器的种类多、质量好。因此地古称越，这里的瓷窑逐渐被称为越窑。越窑区以外的今浙江地区，也产瓷器，著名的有今杭嘉湖平原西端的德清窑、温州一带的瓯窑、金华一带的婺州窑。在今江苏南部地区则有宜兴的均山窑。

东汉中期出现了成熟的瓷器，三国时

瓷器制造业稳步发展，工匠对胎釉料的选择、成型、施釉法、窑炉结构及装窑、烧制技术都做了一些改进。从出土的实物看，瓷器的数量及种类都比东汉增多。

西晋越窑的瓷器，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了氧化铁、氧化钛含量较多的瓷土作为胚料，也有可能是在胚料中加入了少量紫金土以提高胚料中氧化铁的含量。东汉晚期胚料中氧化铁含量不超过2%，这时可达到2.5%至3%，氧化钛含量则由东汉三国时的1%以下提高到1%以上，这样瓷胎烧成后就呈灰色，釉色在灰底的衬托下颜色沉静，对提高青瓷的釉色质量起到了作用。

东晋德清窑对胚料的选择也很侧重，所烧的青瓷器胎色为灰色或灰白色，较浅，而黑瓷的胎色多为紫色，这是有意选用氧化铁含量较少的瓷土制成青瓷胎，而用含铁量3%



青瓷狮形水注

三国 吴

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

黑褐釉鸡首瓷壶

东晋

1964年江苏镇江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通高15.6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10.3厘米

盘口外侈，长颈，圆肩，平底。肩部前端有一向上直伸鸡首形流，头顶高冠，双目圆睁，似作昂首啼鸣状。后端为一曲形圆柄，一端与盘口相接，另一端与肩相连，上端略细，向下渐粗，肩左右两侧各有桥形环耳。器身平滑，施黑褐色釉，近底露胎。器身上有细小开片纹。此器造型优美别致，为东晋时褐釉器的代表作。



以上的胚料制造黑瓷胎。

瓯窑生产规模开始时比越窑小，品质也稍逊。但到了东晋时，瓯窑、婺州窑的产品销售到今福建、广东、江苏等地，说明已有一些发展。

婺州窑在西晋时首先成功使用化妆土工艺，即在瓷胎表面再施一层胚料，可以使原本粗糙的瓷胚平整，又可覆盖较深的底胚颜色。这样，选用底胚料时就可不拘颜色而使用当地多见的红粘土，还可使釉层外观得到改善。东晋时，越窑、德清窑生产的部分瓷器也使用了化妆土工艺，而南朝时随着瓷器

生产范围的扩大，化妆土工艺流传得更为广泛。

均山窑是在汉代釉陶及陶器制造的基础上吸收越窑技术发展起来的，但品种质量要比越窑差一些。瓷胎较为疏松，气孔多，瓷土中铁、钛的含量较高，烧成后的瓷器胎的颜色为灰、青灰、土黄色。胎色对瓷器的表面呈色有较大影响，釉色为豆绿色、微微泛黄，釉面的玻化程度较差，有的瓷器胎与釉的结合不好，容易脱釉。

东晋以来，一些青瓷器上使用褐色的釉料点作装饰，也有少量用褐色釉料画出人物

及其他图案，这是釉下彩工艺，后代的彩色瓷器都是在这种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南方其他地区也有一些瓷器制造，都是青瓷，开始烧造的时间比江浙一带稍晚，质量也有差距，不过到了南朝已可见到很精美的瓷器。在今湖南、湖北地区发现的青瓷器，颜色偏黄，与其他地区的灰绿色调的青瓷器明显不同，这是由于在烧制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火焰气氛所致。较早阶段的烧造技术较差，有些瓷器有釉层脱落现象，以后得到改进，出现了精品，如南朝的青瓷印花壶。

这一时期，瓷器的釉料都是石灰釉，光泽好，透明度高。釉料瓷土中没有多少氧化钙，需要加石灰石配制而成，但加入过多会使釉面产生不透明的感觉。越窑瓷器的釉料中氧化钙已达18%，最高的将近20%。

这一时期，瓷器以氧化铁为主要的呈色

剂，经高温烧制，釉料变成青色。青瓷釉料中铁元素含量一般不超过3%，越窑、婺州窑青瓷器釉的含铁量为2%至3%，德清窑黑瓷釉料中的氧化铁达6%至8%，含铁元素越多，烧成后釉色就越深。釉料中的氧化钛、氧化锰也是呈色剂，含量过高颜色会不好。这些都是需要很好的技术及经验加以控制才能达到的。

今浙江境内出产的瓷器釉与胎质结合较好，脱釉流釉情况不多见，说明釉的烧成温度控制得恰当，膨胀系数匹配，掌握了较高的烧成技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成型技术也较前代有提高。较为常见的、器型简单的瓷器如碗、盘、钵、壶、罐、盆等都采用拉胚成型，器壁厚薄较均匀，器型显得较规整。而不常见或器型较为复杂的瓷器则使用其他的



青瓷羊形烛台

东晋
江苏镇江出土

青瓷印花带盖唾壶

南朝

1954年湖南长沙出土
通高14.8厘米，口径8.2厘米，底径11厘米
此器造型别致，釉色莹润，是当时贵族们使用的生活器皿。



窑具

东晋南朝
浙江德清焦山出土



成型法，如拍片、手捏、模印、镂雕等技术，用这些技术制造的瓷器器型变化多端，如形态各异的魂瓶、体型高大的莲花尊、生动有趣的动物形瓷器等。

这一时期，瓷器的主要产地今浙江一带普遍采用龙窑烧瓷。龙窑内部空间大，热效率高，节省燃料。龙窑是春秋时期出现的窑型，这一时期得到了改进，比东汉时窑身加长，窑身前部宽后部窄。

浙江上虞联江鞍山发现的一座保存较完整的三国龙窑，长13米多，宽2米多。这座窑前段坡度较小而后段坡度较大，窑床中段



青瓷仰覆莲花尊

北魏

1948年河北景县出土

通高63.6厘米，口径19.4厘米，足径20.3厘米

该器的高度在当时青瓷器中是极少见的。器腹部装饰几层莲瓣纹，其中的三层向下覆盖，二层向上仰，与器身配合得极为恰当。莲花尊是佛教文化影响的产物。

下凹，这对烧制瓷器有不利影响。而联江帐子山发现的一座晋代残龙窑中，后部放满了装置瓷胚用的窑具，说明当时已解决了瓷窑分段烧成的问题，即在窑的顶部或两侧设孔以便投柴，用火塘移位法烧瓷器。有了分段烧成法，龙窑长度可以加长，可以把窑的宽度减小，窑内温度就更加均匀，有利于提高瓷器质量，也能提高热效率，节省燃料；同时窑顶跨度小了，也便于筑窑及延长窑的使用寿命。到南朝时，龙窑发展趋向已是窄而长，在浙江丽水发现的一座仅残存中间部分的龙窑，长度仅为10米多，宽度仅为2米。

烧制瓷器的窑具也不断改进。叠烧在三国主要用三足支钉，支钉足尖容易对下面的瓷胚压出印痕。西晋时发明了锯齿口的孟形窑具，齿的数量多，且齿底呈小平面，减少了上层器胚对下层器胚的压力。东晋德清窑采用大碗、小碗与碟套装，相邻器物间不用窑具而是用泥点间隔，彼此之间空间很小。南朝出现了很矮的孟形垫具。

这一时期，北方瓷器制造出现较晚，推测可能现于北魏晚期，目前发现的实物较少。北方瓷器开始也是青瓷器，总的来说制造水平不如南方地区。也有造得很好的器物，如河北景县出土的青瓷莲花尊，器体大，装饰丰富，釉色、造型都较好。

稍后有白瓷器出现，时代在北齐。目前发现的白瓷实物较少，瓷胎较细，没有使用化妆土工艺，这就要求瓷胎颜色要浅，要把瓷土中铁元素含量控制到较低的程度，使之不致在烧成时呈现明显的深色调以影响釉面的颜色。这时期的白瓷器釉色呈乳白色，并普遍泛青，局部釉厚的地方仍呈青色，这是早期白瓷不可避免的缺陷。

北方地区黑瓷出现的年代尚不能确知，已发现的北齐黑瓷器制造工艺已较成熟，应

是在青瓷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六节 造纸与纺织

造纸术发明于汉代，但当时所造的纸白度差，不平滑，结构不紧密，纸中纤维束较多，显得粗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的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密，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张较薄。晋代有的纸张纤维帚化度已达到70%，接近现代机制纸。这时期造纸量增多，纸张逐步取代缣帛和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造纸原料以麻为主，兼有楮皮、桑皮、藤皮，还有树皮与麻混用的，这是造纸技术发展的结果。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有所改进。舂捣要进行多次，以碓代替了杵臼。晋代已有了施胶术，用植物淀粉糊掺入或刷在纸面上，然后轧光，用此技术所制的纸张在书写时不会走墨、晕浸。

这一时期出现了活动帘床纸模的造纸设备，即将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反复捞取湿纸，可以抄出薄而匀细的纸面。还有表面涂布技术，是将白矿物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轧光，制出的纸既白又平滑，纸质紧密。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纺织技术随着纺织业的发展也有一些进步。文献记载，后赵邺城织锦工人很多，锦的品种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稻文锦、桃核文锦及青、白、黄、绿、紫各色织锦，非常之多。这些都是图案复杂的织锦，需要较高的技术方能织成。当时，邺锦与蜀锦齐名。



北魏的丝织业也很发达，其后的北齐、北周仍以丝织业为重要产业。河北是当时重要的丝织业中心，以绫、锦之精美著称。南朝刘宋采用三国时已有的一蹶鼓动数综的机织技术，生产效率得到提高。梁代有嵌着金箔的罗，当时丝织品的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等，都是复杂的图案。

第七节 地理学

地理学是古代一个重要的学术门类，史书中大多辟有专门章节，另有不少专门的地理著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地理撰述较为风行，如三国谯周撰《三巴记》，吴国人沈莹撰《临海风土异物志》；西晋周处撰《阳羡风土记》；东晋贺循撰《会稽记》，顾夷撰《吴郡记》；刘宋郭缘生撰《述征记》，戴延之撰《西征记》，山谦之撰《吴兴记》、《丹阳记》、《南徐州记》，盛弘之撰《荆州记》，庾仲雍撰《湘州记》、《江记》、《汉水记》，袁山松撰《宜都记》，阮昇之撰《南兖州记》；北魏酈道元作《水经注》、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此外，还有记述域外地理的《惠生行纪》、《佛国记》。这些地理著作流传至今，最有名的是酈道元的《水经注》。

《水经注》共四十卷，三十一万字。它是

灯树纹锦

北朝

1959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水经注》

北魏 酈道元著
明嘉靖刊本

以对曹魏时人写的《水经》一书作注的形式撰著而成的。

酈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人，曾在北魏任官。他博闻好学，撰写此书引用以往与《水经》有关的著作三百多种，他还对有些地方做了实地考察，对错误之处加以考证、改过。

《水经注》最大的特点是详细。《水经》只记载了137条河流，且叙述简单。《水经注》增加为1252条，不仅系统地写出了河流的源流和变迁，还对沿河郡县、城邑的沿革及历史古迹、民间传说、自然风光、地貌以及经济特点、特产作了记载，如河流的发源地、干流、支流和河的宽度、深度、长度、方向、水量的季节变化、河水含沙量及这些河流当时及历史上的洪水大小程度等，还有河流中的滩、堆、峡、濑等关系到航运的内容，又有河流的桥梁渡口的情况。《水经注》还对各种类型的水体作了区别及叙述，如湖的名称有

14种：湖、泽、海、陂、浦、渊、淀、沼等。有的湖记载了面积大小及排水湖与河流的水文关系。又对运河和水利工程的历史状况作了说明，记载了109个陂、28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灵积渠、六门碣等。

《水经注》所载地名有17756个，县级以上的居民点大部分作了历史沿革的记载，对有些地名本身还作了考证。《水经注》还包罗了许多经济地理的内容，对几个有水利灌溉的大型农业区做了重点介绍，记载了采矿、冶金、造纸、食品、纺织等行业在各地的工场及状况。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与地理学相关的地图学也有发展，最有名的是西晋裴秀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在制图人员的协助下，裴秀总结了前人的绘图和地理知识，提出制图六体的原则：一是分率，用来表示地区的大小及比例；二是准望，用来校正各个相关地区地点的方位，这样可使位置较为准确；三是道里，即要知道两个地点的道路里程；四是高下，要知道道路里程在地图上的高低；五是方邪，即要知道道路的方斜，是直路还是斜路；六是曲直，即要知道道路的弯曲状况。制图六体成为中国绘制地图的理论，依照这一原则绘制地图，讲求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的准确，基本符合近代绘制地图的原则，直至明清仍被地图家使用。

运用这些原则，裴秀主持了《禹贡地域图》的绘图工作。对《禹贡》一书记载的山川河流、湖泊海洋、平原沼泽，古代九州和晋时十八州的郡县疆界，以及古代盟会地点旧名、水路、陆路等都作了查对核实及注解，绘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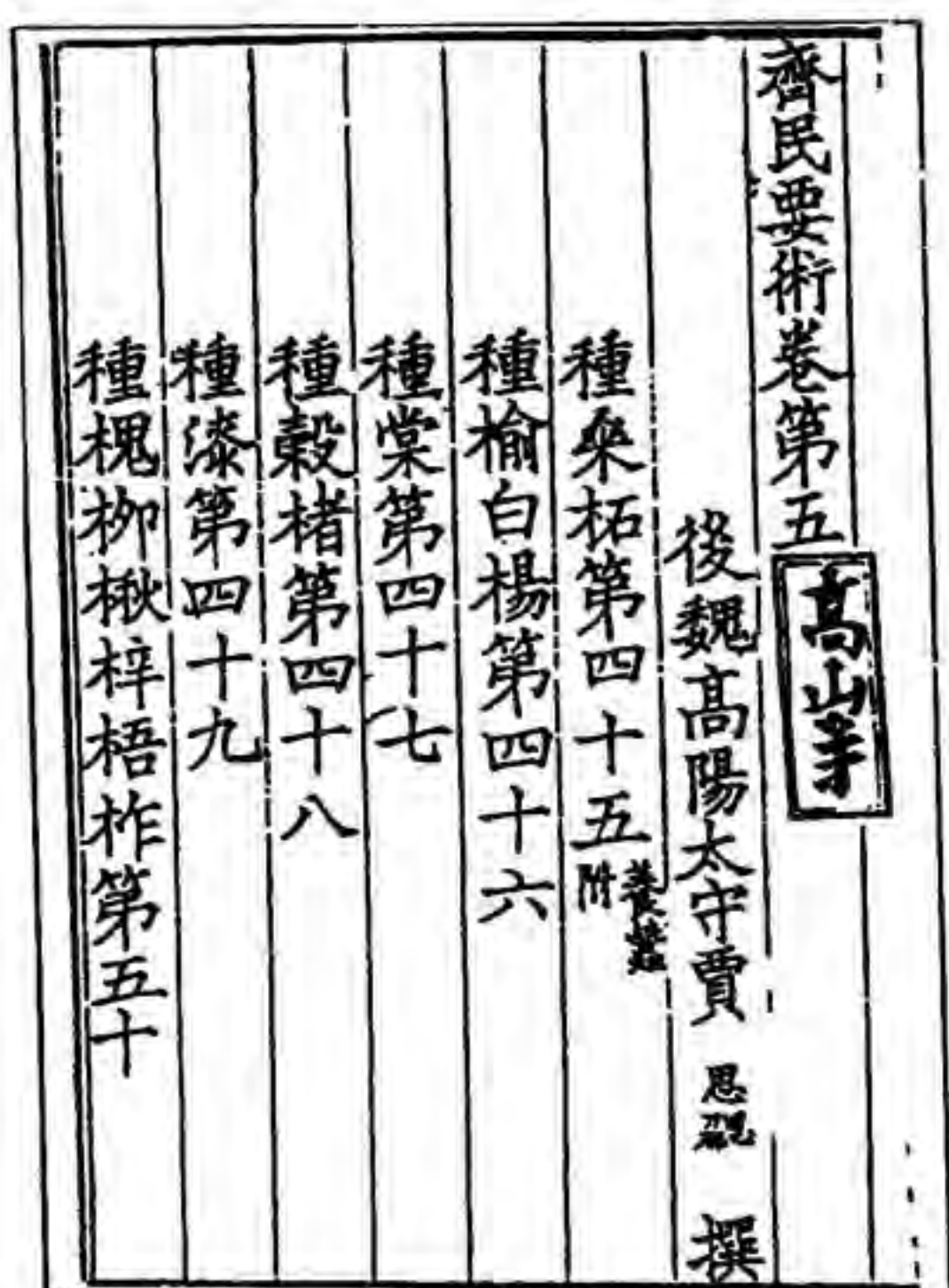
第八节 农学

中国保存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一部农业技术书籍是《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的作者是贾思勰，这部书写成于北魏末年东魏初年，全书十卷，九十二篇，正文约七万字，自注约四万字。

《齐民要术》是一部很全面的农书，引用书籍一百五十六种。另外，贾思勰还广泛搜集农谚，并访问有经验的农民。该书内容包罗很广，有粮食作物的生产知识，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技术，林木、畜牧业知识以及养鱼、酿造、食品加工、手工业等门类。

粮食和果蔬方面的技艺占了该书很大篇幅，且极为详细，仅粟的品种就有八十六种，果物有十大类。书中对土地的耕作技术有详尽的叙述，如初耕要深，转地要浅，秋耕要深，春夏耕要浅；并认识到深耕的好处，那



《齐民要术》(书影)

就是根除杂草、防止病虫害、利于吸收水分、疏松土地等。又如，书中反映当时对农作物的栽种时间有很明确的认识，比如指出种谷时间，二月上旬是上时，三月上旬为中时，四月上旬为下时，等等。

第八章

文化艺术



第一节 玄学兴盛

玄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的一个新内容，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以后在两晋南朝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玄学理论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曹魏吏部尚书何晏、尚书郎王弼、西晋尚书郭象。

玄学论者主要是通过为先秦《老子》、《庄子》、《周易》三部著作作注，来阐述自己的看法。他们常小范围地聚集讨论玄学问题，即清谈。玄学的现实底蕴，是对汉魏以来的行政体制及儒家学说对人的行为的约束进行变革。

玄学最核心的内容可用何晏的“贵无论”来说明：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创世界，成就事物，无处不在。

“无”的概念来自《老子》中的“道”，“道”

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来源，而“无”是“道”的特质。“无”的观念是想说明，一切事物没有恒定不变的规定性，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待。

汉代行政体制是每年对官员进行考课，内容包括人口、土地、赋税、捕获罪犯数量等，根据考课进行升迁。许多官员为追求政绩，想方设法提高指标，造成了为政苛刻及百姓生存状况恶劣。而曹魏采用先秦法家的学说驾御臣下，设立了更多的名目考课官员，魏明帝时曾制定考课法七十二条。过多的行政及考课名目，会使问题变得复杂。王弼说：法规越繁，奸轨越多。

何晏进行了一次改革，具体内容不详，但从“贵无论”来看，应是否定设立名目指导官员施政的传统做法。具体到何晏的职务，有可能不按名目核定政绩及评价、提拔官员。当时许多人认同这种思路，但也认为

实行起来很困难。

不过，确有官员按照这种思路行政。洛阳尹李胜就放弃了以往的行政法则。阮籍任东平国相时，法令清简。而到西晋，这种思想的影响更加扩大，有玄学观念的官员把一些热衷于寻事出政绩的官员斥为“俗吏”。西晋皇家祠庙因大风，屋顶的几片瓦被刮破，有人对有关官员进行弹劾，这种小题大做的做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两晋一些官员有“清”的气质。“清”在汉魏指不慕财物，到两晋则变成了少、省的风格。王导清虚寡欲，任东海太守时，为政崇尚清静，不追究小事。王导执政，为了不激起与江南豪强的矛盾，小察细事，又减少农民的劳役。

在南朝，宋文帝与士大夫谈玄；梁武帝把玄学与儒、佛、道并立，使之成为官定的四学。

玄学的另一意义是解除儒家观念对士大夫行为的束缚。儒家有许多道德名目：孝、悌、忠、信、礼、义、仁、俭、廉、让等，即当时人们所说的名教。汉代以来，名教被纳入统治体制，成为官员、士大夫的行为准则。但在汉代晚期及魏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杀



阮籍、嵇康

南朝宋
模印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拓片局部。

身破家的很多是恪守名教的人。而且，不论何种情况都固守名教、不知变通，也不合人性。另有一些人为了当官，按道德名目造作伪行。于是一些士大夫反名教，贵自然。



《高逸图》(局部)

唐 孙位绘

上海博物馆藏

绢本设色

画中山涛、王戎、刘伶、阮籍为“竹林七贤”中人。左为王戎，持杖远视，若有所思，右为山涛，披襟抱膝，气度超然。

曹魏时有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嵇康、阮籍不谴人是非，即不以名教评价他人。嵇康说自己有十种不能忍受的礼的约束，阮籍在丧母期间照旧饮酒吃肉。西晋士大夫反名教的行为更甚，时称“放达”，与猪同饮、脱衣上树是其中的极致例子。而东晋士大夫要恰当得多，王徽之在雪夜来了兴致，乘船去外县访戴逵，到了戴家门前却不进而返。他说：“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经过长期的玄学熏陶以及政场的历练，东晋士大夫的文化素养、才能、器度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有“风流”之美誉。

第二节 佛教的广泛传播

佛教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随着使节、商贾、戍边将士的西来东往，沿着丝绸之路向内地延伸。佛教初传中原大地，信奉者多为王公贵戚，人们以黄老之说、神仙的形象来看待佛，当时高僧也多精通阴阳星算、神咒方术。佛在人们心目中是降吉祥、保平安的神仙之一，今天能见到的当时的佛的形象只保存在铜镜的画面上、魂瓶的贴花中和墓室的阑额上。

黑釉楼阁佛像陶魂瓶

三国 吴

江苏南京出土

高42厘米，腹径26厘米，底径16.3厘米

魂瓶，又称“谷仓罐”或“堆塑罐”，是流行于三国孙吴至西晋期间的一种形式独特的随葬品，多出土于江苏、浙江两地。





四叶八凤佛兽铜镜

西晋

1975年湖北鄂城出土

直径16.4厘米,边厚0.4厘米
用佛像作为铜镜装饰,始于
三国时期,说明佛教在此时
广泛传布,影响越来越大。

宗教根植于人群有其社会根源,有统治者的需要,有文化层的需要,也有普通民众的需要。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内乱不断,即使政治平静时期,统治层内部也潜伏着危机,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尽管表面上还维持着正统地位,但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逐渐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学说。同时,众多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尚不能完全接受、采用中国传统的儒家体系,需要以佛教作为教化劝善的学说。北魏文成帝就说过,佛教有助于加强统治方面的禁律以及增长人的仁义贤智的善行。更重要的是,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使民众的生存状况处于极低水平,大量人口托身寺庙为僧祇户、浮图户。所有这些使佛教有了广泛传播的土壤。

三国时已有西来的僧人到了洛阳、建业及广州,不过数量较少,多被视为方术之士,从佛教传播的角度看尚无多少意义。目前出土的一些三国晋代的魂瓶,其中一些上有佛像。魂瓶质地为陶或青瓷,下半部为一罐形,上半部多为建筑模型,建筑周围或罐的周身模印或塑出几个小佛像,穿僧衣,身后有背光,佛像不在魂瓶的主要位置。也有一些西晋时期的铜镜,上面铸有佛像,这些佛像与祥瑞的兽类及传说中的人物图像间隔排列,没有独尊的位置。

魏晋玄学盛行,为了顺利地传播佛教,僧侣们往往以佛教《般若经》的教义迎合玄学风尚,士族也常借佛教哲学发挥玄学理论。

曹魏时期的朱士行是第一个西行求法的

汉僧。为求取大本《般若经》，他于甘露五年（260）到于阗取经，晋太康三年（282）他把所抄的经本派弟子送回洛阳，其中的梵文大品《放光般若经》一经译出即风行洛阳。

支谦是大月氏人，是支娄迦谶的再传弟子，先在洛阳居住，以后又移居到吴国，译有《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等四十九种佛经。西来的僧人帛延在洛阳译出《无量清静平等觉经》。康僧会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后到中国的交趾、建业居住，译出《阿难念弥经》等佛经。

曹魏规定汉人不得出家，这个时期的佛教徒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西晋时又有一些佛经传入内地。译经中心为洛阳与长安，高僧竺法护除在长安译经外，还在敦煌、酒泉、洛阳等地译经。于阗僧人祇多罗带来《光赞般若经》，由法护译出。龟兹国副使携带《阿难越致遮经》到敦煌，由法护译出。法护所译的佛经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弥勒成佛经》、《普曜经》等。竺法护推动了佛教的普及，被当时的信徒誉为“敦煌菩萨”。

龟兹僧人来到敦煌的不少，如帛尸梨密多罗被当时人称为“高座”。佛教在一些文化阶层稍稍有了影响，出现了六家七宗，但只是用汉末传播进来的少量佛教学说对应当时很有影响的玄学学说，佛教本身的学说体系并未得到彰显。

东晋虽偏安江南，但因士族名流相继避世南迁，玄风也跟着南渡，尚清谈的名僧受到尊重。东晋皇帝崇信佛教，这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名僧与王公、士大夫交往密切，他们同游山水，共赋诗文，或谈玄说法，或设斋礼佛。东晋的佛寺兴建不仅数量空前，规模也比以往宏大。

十六国后赵统治者石虎好佛，著名西来僧人佛图澄据说能诵神咒，役使鬼神，受到他的特别尊崇。佛图澄也利用石虎相信自己的方术来传播佛教。石虎下令少数民族及汉人愿意崇佛的即允许。追随佛图澄受业的弟子常有几百人，累积弟子有一万多人。佛图澄和弟子在各地建造佛寺893所。石虎性情残暴，佛图澄用佛教教义对他劝善，减少了一些对百姓的杀戮。

前秦也崇佛。苻坚特命大将吕光进攻龟兹、焉耆，迎接名僧鸠摩罗什。因苻坚被害，鸠摩罗什停留在凉州。后秦姚兴灭后凉，迎接鸠摩罗什到长安，以国师之礼待之。鸠摩罗什是第一个把大乘佛经传入中国的人。在

佛像壁画

魏晋

1993年新疆于阗佛寺遗址出土

长64.5厘米，宽46厘米

佛教较早传入今新疆地区，然后进一步向内地传播。





石菩萨像

北魏永熙二年(533)造
高27.5厘米

八百多位弟子及僧人协助下，他翻译了佛经三十五部三百余卷。他深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其弟子也都是有相当文化造诣的人，所以译出的佛经质量高，范围广，又很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后中国佛教所使用的重要佛经，都是这时译出的。

同期，法显西行求取律经，使中国佛经初步有了完备的结构。由于地近西域，西北地区的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等地

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佛教文化，而北凉则是当时全国的一个佛教文化中心。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特别好佛，曾请西来僧人昙无讖在姑臧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动。

南朝与北朝，地域条件不同，社会情况不同，传统文化不同，反映在佛教上是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修。由于南方玄学盛行，清谈成风，帝王信士以延僧讲经为时尚，沙门也崇尚畅说义理，开坛讲经。北方则讲求实际，大力建寺、度僧，广开石窟。开凿石窟是另一种形式的修建佛寺，为的是“修福”、“行善”，以求自身与子孙世代永昌。

北朝时，佛教的发展大大超过前代。北朝各政权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他们对于传统儒学和道家思想了解较少，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借助佛教，企图用佛这种“戎神”作为统治汉人的一种精神工具。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下，各地大造寺院，汉、胡各族人出家的数目日增。

北朝皇帝大多崇佛，带动了后妃王公贵族及士族的崇佛。北魏宣武帝专信佛教，以至不读儒家著作。孝明帝时，胡太后极为崇佛。北魏熙平元年（516），胡太后在洛阳兴建永宁寺。寺中有九级浮图一座，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高十丈，九级浮图角皆悬金铎，浮图有四面，每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寺中浮图楼观共一千余间。寺外围墙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距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永熙三年（534），永宁寺为火所焚。

西魏宇文泰好佛。他为大僧统道璩在长安建立中兴寺，把昆明池及百顷稻田及大量的果树一并赐与中兴寺。西魏、北周的几个帝王如文帝元宝炬、明帝宇文毓、宇文护都是好佛的人。北齐文宣帝高洋，还亲受菩萨戒。他在邺城西面划边长五里之地建造云居

彩绘石雕释迦立像

北齐

1987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

1987年、1996年在山东青州的龙兴寺遗址出土了大批佛教石造像，大部分都是残断的，据研究这与北朝及唐代的灭佛事件有关。



寺，赐给稠法师。文宣帝还下令禁绝道教，专崇佛教。北齐后主高纬也崇佛，他把邺城三台施舍给大兴盛寺，把在并州的尚书省官署施舍给大基圣寺，把晋祠施舍给大崇皇寺。上行则下效，流风所及，官员与百姓信佛的人很多。

北方的民众由于这一时期政治恶劣，赋税劳役负担很重，再加上其他的压迫，许多人投身佛门。僧人不用缴纳租赋服劳役，寺

院的僧祇户、寺户、白徒、养女也不向国家缴纳租税劳役。成为佛寺的民户，只向佛寺缴纳租税服劳役，其负担其实也很重，每年要缴纳六十斛粟，但相对缴给国家的赋税劳役负担仍要轻一些。《魏书·释老志》就明白地指出：正光（520—524）以后，天下多变故，国家劳役太甚，于是百姓都入佛教，假装信佛，实际是逃避赋税劳役。北齐时有人向皇帝上书，反映佛法诡诈欺骗，逃避劳役



石雕胁侍菩萨像

北魏

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石灰岩质，雕饰精细。面部表情含蓄，略带微笑，耐人寻味，是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北朝石刻造像最精美的代表作品之一。



彩绘贴金石菩萨像

北周
1982年陕西西安发现
这是一尊雕塑与装饰都十分
精致的作品。

的人以之为隐身之处，都是同一原因。

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迅速发展。京都和各州郡寺院遍布，通过帝王的赏赐和贵族、官僚的施舍，大量土地转入寺院手中，民众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为逃避徭役和租调纷纷出家为僧，或者成为附属寺院的僧祇户、寺户、白徒、养女。佛教寺院拥有雄厚的财富，又占有众多的劳动力，因此在政治上、经济上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僧尼人数太多，对国家收入及劳役人口的来源产生巨大影响。有关资料显示，

北朝佛教人口与户口数比例很大。北方在后赵时有佛寺893所，僧尼近万人；北魏太和元年有佛寺6478所，僧尼77258人；到北魏末年为佛寺3万所，僧尼近200万人；北齐有佛寺3万所，僧尼近200万人；北周有佛寺1万所，僧尼近100万人；北齐、北周时期北方地区僧尼总数达到300万人。而北魏末年北方人口数约3000万，北齐、北周合计的人口数大致也是这个数量，僧尼数量占据了人口总数中很大的比例。因为这个原因，兼之发生过佛教寺庙卷入农民起义的事件，北朝曾两度灭佛。

第一次灭佛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他先在438年下诏，规定五十岁以下的僧人必须还俗成为编民，向国家缴纳赋税服劳役。第二年，北魏灭北凉时，崇信佛教的北凉政权得到了僧人的帮助，大量僧人为北凉守卫城池，有三千僧人被俘虏。太武帝认为僧人不修行而作“贼”，实在可恨，下令将被俘僧人全部杀掉，经人劝说才改为罚做苦工。445年，关中发生了各族人民反抗北魏统治的盖吴起义，因当地许多人都信奉佛教，可能有不少起义的参加者也是佛教徒。同时，在镇压盖吴起义时，还发现长安一寺庙中藏有武器、酿酒器具及一些官吏富人寄藏在寺内的财物。信奉道教的崔浩趁机劝太武帝灭佛。446年，拓跋焘下令将全国僧尼一律坑杀，烧毁所有的佛经佛像，为此出现僧尼大逃亡。

第二次灭佛发生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他先召集官员、僧人、道士讨论儒、道、佛三教的先后，定出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最末。574年，宇文邕下令禁止佛教及道教，烧毁一切佛像佛经，平毁一切佛塔。577年，北周平定北齐，在邺城召集僧人告诉他们要废除佛教。僧人慧远说：“陛下依靠政权

的力量毁坏三宝，这是接受邪见的结果，穿鼻地狱不分贵贱，陛下不害怕吗？”周武帝说：“佛在域外，我不是五胡，不信此道。”于是下敕令禁断佛教，北方地区几百年来建造的佛塔都被毁坏，将四万所寺庙赐与王公为住宅，三百万僧尼都还俗为平民，一些僧尼逃往深山，还有不少逃到南朝。

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

北朝占其二。统治者不考虑大量佛教人口出现的原因，进而改善自己的政治，使民众的生活有所保障，而是简单武断地采取禁断政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人民生存质量极为低下的时期。

南方在东晋时佛教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佛图澄的弟子道安是汉族人，他先在北方传教，以后到过东晋统治地区襄阳，与弟子慧



彩绘贴金释迦多宝造像

南朝

1995年四川成都出土

远等四百多人在此传教，经常讲般若学，前后共十五年。襄阳被前秦攻克后，道安入长安。为了宣扬阐明佛教义理，道安对佛经作了很多注，并亲为讲述，教出了许多弟子，对弘扬佛法起到了重大作用。晚年，道安在长安译出佛经十部，共一百多万字。

道安的弟子慧远与弟子几十人向南到了

荆州、浔阳等地。慧远是中国人，原本学习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及老庄之学，在听过道安讲的《般若经》后，他认为原来所学的都不足取，转而专心学习佛教，以后成为道安欣赏的弟子。南迁后，他在庐山居住了三十多年，与东晋名士桓伊、王凝之、何无忌、殷仲堪、王谧、王默、谢灵运等交往密切。他

彩绘贴金释迦石造像

南朝

1995年四川成都出土



把当时流行的玄学及传统的儒学结合般若学加以阐述,使佛学在士族甚至帝王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同时他还宣扬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意在要人们注意自己的行为,有劝善的功效。

东晋晚期,法显及一些西域僧人如佛陀跋陀罗等到南方大量译经,使佛教在南方的传播有了适合的条件。

南朝是佛教发展的时期。竺道生是晋宋之际的人,出身士族,幼年师从竺法汰,因而也改姓竺。以后竺道生到庐山向慧远讨教,再到长安跟随鸠摩罗什学习。学成后,他到了南方,阐述顿悟论,认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一阐提人指不信因果、不信善恶都有报应、断绝了善根的人,即在人群中属于恶劣的那些人。这类人只要改恶从善,即可顿悟成佛,更何况一般的人了。顿悟法不用长期修行,积累善果,这对人是有吸引力的,但这也是世道混乱的反映,佛教学说也适应了这种情况。竺道生因其独特的学说被当时佛教信奉者尊奉。竺道生在庐山说法,听讲的人都十分愉快,有感悟。

刘宋许多帝王官员都信奉佛教,如王弘、范泰、颜延之都曾向竺道生请教佛法。谢灵运有专门的研究佛理的著作,并为《金刚经》作注。后他因反叛被处死,临刑前嘱咐把自己的胡须布施给寺庙作为塑造维摩诘像的假须。

宋文帝刘义隆接受了何尚之的劝告,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有利于统治,佛教让人行善,可以使民风淳谨和厚,天下即可太平。因与范泰、谢灵运、颜延之等好佛的士大夫谈论佛教,并自己也加以研读,经常与僧人讨论。宋孝武帝与僧人慧琳交好,让他参与政事,当时称慧琳为黑衣宰相。宋明帝即位,提倡佛教,花费大量资财把自己的故居改建

成湘东寺,认为是大功德。

齐代竟陵王萧子良对佛教极为虔信。他曾手写佛经七十一卷,多次在家中设斋,会请僧人,并亲自送饭送水,被世俗认为有失宰相体统。他还经常与僧人谈论佛理,曾召集一些僧人与宣扬神灭论的范缜辩论。

梁武帝好佛。他早年信奉道教,在齐代是萧子良的西邸之友,与僧人及士大夫交游,以后信佛。儒、道、佛三教中,他把佛教设为最高,认为孔子、老子、周公是释迦牟尼的学生,佛教好比月亮,儒家、道教就像围绕月亮的众星。

梁武帝笃于佛学,曾几次到同泰寺讲经,还对佛经要义作论述,其撰述的佛教论著有几百卷。他先后在建康建造了大爱敬寺、智渡寺,在宫内设了至敬殿。还几次舍身同泰寺为奴,前后由群臣花费四亿钱将他赎回。他早晚到佛寺中礼拜,多次设救苦斋、四部无遮大会、无碍会,做功德为百姓求福。同泰寺是梁武帝经常讲论佛法、举办法会的寺庙,后来被烧毁。梁武帝认为道愈高魔也愈高,应再次修建,新塔应比旧塔高一倍,于是造了一座十二层的高塔。其好佛可谓不惜资财。

梁武帝晚年素食,曾著《断酒肉文》、《与周舍论断肉文》等,阐明戒律的重要性,要求僧尼严格遵守。他自己一天一餐饭,吃豆羹和粗米饭。他崇佛的真正目的是劝善,因为宋齐两代统治层以至皇室内部互相残杀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南方佛教在梁武帝时达到颠峰,东晋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梁时佛寺达到2846所,僧尼82700人。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也都是好佛之人。陈武帝陈霸先、后主陈叔宝都曾舍身寺庙,陈文帝、陈宣帝也大规模地举办法会,对佛教

彩绘圆雕阿育王石造像
南朝
1995年四川成都出土



的态度如同前代帝王。

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佛教认为人可以因果轮回，是以精神脱离肉体常存，即“神不灭”作理论基础，于是有了范缜的《神灭论》，对此展开有力的批判。

范缜，南乡午阳（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出身寒微士族。他不顾王公贵族的威胁利诱，以不妥协的精神反对“神不灭”论。489年，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召集宾客，范缜发表了反对佛教的著作《神灭论》。504年，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

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说，是建立在“形神相异”，即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

立、灵魂不生不灭的理论基础上，这称之为“神不灭”。范缜在《神灭论》中，驳斥了“神不灭”论，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就是说精神和形体是相互依存的，形在则神在，形谢则神灭，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他用锋利不能离开刀刃而单独存在来说明“形”是“神之质”，“神”是“形之用”，“形”指手足、耳目、七窍、五脏等生理器官，而“神”指知（感觉）、虑（思维）、情、性，每一种精神作用为一定的生理器官所决定，“是非之虑，心之所主”，“痛痒之知”以手足为主。

不过，他认为圣人和凡人之不同，是由于他们的生理不同所决定，这说明他的认识还有局限性。

作为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成果，现今仍存留一些石窟寺。石窟这种建筑形式源于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入一起来到中国，为人民所接受。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石窟寺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

敦煌地处中西交通要冲，与西域及印度的往来较为频繁，所以较早就开凿了石窟寺，现存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莫高窟始凿于前秦时的366年，历经千余年不断修造，形成了巨大的洞窟群，现存洞窟735个，分布在1680米长的山崖上。其中南区492个洞窟中有壁画、彩塑，现存壁画45000平方米、塑像2000多尊，这是僧人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北区的243个洞窟则是僧人修行、居住、埋葬的场所。

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莫高窟地处古代莫高乡，石窟因地而得名。

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期，当时中原战乱，人民摆脱不了现实的苦

难，寄希望于未来，弥勒信仰流行。弥勒是佛教中的未来佛。佛经说：弥勒之世，一种七收，树上生衣，随意取用，山喷香气，地涌甘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寿八万四千岁，女子年五百岁出嫁。只有信奉弥勒，尽心修行，来世才能得生“兜率天宫”内，住进弥勒净土，享受“天国”之乐。北朝的北魏、西魏、北周政权，在敦煌统治一百四十余年，开窟建寺达到高潮。从建筑形制看，这一时期有禅窟、寺塔窟、殿堂窟。

禅窟，是禅僧修行的地方。莫高窟的禅窟是开凿在主室内的左右两壁，壁下凿出仅容一人打座的小室。有禅室的洞窟，后壁开大佛龕，雕有佛像。

寺塔窟，又称中心塔柱窟，是在主室的中央留一方柱，将柱体凿成塔状，四面开龕，龕内塑像，禅僧面对佛塔，闭目静思，称为“入塔观像”。礼佛信士常常绕塔诵经礼拜。

殿堂窟，由前室、甬道、后室三部分组

成。前室为长方形，外接土木建筑，构成石窟檐；后室方形，开龕造像，供信徒瞻仰、礼拜和斋会使用。

石窟顶部有穹庐顶、人字披和平棋，往往彩绘莲花藻井，四周有飞天环绕。壁画内容丰富，有佛、菩萨的画像和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等，画中还常点缀山水、树林、动物，构思巧妙，布局严谨。

莫高窟的塑像多为泥塑，外表施彩，有圆雕及影塑，分为佛像、菩萨像、弟子像、飞天像等。莫高窟壁画题材多样，有佛像、菩萨像、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供养人物画及装饰图案画等。这些壁画题材涉及宗教、社会、艺术、经济、军事、科技、体育、民俗等方面，是十分珍贵的文化艺术宝库。

云岗石窟开凿于文成帝时的460年，位于大同市区西面的武州山南麓、武州河北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



北响堂山石窟远景
位于河北邯郸市南



岸。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洞窟内的石壁上、门楣上及顶部雕有上下排列的佛像、菩萨像、飞天像及供养人像，共有大小造像51000尊。其代表造像是第20窟大佛，高13.7米，洞窟原有顶和前壁，后来坍塌，大佛像成为露天的，因之显得更有气势。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是宣武帝为其父母做功德而开凿，北魏以后陆续有开凿。石窟位于洛阳市区南面的伊水两岸山上，分布长约1公里。现存窟龕2100多个，其中北魏窟龕占三分之一，大小石造像10万多尊，碑刻题记3000多品，佛塔10余座。北朝时期的洞窟著名的有宾阳洞、古阳洞。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天水东南的麦积山，始凿于十六国后秦时期。现存洞窟194个、大小造像7800尊、壁画900多平方米，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三代的。大量的造像是泥塑的，有彩绘，塑造水平很高。

响堂山石窟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时开凿的，有南响堂、北响堂、小响堂三处石窟，共

有17个窟，大小石造像4000多尊。响堂山石窟地近北齐邺城。

第三节 道教的发展 演进

道教形成于东汉，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改造和充实，吸收了儒家思想、佛教仪规而发展成为正统的宗教。

道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宗教，它所信奉的“道”，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理论，它追求的“得道成仙”，又深受神仙家养生延年观念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不断演变，道教自身也不断变化和发展。在封建社会里，皇权以神权为依托，神权以政权为靠山，神权与皇权始终保持一致，相互支援。道教也如此。

道教在东汉时被称为“黄老道”，各地的黄老道组织中以张角在东方创立的太平道和张陵在西南创立的天师道（即五斗米道）规模最大，影响最广。黄巾起义就是在太平道

的旗帜下发动起来的。起义失败后，太平道瓦解。天师道的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又传其子张鲁。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三十年。张鲁传播五斗米道，宣扬学道能为人解除疾病。五斗米道设有静室，让病人在其中思索自己的过失，用符水治病，病家要出五斗米，因此被人称为“五斗米道”。道的一级首领名为祭酒，各个祭酒都设置义舍，义舍中放置米、肉，免费提供给行路人。五斗米道实际上提供了政府所无法提供的一些生存保障，吸引了众多信徒。后曹操破汉中，张鲁降曹。曹操下令禁天师道，其徒众北迁。

统治者的法令不可能禁绝宗教的流行。魏晋时期天师道迅速扩展至大江南北，依然成为农民起义的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工具。

两晋时期，道教开始从民间向统治阶层发展，一部分道徒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得统治者的认可和保护，以此来维持道教的生存和发展。五斗米道向其他地区主要是南方地区传播，道教中的长生久视、羽化升仙的内容又吸引了一些统治层的人参与，如东晋著名的大族琅邪王氏、高平郗氏的一些人及殷仲堪、许迈，南朝吴兴沈氏、丹阳陶氏、会稽孔氏等，甚至东晋简文帝、孝武帝，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及南朝刘宋的少帝刘义符等都信奉道教。刘宋时杜子恭传道，许多江东的大户及建康达官贵人都成为五斗米道的信徒。

为适应新的变化，东晋葛洪、杨羲等人先后对道教教义和修练方法进行变革，从理论上将道教的戒律和封建纲常名教相联系，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道教体系，成为道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葛洪认为，道是自然之始祖，万物的大宗，是儒家学说的本源，对其他各种学说有

统摄之功。要想成仙就要把忠孝仁义作为立身之本；仅修行方术，不做道德修行不能长生。长生不老的要诀除了道德修行，还要服食药物、草木丹砂之属。他认为朱砂是上等仙药，茹芝是中等仙药，草木是下等仙药。葛洪专门研究仙药及炼金丹。葛洪的道教著作主要是《抱朴子·内篇》。葛洪的学说有劝善的功能。

葛洪之后，杨羲建立了上清派，主张静功修行，比金丹派简化易行，受到信徒欢迎。

南朝刘宋时供道教徒离家修行的道馆普遍出现，反映了信奉道教人数的增长。刘宋人陆修静制定斋戒、仪范等内容，道教的仪式由此初备。

早期道教追求长生不死、修炼成仙、辟谷、炼丹，其养生之术为帝王所崇信。道教的炼丹术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炼金术与铸造技术的发展。炼丹首先须铸造鼎炉，不同丹药所用的器具不同，如果冶炼的器具质量、规格不精密，就无法炼出丹来，因此炼丹术与冶铸技术是同步发展的。

道教为多神教。相传东汉顺帝时有人授方士于吉神书一百七十卷，称《太平清领书》，又称《太平经》。太平道张角就以《太平经》传道。天师道张鲁作《老子想尔注》，供道教徒修习。寇谦之托称太上老君授他《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改革道教斋戒仪规使其完善，并收集道书，分为洞真、洞玄、洞神三类，编成《三洞经书目录》，计道家经书、药方、符图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使道教经典系统化，为后世编修《道藏》奠定了基础。

梁武帝早年即崇奉道教，当皇帝后并不逾改，官员随同信奉的不少，他与当时的道教大师陶弘景过从甚密。陶弘景齐代隐居在茅山修道，是一位思想家和医学家，为上清



隆绪元年王阿善造像

北朝

高27.8厘米，宽27.5厘米
这是一尊道教造像，发愿人王阿善是一名女性信徒。

派传人，对道教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茅山长期修道，随陆修静的门人孙游乐学习，以后又游历名山大川，搜集了许多道教资料，写出《真诰》等著作。《真诰》共二十卷，主要论述道教理论，认为道产生元气，元气产生太极，太极产生天地，阐明了道教的根本观点。其中还有神仙故事及药物、导引等修炼方法，是重要的道教著作。

陶弘景创立了茅山宗，成为道教中的一个重要派别。陶弘景主张形神双修，养神与

练形并重，总结了道教的养生理论，并重新整理了道教神仙谱系，将幻想中的神仙世界与人间世界相结合。道教经过上述改革与充实，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

在北朝，北魏道士寇谦之在北方推动道教改革，是道教的代表人物。寇谦之是嵩山道士，假托遇到过真人成公兴，又遇到太上老君授之为天师，赐予《云中音诵新科之戒》二十卷，命他清理道教，除去五斗米道三张等人的交纳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以礼



度为首，服食闭练，并派玉女授与服气导引法，能够辟谷。又假托遇到太上老君玄孙神人李谱，授与《图箓真经》，能召百神，并有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要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寇谦之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献道书，拓跋焘于是向天下显扬道教，并亲自受符箓。以后北魏皇帝即位都要受符箓，供养天尊及各种仙人像。经寇谦之提倡并通过北魏皇帝实行的道教，去掉了以往五斗米道及太平道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并使道教开始

有了戒律，让道众建立道观，早晚礼拜。经寇谦之改革的天师道得到了魏太武帝的赏识。太武帝尊奉寇为国师，并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这标志着天师道得到官方的承认。

北齐文宣帝高洋认为佛教与道教二家宗旨不同，要去掉一种。他集中佛道人士彼此辩论，最后下令禁断道教，命所有的道士必须剃去头发成为僧人，不服从者斩立决；若有道士称自己是神仙，高洋就命令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看死不死。此举使北齐境内道士

绝迹。574年，宇文邕也下令禁止北周的道教。

早期道教不立神像，大都是“祭神如神在”，以思念之法来祀神，因“道无形质，盖阴阳之精也”。南朝陆修静始于道观中立神像，接受斋供，但早期道教造像存者甚少。除道教造像之外，尚有道、儒、佛三家同雕一石之上的造像碑。茅山道士陶弘景将《莲花经》与《上清经》并列，在茅山立道、佛二堂，隔日礼拜，一日礼道君，一日礼释迦。至此，早期道教从经典到仪轨都相应完备，又得到官府的支持，形成儒、道、佛互补共存的局面。

第四节 文学的勃兴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诗歌文赋大量产生、名人名家大量涌现的时代。不仅许多士族人物，连一些帝王也对文学创作具有浓厚的兴趣。

曹操父子雅好文学，且都擅赋诗撰文，由于他们的倡导，曹魏集团聚集了大批的文人雅士，为建安文坛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曹操喜爱清商俗乐，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是第一个用乐府旧题创作新辞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曹操不是一个普通的诗人，他常于“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作品或叙事述怀，或写景抒情，都能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深刻眼光。其名作有《蒿里行》、《短歌行》、《观沧海》等，清峻豪迈，历代评价甚高。

魏文帝曹丕倾心文学，曾撰《典论·论文》，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高到与治国平天下同等的地位。曹丕待人随和，又自称“托士人之列”，乐意以

“诗友”、“文友”的身份与文士相交，因此建安文人如王粲、刘桢、徐干等都与他交情深厚。曹丕诗歌的代表作是一些情致深婉的游子思妇之辞。其《燕歌行》之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情韵清婉，文辞清丽，明显地流露出建安诗歌“益尚华丽”的发展趋势。

“三曹”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曹植。曹植自幼才华出众，十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素受曹操钟爱，几度欲立为世子。曹植向以济世匡俗为念，为人有名士之风，任情纵性，不拘小节，又好酒。其前期作品洋溢着贵介公子洒脱不羁的豪情，也有一些感怀时世之作。

曹丕及其子明帝曹叡用事后，忌惮曹植的才华，对他屡加贬抑，曹植志不得伸，其心情之抑郁发而为文，终于造就了建安文学的标志人物、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后期的作品寄寓深沉，梗概多情，文辞华美蕴藉，如五言长诗《赠白马王彪》及辞赋《洛神赋》等。《洛神赋》通过描写人神相遇、相恋而最终不得不分离的故事，曲折反映了他矢志不渝追求理想而终究落空的悒郁不平，全赋意境空灵，辞采华赡，为千古传诵之名篇。

“三曹”父子之外，汉末曹魏时期以文学闻名的还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的作品多是描写时世的乱离，人民的悲苦，对建立功业的渴望，以及征战、田猎的场面，也有奉命而作的应制诗、侍宴诗及政论、公务文章。这些人的作品构思有格局，文句讲究。

西晋有文名的人物是左思、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他们的诗歌文赋大都反映时代问题、个人遭际，也有应制的歌功颂德之作。

左思有《三都赋》，描写魏、蜀、吴三国的都城。为作《三都赋》，左思付出了极大精力，他前后构思十年，翻阅地图、方志，亲自走访调查，了解三都的著名人物、山河地貌、鸟兽草木以及民谣风俗等等。据说，在写作《三都赋》时，左思在屋门、庭院、藩篱、厕所都放置纸笔，以供随时记录涌出的

文思。结果，《三都赋》一世即被竞相传抄，洛阳一时纸贵。

张载的五言诗被钟嵘《诗品》列为上品的中等，评价是：文体华净，少有文字病累，对物的描写有巧妙之思，雄气与潘岳相等，丰富与左思相等，词彩葱蒨，音韵铿锵。

陆机的诗、赋、文共三百多篇，诗歌意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北宋摹本之曹植像

在反映深刻的思想内容。刘勰对陆机的评价是：词句追求广博华丽，文思巧妙但有繁多之累。钟嵘对陆机的评价是：才高，词汇丰富，整体华美，气势不如刘桢，文思劣于王粲，文字规矩而不追求出奇，较为直叙。陆机之弟陆云的风格则明朗简练，文字既有风采又不繁杂。

潘岳文辞清美华丽，刘勰对其评价是：敏捷给出，文辞和畅。此人趋炎附势，为人所讥。潘尼是潘岳从弟，为人与潘岳正好相反，只是勤学写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文学人物是隐逸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大司马，祖父是武昌太守，父亲是安城太守，在东晋属于二流士族出身。陶渊明自己曾任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但他厌恶官场的黑暗虚伪、案牍劳形，最终“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隐居，每日与士人饮酒赋诗，同老农谈锄禾种豆。其诗文意境高远，自然清新，代表作有广为人知的《归去来兮辞》、《桃

花源记》、《归园田居》、《饮酒》等。

陶渊明被后世奉为隐逸诗人之宗祖，其行事为人及诗文风格都对后世文人产生深远影响。

魏晋之时，士人倾慕玄风，好清淡平朴之文，南迁后，渐尚华靡，宋、齐、梁、陈四朝更以文辞之绮艳著称。

刘宋时的诗歌，按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是讲求文字的奇妙，用词的对偶、新奇，对事物描写的丰富，代表人物是谢灵运和颜延之。

晋宋之际的谢灵运，少时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冠绝南方。他是开创山水文学的作家，隐逸会稽期间纵情遨游，所到之处总要为诗作赋，吟咏山水，抒发怀抱。其代表作《山居赋》近万字，详尽地描写了会稽远近山水的状貌、草木鱼鸟及山居生活，辞情极为丰富繁厚。其隐居期间的作品传到城市，不论贵贱无不争相传抄，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颜延之诗歌擅长对偶，所用典故不少，往往是对偶与典故结合使用，以此而有文名。

南朝齐梁时期，诗文的代表人物是沈约、谢朓、王融。齐竟陵王萧子良极爱文学，他在今南京的鸡笼山下的西邸召集好文的士大夫，搜集儒家及各家文集，研习佛教，编纂大部头丛书，也探讨诗文音律，或以诗文酬答，为一时盛事。沈约、谢朓、王融等八人被称为“竟陵八友”。

宋齐时人周顒擅长声韵，言辞富于音调变化，与宾客朋友相会，人们听他发言不觉疲倦，著有《四声切韵》流行于世。稍后到齐永明时期，四声运用到诗文写作中，文人往往力求一篇文字音韵都不同，两行诗句轻重音有区别。写诗讲究平上去入四声，忌讳

《陶渊明集》书影
明万历刻本



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人称“永明体”。四声的出现与诵读佛经有密切关系。四声入诗是唐代律诗的来源。

沈约精通文学、历史，他的诗讲究协音和对仗，他还著有《四声谱》一书，阐述诗歌的声律问题。谢朓文章清丽，擅长乐府诗、五言诗，也以描写山水见长，其文赋、骈文也很有成就，属文讲究音韵技巧。王融的文字多为政论，也有明显的讲究声韵的特点。

梁代的萧统是武帝萧衍的长子，被立为太子。萧统生而聪睿，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会作诗，每次宴会都要赋诗十几韵，有时有人出很难合的韵让他赋诗，他也思索一下便成。他喜欢读书，东宫有书三万多卷，又招引才学之士，与这些人讨论古今，当时“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萧统闲暇时则写文章，其文集有二十卷。他还召集文士把历代五言诗中较好的编成《文苑英华》二十卷，另有流传至今的《文选》三十卷。

《文选》是萧统主持、由一些文人共同编纂的历代文学作品集。上起先秦，下至梁代，收入了一百多位作者的七百多篇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入选作品的标准是对所述事物要经过深思，要用有文采的语言表达出来。由于标准严格，萧统及编纂成员的学识丰富，赏鉴力高，《文选》包罗了梁代以前历代各种体裁、流派、内容的文学名作。如：汉代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是描写都市的；晋左思《三都赋》、张华《海赋》、郭璞《江赋》，这是描写自然的；还有西晋潘岳《西征赋》、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是游记；西汉贾谊《过秦论》是政论；汉代卜子夏《毛诗序》、孔安国《尚书序》、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是学术性的文章。《文选》最早收入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使后代



的文学之士对陶渊明加以注意。正是《文选》编纂的高质量，使其历经千余年而仍为学者文人喜爱。

梁、陈两代著名的文人有江淹、何逊、吴均、阴铿、徐陵、江总等。

江淹以文赋见长，代表作是《恨赋》、《别赋》。《恨赋》写古来不幸人物的遭际，《别赋》写各种人物的离别情态，极富音韵，句法错落有致。

阴铿擅长五言诗，其诗主要描写山水景物，也有写离别的作品及游记，风格清美健拔，这与梁陈流行的宫体诗的靡靡之风大不相同。他也很注重用词、音韵、对偶、典故，

《文选》书影
昭明太子读书台
位于江苏镇江



颇多佳句。他的诗对唐代有一定影响，李白、杜甫都有类似阴铿的诗句。

何逊八岁能写诗，年轻时诗文被时人推重。他的诗歌大多是感叹自己的不得志，赞赏前代英豪往事，也有对山水鱼鸟的描写。他的诗讲究音韵对仗，对后代的律诗有一定影响。

吴均的诗是古体诗，但颇有新意，被一些人学习，谓之“吴均体”。

宫体诗的代表人物是徐陵、江总。

徐陵八岁能写文章，早年与父亲徐摛及庾肩吾、庾信出入梁太子萧纲的东宫。萧纲好写艳诗，文人名士受到影响，成为风气。他们常几人共作宫体诗，风格绮艳，当时称“徐庾体”。徐陵奉萧纲之命编纂了《玉台新咏》，将汉代至梁代涉及女性的诗篇都收入其中。在陈代，当时的对内对外的公告性文书、军事文书及受禅诏册都出自徐陵，他被尊为“一代文宗”。

江总年轻时好读书，善属文，其五言及七言诗尤为独到，风格浮艳，被陈后主欣赏，有文集三十卷。

十六国北朝的文学成就不如南方，多为乐府民歌，风格豪放爽朗，有一些佳作，如《敕勒歌》、《木兰诗》。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都喜好文学，庾信、王褒等善文之士受到优礼。庾信在南朝的梁代就很有文名，西魏攻陷江陵，他被俘虏到长安，在长安他创作了著名的《哀江南赋》。当时南方是中国文学的正统，南方文风对北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结合实际，北方文学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代表人物是北朝后期的温子升。

文学的进展，也催生了一些探讨评价文学作品的著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沈

约《四声谱》。《文心雕龙》五十篇，广泛论及古今文体，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理论作品。《诗品》则对汉代至梁代122位文人进行鉴赏、评价，对后代文学批评及文士、诗人影响很大。

第五节 史学著述的繁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办及私人史学的著家、著作都很多。

编修的汉代史书有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纪》、谢沈《后汉书》、裴宏《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璠《后汉纪》、孔衍《后汉春秋》、范曄《后汉书》、刘义庆《后汉书》、萧子显《后汉书》。

关于三国的史书有：陈寿《三国志》、鱼豢《魏略》、《典略》、王沈《魏书》、孙盛《魏氏春秋》、阴澹《魏纪》、孔舒元《汉魏春秋》、《魏尚书》、梁祚《魏国统》、韦昭《吴书》、环纪《吴纪》、张博《吴录》、王崇《蜀书》、譙周《蜀本纪》、王隐《蜀记》、习凿齿《汉晋春秋》。

记载晋代历史的有王隐《晋书》、虞预《晋书》、陆机《晋纪》、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谢沈《晋书》、干宝《晋纪》、萧子云《晋书》、沈约《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谢灵运《晋书》、刘谦之《晋纪》、徐广《晋纪》、郭李产《续晋纪》、郑忠《晋书》、庾铕《东晋新书》、臧荣绪《晋书》。

关于南朝的史书有：徐爱《宋书》、孙严《宋书》、沈约《宋书》、裴子野《宋略》、萧子显《南齐书》、刘陟《齐纪》、沈约《齐纪》、

江淹《齐史》、吴均《齐春秋》、谢吴《梁书》、许亨《梁史》、何之元《梁典》、陆琼《陈书》。

修编的十六国史书的也有不少，如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李概《战国春秋》、《诸国记略》、和苞《汉赵记》、田融《赵书》、王度《二石传》及《二石伪治时事》、范亨《燕书》、张铨《南燕录》、王景晖《南燕录》、游览先生《南燕书》、何仲熙《秦书》、裴景仁《秦记》、姚和都《秦记》、段龟龙《凉记》、高道让《凉书》、高谦之《凉书》及《拓跋凉录》。

北魏曾废除史官，前期更有崔浩修史之祸，因此没有私人著史，直到北齐才有魏收的《魏书》出现。

上述史书现大部分已失传，流传下来的范曄《后汉书》，是在删定以往诸多后汉史书的基础上写成的，历来评价较高。陈寿《三国志》失于简略，还缺乏表和志，刘宋裴松

之引用有关书籍一百五十多种为之作了补注，大大丰富了其内容，使之成为后人研究三国历史最重要的文献。而魏收的《魏书》虽有“秽史”之称，但实际上其内容并不比一般史书少。

第六节 书法的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也是书法艺术颇有发展和成就的时代。

中国书法从最初的商代甲骨文，经周代金文的大篆，又经秦朝的小篆、隶书，进入汉代、三国时，隶书成为常用文字，立于洛阳曹魏太学门前的三体石经就反映了中国书法字体演变的过程。三体石经刻写了古代儒家的《尚书》、《春秋》等经典著作，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刻写。

咸宁四年吕氏墓砖

西晋

1918年安徽凤台出土

长34.8厘米，宽17.2厘米，厚5.8厘米

其砖文为隶书，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书体。



三体石经

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

刻

1922年河南洛阳出土

残高112厘米，宽46厘米
分别用大篆、小篆、隶书镌刻《尚书》和《春秋》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字体的演变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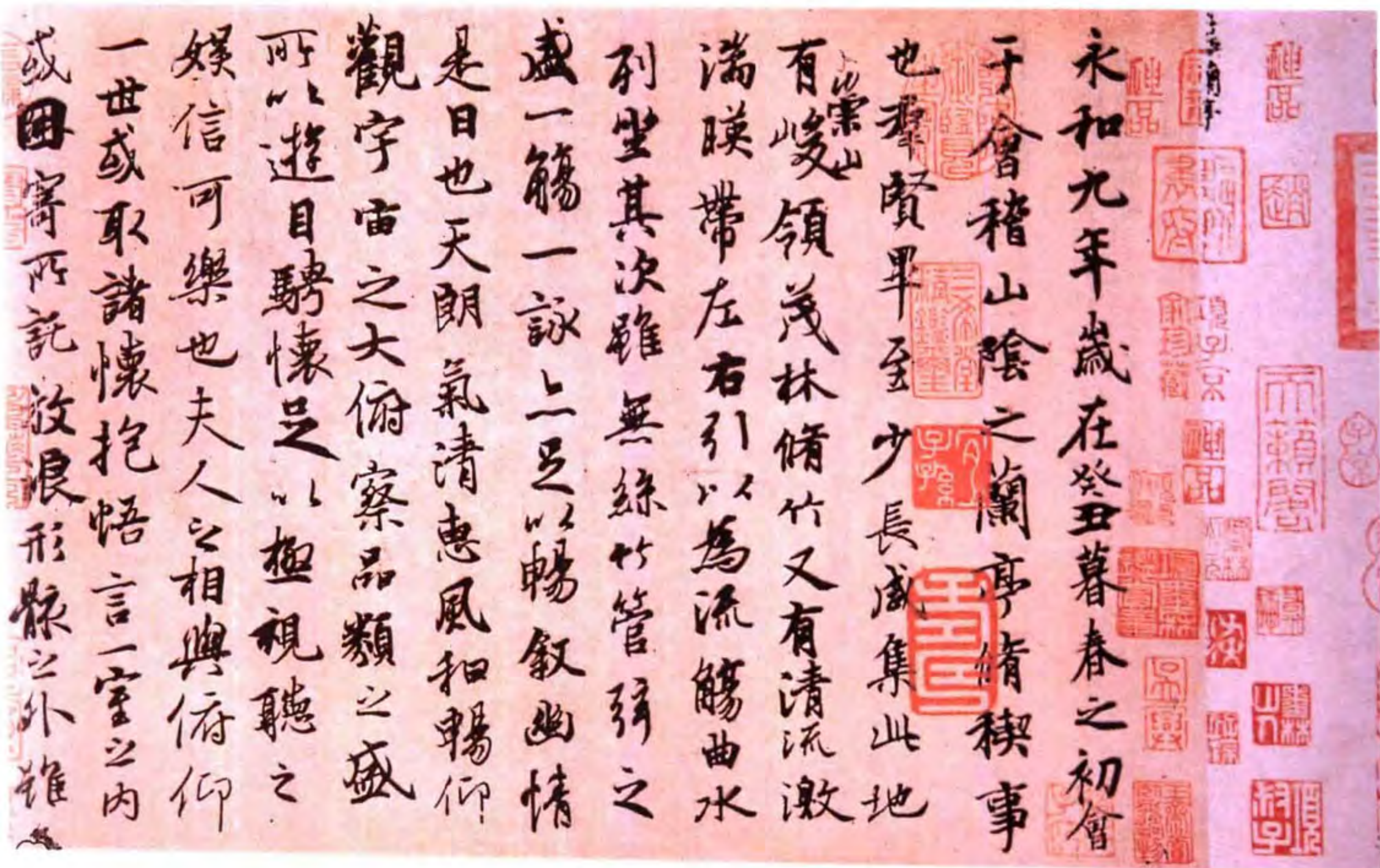
三国的梁鹄、韦诞、钟繇均以隶书见长。梁鹄的书法是向东汉末年人师宜官学习的，曹操说梁鹄的书法超过了师宜官。韦诞经常为曹魏的官府题写府名。钟繇书法成就比韦诞更大，代表作有《荐季直表》、《劝进表》等。

草书在西晋时有著名的写家，卫瓘、索靖并称“二妙”。索靖草书名气大，当时有“索草钟真”之说。1918年安徽凤台出土一块西晋咸宁四年吕氏墓砖，上写草书，透过它可以略窥当时民间草书的一般面貌。

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具有很高的造诣。王羲之少年时师从卫瓘之女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又游历各地，见到了李斯、曹喜、蔡邕、张昶、钟繇、梁鹄等人的书法作品。他从各种碑字中学习书法，“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创制了新体。他的书法在当

时及后世都有很高的评价。唐太宗认为，详细了解古今书法，研精篆素，尽善尽美的书法家只有王羲之。说他的书法，“点画之工，构造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凰翩飞，游龙栖绕，字势似倾斜而实直”。

王羲之的代表作是《兰亭序帖》。永和九年王羲之与谢安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作修楔之会，诸人饮酒赋诗，王羲之书写诗序，即成《兰亭序》。《兰亭序》文字书法俱佳，其文清新隽永，其字飘逸不凡。笔画或出锋，或顿挫，或引长，或短收，既酣畅淋漓，又举措有度，结体有的取长势，有的宽博平和，有的左撑右挺，有的紧密内敛，全篇同样字的结构无一相同，毫无苟且之处，字的大小不一，字距、行距疏密不同，似随着文思张弛而自然流转。唐代孙过庭《书谱》评价王羲



之“兰亭兴集，思逸超神”。后人称《兰亭序帖》为天下行书第一法书。

王献之幼年学习父亲书法，以后又学习张芝风格，精通各种书体，在此基础上，他创造了一种姿态更为豪放纵逸的书体。王献之认为其父书法革新不够，便在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草非行。其代表作有《鸭头丸帖》，风格舒展俊美。

北朝也是书法大为发展的时期，流传至今的多是一些石碑及墓志文字，风格多方正硬朗，当然也有一些圆润的作品。北朝书法的代表作是洛阳龙门石窟的一些造像题记。如《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简称《杨大眼造像记》，在龙门古阳洞壁，是著名的龙门四品之一，共11行，每行23字，笔画取方势，撇画笔势流锐，捺画锋棱强劲，横、长竖画多沉实安稳，短竖、点、折、钩多劲力内蓄。



《兰亭序帖》（神龙本）

王羲之书

《鸭头丸帖》

王献之书

《杨大眼造像记》(拓本)

北魏



第七节 绘画的代表作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画家较多。三国时有曹不兴始画佛像，所画的龙极具风骨。晋代则有卫协与张墨，二人是曹不兴的弟子，擅长人物画，不仅神似，而且富有神采，当时

称为“画圣”。

出土文物中，甘肃嘉峪关、敦煌的一批墓室中的砖画很值得注意。1972年至1973年，在嘉峪关发掘了八座曹魏、西晋的墓葬，其中的六座墓有砖画，共600多幅，是在墓砖上绘出的图画，每幅画或单独成画，或与其他砖画组合成一个场面。砖画以白色为底，用墨线描绘，其他颜色主要是红色，少量部位用赭石、黄、绿等色。画面的内容有墓主人宴饮、出行及伴奏的乐队和侍男侍女；有农业生产场面如耕种、扬场、放牧、采桑、放鸡、果园等；有生活场面如庖厨、宰牲、汲水、酿造、狩猎等；其他的内容还有军营、驿传等。这些砖画线条少而洒脱，设色单纯，对人对物的描绘不求工细形似，但极有生气，画面简练质朴。

敦煌西晋墓也有砖画出土，数量较少，手法风格与嘉峪关砖画很接近。历经曹魏西晋百年而如此一致，可知这是河西走廊地区当时成熟的绘画风格。

东晋著名的画家有戴逵、顾恺之。

戴逵擅长人物画和山水画，唐代张彦远称他的山水画极妙。戴逵的画惜早已失传。

顾恺之出身晋陵顾氏。顾氏在三国时就

《李广骑射图》画像砖

晋

1992年甘肃敦煌出土
高15.8厘米，长29.2厘米



是江南大族。其祖父为东晋光禄勋，父亲是尚书右丞，顾恺之本人先后担任大司马桓温参军、荆州刺史殷仲堪参军、荆州刺史桓玄参军，官至散骑常侍。世人称其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

据说，顾恺之曾把一橱自己的绘画交给桓玄保存，橱门有封条。桓玄没有从前面而是从后面开启盗走了全部绘画，把橱复原还给顾，说自己没有打开过。顾恺之发现画没了，但封条还在，只好说：这些画能通灵，如同人修炼成仙变化而走。顾恺之性情幽默，人们都喜爱亲近他，桓玄于是告诉他有一片柳叶是蝉用来隐身的，人若拿着它遮蔽自己，别人就看不到。顾恺之很高兴，拿柳叶遮蔽自己，桓玄就向他身上小便，意思是没有看见顾。顾恺之只好表示相信桓玄真的看不见自己，还装作十分珍视这片柳树叶。这样装傻，久之成性，这就是他痴的内涵。他自称痴黠各半，说得很明白。

顾恺之是卫协的弟子，擅长人物画和佛道壁画，也画山水画。他的人物画非常传神。建康瓦棺寺刚建成，寺僧请士大夫捐钱，但所捐不足十万。顾恺之闭门一个多月，在寺内的墙上画维摩像一幅，画成而不点睛。他对僧人说，我点画出眼睛后，你们打开门，第一天看画的人每人要给钱十万，第二天给五万，第三天任意。结果，当天收钱百万有余。顾恺之还著有绘画理论著作，如《论画》、《画云台山记》，认为画家必须对事物对人有所认识，“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巧思于精密”，指出骨法、气势、神情、韵味是绘画的要素，还要手上的技法能反映出心意所想，有一毫的小小之失误，就会影响对人物神情、气质的描绘。

顾恺之曾根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画成《女史箴图卷》，后失传。现传《女史箴

图》为唐代摹本，藏大英博物馆，绢本设色，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手卷式，全卷十二节画面，线条绵密。人物刻画传神，是研究顾恺之作品的珍贵资料。

顾恺之的另一著名作品是《洛神赋图卷》，根据曹植同名文赋绘成。原画已失，现传北宋摹本。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手卷式，以若干独立又情节连续的画面描绘曹植及随从途经洛水，时已黄昏，人困马乏，停车岸边，在神情恍惚间与洛水女神相见。洛神风采闲雅，曹植心生爱慕，然而人神终不能相处，曹植惆怅离去的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北宋摹本之洛神像



故事。全画布局错落有致，人物颇具气度，刻画传神，很好地表现了洛神与曹植二人当时的心态，间以树木山石，极有章法。线条具有顾恺之的绵密风格。

南朝刘宋的名画家有陆探微和宗炳。二人都以人物画见长，宗炳还以山水画有名。齐代的谢赫不仅擅画人物，也有理论贡献。他归纳出绘画六法：一为气韵生动，二为骨法用笔，三为应物象形，四为随类赋彩，五为经营位置，六为传移模写。这六法对后世影响甚广。他还撰《古画品录》，对魏晋以来二十七位画家作了品评。

梁代的张僧繇借鉴古代印度画法，使画出的对象有凹凸感。他曾在建康的一乘寺用此法画花，从远处看有凹凸感，从近处看则是平面的。他的画很肖似，梁武帝的儿子们有一些派驻外地任刺史、都督，梁武帝时常思念，因而命张僧繇至益州为武陵王萧纪画像，武帝见到画像后减少了思念之情。

南朝梁元帝萧绎博学多才，勤于著述，同时也是一位画家，擅长花鸟、走兽，也画人物。他曾画过一幅《职贡图》，反映当时中国与国外一些政权的交往情况。此画现存北宋熙宁年间的摹本，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198厘米。图卷原画来中国的使节二十五人，现已残缺，仅存十二使节。每个使节均单人右向侧立，身后有题记文字。每个使节的体形、面部特征、服饰神情都不相同，较好地把握了不同地区、民族人物的特征。

1958年，河南邓县一座南朝墓中出土了几十块画像砖。这些砖镶嵌在墓室两侧的墙壁上，是预先在模上刻出画面，再印到砖坯上，然后烧制而成的。这些砖画表现的是墓主夫妇出行及生活的场面，有墓主夫妇、武士、侍女、牛车、马匹等。虽然是砖画，但也是类似毛笔的线条画，应有在纸上或绢帛上绘出的原本。该画线条飘逸绵软，画面大多简练，人物柔弱瘦软，似乎缺筋少骨，别

贵妇出游画像砖

南朝

1958年河南邓县学庄出土
长38厘米，宽19厘米，厚
6.3厘米





凤凰画像砖

南朝

1958年河南邓县学庄出土

长38.7厘米，宽18.9厘米，厚6.3厘米

具韵味，看得出画的原作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北朝名画家有北齐的杨子华。相传他曾在墙上画马，晚上人们听见马长鸣的声音，好像在要水草；又说他曾在绢上画龙，展开画卷时总有云气聚拢。这些都说明杨子华的绘画很逼真。北齐的曹仲达也是著名画家，善画佛教画。宋代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说曹仲达的笔法“其体稠迭，而衣服紧窄”，所绘人物的衣服似被水沾湿贴体，后人称之为“曹衣出水”。

1981年，山西太原发掘的北齐娄叡夫妇墓中发现了大量壁画，分别位于墓道、天井、甬道、墓室等处，大部分保存完好，共存71幅，约200平方米。

娄叡夫妇墓门门额中间绘龙头，头上有莲花摩尼宝珠。门额两侧绘两只金翅鸟，口衔莲花。墓门绘彩云及青龙白虎，门框绘忍冬纹。墓道两侧的壁画描绘的是娄叡出行与回归的场面，共分三层，上层、中层是仪仗队的官兵，下层是军乐队。墓室顶部绘天象，顶部向下绘十二生肖像，再下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墓室西壁绘牛车，车后

绘出娄叡夫妇像，上有华盖，后面有男女仆人相随。北壁绘帟帐几案以及歌舞奏乐伎人。东壁绘旗帜、羽葆、鞍马、随从。这些壁画具有很高的水平，有学者推测是当时的宫廷绘画高手或者就是杨子华所绘。

娄叡夫妇墓中最具代表性的壁画是出行图。出行图壁画共10幅，在墓道西壁，与东壁的回归图相对。大小幅相间，小幅在前，大幅在后。小幅出行图高130厘米，宽168厘米，画面上绘二人二马。大幅出行图高160厘米，宽202厘米，画八人四马。画中人物形象端严，马匹体魄雄健，造型准确，具有高度写实性。画面布局疏密相间，既分组清楚，又以人的目光互相呼应。人物马匹虽聚集而不局促，顾盼转侧略带夸张，大量同一场面的人物也不相雷同。如一幅小幅壁画中，年轻者穿白衫骑黄马，扬鞭前行，年长者穿红衫骑枣红马，马首与前身挺起，作惊蹶之状，骑马的人躬身前倾，以求平衡。壁画线条清楚、圆劲，赋色简练，人物马匹富于动感。

佛教画也是当时绘画的一大类，寺院里往往要画佛像和其他与佛教有关的绘画。莫高窟现存大量这一时期的壁画，以佛经故事为主，还有佛和菩萨像，也有世俗生活的题材，其中不乏水平高超者，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绘画的代表作。

第254窟的北魏时所绘《舍身饲虎图》，纵165厘米，横172厘米，为佛本生故事画。佛经说释迦牟尼有许多前生，每生每世都以慈爱救渡众生为任，所以能摆脱轮回成佛。这些本生故事随着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

这幅画描绘了释迦牟尼曾为太子，名摩柯萨垂。一天他与两位兄长出游，见山谷中有七只刚出生的小老虎围着母虎求乳，母虎由于分娩和饥饿的折磨，已奄奄一息，没有

娄叡墓壁画《出行图》(小幅)

北齐

1981年山西太原出土





莫高窟第254窟壁画《舍身饲虎图》

北魏

乳汁。摩柯萨垂让两位兄长先离去，自己脱衣躺在母虎身前让它吃，但母虎无力啃咬，摩柯萨垂又爬到崖上，用竹枝刺破身体出血，再纵身跳到母虎身边。这时地震天暗，风吼浪翻，诸天神为之感动，祈祷赞颂，香花遍撒山谷，母虎舔血后略有力气，将摩柯萨垂啖食。国王、王后和两位兄长赶来，看到斑斑血迹和骨骸，万分悲痛。

壁画绘出了山间见虎、刺颈、投崖、饲虎、回宫报信、家人悲泣、收拾骸骨、起塔供养八个情节，并将其组合在一个画面上，这样各个人物的悲壮、怜悯、悲伤的表情和自残、牺牲的体态被安排到一个空间，视觉

效果非常丰富、强烈，但又主次分明。“饲虎”是主题，在画面上占三分之一，人物形体也画得较大，构成壁画主体，为避免重复，山间见虎、刺颈、投崖三个情节中老虎只出现一次，可以看出画家对构图有一番巧妙安排。摩柯萨垂的仁爱、牺牲精神在壁画中被着意表现。画出了他见到老虎母子时的怜悯、刺颈时的坚毅、投崖时的果决、饲虎时的泰然。画面没有描绘摩柯萨垂被虎吃掉后血肉模糊的残躯，而是恢复了他原有的形象，以躯体的完美强调其人格的完美。壁画人物比例协调，结构准确，线条流畅而富有弹性，还采用了有明显西域风格的晕染法，



莫高窟第249窟壁画《狩猎图》

西魏

画面洋溢着很强的宗教气氛。

莫高窟第249窟的壁画《狩猎图》是西魏时期的作品。画面左下方画一猎人跃马山间，身后有一猛虎飞身前扑，猎人与虎似经过了一番追逐周旋，猎人所骑的马匹后腿踏地，前身挺起，猎人转身回首，劲弓满张，引箭将发。画家只撷取了猎人射虎的一瞬间，却涵盖了猎虎的全过程。画面上方绘另一猎人跨马疾驰，手举标枪，追逐一群奔跑的黄羊，场面十分活跃。右下方一只黄羊在两棵树间悠游，与狩猎的情节与动态场面对比产生了一个丰富的意趣。

壁画中的山峰、树木与人物、马匹、野兽相比明显矮小，却使人觉得山林之间有开阔的场地，任人物、马匹、野兽腾跃奔跑，一点儿也不嫌局促。座座山峰用赭、蓝、白三种差别较大的颜色画出，看上去似峰峦重重。左上角两棵老树被画得干粗色重，同样

具有树林的实体感。画中人物、马匹、野兽造型简练，动态表现得很好。虎和黄羊的后肢、尾部画得比正常稍长，符合快速奔跑时人们的视觉效果。人物、马匹、野兽都是侧身，并用重彩填涂，以显示运动时特有的强劲体态；猛虎虽仅用土红线白描而成，但仍生动有力，看上去不觉形体单薄。

第八节 雕塑艺术的旧趣新风

从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到，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雕塑艺术有着多样的风格，不论是工匠的制作，还是雕塑师的作品，留存至今有不少水平高超之作，这是中国造型艺术有很大发展的时期。

瓷器作为雕塑艺术的载体，这一时期出



青瓷羊

三国 吴

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

高23.4厘米，长32厘米，宽

15.2厘米

现了一些佳作。

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了两件三国时吴国的青瓷羊形尊，造型大小相同，长30.5厘米，高25厘米。羊尊被制成卧伏姿态，头部刻画十分精细，极为肖似，嘴微张，颈稍短，身体肥硕浑圆，约略刻出一些阴线代表羊毛，四肢屈曲，瘦细而显骨骼，无羸弱不胜身躯之感。颈部、身躯比真实的动物略肥，但视觉上却不觉比例失调。羊的姿态安祥、驯顺，配上匀净沉着的青灰釉色，有稳定踏实之美。

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的三国时吴国的青瓷熊灯也是一件杰作。此灯高11.5厘米，灯盏为钵形，灯柱制成一只幼熊形状，胖身鼓腹，四肢细弱，身体刻画出竖线纹代表鬃毛。熊蹲坐在灯座上，头顶灯盏，双臂按在头两侧，好像因头顶重力而伸臂护持，又好像在玩有趣的游戏而露出新鲜好奇之感，表现出

熊特有的憨笨姿态，极为传神。

1964年江苏南京西晋墓出土瓷质的男、女俑各一件，男俑高20.5厘米，女俑高23.5

青瓷灯

三国 吴

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

高11.5厘米，口径9.7厘米，

底径15.5厘米





瓷男俑与瓷女俑
西晋
1964年江苏南京出土

厘米。男俑头部稍大，额头圆凸，鼻梁、双目下凹，嘴的部位偏下，表情执拗，肩膀窄短，双臂紧挟上身，类似儿童体形，嘴唇上却有两撇重重的胡须，头戴巾，身穿袍服，双手端拱，跪坐，应为一个吏，合乎礼法的姿态与儿童的躯体相对照，富有滑稽趣味。女俑的身份应是侍女或奴隶，身体也是儿童比例，立姿，双手贴于腹前，表情温良，与身份很贴切。二俑以阴刻的点与线刻出衣纹，使圆浑的体形有了一些几何形体面，人物也有了几分规整。头上的巾及发式只用简单线条刻出，不另加塑造，突出了人物的头部形态及表情。整个俑的塑造没有刻意堆加或过于忽略的部分，把握有度。

东晋及南朝雕塑继承了三国西晋风格，制作得较为规整一些，从江苏南京出土的一件陶女俑就可看出。此俑高33.7厘米，身材已脱离了儿童的特点，五官塑造也是力求准确，服装、头饰的塑造较少随意之处。

现存南朝雕塑作品中突出的是江苏南京及周围地区的南朝帝王陵墓石兽。在江苏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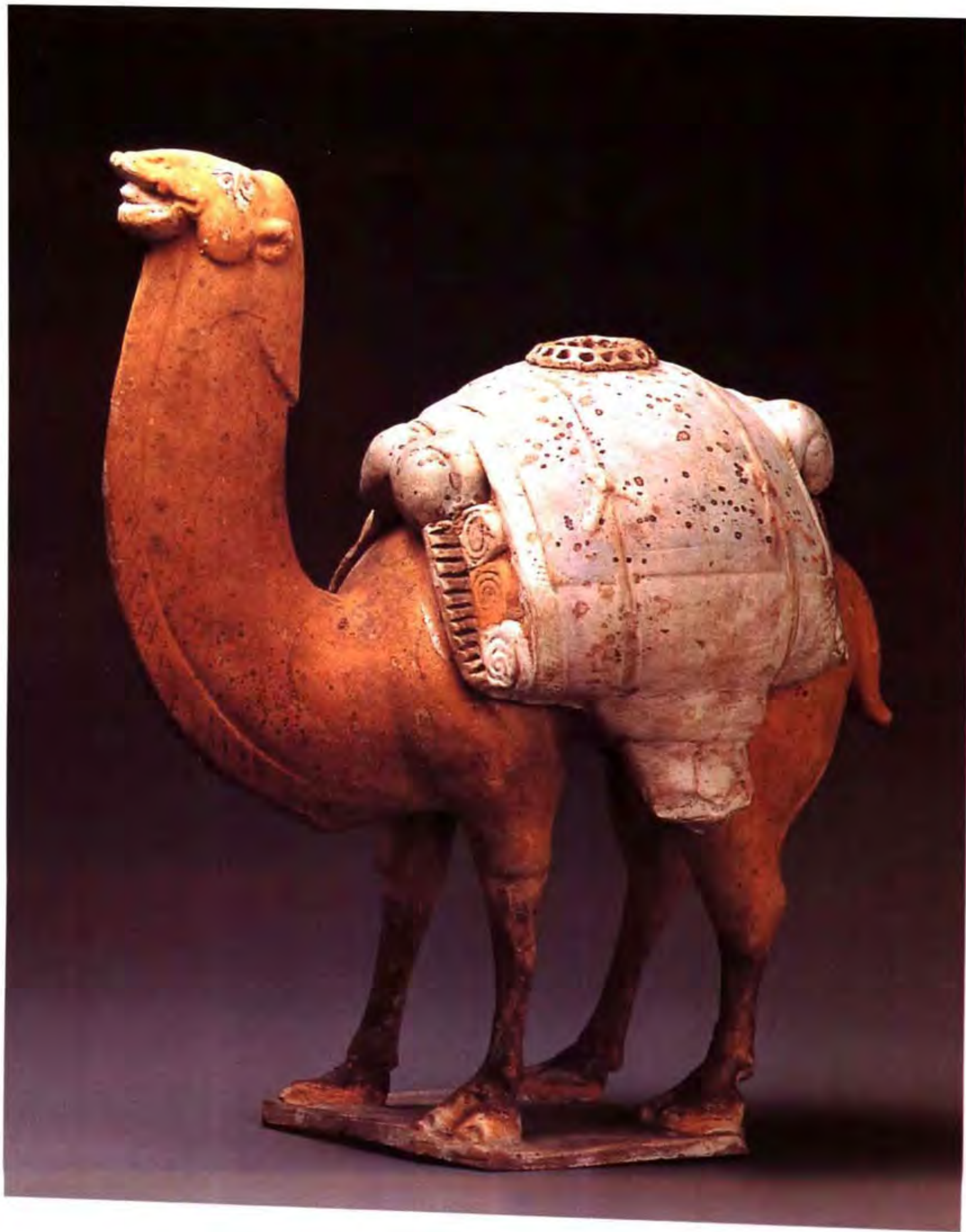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麒麟

阳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前有一只石麒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这只石麒麟身長3.05米，由于四只腿已缺失，身体残高2.30米。昂首挺胸，双目圆睁，尽管已残，但仍不失雄傲的体态及神气。关于麒麟与天禄，有说是来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动物，也有说是根据汉代以来传入中国的狮子的原形创作的。二者都有类似狮子的体貌、神气。二者的区别，一种说法是头上有一角的是麒麟，长二角的是天禄。南朝帝王陵墓前大都有石麒麟、石

天禄相对排列。

北朝雕塑在准确规整方面有很大进步，较之同期的南朝雕塑明显成熟，基本上能够表现出成年人的身材，比例上相当准确，服装冠饰也与实际相同，只是由于一般陶俑头部较小，多数陶俑的五官不可能加以个性刻画。不仅对人，对动物的塑造也有很高水平。

1955年，山西太原北齐张肃俗墓出土一件陶骆驼，高29厘米，直立姿态，下有方板，造型逼真，塑法细腻，陶骆驼的四肢骨节都



骆驼陶俑

北齐

1955年山西太原出土

高29.8厘米，长26.6厘米

骆驼俑从北魏时期开始出现，一直流行到唐代。

被塑出，与宽大的掌、趾配合，显得坚实有力，能负重物。骆驼头部刻画相当传神，颈部弯弧而长，十分优美，尽现骆驼的从容徐缓之习性。陶骆驼全身比例匀称，结构准确，体块起伏自然。雕塑家以极为写实的风格塑造出这匹体魄健壮、神情怡然自得的骆驼，可称得上是北朝俑塑中的佳作。

雕塑艺术的一大门类是佛像，在南方地区自东晋刘宋时起，佛教造像成为一门艺术，这是由戴逵、戴颙父子开始的。戴逵、戴颙是当时的大隐，戴逵善弹琴书法、绘画雕塑，戴颙也学得此艺。刘宋时朝廷在建康瓦

莫高窟第275窟交脚弥勒菩萨塑像

十六国北凉



官寺铸造一丈六尺高的铜佛像，铸成后，觉得佛像面部偏瘦，铸工无法纠正，请戴颙来看。戴颙说，不是面部瘦，而是肩臂部肥了。于是把肩臂部位削减，面部就果然显得正常了，人们无不叹服。

北方地区从十六国起佛教学说流行的同时，佛教艺术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产生了一些很好的雕塑艺术品。

莫高窟第275窟是北凉时期开凿的，正壁中央的交脚弥勒菩萨像亦属同期塑造。此像高3.35米。据佛经记载，弥勒出生于古印度婆罗门家庭，以后成为佛的弟子，先于佛入灭，上生于兜率天内院。

佛教把有情众生（人和一切有情志的生物，包括各种神）所居住的世界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色”在佛教中指有形物体）。欲界为有食淫欲望的众生所居，这类人如果不修“四静虑”的禅定或修持达不到一定程度，死后只能往生欲界，再轮回为人、畜牲、饿鬼、地狱、恶神阿修罗。如果修持“四静虑”达到一定程度，摆脱了淫食欲望，可往生色界。而无色界为无可视形体的众生所居，又是一类世界。三界众生要在生死世界循环不已，只有达到涅槃境界即成佛，才可升入不生不死的西方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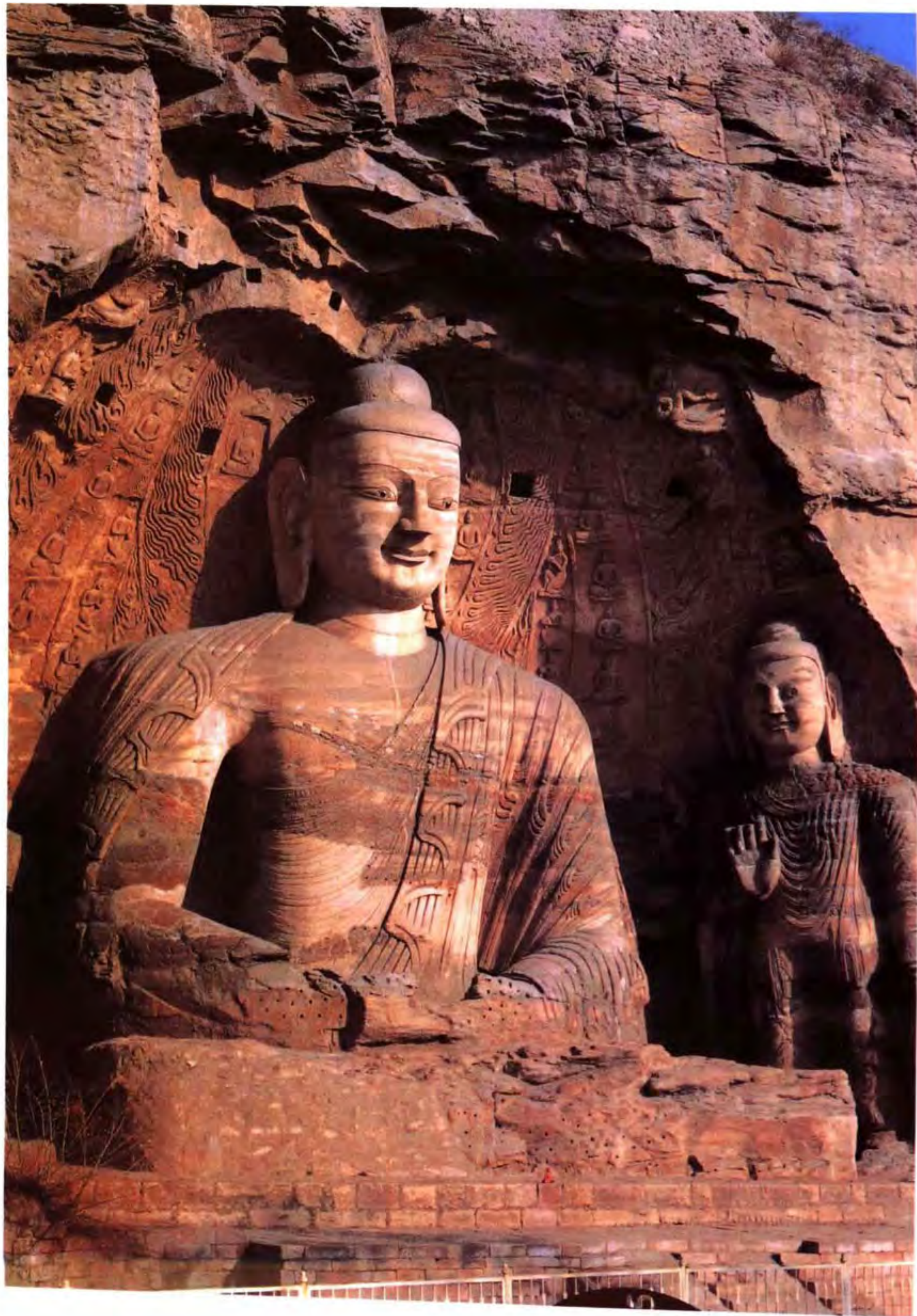
三界中层次最低的欲界又分六重天，兜率天是其中之一，兜率天分为内外两院，外院是欲界的一部分，内院是“净土”。弥勒已具菩萨行，入灭后应往生色界，而却下住欲界，这可能是因为他受了佛的预言将继承释迦成为未来佛，成佛的方式是下生人间，尔后成佛，并在人间向众生广传佛法，所以在轮回为人的欲界居住。

这尊佛像头戴三珠宝冠，上身袒呈，璎珞、披巾垂绕，下着羊肠裙，裙薄贴体，裙纹细密平行，彩塑面部丰满秀雅，鼻梁高隆，

与额平齐，眼球外突，垂发披散两肩，胸平腰细，坐姿平正，左臂向侧下伸展，手掌翻张，右臂抬起，手掌已失，两腿相交，神情清淡温润，这是具有自悟、觉众生品格的菩萨常见的神情。

大同云岗石窟第20窟的大佛像，高13.7米，结跏趺坐，双手为禅定印姿势。大佛像

内着露右肩的僧祇支，外着袈裟。身后有浮雕的火焰纹背光，背光上有小坐佛像及飞天像。大佛像肩宽体厚，体魄强壮，神情平和中带有刚劲，不似一般所见佛像的慈悲温和的表情。从某些角度看，佛像双眼威武有神，似在审度万物，嘴角带有矜持的笑意，大有压倒一切的好胜气度，体现出君临天下的帝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第20窟
大佛像

北魏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第18窟
弟子雕像

北魏



王风貌。

有的学者认为，北魏前期有将皇帝等同于佛的做法，道武帝把道武帝看作“当今如来”，要佛教徒礼拜。文成帝也曾下诏造石佛像，要求与自己的形像相似。454年，又下诏为自己及前四世皇帝在佛寺内各铸一尊释迦铜像，这与岗早期的五座大洞窟即昙曜五窟的数目一致。昙曜五窟即是为文成帝及前四世皇帝而开凿的，学者甚至猜测五个窟的主佛与这五个皇帝的相貌相类。按这一推断与猜测，第20窟大坐佛像可能反映出道武帝拓跋珪的某些特征。道武帝是北魏开国皇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
洞佛像

北魏



石柱础

1965年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

帝，主持了拓跋部的内迁及定都平城，先后打败了许多强敌，武功赫赫。大佛像鼻梁高直，眉弓略突出，眼眶稍凹，嘴唇体块分明，身体各部准确合度，身上的僧衣紧密贴体，衣纹细密。

云岗石窟第18窟的主佛与东西两立佛之间，原有十身弟子高浮雕，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的形象。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后，四处弘法，听法弟子前后共有几千人，经常随侍者有几百人，其中又以阿难、迦叶等十人最著名。他们的形象经常在佛教寺院里出现。云岗十大弟子像有残缺剥落，现存的一尊迦叶头像雕刻精妙。迦叶是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人，出身于婆罗门种姓，以后皈依释迦牟尼。迦叶在佛教造像中有时是老年西域人形象。这尊像高鼻深目，短发，双目阖闭，眉头紧皱，双唇有笑意，头部各部位结构清楚，块面分明，面部消瘦，骨骼棱起，唇薄，上颌略短内收，下颌尖而略外突，较好地表现了上年纪西域人的面部特征。

龙门石窟宾阳洞是北魏洞窟，洞中的佛

像是这一时期佛像的代表作。像高8.42米，为如来结跏趺坐在狮子座上的形象，背后有浅浮雕的火焰纹背光，背光中央有忍冬纹顶光。此像面部有关注的表情，形象和气、可

虎头石门墩

1976年山西大同永固陵出土



亲可近，展示了人物聪慧的器性。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觉悟真谛后，四处向大众传播佛法，80岁圆寂，进入涅槃状态。大乘佛教认为佛入涅槃，摆脱生死轮回以后，仍不脱离世间，以弘扬佛教真理，普渡众生，与此造像的面部表情相合。此像面目清秀，身体魁伟，雕刻细致，佛像的髻发纹路细密，服装有柔软质感，上衣线条流畅，下裳褶纹稠密，叠错有序，增加了佛像下半部的体量，使形像更具有稳重感，身材也显得高大，背光、顶光纹饰繁复多样。

孔雀图石浮雕

1976年山西大同永固陵出土



佛教艺术的传入，带动了这一时期雕刻艺术的发展，1965年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柱础是一佳作。柱础高16.5厘米，边长32厘米，是用于插立屏风的。上部是扁圆体，中央有孔，孔周围有两周莲瓣纹，再向外是高浮雕的蟠龙纹，龙身长而交错回绕。蟠龙纹下有一周云气纹为高浮雕，似表示龙在天际遨游。石柱础下部是一个方形座，四角各有一个圆雕的伎乐人物小像，人物大头，短胖躯肢，体似童子，又面相老成，跪坐姿势，正在演奏乐器、跳舞。服装贴身，上有披巾缠绕。这种短胖躯肢、着贴体服装的人物造像，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中多见，应来自古印度的笈多艺术。

1976年山西大同北魏永固陵出土的墓门有很好的石雕。在拱形门楣两侧，各有一个童子雕像，高约37厘米。童子赤足，体态丰腴，面带微笑，衣带飘拂，手捧莲蕾。童子以下各有一个朱雀浮雕，朱雀口衔宝珠，立于圆顶束腰状物上。这些雕塑与大同云冈石窟中部窟群的艺术风格很相近。而拱门两侧的下方各有一个虎头形的石雕门墩，五官极为突出、夸大，强化了虎的凶悍，可能是起镇墓作用的。这种超出实际形象的风格极具艺术效果。

第九节 音乐舞蹈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音乐有了较大发展。曹操、曹丕、曹植及当时的文人大量创作歌词，配合曲调乐器演唱，成为一大趋势。到西晋、东晋时，度曲填词更成为时尚，上至帝王，下到文人官员创作了不少的歌词。南朝人将这种音乐称为清商乐，如陈后主《玉树后庭花》即属此类。

清商乐中的一大类是吴歌，在东晋南朝盛行；另一类是西曲，出自南方荆州、郢州、襄樊、邓县一带。清商乐不同于正式场合演唱的雅乐，是日常娱乐欣赏的。其歌词出自当时的帝王、官员或来自民间，题材涉及各个方面，如曹操的《短歌行》、《苦寒行》，王粲的《从军行》，是咏唱时世艰难及军旅生活的；西晋石崇、绿珠的《懊侬歌》，是写男女之情的；民间女作的《子夜歌》，则是鬼歌；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歌唱美女；其他也有演唱汉代旧曲的。

南朝的梁代引入了北方流传的鼓角横吹

曲。陈后主曾令宫女学习北方的箫鼓，在酒宴上歌唱。

清商乐的伴奏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箏、节鼓、笙、笛、箫、篪、埙等。

北方的十六国及北朝流行鲜卑及西域音乐。鲜卑人用鼓、牛角及横笛演奏，在军队中及宫廷、出行场合演奏。鲜卑风格的歌曲也有不少，《真人代歌》是鲜卑语歌曲，在唐代还存有五十三章，北魏宫女早晚都演唱这些歌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汉族以外的

女乐陶俑

北魏

1953年陕西西安出土

弹琴俑高22.5厘米，说唱俑高24厘米

当时的宫廷和高官府第宅内设有乐队，有时还伴以演唱。



弹琵琶陶俑（左）

北齐

1973年山西寿阳库狄回洛墓出土



彩绘舞蹈陶俑（右）

北齐

1987年河北磁县出土



音乐舞蹈传入内地。天竺乐在前凉时传入河西，龟兹乐是前秦吕光时传入的，西凉乐是后凉、北凉时在龟兹乐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的音乐风格而形成的。

北魏平定河西，得到北凉的伎乐，伎乐在会见嘉宾的场合演奏。北魏时，不少西域人来到中国，带来了这些地方的音乐。北魏灭北燕，得到高丽乐。北魏南征也得到了流传在南方的中原旧曲及吴歌西曲。

北齐人喜好西域文化，西域音乐极为流行。齐后主高纬迷恋西域音乐，对此外的音乐都不喜欢，他还能自己演奏西域乐曲并歌唱。他所喜好的主要是哀怨的曲风，曾经采寻到新的曲调，创作《无愁曲》。其音乐灵动曼妙，极富哀思，齐后主让西域人宦官齐声合唱，到曲终时，闻者无不流泪，可见此曲极富感染力。

北周与北方草原民族通婚，这些民族曾

获得西域的康国及龟兹音乐，也将它们传入中国北方。

北方音乐中，不同地区的音乐所用乐器不同，如西凉乐的乐器有钟、磬、弹箏、挡箏、卧箏篥和竖箏篥、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小筚篥、长笛、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钹、贝等。龟兹乐的乐器有竖箏篥、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舞蹈除郊庙、朝飨的仪式舞蹈外，还有不少采自民间，然后用于官府宴会，也有的舞蹈大量采用清商乐的乐曲。魏晋时，在宴会上饮酒到兴起时常起身舞蹈，名曰属舞。一个人先舞蹈，邀请另一人跳舞，被邀者起舞，为“报”。到南朝时变为由艺人舞蹈。著名的舞蹈是《白紵舞》，原是三国吴地的民间舞蹈，以后在宫廷也表演，舞曲属于清商乐。舞蹈者身穿白紵舞衣，



黄釉乐舞图瓷扁壶

北齐

1971年河南安阳出土

高20.5厘米，口径5.1厘米，

足径10.1厘米

从其舞蹈者和伴奏者的形象、服饰看，表演者应是西域胡人。

“质如轻云色如银”。舞蹈以舞动衣袖为主，身躯婀娜，徐徐而起，两臂高挥如天鹅飞翔，眼神顾盼表现出舞意情绪，舞蹈中间舞曲音乐变急，舞蹈节奏加快。梁代以前多是独舞，以后有了群舞。

北齐的《兰陵王入阵曲》也曾被编成舞蹈，由一位男性舞者戴面具，穿紫衣，束金腰带，手执鞭，做出指挥、击刺的动作。

西域舞蹈在北朝很受欢迎，当时在北方流行的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

国的音乐中有一些是舞曲。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乐舞瓷扁壶反映了这种情况。该壶高20.5厘米，两面印有相同的胡人跳舞图画，两侧各有两个乐人，左二人吹笛、击掌，右二人弹五弦琵琶、击钹，中间的舞者在莲花座上跳舞，右臂横举，左臂反手叉腰，转首回顾，右腿曲提，左脚踏地，舞姿夸张有力。五人皆高鼻深目，身穿窄袖长衫，腰间系带，脚上穿靴，应是西域民族舞者。

参考书目

-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张承宗等主编：《六朝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 许辉等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89年。
-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
-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柳春藩：《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1981年。
- 王文清、许辉：《两晋史话》，北京出版社，1987年。
- 程应镠：《南北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
- 《中国艺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
- 孔毅：《北魏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

图片索引

《坞壁图》(砖画)	3
曹操像	3
吕布射戟台	4
官渡之战示意图	5
邺城城墙遗址	6
邺城三台遗址	7
云纹瓦当	7
刘备像	8
诸葛亮像	9
太史慈墓	9
孙权像	10
鲁肃墓	10
赤壁之战示意图	11
三国鼎立示意图	12
正始二年造铜弩机	13
玉杯	14
“直百五铢”铜钱	16
南京玄武湖	17
陶耳杯	18
汉魏洛阳金墉城城墙遗址	19
《耕种图》(砖画)	20
《牛耕图》(砖画)	20
《耙地图》(砖画)	21
《扬场图》(砖画)	21
《打连枷图》(砖画)	21
《采桑图》(砖画)	21
司马懿像	23
寿县城墙	24
《驿传图》(砖画)	25
神兽纹铜镜	26

持簸箕陶俑	29
吹箫陶俑	30
抚琴女陶俑	31
费祎墓	32
石头城遗址	34
陶碓	35
永安五年神兽镜	36
“位至三公”铜镜	37
“大泉当千”铜钱	37
陶院落	39
简牍	40
青瓷神兽尊	43
鎏金画纹带神兽镜	44
稟事陶俑	45
写字陶俑	45
《牧马图》(砖画)	46
《屯垦图》(砖画)	46
青瓷猪圈	47
青瓷羊圈	47
陶骑马俑	49
持鞭陶俑	51
持刀陶俑	52
青瓷香熏	54
铁戟	55
陶耳杯	56
持盾陶俑	57
陶女俑	59
青瓷印纹唾壶	60
江苏镇江长江滩涂	62
淝水之战示意图	63

淝水之战战后形势图	64	“冠军将军印”铜印	104
东山	67	“高城侯印”铜印	104
浙江绍兴鹅池	68	“怀州刺史印”铜印	104
江苏镇江招隐寺	69	铜尺	105
青瓷托盏	70	武士陶俑	106
江苏扬州	71	陶马	107
青瓷双柄鸡首壶	72	永固陵石券门	109
青瓷博山炉	73	元羽墓志	110
青瓷莲花尊	74	镇墓陶兽	111
武士俑	75	文吏陶俑（左）	112
萧顺之建陵石刻	76	文官陶俑（右）	112
南京鸡鸣寺	77	牛头鹿角形金饰件	115
梁武帝修陵石天禄	78	马头鹿角形金饰件	116
江苏徐州	80	武士陶俑	119
青瓷褐釉十足砚	81	镶嵌红宝石金面具	120
青瓷狗窝	82	女陶俑	121
青瓷鸡笼	83	彩绘甲骑具装陶俑	122
“亲晋胡王”铜印	85	彩绘按盾武将陶俑	123
“石安韩丑”砖	86	陶牛车	124
“汉兴”铜钱	88	加彩武官陶俑与文官陶俑	127
鎏金鞍桥和马镫	89	独孤信墓志	128
莲花纹瓦当	90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	129
鎏金镂空箭箠饰	91	《职贡图》中的波斯国使像	131
“大秦龙兴化牟古圣”瓦当	92	《职贡图》	131
“太清丰乐”及“凉造新泉”铜钱	94	《职贡图》中的呵跋檀及胡蜜丹国使像	132
“大夏真兴”铜钱	94	胡人头陶像	132
沮渠封戴墓表	95	波斯银币	133
白双且造塔	96	网纹玻璃杯	134
嘉兴元年神兽铜镜	97	银壶	134
木芯鎏金铜片马镫	98	鎏金镶嵌红宝石高足铜杯	135
鸟纹铜牌	99	鎏金银壶	136
圈足铜甗	100	写经残卷	137
“传祚无穷”瓦当	101	《隋书·律历志》关于祖冲之圆周率的记载	139
“河内太守”铜虎符	101	《星象图》（壁画局部）	139
骑马武士陶俑	102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书影）	140
击鼓陶俑	103	指南车模型	141

翻车模型	142
青瓷狮形水注	143
黑褐釉鸡首瓷壶	144
青瓷羊形烛台	145
青瓷印花带盖唾壶	146
窑具	146
青瓷仰覆莲花尊	147
灯树纹锦	149
《水经注》	150
《齐民要术》(书影)	151
阮籍、嵇康	153
《高逸图》(局部)	153
黑釉楼阁佛像陶魂瓶	154
四叶八凤佛兽铜镜	155
佛像壁画	156
石菩萨像	157
彩绘石雕释迦立像	158
石雕胁侍菩萨像	159
彩绘贴金石菩萨像	160
彩绘贴金释迦多宝石造像	161
彩绘贴金释迦石造像	162
彩绘圆雕阿育王石造像	164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	165
北响堂山石窟远景	166
隆绪元年王阿善造像	168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北宋摹本之曹植像	171
《陶渊明集》书影	172
《文选》书影	173
昭明太子读书台	173

咸宁四年吕氏墓砖	175
三体石经	176
《兰亭序帖》(神龙本)	177
《鸭头丸帖》	177
《李广骑射图》画像砖	178
《杨大眼造像记》(拓本)	178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北宋摹本之洛神像	179
贵妇出游画像砖	180
凤凰画像砖	181
娄叡墓壁画《出行图》(小幅)	182
莫高窟第254窟壁画《舍身饲虎图》	183
莫高窟第249窟壁画《狩猎图》	184
青瓷羊	185
青瓷灯	185
瓷男俑与瓷女俑	186
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麒麟	186
骆驼陶俑	187
莫高窟第275窟交脚弥勒菩萨塑像	188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第20窟大佛像	189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第18窟弟子雕像	190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佛像	190
虎头石门墩	191
石柱础	191
孔雀图石浮雕	192
女乐陶俑	193
弹琵琶陶俑(左)	194
彩绘舞蹈陶俑(右)	194
黄釉乐舞图瓷扁壶	195

后记

1997年4月，我从国家文物局调动工作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陈列部主任。时值俞伟超馆长主持的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部分）修改后重新布展。同年9月，历时九年的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以崭新面貌接待观众。在修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俞伟超馆长、杜耀西副馆长等都有在理论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一套书的想法，并积极支持我和陈列部的业务人员着手去做。

这个项目得到陈列部同仁的积极参与。从1997年下半年起开始启动，研究总体体例、编撰细则以及确定每卷撰稿人，接着讨论试写的样章、样条和部分初稿。在这一阶段，王冠英先生、安家瑗女士等给予很大的帮助。1998年先后担任副馆长的孔祥星先生和朱凤瀚先生都竭力支持这一项目。

2000年，朱凤瀚先生担任馆长后，继续把该项目作为馆里的重要任务安排。朱凤瀚先生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要审稿人，对全书从总体体例到各卷具体表述都付出了极大心血。展览部（原陈列部与美工部合并）主任董琦先生负责全书各卷的统筹协调，王永红女士承担了执行编务工作。该套书的编撰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一个部门，成为全馆学术与业务协作的成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部《文物中国史》也就有幸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主编的第一套多卷本古代文物与历史著作问世。

在开始构思这套书时，主要考虑到依托中国通史陈列的各位主创人员，将这套书的定位设计为：“以《中国通史陈列》的内容为主线，侧重反映中国远古以降的物质文明史，突出介绍历代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作为《中国通史陈列》成果的深化和延伸，充分体现学术界几十年来对历史文化遗产综合研究的学术水准，兼顾知识性、通俗性，以物带史，物史结合，全面介绍我国目前的文物考古和历史学科有关最新成果。”全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从原始社会到晚清，分为八卷。

几年来，各卷的作者为了实现本书的定位，作了大量的探索，特别是先动笔的前四卷更是数易其稿。有些作者甚至试写了相当篇幅的不同风格的样稿，不惜自我否定、推翻重来，为最后全书基本统一体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了保证本书的学术质量，各卷又延聘了专家学者审稿。他们严谨的学风和细致的校阅，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一直在研讨如何处理下列问题：

首先，《文物中国史》也是一种中国通史类著作，历史框架的完整性是必须的，例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不应该疏漏和缺席。但是作为博物馆编撰的中国史，主要特点表现在以历史文物为切入点和铺叙基础。难点在于，即使是中国历史文物藏品最丰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使本书还借用了许多全国范围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但文物相对于历史，总是极为残缺的、片段的。各位作者只能在书中粗略勾勒时代背景和演变线索，然后以物质文明史为主线，利用已有的文物，尽可能举一反三，展开描述，以求呈现远为宏大和复杂的历史场景。

其次，学术界最近的研究成果和各卷的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是本书的学术基础。正像我们在讨论新版中国历史陈列大纲时所表达的，要兼顾学术观点的前沿性



和稳定性。对于尚在争论的热点问题，应该清晰地表述主要的不同论点和作者的态度，供读者参考。但是本书的定位又使得上述表述局限于介绍性、结论性的文字，不过多进行考据和反映推理过程。相反，我们希望用生动活泼的、通俗易懂的笔调把学者思维所得向广大非专业读者娓娓道来。在学术与普及之间，这显然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分寸。

第三个问题是全书八卷，涉及十多位作者，前后行文的贯气与不同风格的个性如何协调。大家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全书应该在体例和内容的基本要求方面保持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在叙事方式、语言组织等方面，针对不同时期历史与文物的差异，鼓励作者展现自己的才华，寻找最贴切的格调，在浑然一体中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最后应该特别感谢出版社的朋友们。为了此书的问世，他们也付出了大量的劳动，辛苦共尝，自然值得一同庆贺。

李季

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

北京 中国国家博物馆

